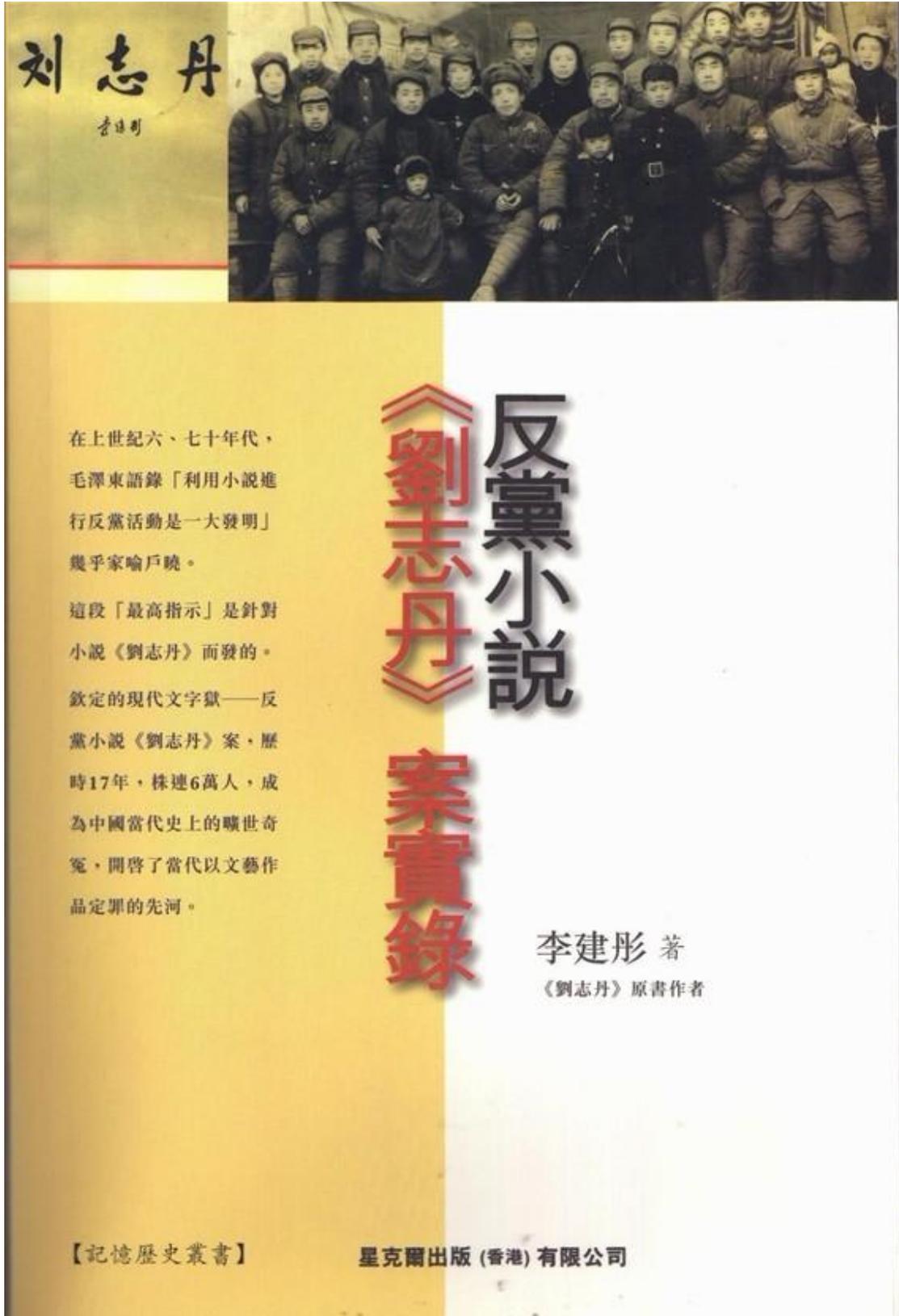


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

李建彤



- 1、引 言
- 2、一九六八年元月八日
- 3、在地下室
- 4、彭、高、习反党集团黑干将
- 5、第一次三堂会审
- 6、思念景范
- 7、白坚之死
- 8、哪个人物是高岗
- 9、造反派联合斗争会
- 10、康生的指示
- 11、造反派中有好人
- 12、挨 打
- 13、解答十个问题
- 14、潘自力
- 15、李治洲
- 16、1962 年给中央的信
- 17、一顿陕北饭引来大祸
- 18、审查创作经费
- 19、朱理治、高锦纯、王兆相、王恩惠和吴台亮
- 20、刘景范被逮捕
- 21、高朗亭专案和赵连璧之死
- 22、华北局斗争张邦英和朱理治
- 23、朋友为我受难
- 24、株连陕西的朋友
- 25、第一次思想汇报
- 26、赵耀先、方仲儒和秦川
- 27、两面派吴岱峰
- 28、李景林的说客
- 29、孩子们去插队
- 30、政治混子李景膺
- 31、请求给景范带用品
- 32、难友们
- 33、关押的「反动分子」
- 34、马文瑞
- 35、背后暗箭
- 36、中央项目组又来了
- 37、贾拓夫之死和马明方专案
- 38、张鹏图和王世泰
- 39、杨明轩老人
- 40、工人出版社的朋友们
- 41、习仲勋和周扬
- 42、苏一平和闻捷
- 43、刘志丹的战友
- 44、难友钱凝

- 45、饺子风波
- 46、少年同窗
- 47、宋克获释
- 48、为刘志丹辩诬
- 49、驳阎红彦
- 50、钱瑛
- 51、张秀山和张策
- 52、交锋
- 53、陕甘宁边区是黑窝吗
- 54、谁在剽窃
- 55、我是“基督徒”
- 56、拒绝“解放”
- 57、火车上
- 58、在上海的回忆
- 59、寻找小女儿
- 60、五七干校
- 61、养猪班长
- 62、阿姨挨整
- 63、养猪遭陷害
- 64、中央项目组追来了
- 65、遭遇雷击
- 66、好汉只怕病来磨
- 67、何长工
- 68、小女儿回京
- 69、书的故事
- 70、两个樟木箱
- 71、难以捉摸的张舫
- 72、去南昌
- 73、在农家做客
- 74、群众批判会
- 75、申诉还是翻案
- 76、女儿来了
- 77、孩子们的苦与乐
- 78、回到北京
- 79、小脚侦缉队
- 80、中央项目组找上门
- 81、孩子们去探监
- 82、营救景范
- 83、刘景范出狱
- 84、劫后遇故人
- 85、患难与共的朋友
- 86、根据地乡亲遭难
- 87、招待所里的怪事
- 88、悼念周恩来总理

- 89、打倒了四人帮
- 90、冤案昭雪

1、引言

这桩公案是由一部小说《刘志丹》引起的，折腾了 17 年，株连约 6 万人，致死上千人。一本小说造成的冤狱，可称是中国之最，世界少见。

刘志丹是 1920 年代的革命者。他一生坎坷，意志坚强，生命短暂，牺牲时年仅 33 岁。以他为主要领导者，创建了陕甘宁边界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在 30 年代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1936 年刘志丹参加了红军东征，牺牲在山西。周恩来题颂他为“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小说《刘志丹》是写他的一生经历，从他的经历中带出陕甘宁边界根据地的发展，本应无可非议，谁知却遭灭顶之灾。

文革结束，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反党小说”《刘志丹》的这桩公案，想弄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能如此惊天动地，牵连那么多人？还有些人关心我的状况，问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也有人想知道，这个案子的来势那么大，我是怎样争取平反的；有不少了解此案的朋友也曾劝我：“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吧！留给后人，作为他们的一面镜子，以此为鉴，免得这类悲剧再次发生！”我的朋友认真地说：“要写快点写，年龄越来越大，怕要忘记了。”朋友说：“这个案子的经历，还是你自己写出来为好，以后让别人写，就差劲了。”这都促使我提笔写这个事件，给社会留下这本历史记录。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历史，而且是国家的历史，是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历史，是中外古今稀有的奇案。

这个案子，我不能写成小说，只能写记实，把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把我当时的思想情绪记录下来。从哪里开始呢？再三考虑，不能从头写，如从头写，怕又说是攻击了哪位伟人。我只能从中间开始，让镜头折射，把 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先撇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写。我开始翻阅数据。资料像汪洋大海：自己收藏的，平反后退还的，有报纸、传单、小报，我被迫写的“检讨”、“交代”、“思想汇报”、“证明”，几百次提审的“供词”、“记录”，合起来有几百万字。这个案子经历了从 1962 年到 1979 年的 17 年。这 17 年中，除文字记载外，还有那

些刻骨铭心留在我记忆中和朋友记忆中的东西。我一定按事实的本来面目写。对于应该写的人物，哪怕是他后来起了变化，或犯了严重错误，我也要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而且以后也不准备修改，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他们受过我的株连，被康生的项目人员提审过，被造反派围攻过，甚至挨过打，坐过牢，发配过，有的险些丧生。下边就先从 1968 年元月说起：

2、一九六八年元月八日

1962 年秋，我写的小说《刘志丹》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定为“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我写的是 30 年代的事，怎能为 50 年代的高岗事件翻案呢？文革以来，我家门口就贴上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的这本小说，能推翻一个若大的政权？当时我很震惊：这是御批呀！使我悲愤，寒心，也够我光荣一辈子了。康生居然还说：“那本小说是篡党纲领。”

文革前我家住在北京西城丰盛胡同 2 号那个大红门院内。1962 年 8 月以前生活是正常的。八届十中全会后，这院里就起了风波。康生领导的项目委员会经常把我的老伴刘景范叫去审问，有时也把我叫去审问。文革期间，康生到处说：“要清算小说《刘志丹》这笔账。”他觉得北京的造反派不够用，又特地调来天津南开大学的“八一八造反兵团”。一到我们机关就亮出招牌：“我们是奉康老之命来的！”他们在北京组织各大学造反派成立了一个“六二项目兵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因为我这个案子是 62 年发生的。用这个名目在我家大门口贴了“勒令”说明：这院子里住的“反党分子”——刘、李是他们掌握着的，谁也别来抢。康生把从我家收走的采访记录交给了造反兵团，让他们照记录上的名字通知各地造反派揪人。全国各地造反派都跑到我家来批斗，进进出出不断。

1968 年 1 月 8 日上午，我和景范分别被拉到地质部和中国地质科学院批斗。围着我的有五、六个人，问话内容和中央项目委员会类似，无非是：“为什么写小说？”之类。他们都是年轻人，都是上当受骗的，我不想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只是平心静气地对答。磨蹭到中午，有个女干部给我端来一碗大米饭，一碗白菜

豆腐汤。我吃过饭，他们就押上我直奔西四羊肉胡同的地质部礼堂，再次开我们的斗争会。会场布置得真隆重。从大门口到礼堂内都贴着大标语，大字报，红绿黄白全有。礼堂舞台上挂着横幅大标语：“斗争反党分子刘景范、李建彤大会”。仰头一看，真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都有，我顾不得辨人脸就被拉上了舞台。我们两人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我们已是老演员，上这样的舞台已数不清多少次了。我以演员的心情在台上环视周围：台上坐的主审人有地质部造反派，有中央组织部造反派，还有穿军衣的。

景范讲过，把他一个人拉到地质部斗时，每次都有穿军衣的，不知是“支左”人员，还是康生派的什么人。“支左”的意思是，谁左得出奇，他们就支持谁。不过，在我们这出戏里，他们是主张“大联合”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联合起来斗争刘景范。斗争会就是“火线”，在火线上练兵，谁斗得最凶，谁最革命。他们比1935年王明左倾路线斗人的花样并不少。每次斗争刘景范时，都是无情斗争：拉过来，推过去，拧膀子，坐“喷气式”，站几个小时也不让休息，不许靠墙，不许扶桌子，不许伸腰，不许上厕所，也不管他病体如何。每次被斗回来，景范总是满身汗透，躺下半天不能动。真是落在了法西斯手中。看到他这样，我就想：你们知道吗？他在陕北土地革命中，当过陕甘宁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当过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难道就该落到这么个下场？你们就该这样对待他？陕北人拿小米饭喂出些仇人来。既有今天，何必当初呢？

我俩并排站着，要弯下腰，不许抬头。我一抬眼，看见许多照相机，还有闪光灯。明白了，他们要拍记录片呀！我一闪念：“哼！没门儿！我俩不给你们弯腰低头！”我突然把腰直了起来，仰起头，眼角一扫，景范早把腰直了起来。押解人就按我们的头。按下去，我们再抬起来。再按，再抬起来，咱们就好好演这场戏吧！主席台上的人发言了，无非是揭发批判，给我的小说《刘志丹》捏造些极可笑的罪名，再把陕北的干部诬蔑一番。我听腻了，他们要我开口：“小说是谁让你写的？”“我自己喜欢写，不要诬赖别人”，我给碰了回去，惹来一片口号声。我深知这时越说实话越有罪。穿军衣的人站出来大声说：“我们要把这些”反党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又拿出一张纸摇了摇“看这是什么？上级已经批准，要把你们带走！”我恨得直咬牙，谁批准

的谁就欠下一笔债，不是欠我们的债，是欠中国人民的债！在一片打倒声中，景范被他们带走了。另外一些人把我从后台架出来，一直押回家。

进门一看，原来他们又在抄我的家，已经抄得乱七八糟。穿军衣的人命令我：“给刘景范拿被褥，洗漱用具！”原来他们把景范送进了卫戍区。就是因为我写了一本小说，就足以造成丈夫被捕？我沉着心，给景范拿东西，同时观察着他们。突然，我叫着要吃饭。他们无理由禁止，因为已是下午五点多。光线渐暗，我家的老阿姨还守在家里。她在我面前的桌上放了一个馒头，一碗土豆白菜肉片汤。我理直气壮地坐在桌前吃着。有个造反派“哼”了一声。我眼皮不抬地吃着，管他们围着多少人呢！这些人中有三、四个穿军衣的。我心里说：“我要吃饱，今天他们不知把我往哪里送，我得贮备点力气，不吃饭哪能行？”我吃了半个馒头，再吃半个。他们正在抄家，一些人监视着我。我吃着，他们坐着。

我吃完了，被他们拉出大门，上了吉普车。往哪里开？我不管，只是望着车前的玻璃，却什么也没看见。脑子里在放电影。隆冬季节，狂风怪吼，群魔乱舞。人的心灵被扭曲了，已是六亲不认，彼此用仇恨的眼光审视对方。我心想，把我送到哪里都无所谓，早准备好了。1962年冬，中央项目委员会把我叫到中组部会审时间问我：“你有什么打算？”我说：“坐牢！你们看，我的旧大衣已修好，随时去坐牢，再冷的地方也不怕！”他们没有把我和景范送到同一个地方，把我送到三里河百万庄的中国地质科学研究所，关在地下室里。

3、在地下室

多么阴暗的地下室！黑咕隆冬的两端看不到尽头，像煤矿的坑道。中间一个小房间已为我放了张木板床。两个女人押我进去，开了灯，我往床上一坐，她们便把门锁上，走了。我很疲倦，该躺下睡一觉了。躺下仰着脸，望着房顶和墙上吊着的暖气包，发着砰砰的响声，像要往我身上砸下来。这个地下室里只有我一个人。虽然已被审了6年，不管是三堂会审，还是群众斗争，我从来未曾失眠。我的神经也许是天生很健全，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骂时就痛痛快快地骂一顿。谁想制服我，那是难上难。可是这个晚上，我失眠了。那两个女看守每隔一小时就来开一次锁，看看我。我也睁着眼看她们，彼此无言。她们悄声退出去，噤噤

喳喳在黑暗中不知在说什么。

我继续想我的：今天斗争会上，他们提出了十大罪状：

“《刘志丹》是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和李建彤合伙写的。”岂有此理！你们审查了6年，难道不曾见到最初的草稿？可曾发现过他们写的一个字？

“刘景范的家庭是大地主！”这和1935年王明路线时逮捕刘志丹唱的是一个调子。那时也是说刘志丹是大地主的儿子，现在又老调重弹。这是明批刘景范，暗批刘志丹。凡是看过政务院《划分阶级成分决定》的人就应该知道，不出租土地就不是地主。

“刘景范包庇彭德怀！”彭德怀用得着刘景范包庇吗？大跃进谎报产量，百姓挨饿，死了那么多人，彭老总为百姓说话就被罢了官。

“刘景范和高岗反党集团有关系”。从前没听说过有个“高岗反党集团”，只听见传达中央《关于增强党内团结的决定》说有个“高、饶联盟”。那时对刘少奇有意见就是反党。现在公开叫着“打倒刘少奇！”这和那个“决定”有没有矛盾？

“刘景范是假党员！”刘景范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的来信还在我手里，我有证据。

这些罪状就是1935年王明路线在陕北搞“肃反”的腔调。刘志丹他们为此坐了牢，今日又旧戏新演，老调重弹。我要反驳！一切证据都在我手上，在我脑子里。那十条罪状全是假的。看着军人也上台大吼大叫，被坏人牵着鼻子走，真使人痛心！刘志丹是西北红军的创始人，刘景范也是红军组织者。如今只因我以刘志丹历史为题材写了一部小说，穿军衣的竟然也大叫着要把我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世事颠倒，如此荒唐！中央组织部造反派也在大会上胡说八道。原来的部长安子文曾是我们这个项目委员会的秘书长。1962年后，他听从康生指挥，对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进行审问。可是在去年满街敲锣打鼓拉着老干部，老将军游街时，安子文部长也被游了街，在中直礼堂开了批斗大会，说他是叛徒，还在他脖子上戴了个几十斤重的大铁环，很让人吃惊和

同情。如今上台发言的当然不再是他指挥的，而是新部长指挥的了。新部长是“夺权”上来的。

地下室无处吃饭。第二天还是那两个女人押着我去食堂吃饭。人们都像看怪物一样望着我，也有个别熟悉的脸不敢打招呼。轮到我买饭时，我挑最好的菜红烧牛肉买了两份，一个馒头，拿回地下室一顿吃了下去。他们背后议论说：“她倒能吃。”我想：“平常我不爱吃肉，可是现在一夜不睡觉，不吃这些怎么行？只要你们允许买，我就吃。”到半夜，我觉得头晕，心想千万别病了，我现在决不能生病。我被锁在地下室的第二天，另一个女看守把我带到地下室的小会议室，要我打扫卫生，这是给我安排工作了。她指点着，我扫着地，她叹了口气：“唉！既然犯了罪，只有这样干吧！”我抬头看看，这姑娘不过二十五、六岁，脸上有块黑痣，听口音是个老北京。我不答话，她也不作声，给我提来个暖水瓶，拿来两个大白碗，一双筷子，“这是你吃饭用的，以后要开水，告诉我一声。”然后把我送进小屋，锁上门走了。我断定这是个执行者，没有恶意。

4、彭、高、习反党集团黑干将

白天去吃饭时，看见大院里满是大字报，还有漫画，自然也有画我的。我只能用眼扫一下。因为我是被人押着走，不允许站住看。只见画我的漫画上写着：“泡制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反党分子’李建彤是‘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这又够我想一夜的。我又升级成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干将，真是高抬我了。如果我能为彭德怀帮上一丁点忙，我当认为是永生的光荣！

那一年，毛泽东提出：钢铁要赶英超美，“钢元帅升帐”，各机关大炼钢铁，一切工作统统为炼钢让路。农村里搞人海战术，都去炼钢，粮食就没人种，没人收了。农民做饭用的铁锅铁勺都收走当废铁炼了。农村搞“共产”，吃大锅饭，百姓不许在家生火做饭，农民从吃饱，到吃不饱，到挨饿，到饿死。其实那阵子我们家已开始每顿按定量蒸饭，每碗饭二两，每人一碗。我父亲饭量大，我只得分一半给他，每顿我只吃一两。全家我是第一个浮肿的。1958年我到陕西采访，一下乡沿路买不到吃的，这里可是陕西关中的米粮川。我和画家石鲁一同到三原

县午字区访问当地老干部黄子祥。到了中午，黄子祥给我们拿出两个麦面馍馍，我和石鲁啃着干馍，还高兴得不行。因为我们早上5点在西安吃的饭，一路上再也买不到吃的，已经饿透了。吃着馍，我想黄子祥是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住在乡下，我们吃的馍馍可能是他的老红军补助粮吧，真剥削他老人家了。

1959年，我的同学白莉来看我，她是医院院长。她告诉我带医疗队刚从河南信阳回来，那里的情况简直不能提。她悄悄说：“人都饿坏了。今天刚给这家看了病，明天再去就没人了。死的死，逃的逃。这话你可千万不能说，一说咱都成‘反革命’了。”那时候，我经常喝“小球藻”。“小球藻”是什么做的？有人说是脏水做的，有人说是骗人的，有人说可以治浮肿，我也不问青红皂白，反正是机关发给我的，就喝下去了。这天，田星的孩子来看我，一进门就说：“阿姨，真把我气死了，我们学校会餐，每人发了两个肉丸子两个馒头，我吃了一个，留下一个馒头夹着个丸子拿回家给我妈吃，我妈当时就塞到我姥姥嘴里了。我妈肿得比谁都厉害！”我笑着说：“你顾你妈，她顾她妈嘛！”我心里发酸，田星的丈夫曹力如（注1）1949年就去世了，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受尽了艰难。平常年月还可过，遇上这个自然灾害，她怎能贴得起3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粮食？我说：“毛英，你真有福，昨天有个伯伯从西北带来些青海的干鱼，新疆的葡萄干，给你些拿回去解馋吧！”打发走毛英，我又想起了李力群（高岗夫人），她也是带着一群没有爸的孩子。不管别人怎样说，她还是我的同学，孩子是革命后代。我拿了几条干鱼，两盒葡萄干给她送去了。恰巧碰上她不在家，我对看门的老头儿说：“我是李力群的同学，这是送给孩子们吃的。”

我身边的干部和高级干部都是这样生活的，普通老百姓就更是苦不堪言了。中国的老百姓真好，都忍着什么也不说。可是彭德怀说话了。在庐山会议上把问题提了出来：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谎报，粮食没有收那么多，百姓饿了肚子，太冒进了，有些地方太“左”，共产风刮乱了！这本是为民请命，却被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我同情他老人家，可没有胆量说出口，怕戴那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康生却说：“李建彤写的小说比彭德怀的万言书还恶毒！”我什么地方恶毒？不就是反对右倾，又反对了“左”倾么。既然“左”倾统治时间最长，对革命危害最大，我的小说刚好就是写那个年代，反“左”反得尖锐些，这就触

犯了天颜。

我想起在西北时，彭老总的行为令人尊重，当时他是西北局的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西北局在陕北绥德义合镇召开土地会议，传达华北土地会议精神。在那个会上斗争了许多老干部，刘景范也在被斗之列，因为有人揭发他主张照顾老区在土地革命后由贫雇农变成的新富农。那时刘景范不在后方，兼任第一野战军后勤司令，在前方和彭老总朝夕相处，彼此了解很深。后方给前方发电报要刘景范回去，彭老总挡了驾。他明白刘景范回去是要挨莫名其妙的批斗，便给后方回电话推说前方需要。后来在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毛泽东同意了刘景范的意见，纠正了西北土改中的偏差。1954年，因为高岗问题在北京饭店开了西北历史座谈会。原先在陕北土地革命犯过“左”倾错误的人趁机翻案，要重新斗争习仲勋和刘景范。刘景范气得不说话，出来进去都绷着脸。有一天，刚走出饭店门口，彭老总叫住刘景范笑着说：“你愁什么？我主持会议，心中有数，谁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我都清楚。”

到了文革，在我被抓以前，有个河北师范学院学生跑到我家说：“彭德怀被揪回来了，在北京航空学院挨斗，斗得很惨！有打的，有踢的。”他年纪那么大，脾气那么倔，怎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我问那个学生：“有人保护吗？”学生说：“北京的‘天派’、‘地派’都不保护他。只有我们这些不出名的学生暗中保护他，也使不上劲儿，他们的势力很大，有中央文革指使。”那学生走后，我的心揪成个疙瘩。现在怎么又把彭德怀和高岗连到一起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1962年，我的小说被康生点名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把某些人的揭发材料抛了出来：“就是等这一天的，你们果然写起了小说。”一听这话，我觉得领导人够阴的。原来被揭发的第一人就是彭德怀，说彭在高岗家里谈话，谈的内容是对刘少奇的土地政策有意见。这就是他们的“反党活动”。被揭发的第二个人就是习仲勋，说习不同意揭发彭德怀：“高岗出了问题，拉扯长征干部干什么？”第三个就是揭发刘景范，说当时刘也在习家里，也表示不同意：“不能胡拉扯！”这样就得出了结论：习仲勋和刘景范包庇彭德怀。彭真说：“这个揭发早就有了，中央宽大，是观察你们，看改正不改正。结果你们谁也不改，反而合伙写了反党小说，这账要一块算了。”小说《刘志丹》和彭德怀对土改政策有意见能拉扯在

一起吗？

到了文革，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和康生一捏合，把1962年定的“习、贾、刘反党集团”提升为“彭、高、习反党集团”了。他们的理由是彭德怀在西北工作多年，和西北干部关系密切。凡是长征干部，哪个没有在西北工作多年。难道只有彭德怀一个人和西北干部关系密切？刘澜涛是西北干部，却对土地革命时的干部一点感情也没有。文革一开始，他的劲头很大，提出西北文革就是要批判“习、贾、刘”和彭、高、习反党集团”。他在西北整了一年多，从上到下人人自危。没想到康生在北京、天津又策划了南开大学揪“叛徒集团”，把刘澜涛也揪了进去。刘澜涛那么卖力气，只落得和习仲勋一块挨斗，同行游街。前个时候，听说康生派人把习仲勋从河南洛阳揪到了西安。不久，北京街上就贴出了斗争会的照片。照片上有习仲勋，也有刘澜涛，都弯着腰，被人按着头。我一见照片就心中起火，是我写小说株连了习仲勋。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弄到这个下场，我决不能允许这张照片在北京街上存在！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了张寻人启事，趁天刚亮，街上没人，跑到中组部门口把那张照片盖上了。我实在对不起他们！我能力挽这场恶浪吗？

5、第一次三堂会审

三天三夜未合眼，实在有些头痛脑胀。长此下去，怕要神经失常了。我要求吃安眠药。在地下室睡不着，他们把我搬上一层楼几个女看守合用的办公室里。中午人们都去吃饭时，我的两个女儿跑来给我送粮票、钱、褥子和脸盆。我问：“你爸爸有消息吗？”孩子们说：“他们那里也来取过粮票，不让人去看。”“他在哪里？”“不知道！”孩子们含着眼泪。“家里什么样子？”“都抄光了。咱家北房和东西房都被贴了封条，把我们都赶到厨房里睡觉。他们要赶阿姨走，阿姨哭了说：“你们把他们的爹妈叫回来，我就走。不叫回来，我不能走。这些孩子交给谁？毛主席不是说过，能拉过来一个就拉过来一个，我要拉住这3个孩子。”我点点头，心里笑着：“淑敏大姐满有水平，她能对付那些坏家伙。”孩子不敢多待，匆匆忙忙走了。这一下就闯了乱子，几个女人慌张起来：“谁看你来了？看你得通过我们。上边有命令！”我没言语，心里想孩子们不知道我住在这里，总是有人指点着才进来的。这天晚上，他们给我吃了安眠药，总算是睡了。半夜醒

来，外间开着灯，可以照到我床边。抬眼看见两个男人睡在两张长桌上，原来他们是看守。

我坐在小床上发呆，想起1962年10月，康生领导的项目委员会把我叫到中组部会议室接受“三堂会审”，就是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监察委员会三大机关组成的项目委员会，康生是主任，安子文是秘书长。但这一天，他俩没出场，出场的有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处长杨以希；中宣部方面应该是副部长张子意出面，但张没露面，只来了处长王谟和苏蓓。中监委有副书记钱瑛、伍云甫和处长李振海。我一看那阵容还算蛮强的哩！虽非一号人物，也都是二、三号人物。我是被审者，坐下听他们发话，钱瑛先开口。这个女人，我认识，平常还称她“大姐”呢。她说：“受中央委托，要我们审查你那本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你说说写作过程吧！”我从中宣部拟定的宣传烈士名单，工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向我约稿谈起，然后谈到采访和写书。钱瑛冷冷地说：“你没参加过土地革命，这书你能写么？还不是得要习仲勋、刘景范他们写。”看样子，他们要小题大做，往习、刘两人身上赖，我内心起火，出言也不逊：“你们是审案子还是大会餐？如果是审案子，那就要实事求是，如果是会餐，就嫌杀一只鸡不过瘾，非杀两头牛不可。杀我不解气，就想杀习仲勋和刘景范？”王谟眯缝着眼说：“要说实话，不能隐瞒！”我说：“我说的全是实话，你们要实事求是”杨以希忽地站了起来：“谁不实事求是？”我说：“你们！”全体都站了起来：“态度要端正！”空气一阵紧张，我倒冷静下来，仔细察看他们的脸，然后说：“今天诸位在审我。我却在透视诸位的灵魂，丑话说在前边，将来诸位都在我的小说中！”一阵沉默，大家又坐下。

中监委副书记伍云甫上阵：“你为什么把高岗写成好人？”我正身端坐，发起议论：“同志们，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我能把红军政委写成坏蛋吗？你们大家说说，能不能？如果今天不能定，就请示中央！况且，我并没有写高岗，仅用了他的一点素材而已。”他们面面相觑，无言以答。乔明甫解了围：“你那书中的问题多得很，我们今天顾不上说。”我看这个人瘦得可怜，据说是坐牢太久，折磨坏了，我不忍心顶他。见我不说话，他又说：“高岗是什么人？中央早作了决定。他是反党头子，你为什么要宣传他？”“我没有写高岗。”王谟问：“罗炎

是谁？”“罗炎是5个人的材料组成的，共出场7次，你说他是谁？”“用一点材料也不行！”我心中有火，只按住不发，说：“列宁是怎么对待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列宁夫人回忆录中还谈到列宁第一次要见普列汉诺夫时是那样激动，难道这也是为普列汉诺夫翻案？普列汉诺夫早已被定为背叛马克思主义了。高岗虽然不能和普列汉诺夫相比，就算他是中国老根据地的一个村长吧，也是在革命队伍里呀！难道被定为“反党分子”之后就一点不能再提？”王谟说：“中国和外国不一样，中国有中国的情况。”我心想，你还是中宣部的处长呢，连这点常识也没有。那叫历史唯物主义！苏联人讲，难道中国就不讲了？

我还是要反驳：“中国也有先例。我根据《毛选》写的，《毛选》第三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中央到陕北后挽救了陕北的危机。第10条注释中说：“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过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我说到这里，不知谁冒了句：“你倒背得熟！”“我不背行么？我要照这个精神写小说。什么时候《毛选》上把这篇文章改了，我什么时候改小说，绝对不会用高岗一点材料。照《毛选》写，我没有错误，虽然这也是违背历史的。”

我又睡不着了，这比在地下室更糟。他们每晚开着灯监视我。我倒不怕监视，怕的是那个长明的日光灯照得人难以入睡。我躺下后在心里背着“老三篇”。这是最时髦的，人人都必须背的，否则就会遭到刁难。我一早起来就要求代我买一套《毛选》，我只带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因为要在这里以《毛选》来对付《毛选》，否则就难过日子。中午《毛选》买来了，我一翻目录，那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在，只在注释第10条删去了“高岗”二字。我不禁从内心发出冷笑：好个康生，偷偷改掉也算你输了！我仍坐在小床上拿着《毛选》沈思。自那次我提出《毛选》上有高岗之后，1964年听说康生把《毛选》中的“高岗”二字抹掉了。不过，我早走在前边，1962年9月报刊上发表的《刘志丹》片断早已没有高岗的材料。他们手中拿的是废稿。对此，我还是有许多疑问：原来写这条注释时可曾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如果他不同意，能编入他的著

作吗？1964年修改时是否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他的文章能随便修改吗？

6、思念景范

在地下室和一层办公室住的那几天，他们已在为我准备“新居”，终于要我搬家了。“新居”是地质科学院主楼东头一层医务室斜对门的114号。这是一间约18平方米的办公室，东面临街，有个大窗子，窗前放个三屉桌，两把椅子，靠北墙放了一张单人床，是给看守人员和“提审官”们坐的。桌上还有电话，可以随时报警，特别放了个记录本，一瓶蓝墨水，供看守做记录。靠西头约有2平方米的地方用木板隔了一个木笼子，开了个小门儿，门上方有块小玻璃，看守可以随时窥视。里面放了一张小木板床，一张两屉桌，一个方凳，屋顶上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灯。这就是我的囚室。我给自己铺床，床板很脏，还有两个碗口大的窟窿。我要了几张旧报纸铺在板上，再铺上褥子和床单。看来我要在这里长住，必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我坐在桌前看《毛选》，准备从头通读一遍。不看《毛选》再无书可看，全国只有这一本书。

一个上午，我才看了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看守每隔10分钟就进来看一次，扰得我心烦。我随时都在走神，又想起1月8日斗争会，我必须反驳。我向值班人员要求去买东西。他问：“你要买什么？”“我什么也没带来，我需要纸、笔记本，我要写学习笔记”。一男一女两个看守对视了一下说：“上级有命令，必需的东西允许买。”下午，他们押着我到甘家口商场走了一趟，我买了几个笔记本、稿纸、红蓝墨水和两支蘸水钢笔，还到书店买了一本毛泽东字帖。我问押解人员：“能买吃的么？”“买什么？”“茶叶，我满口都烂了，嘴唇也干裂，需要点茶叶。”他们点了头，我买了一盒绿茶。

我买的那本毛泽东字帖是想送给景范的。我在上面写了“刘景范”三个字，下面写上“地质科学院”。如果能把这东西送给他，他一见我的字，就知道我的下落了。我把写好的字帖交给看守说：“请把字帖转给刘景范吧，他喜欢毛主席的字，也喜欢写毛笔字。”那个看守拿走了。不久，来了个操徐州口音的人拿着字帖，板着脸说：“这字帖不能转。上边有命令，不许你给刘景范送东西。”我的打算落了空。景范现在在哪里？他在想什么？他的性格那么刚烈，这么冤枉能把

他气死。他有肝病，有十二指肠溃疡。这一年多来，每次斗争会后，他都用水袋捂着肚子，胃疼吃不下饭，发烧。他的身体已经垮了。从1962年10月后，他没舒展过一天，这个批判，那个审查。我算把他坑害苦了。不是我答应工人出版社写这本小说，哪会引来这么大的祸？其实，在我写书时，刘景范谈得很少。自己没参与过的事，他不会说。1960年以后，倒是我和他聊天时滔滔不绝地告诉他许多史料，许多事他还是从我这里听说的。

记得是1962年10月23日晚上，他的体温又一次升高。那是个大风天，中组部找他谈了3个小时。项目委员会把他抓得很紧，一次又一次逼他，非要让他按照他们的想法交待。景范被他们逼得已经住过几次医院了。首都医院已经诊断景范是初期肝硬变。这两年把他到处拉着斗，拳打脚踢，按头拧脖子。他哪能受得了？这次，他能活着回来么？去年，南开大学“八一八”找来一批大学生，要把他拉到《工人日报》斗，《工人日报》在北城外的六铺炕，离西城的丰盛胡同那么远，我见那些人贼眉鼠眼，凶神恶煞的，真担心他们走到无人处会谋害他，因为我怀疑有坏人背后唆使。历史上因不同政见而杀人者常有，我便让儿子和他的朋友在后面跟着，两个都是大高个儿的中学生。那次真险，直到半夜才回来，是两个中学生护着回家来的。

我坐在木笼子里想到天黑，硬塞了几口饭，已经上了灯。那个女看守走进小木笼，操着青岛口音问：“你束的什么裤带？”我拉起衣服给她看，是一条线织皮带。她是看我能不能用裤带上吊自杀。然后就查找有没有剪子、刀子、针线。我从提包里取出这些日用品，她全拿走了。我说了声“谢谢，你很细心。但请你转告大家都放心，我这种人不会自杀！除非有人暗杀我。”她点点头。后来听到看守在交班，值夜班的是两个男人，有一个操广东口音，很凶，刚坐下来就对同伴说：“留着这种人干什么？不如一刀杀了痛快。留着叫她反党？还得管饭吃，又得用人看着！”我借口扔废纸，出木笼走一趟。一看这家伙像个屠夫，够恐怖的。我还真得防他一手。如今世道没有保障，他真把我一刀砍了也不会有罪。有人会说他是出于“革命义愤”，他会成为“革命英雄”。如果他不是共产党员，有人还会马上介绍他入党。他是拿起真刀真枪“闹革命”的。我是被中央点了名的死案。谁敢替我说话？我这个50岁的老太婆怎能对付得了一个大彪形大汉？他会

把我掐死。今晚我主要的任务是防身，时刻警惕着坏人的谋杀。我把蘸水钢笔放在床头，万一有事，可暂作武器用，我也要“文攻武卫”。屋顶上的灯整夜亮着。开关在外边，归他们管，我不能自由开关。这灯光，要写字显得暗了，要睡觉就照得晃眼，这就是“犯人”的待遇。他们每隔十分钟就从玻璃窗往里窥视一次，看我在干什么。然后，听见他们在纸上丝丝响地做记录。十分钟作一次记录，一天 24 小时要作多少记录？我只得躺着闭眼回忆往事。这一晚的回忆就没有离开过景范：他肯定比我更惨，可能是背着枪的人整夜站在他床前。深更半夜里，那些人不知怎么折磨他呢。

记得我见过他写的一篇记要：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有一天下午，他被通知到彭真的会客室里，见彭真和中组部长安子文都已坐在那里等着。刚坐下彭真就说：“你写的《刘志丹》是一本反党小说，篡改了历史，为高岗树碑立传，是为高岗翻案的。”看到这里，我觉得这不是彭真的思想，他不认识刘志丹。这是 1935 年那些杀人者的思想。他们在把这本书的问题引上了歧路。我在地质学院见过陕西省的几张小报，是康生支持的那一派出的，报上说：“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谢子长才是正确路线。”现在他们竟然要为王明路线翻案了。要推翻中央在延安做的历史结论。景范的记要中还写道：彭真说，习仲勋是里通外国的。这本小说不过是导火线。高岗反党集团的问题，过去中央采取不扩大的政策，没有彻底解决，这次要彻底解决了，你要彻底交代问题。你们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我很吃惊，彭真这人并不坏，怎能这样提问题。他们把毛泽东当成挡箭牌，对谁有意见，都扣上个“反对毛主席”的帽子。这次要彻底解决“高岗反党集团”的问题，什么时候定的这个集团？反对谁了？谁代表党？他们要怎么解决？

我也看到了景范的答辩：“从前传说的那些话，高岗说毛主席都知道。他们在会上的发言都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我心想：谁去向毛泽东对证呢，他会承认吗？景范也只好吃哑吧亏了。我深深知道，陕甘地区的干部对毛泽东的感情最深。因为 1935 年他们都被押在瓦窑堡监狱。将要被活埋时，中央红军到了，发现那里在搞“肃反”，狂捕乱杀，就把他们放了出来。虽然解决的不彻底，比如他们还戴着右倾错误的帽子（1945 年七大才得以平反），但总算从监狱中放了出来。从此以后，他们就绝对相信毛泽东，服从毛泽东，没有说过一句不满的话。

虽然全国解放后，国家内部出了那么多问题，他们都没有批评过，默默地干着他们该干的工作。在高岗问题上，景范默默地承受着强加在他头上罪名。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就把他的职务连降三级，从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当时全国只有4个委员会，即政法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都比部高一级）降到地质部副部长，可是他不在乎，做他应做的一切。

就在彭真约他谈话的当天下午3点左右。中组部长打电话要景范把我写书的草稿全部送去。景范答：“你派人来向李建彤要吧。”很快就来了几个人，我把文件柜打开，他们把所有的草稿全拿走了。又隔了两天，由安子文主持，在中组部又开了对刘景范的斗争会。他们说，经过写《刘志丹》又把“西北反党集团”组织起来了。想不到，又捏造出个“西北反党集团”来了。难道陕甘和陕北老根据地的老红军都成了“反党集团”？他们又说：“工人出版社是受欺骗的！”工人出版社绝对说不出这句话。在康生派中宣部王谟去逼供时，就遭到社长高丽生的抵抗，高毫不犹豫地说：“这书是好书！”安子文说：“阎红彦对这本书提出几十条意见，他立下了汗马之功。”阎才是真正要害陕北干部的人。1935年，陕北“肃反”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北方局来的人听了这些人的造谣，才错杀了那么多人。他们还说：中央已另派人找习仲勋、马文瑞谈话，要他们交代问题。可见习仲勋、马文瑞、贾拓夫都遭到了和刘景范同样的命运。

当天下午，中组部副部长和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来收走了我的全部采访记录和书稿。我并不发慌，他们临出门时，我喊道：“何老，我的采访记录18本，将来可要如数还我。”我相信最终会胜利。又过了两天，中组部的乔明甫和地质部副部长李轩又来了，收走了刘景范保存的一野时期留下的枪支。再隔一天，又在中组部开了对刘景范的斗争会，是钱瑛主持的。她先发言：“中央不说话，我们也不敢动你，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还是代主席嘛！受了中央委托，我们才找你来，你那份检讨不行。写小说《刘志丹》是个阴谋，你们早预谋好了，人证、物证俱在。”她扔出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我写的《刘志丹在桥山》，另一本是在《解放军三十年》上刊登的刘景范写的《太白收枪》。为什么陕北人写回忆就是阴谋？景范冷静地怒视着他们，内心冷笑。钱瑛说：“你们在西安有个地下印刷厂，要不然，谁给你们印刷呢？”想到这里，我觉得特别可笑。你们都写回

忆录，难道你们都有个地下印刷厂？钱瑛是王明路线的宠儿，在湖北杀了多少共产党好干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康生、阎红彦、钱瑛都是“左”倾一条线上的，他们几十年来目标是一致的，要实现他们的野心。景范这次又落入了魔掌！这是二次的“陕北肃反”了。这次受难的时间将会更长，我悄悄流出眼泪。

7、白坚之死

项目人员抓得很紧，我刚进来几天，就叫我写自传。自从1962年以后，我写过无数次自传，今天一个机关要一份，明天另一个造反组织要一份。到了这里，还要写。我的历史不就是那些熟套子吗？可我还是答应了，不答应不行。再说，我想利用这点时间，反驳1月8日斗争大会上揭发的假材料。我需要纸张，需要安静。答应写自传，就可以偷天换日写反驳。自然要做得机密点，被发现后会没收的。看守10分钟到木笼看我一次，我必须隔10分钟换一次纸，把他们要我写的放在上面，自己要写的放在下面，慢慢写，写完再拿出来。

上午9时，来了一帮提审人，有本机关的项目人员跟着。一个徐州口音的人穿件蓝布短外衣，戴顶老头帽；另一个小广东穿件咖啡色皮夹克，圆脸，小个子，30多岁。他们坐在椅子上把我从木笼叫出来。我拿着方凳和他们面对面坐下。我沉住气观察他们的神色。徐州人开口问：“李建彤，今天问你白坚的问题，要如实讲，问什么，答什么，不许搪塞！”我盯了徐州人一眼，再用眼角扫一遍其它人才说：“问吧。”外来人问：“你先答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认识白坚的？”我断定有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人，白坚是一机部副部长。否则，不会问这么具体。我说：“早知道白坚，因为他是陕北人，我见他的第一面是在天津。1956年，我们去参观新港，白坚当时是天津市秘书长，他接待过我们。”那人问：“你们？是几个人，都是谁？”“我和刘景范一家人，何长工一家人，王子宜一家人。是天津市政府接待的，不是白坚私人接待的。”那人又问：“什么时候向白坚采访的？他说了些什么内容？”“1957年，他到一机部工作后，我去采访的。采访过程中，我知道白坚是西北红军的政治部主任。一共访过2次，一次是1957年，一次是59年。”“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搭轮船回北方，绕道威海、绥远到西安后，在马鸿逵部队任党代表。”一人插话问：“他不谈路线斗争？”我心里有气，答道：“当然谈，他说陕北有两条路线斗争。举过两个例

子，一是关于梢山路线问题。王明路线的人说，刘志丹是梢山路线，不应当在在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有人说：那时不在山区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因为平原是敌人统治中心，反对梢山路线是不对的。”“白坚是什么态度？”“他和刘志丹思想一致。”我继续说：“再一个例子是陕北第二次反围剿，怎么打法，这是路线斗争。从北平回来的郭洪涛提出‘先打通神府苏区’，这种提法不对。因为神府和陕北苏区相隔几百里，中间是白区，敌人统治力量较强大，当时红军的力量不能那样打法。红军如果舍近求远，跑几百里去打通神府路线，就有可能失去陕北根据地。因此，刘志丹主张先消灭高桂滋的中央军，解放6个县城，使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打成一片。他谈了反围剿中的几个战例：杨家围子战斗、延长战斗、李家崂战斗、靖边战斗。只谈作战意图，不谈具体故事。”他们突然又问：“这些战斗都是谁指挥的？白坚没有说么？”“当然说， he 说是刘志丹指挥的，刘志丹是西北军委主席，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白坚是秘书长。刘志丹的活动，白坚大部分参加过，是个旁证人。”另一个说：“你谈问题的倾向性很大，白坚还说了些什么？”我说：“谁都有倾向性，难道你们提问题没有倾向性？我谈的内容你们可能不愿听。我再补充几句，白坚说：反二次围剿一开始，刘志丹就写了个动员令，那动员令写得很好，像诸葛亮的‘出师表’，把各部队都动员起来了，而且指定了各自的岗位和任务，是老刘亲笔写的，署名是“军委主席刘志丹。”有人冒了句冷话：“白坚很会吹捧刘志丹！”我明白，他们都是用康生灌输的观点来审案子的，刽子手们只恨没有早把刘志丹杀掉，给了他作战立功的机会。我说：“也许有人想吹别人，还没有内容可吹呢，除非张冠李戴，窃他人之功，掠他人之美。”“老实点儿！这不是辩论会，这是审问你！”我一看是徐州人。心想，听说你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呢，为什么也学了这一套？我马上回他一句：“不是辩论，也得说明，如果不允许说明，我就不开口了。”

他们怕我不开口，又提出个问题：“白坚谈没谈高岗？”“谈过，他说高岗在阎家洼会议被撤了职，姓郭的主张把他送到北平。军委成立时，他还没有走，又起用了。”“就这些么？还说了什么？”我说：“就这些，关于高岗，他就说了这些！”小广东发话：“你要老老实实交代，白坚决不止谈这些，一定还有内容！”“一定？那就不一定。他再没说什么。你去查记录吧！”一时他们都吼了起来：

“高岗是这本书的关键，白坚是副秘书长，又是政治部主任，他难道就不谈高岗？”小广东拍起了桌子。“自从高、饶事件发生后，谁还敢谈高岗？有材料也不谈了。”小广东就住在这个楼道里，平时人家叫他小董，也是个大学毕业生，好像是造反派小头目，平常看不出他会作恶，今天竟然露出凶相，料定他们事先布置好的。我也拍桌子：“白坚没有讲，就是没有讲，压是压不出来的！”小广东又拍桌子：“谁压你了？”我绷着脸，不打算再回答问题。暂时沉默，空气一阵紧张，外单位的人有些着急，僵持下去，他们也完不成任务。小广东站起来了。也许这是一种精神战，打了小广东的气焰，伤了他的面子，他没想到我会专门攻他。他不敢再露面了。

徐州人开了口：“继续回答问题，白坚对刘志丹是什么评价？”“谁也没有超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刘志丹的评价！”一机部的人追问：“白坚具体说了些什么？”“白坚说的也是大家说惯的话，刘志丹很能吃苦，平易近人，很用脑子，革命性强，一直坚持武装斗争，方向是正确的。”那人又追问：“你小说中用了白坚哪些材料？”我说：“霍力坚那个人物，是用4个原形塑造的，去掉白坚的，都是别人的。”“哪些是白坚的？”“请查白坚的干部登记表吧！”“现在是问你！”“我不可能把每个干部的历史都背下来，即令我是组织部长，也不可能都记得。”一机部的人发了话：“今天谈的这些，都要写下来！”

话音没落，另一个人又突然问道：“你访没访过郭洪涛？”问得我一愣，怎么？这不是一机部的人么，怎么问起郭洪涛？难道他们是联合项目？管他呢，都是一脉相承的。我答道：“必须得访，关键人物还能不访？”徐州人问：“郭洪涛谈些什么？”我猛然记起：1967年春，南开大学“八一八”兵团大卡车开进地质部，扬言说：“我们是奉康老之命来的，直接受康老指挥”，就长期进驻在地质部，专门搞《刘志丹》案。有一次，他们把我叫到地质部六层楼上审问，也提到陕北历史。我说：“王明路线执行者杀人总是不对的吧！”“八一八”的头目和兆之与成员刘延生都挺有计谋，说话会绕圈子。他们说：“关于郭洪涛的问题，我们也管。他承认自首叛变后专门去陕北搞破坏的。”可另一次，地质部办公厅造反派中有个姓胡的审问我和刘景范时说：“1935年陕北‘肃反’是对的，你们都是反革命嘛！”又一次，南开“八一八”的和兆之、刘延生到我家审问也露出真

面目说：“从现在看，在陕北捕起来的人都是反革命！”我反问：“难道毛主席释放了他们，是放错了？”他们连忙说：“谁说毛主席放错了？”那时康生正在为郭洪涛翻案，又不敢露骨，怕别人攻击：如果王明路线对了，为何产生遵义会议，如果现在为王明路线翻案，也会有人出来斗争。

我谈起对郭洪涛的采访：可能是 1958 年，我到经委办公室采访过郭洪涛。递过介绍信，他劈脸就说：“你可不要把我们陕北人写成错误路线！”我迟疑一下说：“路线斗争不是地区问题，是人的问题。不管陕北或陕甘，是什么路线，就是什么路线，路线斗争没有地区之分。”我盯着他看，他模样瘦小，眼神飘忽不定，总想窥测什么。我老生常谈地说：“毛主席说，我们的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发展起来的，全国都有，难道陕北例外？陕北能脱离当时中国环境？”郭洪涛忙答：“有，有，我们那里也有！”“有？谁带来了错误路线？”“不是人，是文件。”“文件是谁送来的？”“是交通。”“谁传达的？”“我，不，（谢）子长传达的。”“你呢？没有参加会议？你是什么态度？”“我参加了会议。对左倾路线，我在会议上拥护的，会后没有执行。”“那你是两面派喽！”“是的，我是两面派。”那时他可能觉得，当个两面派比当左倾机会主义者要好些。其实，他执行左倾路线比谁都自觉凶狠！我说到这里，听见有人忍不住发出轻笑。又有人问：“郭洪涛还说些什么？”“郭洪涛说：‘本来要把高岗送走的，成立军委后刘志丹是主席。刘志丹说：现在军事指挥员太少，还有人病重，不能行动，建议把高岗留下。他们就把高岗留下了。’”“他怎么敢说高岗的事？”“他说了不算犯错误，也不会有人整他，他有后台。因此，我的记录本上谁提到‘高岗’二字我都抹掉，唯有他和阎红彦的不抹。因为他们有特殊保护条件。”下边的话，我就不便说了：“高岗”二字是有阶级性的，有人能说，有人不能说。他们自己人能说，别人不能说。这天一直谈到中午 12 点，还要我写两份材料。

现在我翻开这些材料，心里就直哆嗦。白坚这位直率人到底是被他们整死了。听说白坚患严重心脏病，为小说《刘志丹》的事，一机部对他进行批斗。在大规模的斗争会上，他的心脏病发作，自己忙掏出药往嘴里塞，造反派把药打掉。他弯腰去捡，造反派把药踩碎。开完斗争会送到地下室，白坚就咽了气。他们为什么要对白坚这样残忍？郭洪涛呢？虽然在文革高潮时，本机关闹派性，有一派曾

冲击过他，可当权者是保护他的。他是西北干部中最早在报纸上露面的。这能明显看出什么人他们的自己人。

8、哪个人物是高岗

他们不让我喘气。下午，项目人员又要我说明小说中哪些地方写了高岗，为什么要那样写？我很清楚，康生印了300本“供批判用”的《刘志丹》书稿，每个项目人员都能看到。那些自作聪明的人虽然看了，还是找不出要找的那个人物。大概是在1967年，我画过一张图，说明小说中的罗炎到底是不是高岗。地质部两派组织都拿去看过，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也看过。有个师范学院来了一群人开到地质部，要插手这个案子，把图拿去一看，撤退了，觉得没有多少搞头。现在这里又要，我还是照样画一张图叫他们找高岗去吧。

罗炎（小说草稿）	高岗的历史
①1929年冬，在苏雨生学兵队，当分队长。	①1929年冬，在苏雨生学兵队当分队长。
②1931年春，到职田镇给刘志丹传达省委决议，请刘志丹到苏雨生部队，搞西北反蒋大同盟。	②1931年春，到职田镇，给部队送文件。
③1931年夏，到邠县营救刘志丹。	③
④	④1931年，晋西部队到陕甘边界，整顿山西部队，因部队要求枪毙阎红彦，他撤了阎红彦的职。
⑤	⑤1931年底，又来陕甘边界，开到三甲原。
⑥	⑥1931年底，解决两股山西部队的

	纠纷。
⑦	⑦1931 年底，反帝同盟军成立，和阎红彦去西安弄子弹。
⑧	⑧1932 年 2 月，刘志丹在三甲原被坏人陷害遭囚禁，被高岗救出。
⑨	⑨陕甘游击队成立，高岗任某大队政委。
⑩1932 年 2 月，刘志丹去西安找省委，在王家巷遇见罗炎。	⑩
(11)	(11)1932 年 4 月，在临镇打了败仗，高岗失踪
(12)	(12)从临镇去西华池
(13)	(13)去活动同学高鹏飞，搞西华池起义。
(14)	(14)1932 年 6 月，部队从韩城回来，被阎红彦撤职，以示报仇。
(15)1932 年 8 月，罗炎从省委回来正碰上打仗，带一队人出去打游击。	(15)
(16)1932 年 10 月，游击队打保安失败，罗炎回省委。	(16)
(17)	(17)1932 年 11 月，部队在保安解决过冬问题。分了六股，高岗走，杜衡来。
(18)	(18)1933 年 5 月，王泰吉起义，省委

	派高岗去联系过。
(19)1933年9月，刘志丹从南山回到照金，碰上了罗炎。	(19)1933年6月，杜衡叛变，省委被破坏，高岗跑到照金根据地，恢复红26军。

由上表看，罗炎和高岗，只有第一、第十九能对得上，第二只对上一半，其余全对不上号。

罗炎在《刘志丹》上卷中共出场7次，请看都是以谁为模特儿：

①罗炎当过学兵队分队长。	①高岗当过学兵队分队长。
②罗炎从西安来职田镇。	②省委派军委的史直斋来职田镇，高岗来送过文件。
③罗炎来邠县营救刘志丹。	③史直斋回西安一趟，又来邠县。 省委委员马子青带来西安营救刘志丹的信。 杜斌承来邠县营救刘志丹。
④刘志丹去西安省委碰见罗炎。	④在西安王家巷遇见的是黄子文。
⑤1932年8月，罗炎从西安来部队，出去打游击。	⑤李梗，小章，小冯从省委来过。
⑥1932年，打保安失败罗炎回省委。	⑥保安失败后，杨森去西安。
⑦1933年9月，刘志丹从南山回到照金，碰上了罗炎。	⑦1933年6月，省委破坏时，高岗和贾拓夫分手，高岗到照金。

从对此表中看，罗炎出场7次，只有两次半能和高岗的历史撞上。

有人说：“你不要狡辩，基本是高岗的素材！”请注意：什么叫“基本”。从

前中央领导讲工业化时，曾声明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 60-70%才称得上“基本上工业化”。我写的罗炎用上高岗的素材还不到 50%，怎么能称得上“基本”呢？凡事都应用统一的逻辑，不要一件事一个逻辑。何况这是草稿，草稿是不应当批判的。如批草稿，再大的人物写的草稿也不会无懈可击！我真想说：“请注意：我的最后稿没用高岗的素材。”南开大学“八一八”从我家抄走了那份稿子，难道他们没交给中央项目组？既然项目组手中有最后稿，又何必再让我说高岗问题呢？

9、造反派联合斗争会

1967 年 6 月 29 日，在地质部礼堂开的那次批斗会很能说明问题。这次斗争会是地质部“红联总”，“革命造反兵团”，中组部造反派，中宣部造反派，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造反兵团联合组织的。那时我被关在地质学院，由地质学院的一男一女用汽车把我押送到地质部礼堂。女人满脸雀斑，男的是个大汉。

把我押进地质部礼堂，先到后台，景范已被押到。另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中组部副部长杨以希，都是陪斗的。他们本来都是我们的项目人员，现在反倒成了陪斗者。杨以希是中组部最年轻的副部长，自从南开大学“八一八”造反派把“叛徒集团”名单公布后，那些老部长都已进了监狱，只有把他拉出来当替罪羊了，他穿件短袖汗衫，半短裤，提个黑书包，像是每天都在应付斗争会。我不禁想起：1962 年提审我时，他是处长。我和他还冲突过。谁知如今我们被拉上了同一个斗争会，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最可怜的是张子意，身体竟这样坏，瘦弱无神，在后台趴在桌子上不抬头，也许他太累，需要休息。中宣部成了文革重点之一，成了“阎王殿”。大概他被斗的次数太多，撑不住了。可是到了台上，造反派叫我们统统弯下腰，低下头，张子意弯得最深，一动也不敢动。有人传说中宣部的部长们每天晚上在家练习弯腰，如上台弯不好，就要挨揍。我也弯下，又直起来，用眼扫了张子意一眼，心中发酸：1962 年康生组织的中央项目委员会中有中宣部，中宣部分工负责这案子的是张子意，他没有审过我，我从未见过他。现在他成了这个模样，是不是康生嫌他搞《刘志丹》专案不得力？所以受这么大的罪。

这个联合批斗会的内容很怪，他们说：“小说《刘志丹》是反革命复辟的纲领。把高岗写成了西北领导人，正确路线的代表。他是反党野心家！要把歪曲了的历史纠正过来！”“1949年，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里通外国，分裂党，说什么‘军队党’、‘地方党’、‘白区党’、‘红区党’。”“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上进行分裂活动。”“革命初期，1932年，他在临镇逃跑，成立过秘密队委。”“1935年，任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嫌官小。”“中央来后，他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拉拢了一批人。”“可是小说中写了些什么呢？第三稿，名叫崇炎，第五稿，名叫罗炎，这就是翻案！翻案用三种方法：第一，是洗刷高岗的罪恶。第二，凡是罗炎出场，都在关键时刻。第三，掩盖他的丑恶历史。例如阎家洼会上他被撤职，临镇事件和秘密队委为何不写？再一个是习仲勋，他支援写《刘志丹》，抬高刘志丹，才能抬高岗。”以上是斗争会的主要观点。他们又自相矛盾地总结：“这本书不写高岗，就没有办法写，不能不写他当政委，还得是正确路线！”他们还说：“书中攻击省委来的代表，不是‘右’，就是‘左’，只有罗炎正确，还写他曾经恢复红26军，又当政委。总之，这本小说从搜集材料到写作过程，就是为高岗翻案的过程。把他写成挽救革命的关键人物。正像从前他自己吹嘘地那样。为高岗翻案，就是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本书的要害就是要推翻党中央对高岗的结论。”革命联络站的人发言说：“这本书实际是反党的历史，是反革命复辟历史！”

这就是他们的理论。他们说是“反党历史”，中央什么时候说陕北、陕甘人的历史是反党历史？中央在延安时是怎么说的？刚进城时，毛泽东还说：“陕北人来北京开会，坐头排。可是高岗问题一发生，陕北人就该坐末排了。再说，高岗问题是1954年发生的。中央哪个文件上说过，高岗在陕北就是反党的？1932年就是反党的？恢复红26军也是反党？打解放战争是反党？支援抗美援朝也是反党？关于“秘密队委”、“临镇事件”已在延安高干会、历史座谈会上都说清楚，解决了。现在又要翻旧账。这些问题，我在中央档案中都看过，不但看了延安高干会、历史座谈会的文件，还看了1931、32、33年陕西省委文件，是什么情况，我心中都有数。为什么不允许说省委派来的代表有“右”，也有“左”呢？翻开省委的文件看看：1931年王明路线上台后，提拔起那么多不懂事的领导人，哪

个人到了红军不是瞎指挥一阵子，批评指挥员是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回省委又检查自己也是右倾。最拥护王明路线的人，他们在土地革命时就瞎指挥，乱杀人。现在又在为王明路线翻案。他们勾通康生，康生又把他们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意见带到中央，冒充是中央的意见，都体现在这个案子里。康生利用南开大学“八一八”造反兵团在各省、市设立联络站，动员全国来打这本小说，而且全是用康生的观点做炮弹。他们要把历史颠倒过来，把王明“左”倾路线说是正确的，把全国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功勋据为己有。

1962年中组部没收了我的采访记录，已在造反派手中，按照造反派开出的名单，他们一个一个在挨打。1967年春，南开大学“八一八”的刘延生跑到我家问我：“田均是谁，他在哪里？”只这一句话，我就明白了。因为我的采访记录中，所有被采访过的人都是真实姓名，只有一个“田均”，因谈话时，本人说：“我以前叫田均”，我就顺便写了“田均”，以后再未补写真名。现在他们把所有人都通知了所在地区的造反派，立了项目，动员各单位来斗争，来审讯，形成一个全国性、庞大的项目网，还是没找到田均，就上门来追问。我冷冷地回答刘延生：“田均就是田均，你们去找吧，反正他在中国，不在外国。”其实，田均就在宁夏工作。我不能说，我要保护他。

在地质学院12楼囚禁时，那个江苏小伙子和一群教职员问我：“你为什么写高岗？”我说：“我没有写高岗！”他们问：“罗炎是谁！”“罗炎就是罗炎！”他们厉声说：“罗炎是高岗！”我马上将上一军：“这是从你们口中说的。我写的罗炎可是个好人，是个红军干部。你们说高岗是坏人，你们怎么能把好人当成高岗呢？可见你们脑子里不干净。我的书中也写了不少坏人，有错误的人，你们为什么不把坏人当成高岗呢？”一个年纪大点的人说：“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他们不能自圆其说了。有个年轻人说：“我问你，为什么写《刘志丹》？里边为什么写个罗炎？在罗炎身上又为什么用高岗的素材？”“我写的是西北红军，红军中需要有政委，不是张三，就是李四，反正得从政工人员身上找素材，不能凭空捏造”他们说：“交代你的政治阴谋！”我一生气，冲口而出：“要复辟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复辟资本主义？”“我还要复辟封建主义呢！我要当皇帝！”顶到了最高峰。“你敢写下来？”“拿纸和毛笔来！”他们真的拿来了纸和毛

笔。我用毛笔写上：“我写《刘志丹》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我要当皇帝！”下边签上我的名字，向前一推说：“拿去，贴到天安门前，你们去动员 50 万人，到天安门去斗争我，就说李建彤要当皇帝！”这个案子，整个是荒诞，我便以荒诞对荒诞。

10、康生的指示

也不知是谁往木笼里塞进一张报纸。我捡起一看，是南开大学卫东、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编辑部出的联合报，共四大版。1967 年 7 月 8 日出的。报尾有个说明：“本期稿件除《宣判反党小说《刘志丹》的死刑》是本报撰写外，其它均是反党小说《刘志丹》项目调查、批判联络站提供的稿件，他们是：

反党小说《刘志丹》项目调查、批判联络站

天津地质学院“卫东”红卫兵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

《工人日报》革命造反联络站

地质部《红联总部》

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所《红旗公社》

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

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近代革命史所

中宣部革命造反联络站

全国总工会《革联》

中组部《人民勤务员》

以上共 12 个单位，写的文章有：

“看，反党小说《刘志丹》怎样剽窃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

“以写小说为名反党罪魁翻案”

“反党小说《刘志丹》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子”

“为反党头子高岗翻案的反革命复辟纲领”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辉”

“刘邓黑司令部炮制和庇护反党小说《刘志丹》罪责难逃”

“宣判反党小说《刘志丹》的死刑”

这些文章都是不实之词，他们要打倒谁，谁就和这本小说有关系，谁就包庇这本小说。只有一篇文章，倒可以看看，标题是：“康生同志对于反党小说《刘志丹》问题的重要指示。”全文如下：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揭发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手策划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件，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康生同志对这一反党案件十分重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至今，康生同志曾多次作指示彻底清查这一反党案件。但是，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的包庇纵容下，旧中宣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旧中监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钱瑛，旧全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颀伯、马纯古，旧《工人日报》反革命分子高丽生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狗胆包天，竟拒不执行康生同志的指示，瞒天过海，舍车保帅，蒙混过关。现在旧债新账要一起清算！

这里发表的是康生同志关于这一反党案件的多次批示中的部分摘录。这个摘录，除 1962 年 10 月 5 日的批示外，其它几次均根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的记录整理，未经康生同志审核。

康生同志 1962 年 10 月 5 日指示：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揪出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案件，中央指示《工人日报》重印 300 本《刘志丹》送给中央。此事立即有人给作者“反

党分子”李建彤通风报信了。中央知道以后，要《工人日报》进行追查。康生同志10月5日在《工人日报》的检查报告上批示：“显然是杜映告诉李的（指李建彤）。找杜映等谈话后，应当让杜等亲自写材料，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林（指周培林）、杜（指杜映）亲自写的材料，望请注意，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已有一月多了，为什么林等一点材料不写呢？”

1962年11月，康生同志对全总党组向中央写的假检查报告很不满意。康生同志批评说：《工人日报》几个人在政治上有错误？应提高警惕，从组织上追查，不能说组织上没有问题。

1964年冬，康生同志看到全总党组对《工人日报》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很不满意，在报告上逐段做了批示。

康生同志认为：（一）《工人日报》的问题，首先是报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存在严重问题，当然全总党组也有责任。（二）报社存在的问题：（1）不是根据毛主席思想，党的方针，而是严重存在着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不是一定程度存在着资产阶级办报作风。（2）五八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不彻底，右倾思想并未肃清，继续发生错误。（3）报社组织人员干部严重不纯，人员中有坏人。报告中未着重检查。在《刘志丹》案中，很难说没有同情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人。而叫一个右派同李建彤一起写小说，问题揭露后，还在报社留了2年之久，难道是偶然的吗？要发动群众，清理坏人。（4）报社高丽生毛病很大，报社的错误与他分不开，全总报告里轻描淡写，不能教育他。决定调职后，又长期留下，还准备送党校学习，早应该送到工农中去锻炼。（听说已下去，早该如此）（三）今年（64年）1月，组织检查组，5月作出总结，但并未彻底，压了5个月，10月送中央。有些人已下去了，给进一步检查造成了困难。应再复查一次。

康生同志认为不是像报告中所说的“组织观念、纪律性薄弱”，而是违反纪律。也不是严重的不负责任，而是政治上严重错误，未发动群众，彻底的把坏人清查出来。

1966年5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康生同志提到《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刊登反党小说《刘志丹》问题时，康生同志说：杜映是推销员。康生同志又说：

宣传部也有人支持李建彤，李建彤因此有劲，不理睬阎红彦。我一看小说，完全是为高岗翻案。

1966年6月在一次会议上，康生同志指出：《工人日报》不只有一个《刘志丹》的问题没有解决。”

康生是这个项目的领导人，所以随时可以发任何指示，他的指示还不止这一点，还可以给他补上几点：

康生曾给中央写报告，说：《刘志丹》小说是篡党篡国的纲领。

康生说：《刘志丹》小说，比彭德怀的万言书还恶毒。

1967年1月，康生说：地质系统要揪刘景范，他老婆写了反党小说《刘志丹》。

造反派整理的“康生指示”，且不说文字如何，那逻辑就有些混乱。头一点就是把1962年以来的项目人员都说成了包庇人。康生说：叫右派（指何家栋）当责任编辑，这是《工人日报》的罪状之一。可是康生自己的回忆录《革命母亲夏娘娘》，就是这个右派何家栋当责任编辑，还送康生本人审阅过。他表示喜之不尽，难道他就不怕右派观点？康生说，他一看小说，完全是为高岗翻案。他什么时候看的？从北戴河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只隔几天时间，就在全会期间，康生和阎红彦还要求中宣部从书中检查对谢子长是怎么写的。中宣部曾通知我，要我说明哪些章节有谢子长。可见康、阎都没能全部看小说，只管信口开河。阎红彦只看了有关他自己的章节。康生根本没看就妄下结论。在康生还未见到书之前，就从北戴河向中宣部发出指示：通知各报刊，一律停止刊载小说《刘志丹》，迫使《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将要采用的稿子停下来，如今校样还在我手里。

11、造反派中有好人

那张报纸究竟是谁塞进来的？这几天，看守轮换得很快，各单位的人都有，各派别的人都有。面目不一样，表情不一样，有的和气些，有的凶狠些，看来大多数是好的。我和他们无冤无仇，他们当他们的看守，我当我的犯人。突然，看守伸进头来，看见我手中拿张报纸，伸手拿去看一眼，是批判我的，就还给我。

这天上午又有一拨人来和我吵架，是要我交代李治洲的问题，我说：“我不认识。”那些人发了顿脾气走了。

下午看守人员换了，听见两个人对话。一个说：“我请会儿假，到街上买点东西。”听脚步声是走了。只剩下另一个，他把头伸进来看看，又伸手去翻我的褥子。我问：“干什么？”他说：“我看看你床板上垫的是什么。”我揭开给他看，并解释说：“全是旧报纸，因为床板上有很多大窟窿，又脏又烂，没法睡，我才要求铺了旧报纸。”那人轻声说：“这报纸上有毛主席像，别人发现了，又会给你扣上个现行反革命，快拿下来，我另找些纸给你。”我才醒悟过来了，马上把被褥揭开，他手疾眼快地把报纸卷起来，夹在手里走了。一阵子，他跑回来，拿了三大张写大字报用的黄色油光纸，给我铺在床上。我连忙把被褥铺好，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轻声答道：“兰州大学毕业的。”我没敢问他姓名，因为这是犯禁的，也怕给他为难。但我记下了他的模样：30岁左右，瘦高个儿，白皙的脸，下巴有些尖，戴着黑边眼镜。我万分感激，他真是救了我一命。要不是他，我还没意识到眼前正抓这种现行反革命。谁弄烂了毛泽东像，谁把印有毛泽东像的报纸擦了桌子，或者把毛泽东像章掉在地上，都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个时期所有报纸天天必登毛主席像，谁把毛主席像弄脏、弄破，就要被打成“反革命”。1943年，延安盛产“特务”；1957年，中国又盛产“右派”；1959年中国盛产右倾机会主义；如今又盛产“现行反革命”了。恐怕有几百万，又是一种恐怖气氛。这位兰州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会这样照顾我？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国人民的正义感！

1967年，我在地质学院被软禁时也遇见过这样的人。那是东北锦西化工厂的两个项目人员，专门调查谭生彬案的。他们来提审我，因为谭生彬在监察部当部长助理时，我向他采访过。他在红26军当过骑兵，当过班长，在陕北延长县当过县委书记。他给我讲过红26军南下终南山的故事。1962年把我的书打成“反党小说”，他就随着一批西北干部一起被从领导岗位上拉了下来。他当时是青海省委副书记，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东北辽宁省锦西化工厂当副厂长。这意味着贬职和流放。文革一起，他又被揪出来挨斗。他们这次到地质学院找到我，是学院造反派陪着来的。一来就凶神恶煞地大声责问：“李建彤，你老实交

代和谭生彬是什么关系？他给你谈了些什么？怎么密谋反党的？”我只得从头说起。他们总是拍桌子，吼得我说不下去。我不免和他们顶撞。

学生听不出名堂站起来走了，只剩下化工厂的人。他们马上变了一付脸，笑着对我说：“实话对你说，我们是保谭生彬的。他在我们那里工作得很好，工人们拥护他。有人打，有人保，我们是保的。”他们说着递一支过滤嘴香烟，点上火说：“抽吧，看把你折腾成啥样子了。”我也笑脸相对，问道：“你们去过西安吗？这是有人捣鬼，不然西北干部不会这么倒霉，一下子打下去这么多。”他们说：“我们去了西安，查了谭生彬档案。就因为你这本小说，西北局书记和中央组织部串通打下去几十名省级干部。中组部对谭生彬的批示是免职，以后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又私自改为撤职。无形中加重了对谭生彬的处分。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只说是和‘彭、高、习反党集团’有关系。”说着说着，他们埋怨起我来：论干部，你也不算小；论级别，你也不算低，刘老的待遇更高，你们两位老人可以过舒服日子，为什么要吃那种苦，写那本书么！害了那么多人。据我们看，被打的都是好人呀！”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回答是工人出身的干部。当我写的材料上有疏忽时，他们还帮我改了几个字。趁着没有外人，他们竟和我聊起天，说说笑笑像是同一个办公室的人，他们嘱咐我千万注意身体，大部分群众是清楚的。他们说：“你也别担心老谭，我们会保护他。虽然北京有人指示要揪他，我们不让他离开，怕他到别处吃苦，我们都喜欢他。”一个小时前，他们进来时是那么气势汹汹，如今又是这么和蔼可亲。我喜欢这种“两面派”。他们一面可以应付敌人，一面可以保护自己人。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我真希望中国多点这样的“两面派”。

我听景范说过去年挨打的事。西北工学院来人揪他，把他弄到地质部一间小房里，把门关上，说着就有人先动手给了他一拳。另一个学生叉着腰横站在前面，看似要打人，其实是挡住了那个最凶的人无法得逞。

12、挨打

当别人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时，我才恍然悟到晕过去了。什么时候晕的？记不得。送到医务室，韩大夫听了我的心脏，对项目人员说：“让她休息吧？她的心

脏有病，打晕过去是有危险的。”我才明白刚才挨了打。是谁打的？好像是天津来的人。什么单位？我不清楚，反正是延安同学王超的单位交通运输部门的，要调查王超在延安的情况，还有他老同学顾丘的情况。这可真难住了我，在延安才认识的，我知道得实在不多。来审我的四、五个人中有个半老太婆，嘴瘪得好像没有牙。她1967年冬到我家来过，说是天津来的，是真是假还很难说。她总是显得挺神秘。到我家假装闲聊，似无大事，实则是来套话的，和我说着笑着，自以为得了大量材料。据说王超抗战前在航空测量学校学习过。抗战开始投奔革命。这有什么可指责的？顾丘和王超同学，是在重庆解放之前到北京的。他不愿离开大陆因为有妻子儿女，结果被打成了特务。有些话到嘴边，我并未说出口，就惹来一顿暴打。有个年轻小伙子为表现“革命性”一拳就把我打倒了。当我醒来时，他们已跑得无影无踪。我挨打当然不止一次。

下午刚休息一阵子，甘肃又来人。其中一个用纱布遮着一只眼，是个独眼虫。他们硬说电影《红河激浪》的本子是我写的。这个电影，我既未参与过，也未看过，只是听说过。1967年，有个甘肃庆阳来的项目人员审问我：“是否认识铁娃？”我哪能认得。后来慢慢的他们才说铁娃是电影中的一个角色，原型是庆阳南梁地区的一个农民。为批判那部电影，康生指示到处打人、整人，铁娃的原形已被整死，连庆阳地委书记也吓得不见踪影了。后来听说：康生点了名，说这电影是李建彤写的，也是为高岗翻案。我好像成了“翻案专家”，所有“翻案作品”都是我写的。想到这些无端诬陷，我反驳独眼虫：“《红河激浪》与我无关，谁说是我写的，叫谁来当面对证！”独眼虫说：“好大口气！谁来和你对证？我们有足够的材料说明是你写的。”“把材料都摆出来！”“你现在是什么地位？还敢强辩！”“什么地位也得允许说话，还未宣布剥夺我的公民权！”“难怪都说你顽固，你就是顽固！”“我不知道的事，你们硬逼，是我顽固，还是你们顽固？”独眼虫又转了口气：“你的小说都给谁看过？”“我列出过名单，到组织上查去！”他突然问：“给北影的于蓝看过没有？”我心想，好恶毒，还想把于蓝拉进这个案子，要陷害她。我说：“没有，未正式出版前，不给任何无关的人看！”“北影和你有无关系？”“有关的只是个别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北影你都认得谁？”“我认得的人多啦，凡是从延安来的，我几乎都认得，但是平素无来往。”正在

这时，医务室的小于大夫进来了，已过下午六点，她来接班。这时独眼虫他们才离开。

小于大夫问：“你房里天天都有人吵架呀？”“可不是，天天都有好几拨人来吵架，不是拍桌子，就是踢板凳。”小于皱着眉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你可千万不要得了什么病。”这天下午和夜里有医务室的大夫或护士来值班。特别是晚上，他们听不到我熟睡的声音互相悄悄说：“她没有睡！”我真的没有睡，只是闭着眼想问题，这么繁杂的局面，不用脑子应付不了。凡是来的人都要吵闹。可我呢，要把真相摆出来，使群众从康生和阎红彦的迷网中清醒过来。这工作只有我能做。我要在斗争风浪中顶风行船。早晨起来，我要求大夫给我安眠药。他们答应了。医务人员一连值了几次班，确实知道我整夜不眠，同意我吃安眠药，每吃3天，停3天。安眠药交给值班人员，每晚9点我从值班人手里领两粒安眠药当面吃下。我明白，他们怕我把安眠药留下，一次吃过量呜呼哀哉。其实，我才不会自杀呢，宁肯等着康生他们指示杀我，我决不会自杀。我要和他们斗到底，争取将来把这部小说写完出版，才对得起延安的小米，延安的人民。

项目组命令我每天打扫楼道，包括医务室门前的垃圾。那些垃圾主要是瓶瓶罐罐，针剂瓶、药瓶、玻璃罐子。我对女看守说：“你看，这东西吃下去随时可以死，连抢救都救不过来。我看过一些书，什么样的死法都懂，只是不用罢了。请你们放心，我要好好地活着，挣扎地活着。这是斗争的需要。”那位女看守点点头。然后，她坐在桌前做记录去了，我希望她把我的话写在记录本上。

13、解答十个问题

1968年2月9日早8点，地质科学院“红旗公社”来审我，命我答复10个问题，其实是一派群众组织来抢材料。我只得公事公办。现按原材料，摘要如下：

一、问题发生后，地质部的部长们谁找你谈过话？

答：有一天，党组书记何长工的秘书打电话，叫我去何长工家。到他会客室后，何长工对我说：中央组织部叫他告诉我，说你写的《刘志丹》是宣传高岗的。叫你交代问题。这是他代表地质部正式通知我的。

二、何长工怎样到你家取的笔记本？

答：在这之前已经有两次，一次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派人来我家取走习仲勋看过的稿子。一次是中组部的安子文派人到我家取走我的第三稿。何长工是最后去取的。那天是中组部叫刘景范去谈话，回来时和何长工一块进门。何长工叫我当场把陕北干部看过的稿子和采访记录全部交出来。我取出一大包，他的警卫员刘振英拿上汽车的。我自己正在用的那份稿子没有给他。我已修改一半。问题突然发生，我也得修改完。后来我向中央项目组声明过，要留一份作检讨用。这份稿子，去年被地质部群众组织“二兵团”拿走了。

三、乔明甫到你家取枪枝弹药是怎么回事？

答：这可能是以后的事。有一天，地质部副部长李轩陪着乔明甫到我家，来取枪枝弹药，好像是怕刘景范自杀。李轩还问我有没有安眠药。我把枪枝弹药都找出来给了他们，都是在西北战场上用过的东西，是李轩和刘振英拿走的。我没有见乔明甫，他在东房客厅和刘景范谈话。他走后我见桌上留个纸条，写着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从前我不认识他。

四、八届十中全会前后，什么人到你家去过？

答：十中全会前，刘景范在地质部主持轮训班，没有人找过他。十中全会后，除上边说的人外，张邦英来过，是中央派他来的。十中全会前，习仲勋的秘书来过。因为我写给中宣部的两封信是对阎红彦本人及其文章的批判。那一段历史，习仲勋了解，我送去征求他的意见，看我写得准确不准确。习看后打发秘书送还我，他没有说我写得不对，可他表示不同意发。我还是把信发了，习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说我不听他的话。工人出版社的杜映来要过第三稿，我没有给她，当时我以为是阎红彦逼他们来要的。

五、你两次去西安都干了些什么？见了谁？

答：第一次是1958年5月，我在监察部请的假，工人出版社写的介绍信，我一个人去的西安，住在省委招待所。那次主要是调查渭华起义的材料。第二次去西安是1960年，还是我一个人。这次主要是调查1932、33年陕甘游击队和红

26 军的情况。在西北党校看了前省委的档案，在省档案馆也查了档案，在省图书馆翻了几天旧报纸。经过副省长杨玉亭（管政协工作）介绍，到政协找过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谈过 1932 年—1934 年杨部和红军作战的情况。西北党校的人也参加了。7 月底，我到陕北走过一趟。那时刘景范正在陕西的汤峪养病，我就动员他和我一块去陕北，目的是想看看老苏区。先到照金，在延安休息几天，去志丹县，看刘志丹出生地和生长地，又去陕甘边界的南梁苏区。一路调查材料不多，主要是看地方。8 月 20 日，我回到北京。

六、写稿和改稿问题。

答：我已写过材料，请去项目查看。第一稿是整理材料，是我和工人出版社的王勉思，边调查边整理出来的。1958 年我从西安回来后写出第二稿，初步加工，在此基础上加工成小说。参加人是杜映、何家栋和我，三个人一起研究出来的。时间是 1959 年初到国庆节，这就是第三稿。第四稿是我去老区回来，我一个人于 1961 年夏写出。第五稿是 1962 年我又一次写出。整个写作过程，出版社的编辑、总编都随时提意见，随时修改。第三稿送习仲勋看过，他说没有写好，提了很多意见，等于推翻了。

七、为什么给何长工、江涛看稿？

答：1960 年我住在西安芷园时，何长工出差路过西安也住芷园。我碰见他，就送他一本第三稿，因为他是地质部领导人，我是地质部干部，应当送他一本，也请这位长征干部提提意见。回北京后，我问了他的秘书，秘书把稿子退给我，没表示意见，也不知看没看。1962 年第五稿印出后，送机关党委一份，因为我暂归那里管。作为我个人的工作汇报，不是给江涛个人的，后来则是江涛退还我的。

八、问题发生后，为什么又到习仲勋家？

答：十中全会期间，习仲勋的秘书打电话叫我去一趟。我中午赶到，习说：你的书有了问题，是为高岗翻案。我说：就像一个孩子已经出生，就是合法的人，谁要掐死他，就要负法律责任。我没有写高岗。他要我把写了几次稿，给他送过些什么都写下来。因为上面逼他作交代。过几天，他的秘书又打电话，我去了，

他问我 1960 年谈话有无纪录？我说：“有，出版社和我都作了记录。”我回来找出送给他。这是正常的，从前我们没有请他审阅过谈话记录。

九、你为什么修改采访记录？

答：因为我写的历史是真的，阎红彦文革中写的历史是假的，他竟能得到领导的支持，我反而受审。事情可能会闹得很复杂，许多人要受我的株连。我觉得对不起人，决定修改记录，保护好人，宁肯自己坐牢。我修改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干部中互相之间的意见，我怕坏人拿去挑拨干部闲的关系。例如，许多人对“肃反”有意见，骂了搞“肃反”的人。而“肃反”的主持人都还是高官厚禄，手中握着大权，他们看到记录，岂不要打击报复？阎红彦一口咬住高岗问题，记录上哪怕有骂高岗的话，我也得涂掉。因为他成了犯忌的名字，谁说了这两个字，谁就是反党，就会大祸临头。我的估计没错。贾拓夫的谈话记录没有涂改，我原以为他们不会整贾拓夫，因为土地革命时贾不在陕北，和他们没有矛盾。谁知他们狠狠地整了贾拓夫，就是因为他说了高岗的一个材料。

十、中央项目组找你谈过几次？谁说的？什么内容？

答：第一次是中宣部周扬找我谈的，他说我写的书是反党的，要我交代。第二次是地质部部长办公室通知我，叫我去中监委找副书记钱瑛谈话。那次是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参加人有伍云甫。还有几个人我不认识，她们让我写出写书的过程，并质问我为什么在书中把阎红彦写成自杀的。第三次是中组部直接打电话叫我，还是去找副书记伍云甫。那次是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主持会议，在中组部会议室，参加人有乔明甫、杨以希，中监委的伍云甫、李振海（处长），中宣部的王谟、苏蘩集体审我。这次一连谈了两天。头一天是要斗争我，提出许多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高岗问题，我和他们顶起来。第二天，我按指定时间，地点去的，这次主要是要我交代问题，也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大家叫交代的那些问题。第四次，专案组又把我叫到中宣部，由苏蘩、王谟主持，对证笔记本，一连对证了两天。第五次，杨以希叫我去中组部，核实我交代问题的记录，让我签字。第六次，中监委的处长李振海，叫我去核实田 X 看过的稿子。那时交代总是需要我回忆，谁谈了什么，记录都在他们手里。不像现在，你们手中无记录，我也一

无所有。我认为，1962年，我的问题已经搞清楚，谁知拖到现在，也不知谁在搞鬼。

14、潘自力

外交部项目组来人审查潘自力案。潘自力是做外交工作的，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他是陕西人，早期的革命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渭华起义时，他担任书记。潘自力项目的项目人员来提审的语气蛮横无理。他们的说法是：1928年搞渭华起义失败了，就是错误。言下之意，潘自力是参加起义的人就应当有错误，怀疑潘自力的历史。他们要我交代所知道的潘自力的一切，并说：“这对你有好处。”我说：“我不需要别人给的好处。”这次，我的项目人员是徐州人参加，还有个说广西话的，有人叫他小林，30多岁，是个不讲理的人。他们和外交部的项目人员对我展开进攻战。不过就是那么一套，不去理他了。问题在于我如何写这个材料。既是“交待”，又要说明事实，表明我的想法。

潘自力的亲友对我说过，他青年时代是个精干的人，曾到德国、苏联学习过。但关于潘自力的历史，我一字不提，绕过去，何必引起项目人员的猜想，给人找麻烦。我就事论事，开门见山：访问潘自力是因为1928年他是陕西省委书记，领导过渭华起义。我写“渭华起义”基本上是1958年在陕西搜集的资料，大多得教于西安市副市长杨晓初、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许尚智，他们当年都参加过起义。草稿在西安已写成，回北京再请潘自力核实。大约是1958年秋，我在北京东郊外交部招待所访问了潘自力。第一次去是先送上我写的稿子，请他审阅。一位女干部代收，他本人不在。第二次去他已阅完，谈了如下意见：

1、他认为我整理的草稿，基本轮廓是对的。当然以后我写成小说时又有很大改动。

2、我向他查正：刘志丹当时究竟是什么职务？他说：刘志丹是渭华起义的军委书记，省委是把任务交给他的，他直接对省委负责。这一点，他谈的和许尚智相同，许当时是军委秘书长。

3、对许权忠的看法，他认为那时许权忠不对，起义前放松部下，把部队拉走一部分，还把重武器搞走，影响起义的力量。否则，工农革命军的力量会更大

些。

4、起义失败时，省委把刘志丹调回来，因他另有任务。后来许权忠把队伍带到别处，失败了。省委没有决定把队伍交给许权忠。

5、我问：在敌人大规模围剿前，刘志丹曾主持军委会议，准备把工农革命军撤到渭河北岸，向陕北转移，以保存实力，在陕北建立根据地。这个意见未得以实现，不知省委有无指示？他说：省委事先没有指示，军委可以事先讨论，然后报省委。

6、我问：1928年的渭华起义是否对？他说：当时起义还是对的。那是八七会议后就准备的，是省委领导的。关于这个旅的起义，中央也有过通知。当时不起义也要被敌人消灭，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一部分，前任领导已被杀害。另外，渭华的农民已经起义，需要军队去配合。失败原因很多，不仅是这个地方失败，其它地方也有。

为了反驳提审人利用起义失败为借口扣帽子，我翻阅《毛选》后写道：按照毛泽东指出的情况，一方面是北方不如南方，都不具备武装割据的条件。另一方面，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可以搞武装起义的。关于在陕西为什么发生了渭华起义的条件和原因，当时陕西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是八七会议后，各地革命者都有起义的思想，省委也有准备。另一方面就整个陕西说是比南方落后，而渭华地区则比较好，是在大革命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的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引用毛选）。这个地区建立革命组织最早，可能是1922年或1923年，这一带的中、小学校中就有许多“火种”，农民中也有许多“火种”。1926、1927年大革命时期斗争很激烈。这里的农民协会很普遍，参加过对北洋军阀刘镇华的作战，许多农民有武器。这里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到1928年就发生了农民起义。起义的军队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里边革命青年多。在陕西来说，只剩下这么一支革命队伍，就像毛主席说的：“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所以这支军队就有改造成工农红军的条件。加上白色恐怖的压迫，军阀之间的混战和不安，就发

生了渭华起义。我觉得潘自力说得有道理。渭华起义是可以而且是应当发生的，有起义的因素；失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条件差。至于我写的省委书记是谁？自然要在潘自力身上取些素材，但也不完全是他。我没送他看过写成的小说。你们提出很多问题，我手头无材料，暂不答复。不过我敢肯定，渭华起义中无高岗问题。

我写出来了，但很冒险。果然交出去的第二天，广西人和徐州人来把我训斥一顿：“李建彤，你是怎么写材料的？你是见机就宣传你的观点呀！”我说：“潘自力的项目人员不是也宣传了他们的观点么？那口气中带有阎红彦的观点！”我气愤的是阎红彦的观点竟然渗透到各个角落。他又没参加过渭华暴动，可是企图否定一切。徐州人严厉地说：“以后禁止你这样写材料！”我说：“如果不许按照我知道的东西写材料，我可以什么都不写！”徐州人憋着气走了。当然，如果我从此什么也不写，他也没辙。据我估计，潘自力一定遭受很重的打击。我观察：凡牵连到我这一案的人，特别是某一段历史的关键人物，只要说了真话的，康生他们决不放过，唆使项目人员狠狠地打，能活过来的人不多。以后得知潘自力确实被整死了。

15、李洽洲

经常看守我的有个胖姑娘，在斗争会上见过她举着拳头吆喝。听看守们聊天才知她是长春地质学院毕业的，夫妻俩都在本单位，她是贫农出身，正想挤进领导班子，又想换大房子。这一天她值班，趁伙伴没到前招呼我：“喂！出来，跟你谈点问题！”我心想：你一个人跟我谈什么？值班看守没有单独提审权。我满脸冷气，带着小方凳走出木笼，坐在木笼门口。胖姑娘拉个椅子过来，摆开架子问话：“地质部的部长、副部长，谁到过你们家？”依她看来，谁到过我们家，谁就和“反党小说”有关系，或者和我们同伙“反党”。我说：“来的人多了。”她说：“你谈具体点，何长工去过没有？李轩去过没有？”我暗想：这是不是为派性搜集炮弹？我可不给任何派性提供炮弹。我说：“从前我们在菜市口米市胡同33号住时，离地质部太远，来的人少。自从搬到丰盛胡同2号离机关近了，谁都来。我们家是部长开会的地方。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来过。”她问：“难道李四光也去过？”“也来过，都是工作关系，公事公办。”“你去过谁家？”“我去过

李四光家，他每年请一次客，大家都去，我当然也去。”我知道，他们不敢找李四光麻烦，周恩来总理保护着他。她沈吟了一阵，好像找不到茬，又问：“你最熟悉的是谁？”“我没有最熟悉的。”她没达到目的，眼皮闪忽几下说：“算啦，你这人没用！”这是个想要捞稻草的人。

下午来了个穿军衣的，陕西口音，是搞李治洲专案的。还是问的那几句话：“你认不认识李治洲？他们在颐和园请客，你去了没有？”我说：“你已来过两次，我不认识这个人，也没有在颐和园吃过饭！”“都说你去了，你还不承认？”“都说？谁去了，我怎么不知道？”“那是一次反党集会！”我说：“反党集会还跑到颐和园？在大庭广众前反党？”“你们有来往，关系很密切。你们是一个反党集团！”“一个反党集团的人我为什么不认识？他是干什么的？”他厉声吼道：“你不老实要自食其果！”我说：“你说的人我不认识，也犯罪？”他暴跳起来，用手一指：“你站起来，给我站起来！”看守听他一吼，溜了。我稳稳当当地坐着，用眼睛盯着他。我们互相对视着。我就是不站起来，心想：不要仗着你是军人，敢在我面前撒野。我也当过军人，见过的军人多了。他在考虑如何对付我。他已经来过3次，开始是两个人，以后都是他一个人。我已经准备好，只要他动手打我，我就和他拚，先撕他的领章，再揪他的帽征，再大声叫群众来看。我们相持着，一秒钟，一分钟地过去，他忍不住再吼一声：“站起来！”我仍稳坐不动。他坐不住了，忽然站起来，把皮带解下。我的手已抓住坐着的方凳腿，只要他用皮带抽我，我就用凳子砸过去。他提着皮带在我面前来回踱了几步。我仍然盯着他。最后，他把脚一跺：“呸！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找你们领导去！”他走出门。我想这又是一位想立功的“英雄”，只要在我这里吼出点李治洲的材料，就是捡来的便宜，不知要换个什么官职呢！

我真不认识李治洲。见的人多了，谁记得那么多。除非是我采访过的。我确实没有采访过李治洲，有人仍然把他往这个案子里拉。几年后才知道，原来是刘志丹夫人在北京时，李治洲请她吃过一顿饭。这就有了罪，成了个大案。在文革中也被斗过，关押过。一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我才算真正看见了李治洲。那时他是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一位威武雄壮的军人，是西北老红军。他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来看我们。他还不知道有人到我这里逼材料。我提到文革中的

这场闹剧，他只是哈哈大笑。经过浩劫后，人都非常亲热。他见我儿子个子很高，便一把搂住说：“到我们军队上去打篮球吧！”

16、1962 年给中央的信

专案组要我交代：为什么给中宣部写那两封信？眼下我是回答还是不回答？因为直到现在未曾见到中央项目组的人。不见他们，只给下面人絮叨，用处不大。他们不是决策人，不能解决问题。这一天，又是好几拨来提审，搅得我思绪繁乱。目前我得有非常健全的神经才能应付这个场面。打发走提审人，我又坐下来从头回忆：

那是 1962 年 7 月，我到前门饭店访问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他是来参加中央会议的。我在前门饭店二楼找到他。早在 1958 年我见过他，那年我们就顶撞过几句。这次我是以尊重西北老干部的口气给他送书，请他指教。我刚坐下，他打着官腔说：“我那篇《回忆陕甘高原早期革命的武装斗争》，你看过没有？已经在陕西发行了 15 万册，还要再印。”我说：“没看过。不过像那种文章过几天人们就扔掉了。没人看！”这表示我已看过。他转到刘志丹身上说：“对于刘志丹，作为勇敢的战士写当然可以，但是……。”他支吾了半天终于没有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我写出来的要比你说的好。我有我的根据，有大量材料，尤其是对刘志丹的描写，是在掌握了大量资料——包括他的战友、同学、亲属所提供的，才动笔。我自会去粗取精，分清真伪。对别有用心的人，我不能听其指挥。”他慢慢坐下，再未站起，直到我告辞，大概在生气。

他那篇文章基本上是谎言，在《星火燎原》上发表前大家都提过意见，他坚持不改，现在又到处发表。那时我家住在西四丰盛胡同 2 号。访问阎红彦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在东房办公室里看稿子，接到一封信，是阎红彦派人送来的。信上写着：“李建彤同志：你写的小说，我不同意出版，那段历史中央没有做结论。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我一想，不对头！昨天下午我见他时，他还未看，难道一夜之间就看完了？他的文化很低，不会看那么快！按时间计算，他绝没有看，只是要阻挡这本书的出版而已。我一怒之下，提笔在原信上批了几个字：“好跋扈！好武断！难道你写的文章中央都作过结论？刘志丹的结论早已作过，而你

的结论恐怕尚未作吧？”我要把这封信送中宣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对方说：“我刚接到阎红彦的电话，他提出你的书他不同意出版，不同意发表。要我转告你，不要发表吧。”我说：“我刚接到信，全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管，我自己的事自己作主！”“叭！”我把电话挂上了。何家栋急问：“谁，谁的电话？”“习仲勋的！”何家栋说：“咋办？咱们原定要发一些稿子，我今天就是来问稿子发不发？”我说：“发！”欺人太甚，逼得我只有如此！如果向他让步，永远没有尽头。

《工人日报》从1962年7月28日到8月4日连载了5天。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杜映找我。她坐在沙发上很久不说话。我问：“有事么？”她凄然一笑：“上边来了通知，《刘志丹》的稿子不许再发！”我说：“又是姓阎的在捣鬼。他到北戴河开会，心不在会上，天天只顾查报刊，看有没有我的文章发表。你们的领导也是上当了。”她不敢多说，只是闪烁其辞：“我们是和你站在一起的，你放心。”

《光明日报》从7月29日开始把《渭华起义》载完，即停止。《中国青年》连载了两期也已停止。接《人民文学》来信：“李建彤同志：您好！作品《终南山暴风雨》，我们本拟在九月号发表，但因临发稿时听说有关领导同志对此作品还有些意见，我们想再斟酌一番，因此暂时未能发表。抱歉得很，至希原谅。具体处理意见，待研究后奉告。”《人民日报》的校样《回照金》存在我手中，再也不敢来取。这是康生下了命令，“任何报刊不得再发表《刘志丹》。”天津消息迟到，方纪竟派《新港》编辑来向我索稿，我未敢再给，怕事态向坏处发展会株连他们。我说：“有人提了意见，现在不能给你们，免得给你们找麻烦。”来说：“我们不怕，领导上说啦，要你写的重要部分。”我还是坚决不给。后来听说天津文艺界负责人方纪在文革期间被打得很惨。他被牵连进几个冤案，我暗自欣慰：我总算保护了你，否则你还得牵上我这条“反党”黑线呢。

有一天，出版社出版部主任周培林匆忙跑来告诉我：“听说康生有通知，把新、旧两稿各印300本送中央。我留下两本将来供你使用。”他临走说：“我再不来了！”多么忠厚的朋友们！都是冒着危险来的。后来才知道阎和康诬告我的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恶毒透顶。我定心坐下翻阅阎红彦的文章，提起笔来就写。我要从头到尾批判他的文章，其中的重要段落恰是我小说的第三部。我写的是真

相，他写的是假话。作为一位当事人，一位将军，一位中央委员，一位省委书记竟能够如此伪造历史！你有权阻挡我的文章发表，我有权批判你的文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找康生，我找中宣部。我是合乎组织程序的。所谓的两封信，一封是批评阎红彦的为人，他在历史上有错误还死不承认，以假乱真。另一封信就是对他文章的批判。两封信都是写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林默涵的，因为他们俩分管文艺。下面是信的摘要：

批阎红彦写的《回忆陕甘高原早期的武装斗争》：

这篇文章有两种错误，一是历史事实上的错误；一是路线上是非不清。

事实上的错误如：晋西游击队过黄河，即从黄河东的山西渡到河西的陕北，是游击队长拓宽和政委黄子文带队过来的。原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现全国政协常委）说：“是我接待黄子文，他带来了山西省委的介绍信仲介绍了干部情况。干部中没有介绍阎红彦的。后又接山西转来的信要黄子文去北平，因为他妻子被捕，又恰遇上生孩子。”阎红彦却诬赖黄子文逃跑了，伪造是阎自己带队伍过的黄河。过河后的队伍只有 27 人，不像阎说的有 30 多人。阎文中说的第一次部队整顿，那是整顿他自己，他一路上违法乱纪，战士们提出要开除他，枪毙他（见 1945 年历史座谈会档案）。至于三甲原的整顿，那不是整顿，是阎红彦和谢子长阴谋缴了刘志丹部队的枪，打死了刘部的人，把整个部队解散了，使部队遭到很大损失，这是他们的错误，不是功劳。阎红彦还得意地写到，他送给刘志丹一支手枪。不对！是在三甲原夺了刘志丹的手枪。全体人员都看到的，因为刘志丹不动手，始终让着他们。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为王明“左”倾路线翻案，也是伪造历史。要翻案，必须伪造，两者紧密相连。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写的是陕甘游击队的历史。王明路线的人上台后，陕西省委书记坚决执行王明路线，使军事遭受失败，而阎红彦却混淆黑白。现摘要略说几点：

第一，文章说游击队一成立，就在“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一带，广泛地展开了游击活动，在那里开辟和建立了根据地。”根据我的调查：翻遍 1932、33 年省委文件，当时的陕西省委根本没有这个决定。游击队内部也没有

这样的决定。陕甘游击队是 1932 年 2 月成立的，当时省委就批示游击队开到渭北平原，开辟渭北苏区，即三原、富平、高陵苏区。而阎红彦的文章却掩盖了这个错误的事实。伪造了另几个县。伪造的那几个县，有的在山区，有的在平原，说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苏区，实际没有这回事。省委没有这样批示过，游击队也没有这样干过。游击队在正宁县的三甲原成立，到职田镇的阳坡头打了一仗就走了。走的方向是渭河北岸的平原地区。从旬邑到三原要路经耀县边境，边打边走，匆匆而过，两三天就到三原。怎么能说是建立根据地呢？（可查 1932 年春省委的指示和游击队的报告）。

第二，文章说：“在攻克职田镇，阳坡头，马家堡和清水源、四村原等地之后都迅速建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赤卫队等组织，还成立了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领导群众抗捐，抗税，没收大土豪的田地，烧毁了地主的契约。把土地、牛羊分给农民群众。广大群众斗志昂扬，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在红军游击队攻山河镇一役中，就有 3000 多赤卫队员拿起了红缨枪包围山河，配合游击队打仗。”这一段文章有两个问题：一、文中说的职田镇，阳坡头、马家堡、清水原、四村原，当时都没住敌人，用不着攻克，去就是了。可是游击队并没有进去，因为根据省委的指示是要急急开往渭北三原一带。游击队没有驻下组织群众，也没有分配土地，更没有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或什么革命委员会。群众工作没有做，怎么能建立政权呢？1932 年 3 月以后，省委曾发过一个指示：“要建立一区、一乡、一村、一镇的苏维埃政权”并“坚决分配土地”，但这些指示又是互相矛盾的，他不让游击队到山区去，只能死守三原，游击队只有二三百人，敌人不但有正规军，还有许多民团，随时跟踪包围游击队。游击队在平原上根本站不住脚。每到一个村只能住一天，最多也住不了 3 天，工作无法进行，那些指示就成了空文。游击队曾按省委指示跑到过四村原，但是不到 3 天敌人就打来，游击队就得撤，怎么能建立根据地？怎么能给群众分粮食，分牛羊？谁敢要呢？分地更是不可能！二、“攻山河镇”也是过“左”行动。山河镇是敌人的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县城城墙较高，驻有敌兵，又有碉堡据守。当时游击队仅二、三百人，武器简陋，去山河镇攻坚实为冒险。一攻再攻，旷日持久，使群众厌战不愿配合。此仗失败得很惨，游击队伤亡大，群众损失亦重。结果是总指挥谢子长被撤职。这种战例

不必再吹，那是在王明“左”倾路线下，攻城市占平原的错误产物。如果 30 年前阎红彦糊涂，30 年后不该再懵懂，如果明知故犯，则更是别有用心。

第三，文章说：“我带五支队到三原县的心字区、武字区一带活动。这一带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就有了党的组织，农民群众斗争基础较好。我去后随即组织了雇工会、贫农会、农民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建立了渭北游击队及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还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这是个弥天大谎！三原心字区、武字区老干部说：“三原心字区、武字区的各种群众组织早就有，不是什么姓阎的来后才建立的。1930 年前后，这里就有各种群众组织和武装组织。有灾民自救军，规模很大，是黄子文领导的。“九·一八”后又成立反日会。1932 年农历 8 月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33 年才正式建立起渭北游击队，都归黄子祥领导。而姓阎的是 1932 年 3 月底 4 月初来的，几天就走了。“按时间说，阎红彦两头不沾边儿，这些都不是他建立的。（关于这里的革命活动，有三原县的文件为证）文章为何如此写法？无非是要歪曲历史。阎氏那次去三原县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省委书记把他调去的。文章的绝技是：先把阎氏提一下，然后把许多事件的时间、地点写成一笔糊涂账，用以假乱真的办法混水摸鱼，把有用的东西都算在自己账上。从档案中查到：三原的心、武两区，1933 年以前根本未分土地，那时省委指示中有分配土地的任务，而根本不能执行，因为敌人常来围剿。省委曾骂那里的领导是“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因为没有分土地。当地的群众又骂省委书记是“日弄主义”，所谓“日弄”就愚弄的意思，因为土地不能分，分不了。那里是平原，距三原城很近，敌人常来常往，谁说那时能分土地，全是痴人说梦。

文章说：在三原心、武两区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千余人的队伍。这是指的哪个游击队？如果是渭北游击队？那是 1933 年春成立，阎氏是 1932 年去的，对不上茬。如是指陕甘游击队也差之千里。因为盲目攻山河镇后部队仅余 200 余人，阎氏带的只是二分之一，跑一趟三原回来并不见增加，哪来一千余人。5 月，刘志丹带游击队进军韩城，途中作战曾有增加至千余人。不久因阎氏值勤失职，遭敌袭击，则降至四五百人。韩城之战后又减员，这是“左”倾路线造成的结果。文章说：“尽管三原城里住着不少白军，我们周围的敌人有好几个团，但由于群众

封锁消息，豪绅地主慑于群众压力，不敢进城向敌人告密和求救，敌人根本不知道。”真实情况是：阎氏去三原是省委书记指使，书记亦在三原武字区亲自督战。攻三原县城引来了敌人，三原群众为此遭难。因此省委干部及当地干部皆很不满。1932年省委文件中提到省委书记在三原的错误时说：“以杜衡同志的意见为中心，决定攻取三原，这是对敌统治力量作错误的估计。认为敌人的军队不能很快开到三原。对我们游击队力量作了“左”的估计。可见阎氏思想之顽固，30年前被批判了的行动，30年后又作为功劳宣扬。他要为杜衡翻案，硬说他们在三原的行动正确。

第四，阎说：“把敌人拖到外线后，我们的两个支队又在旬邑县职田镇一带汇合了。开辟了以旬邑县为中心的三原、宣君、合水、庆阳、正宁、淳化、洛川中部（即黄陵）、保安一带苏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那时哪里来的“内线”、“外线”？游击队成立刚两个月，还未建立起根据地，连游击区尚未成熟，何地是内线？何地又是外线？再数一数所指县名有10个之多。游击队成立两个月，才二、三百人就打下十个县？难道一开战就比井冈山发展得还快？据调查，此时此地连一个乡、一个村的苏区也没有，竟敢伪造出十个县，当地的农民也可作证。那时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是正遇上敌人8个团来围剿，三、五支队会合后即向宣君、中部、洛川绕路到黄龙山、韩城去游击。部队是一边打仗一边转移，沿路经过宣君、中部、洛川，每地只住一夜。怎能一夜之间产生大块根据地？至于合水、庆阳、保安等县，那时根本还未去过。难道脑子一想，就冒出来一块根据地？查省委档案，1932年连一个县的根据地也没有，到1933年换了省委书记，才在耀县的山区照金建了一个小苏区，可那时阎氏等早已不在陕西了。这篇文章如此写法，是何用意？无非是想说：陕甘根据地是他用两个月打出来的，不是1933年秋后经过千辛万苦创建的，想贪天之功为己有。阎氏可曾想到，脚板到过的地方并不是根据地，脚板没到过的地方更不是。毛泽东都不曾说过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程全变成了根据地。我不是冤枉他，他文章中还说：“从此陕北红军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为后来陕北红军和陕北苏区的扩大打下了基础。”在关中搞了两个月的游击战和陕北能沾上边儿吗？陕北红军离阎氏远得很，是后来创建的。阎氏曾说：“什么路线不路线，都是瞎干。”他还明目张胆地说：“对于王明

路线也要两点论，陕北苏区就是郭洪涛用王明路线创建起来的。”这就是阎氏的真面目。他否定了千百万红军战士和革命干部对错误路线进行的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后，有人告诉我：你批评阎的文章送到中宣部。在康生闹得最紧张的时候，中宣部拿了出来印发给八届十中全会。本来正批《刘志丹》小说，这个材料一发激起一场风波。有人说：“既然双方有意见，还是下去解决后再说吧！”阎氏见我揭了老底有点心虚说：“那文章不是我写的，是我的秘书写的。”有人议论：“秘书能作主发表吗？”康生要包庇一方，打击一方说：“这两封信不可能是李建彤写的，她是个年轻人，怎能知道这么多事？这两封信不是西北局书记就写不出来。我看这两封信是习仲勋写的！”康生恶毒地把我写的信栽在习仲勋身上。从此阎被包庇，习仲勋背上了黑锅，被撤掉了副总理职务，被立案斗争审查。我怎么能想到，我写的信又栽到习仲勋头上。

17、一顿陕北饭引来大祸

连日来，为吃“陕北饭”问题已有几个专案组来提审过我。陕北人热情好客，把好吃的送给别人吃，或者请人到家来吃饭都表示对别人的尊重和关心。在陕北时对外来干部，尤其是经过长征来到延安的人都是这种感情。自从高岗问题发生后，有人借此要把陕北干部搞臭。谁在陕北人家里吃顿饭，就要受到侦察调查，没完没了。如果是陕北人聚在一起吃顿家常饭简直是大逆不道。陕北一大批干部在一起战斗过，一起坐过牢挨过打。他们的血是流在一起的，都是真正的亲密战友。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陕北人见了面很亲热，景范就约了几个老乡到家里吃了顿荞面条。不料却惹下了大祸。那次来吃饭的人是陆续来的。客人们吃罢饭到东房客厅聊天。东房又是我的办公室，我就在那里写作。桌上放着数据和稿纸，也有印出的《刘志丹》稿本。因为封皮上写着《刘志丹》字样，他们就问几句。我说：“我正在写，还没有写完。”有人摸了摸书皮，有人扫了一眼书皮就打扑克去了。就这样一闪即过的事情竟被认为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凡是来吃过饭的人都被认作参加了写《刘志丹》，都是阴谋家。

就说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吧。1962年夏天北京正在开八届十中全会，

康生和阎红彦对小说发难，各省来的人都在议论。有人不以为然，有人兴趣很大。在西北各省驻京办事处住着宁夏自治区第三书记李景林，还有尤香斋，和一些1935年在陕北执行左倾路线的人。他们手上都染着人民的鲜血。这些人有后台老板，在几十年后还握有一部分权力，成堆结伙。他们碰见罗成德就问：“你有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罗成德答道：“看见过。”这个老实人只见过一张封面就不加思索地说他看过小说。于是，李景林和尤香斋就逼罗成德：“交代！现在中央正批判《刘志丹》，你们是怎么密谋的？你们要写什么？是怎样为高岗翻案的？”罗成德不知内情被唬懵了，也不知说什么好。李景林、尤香斋和阎红彦听说罗成德到我家吃过饭就盯上了。就这么一点小事，罗成德在北京被李景林他们斗了几天，回到宁夏后又继续斗，最后被定为“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成员，发配到中央党校学习。1965年从中央党校“毕业”，被贬到河北省。文革中又被揪来揪去，到北京、河北、山西轮着斗争。河北某大学到我家外调。我说：“罗成德没有提供过材料，也没有看过稿子，就看见一张书皮，能定什么罪？”学生说：“罗成德自己可是认了帐的，他说看过《刘志丹》。”我真替他着急：“他看过内容么？我写了什么，他知道吗？”从1962年到1967年，他为扫了一眼书皮挨了5年整，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他挨整就是因为陕北时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追随者。

这几天，原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专案、原甘肃省副省长张鹏图专案、原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项目、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项目都来提审、外调，还是为在我家吃的那顿陕北荞面。我只得一遍遍接受审讯，为每个人讲清楚：毛应时，陕西省志丹县人，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工作过，那时刘景范任民政厅长。七千人大会时，毛应时到我家吃过一顿饭，这顿饭吃的是陕北荞面。我家的炊事员不会做荞面，刘景范只得去帮厨，客人们在打扑克。当时三年自然灾害的恶果正在呈现，人们都在发愁，忽见《人民日报》登着“陕北丰收了！”大家喜笑颜开，谈论家乡。我未向毛应时采访过，他也未看过小说稿。王耀华也是志丹县人。我未采访过他，他更没看过稿子。仅仅在我家吃过一顿饭。这些提审人走后，值班人叹了口气：“你的家真麻烦，老乡在你家吃顿饭，现在还得交代，怎么得了！”

我记起曾去中央组织部看大字报，有一张是中组部八处贴的，说是揭发，实

是编造。他们说有个“西北反党集团”，名单中公布了二、三十人，都是 1963 年从西北五省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省级干部。送党校学习也成了处罚的办法。那些被调来“学习”的人，罪名都是因“反党小说”而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的。可那些人中许多我不认识，既没见过面，也没采访过。这是按什么标准定的反党成员？其实是用“反党小说”为借口，把他们从各省领导岗位上拉下来，换上他们的自己人，这就是政治手腕。

18、审查创作经费

今天又审我，主要是经费问题。从 1962 年以来已 6 个年头了，对我写作用的经费竟弄不出个结果。1962 年“三堂会审”时就提出：写这么大的题材要调查研究，要出差，人来客去要吃要喝，哪来的经费？刘志丹是英雄人物，如果公家组织人员去写，至少要三、五个人调查三年五载，游山玩水走遍全国，车船旅费要花国家多少钱？可我写这本书没用国家一分钱。项目委员会到处查账，查我的单位，查景范的单位，看有没有我报销费用的单据。查不出，他们就展开想象的翅膀，从中国怀疑到外国去。

去年传来很多消息：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批判副秘书长高登榜。他是陕北干部，又担任国务院管财务的副秘书长，就把高登榜和副总理习仲勋联在一起，推理出国务院副秘书长当了我的“后勤部长”，供给我大笔经费写《刘志丹》，以便篡党篡国。中央专案委员会大胆怀疑，把矛头指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查账，开斗争会，好大的声势！有人还提出具体数字，说副秘书长拨给我 20 万元人民币；也有人反驳：“20 万元的数目要有总理批件，也没有这项提款。”于是就成了莫名其妙的大案。其实，我写小说时，高登榜根本不知道。他管的是国家大事，我何必去麻烦他。况且，他是个忠厚老实、光明磊落的人，哪能偷偷摸摸给我经费呢？说实在话，如果有哪位领导人想得周到一点，公家是应当提供我经费的。可惜谁也没想到，我只得耗尽了自己家里的生活费，还借了外债。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没钱去广东，没有看到当年刘志丹活动过的《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牵连，我才真正感到有罪，并不是我写的书有什么罪，而是我高估了那些领导人的品德而一味蛮干，给恶人落下迫害好人的借口。

康生的人马在国务院没查出证据，就想到外国，要到赫鲁晓夫那里去调查，因为那时候中国人最讨厌的是赫鲁晓夫。安子文在批斗刘景苑时说：“你们哪里来的经费？是不是赫鲁晓夫支援了你们？老实说，习仲勋是里通外国的！”真是荒唐！竟然制造出赫鲁晓夫提供经费的谎言，诬陷习仲勋里通外国。从前鲁迅先生曾被反动派诬蔑说收了苏联的卢布。现在我也成了被卢布收买的人。不过他们编不出赫鲁晓夫支持我写《刘志丹》的理由，也说不清卢布又是怎样到我手里的。他们有的是人力物力，可以跑遍全国，也可以周游世界，调查用的经费超出我写书用的百倍千倍。他们不会心疼，因为用的钱来自国库。

我自己出经费。谁能真正理解，我为什么要写《刘志丹》。本来是工人出版社约我写的，但如果没有出版社约稿，我也一定要写出来，也许动笔时间会晚上20年，等我离休之后。他们想象不到中国会有这样的傻瓜，别人不敢写的东西偏要去写，别人不敢碰的题材偏要去碰，最曲折的道路偏要走下去。为什么写刘志丹就那样危险？因为全国解放后，迫害过刘志丹的人大都仍身居高位，手中有权，会在背后捣鬼。谁敢写刘志丹，谁就会成为他们打击的靶子。我喜欢刘志丹这个人物。我没有见过他，到陕甘宁边区时，他已牺牲2年了。未见其人，但闻其事，1939年春，我在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学习时，第一次听党史课就被吸引住了。讲课的老师王德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参加过省港大罢工。他讲的路线斗争是那么生动，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革命，“左”倾机会主义又几乎使整个革命覆灭。红军被迫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红军内部的投机分子兴风作浪：敢说真话、埋头苦干的人吃亏；投机取巧、夸夸其谈的人青云直上；常胜将军随便可能被拉去杀头。在我年轻的心灵里埋下了对机会主义的憎恨，总觉得常胜将军被杀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然，这只是理性认识，自己还没有亲身体会。到1943年，康生在延安发动“抢救运动”，波及整个陕甘宁边区，我就身临其境了。谁给领导提了意见，谁就是“反党”，就会被斗争、拷打，甚至致死。究竟谁是党？我弄不清。我疾恶如仇，为队伍中隐藏着那些坏人而忧虑。我苦闷，我徘徊，我感到意外。因为在参加革命前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没有想到党内的种种怪现象。因为我幼稚地认为这支队伍永远是光辉灿烂，连个黑影子也不会有。我内心藏着一腔向真正革命者倾诉的衷情。

从 1943 年到 1945 年，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介绍刘志丹事迹的文章。他是那么坚强无私，那么有胆有识，那么光明磊落。然而，他受迫害，受屈辱，经受过难于忍受的折磨。他挺过来了，在逆境中仍坚持为真理而斗争，直到献出生命。我像找到了知己，可以向他倾诉，也为他倾诉。我要告诉人们，这个革命组织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真善美和假丑恶之分。当时我就立下誓言：一定要把《刘志丹》写出来。现在既然写了，我就要坚持到底。无论用什么言词批判，用什么方法打击，都不能使我回头，我不会向恶势力低头认罪。康生这帮人把我这个为写书而倾家荡产的人诬陷为被卢布收买的人，就连刘志丹本人也被他们出卖了。

19、朱理治、高锦纯、王兆相、王恩惠和吴亮台

这几天，提审者又跑破了门。他们把高锦纯、王兆相、朱理治等人都搅和在一块整。我一个一个地打发他们。

华北专案人员问：“你对朱理治的看法从何而来？”我的答复很干脆：“从《毛选》而来，请查看第 3 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注释第 10 条，那是对陕北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审人说：“中央首长已经宣布《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取消，因为里面有刘少奇问题。”我问：“哪位首长？中央决议不是哪个人随便就能否定的，要修改也得经过政治局会议。你们应请示是否经过了政治局？即便是修改个别问题也否定不了整个决议。请问中央修改关于陕北问题的结论了吗？只要没有修改，我对朱理治还可以那样写。他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这和中央那条路线联系着的。只要中央还承认遵义会议精神，承认 1931 年到 1935 年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猖獗的时代，我对朱理治这个人物的看法就没有错，他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执行者。提审者问：“只是根据一条注释，你就写出一个人物？”“当然不仅仅是一条注释，还有档案和当事人提供的情况，他本人检讨也叙述了自己的历史错误。他的检讨比郭洪涛好得多。我写小说时只把他写成书呆子，犯错误只是思想问题，不是品德问题。一旦幡然醒悟就立刻改正。我没有采访过朱理治，没有亲眼观察他的风貌言谈，只是凭着文字记载得出的印象。但相信他就像我访问过的聂鸿钧（注 2）一样诚恳。提起往事愧悔不已，勇于认错说真话。”

内蒙专案人员要我供出高锦纯和小说的关系。记得清清楚楚，我访问高锦纯

是和工人出版社的王勉思同去的。地点在粮食部宿舍，他是粮食部副部长。高锦纯是红 26 军骑兵团老团长，朴素，热情。他回忆了红 26 军南下，省委左倾路线对红军的摧残，对刘志丹的排挤。康生因此而绝不会放过他。高锦纯什么时候去了内蒙？我不知道，一定是被贬下去的。那个年代遇上西北干部就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又有人来提审了。我抬眼一看，认识，是湖南长沙测绘学院的，要从我嘴里掏王兆相的材料。去年我关在地质学院时，他们就已经来过两次，是两个不同派别的人。从态度看，一派好些，一派很坏，后者的头子是个穿白衬衫的大高个子，长方脸，拍桌子瞪眼，一口咬定王兆相向我提供过高岗的素材，要为高岗翻案。我说：我调查红 28 军东征的情况怎么会谈到高岗呢？高岗又不在 28 军。”我把他顶了回去。另一派的头子是矮个儿，圆脸，40 来岁，问话心平气和。今天来的是这个矮个儿，没想到也转了向，非说王兆相谈到过高岗。我说：“去年就对你们说过，王兆相没有谈到过高岗。”那人说：“你不老实！”苏州姑娘是陪审官，在一旁拍桌子：“老实点，再顽固就没你的好下场！”我抬眼一看，她可真凶，黑眉毛都竖了起来。我也火了：“叫我胡说没门，拍桌子也没用！”矮个子平静下来：“你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就照实说吧！”我也缓和下来，一五一十将去年说过的话重复一遍：王兆相怎么参加红军，怎么南下终南山，怎么回到神府闹革命，成立红 3 团，又怎么配合红 28 军东征。我讲完，苏州姑娘说：“你会背小说呀，这不都是你书中写的么？”“我采访的是这些，写的也是这些，没有其它的。”矮个子叫我再写一遍。去年不是写过了吗？大概是他们听说我被关押起来，赶忙跑来再逼一遍，看有没有油水，免得另一派把材料抢去，自己变得被动。我答应写，按照看管者的规定，我应写两份，一份给外审单位，一份留本单位。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没写上。凭我了解的写。王兆相可不是个普通的团长，他是个单独开辟了神府苏区的军事首领，家中还有几个烈士。他的父亲是因为杀了叛徒，而在““肃反””时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杀害的。他自己也被撤职几次。军队一有起色就被撤职；“左”倾盲动失败了，又要他复职；这样反复几次。他为革命立了功，也吃尽了苦。1936 年红军东征，刘志丹到了神府。群众对志丹的那个热情啊，多少话也说不尽，还编了许多歌。他们唱着：“一杆杆红旗，一把把号，咱们的

老刘啊，你可来了。”这都是王兆相提供的材料。

天津来人追问神府苏区的情况，素材从哪里来？我很反感，他们是怕我写出神府苏区死人太多，杀人太荒唐吧？他们绕着圈子追问，原来是要在王恩惠身上打主意。我的答复很简单：“我没访问过他，他没有提供过素材。”“你认得他么？怎么认得的？”“是在延安认识的。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凡是项目人员问到哪个人的情况，总要问和习仲勋有什么关系？都是西北干部，有历史关系、工作关系，这有什么可问的。我只得回答：“去问他们本人吧。”

这句话是得罪人的，无非是惹得他们狂吼一阵。

陕西来人提审，追查省检察院院长吴台亮的事。我很尊重这个好老头儿，虽然文化低，但待人极诚恳。1958年我去访问时，他是那么热情真挚，恨不得把肚子里装的事统统倒给我，他还唱给我听红军时代的歌曲。他的记忆力真好，歌词一句不漏，曲调充满浓厚的陕北风味。有些歌连我在“鲁艺”收集民歌时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还曾经写信给石鲁让他去听听吴台亮的歌。可是我不愿意对造反派说这些，因为他们会颠倒黑白，变成吴亮台的罪状。对陕西人，我是有半个乡亲之情的，但此时一切都被扭曲着，他们把我当成了敌人。来人问：“你为什么访问吴台亮？”“因为他写过革命回忆录，我想要他提供素材。”“什么革命回忆录？是反革命回忆录！”“他写红军时代的故事，为什么说是反革命回忆录？把红军称为反革命，这是反动派的观点！”这下就惹恼了他们，和我争吵起来，话就谈不成了。

第二天，专案组把我带到楼上，4个人提审我，其中一个穿军衣的样子很神气，摆出付权威架子。他问道：“听说你的态度很不好，你还骂群众？”“我什么时候骂了群众？骂了谁？”徐州人和广西人出来作证：“她骂外省来的专案人员是反动派。”一听这样的话，我马上发火说：“他们真是反动观点，为什么把红军当做反革命？我现在还是认为他们是反动派的立场。”军人说：“他们是群众！”“带着专案任务来提审我也叫群众？不要用群众名义打掩护，真正的群众不会是这样！”军人还要说，我又顶了回去：“如果说吴台亮专案人员是群众，那么中央直接领导的《人民日报》也是群众？报上为什么把南梁说成是红26军‘盘踞’

的地方？盘踞是反动派对红军的诬蔑，把红军贬为‘土匪’，把红军住的地方叫做‘盘踞’。《人民日报》编辑应当撤职！”那军人的脸唰地变红。他们仍不罢休，要我按他们的要求写材料。我写道：

一、1960 年去西安时，我没有找过吴台亮。（这里声明）

二、1958 年吴台亮谈的材料，我没有整理出请他核实。因为他谈的材料和他写的文章差不多，没什么大事情。我的初稿和以后的稿子都没有给他看过。我和吴台亮只见过一面，素无来往。

三、我写的第一、二稿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说，所有的人都用真姓名。吴台亮也是真姓名，这稿子现存在中央项目组。稿子中没有“罗炎”，没有高岗的材料。到第三稿改成了小说，所有真名实姓全不见了，里边出现了许多不认识的人，出现了“李拐子”，这就是吴台亮的变名，为写红军的政治委员也出现“罗炎”。“小说中的人物都得和政治委员打交道，但人家本人可没谈过这人的材料，这不是吴台亮一个人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如果把我小说中写的，凡是和“罗炎”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是谈了高岗的材料，就都当成““反党分子””，打击面就太宽了。这件事实际上是我写作中的错误，与别人无关。

四、吴台亮谈的材料中还有：陕北 1935 年二次反围剿时，游击队在山上打落了反动派的飞机，俘虏了驾驶员，群众痛恨敌人，要打死俘虏，刘志丹就给他们讲俘虏政策。老刘说，因为这些人脑子里有反动思想，才干出反动的事，我们不杀他们，要给他们换脑筋，进行政治教育。

关于吴台亮谈的材料（包括前次你们来时我写的东西）还有他写的革命回忆录，你们说：“那是什么革命回忆录？是反革命回忆录。”我很惊奇。如果你们把 30 多年前，为建立民主政权而消灭反动派的行为，看作是反革命行为。这是自从世界上产生马克思主义以来从未听到过的奇特现象，只要你们觉得这种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你们就去作结论吧！不过，我相信，毛泽东主席不会同意这种观点，虽然那时毛主席不在陕北，他也会把陕北红军（包括陕北和陕甘）为消灭反动派所作的许多斗争都看作是革命行为。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也已提到，中央来的时候，陕甘边地区是块革命根据，不是反动派统治的白色区域。当然，应当着重

指出，中央来的时候，那块地区正发生着王明路线所造成的危机。中央用遵义会议的精神，挽救了那块根据地。1935年中央来陕北以前，那是个什么局面？反动派动员了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甘肃的杨子恒、陕西的17路军，陕北的井岳秀，山西的阎锡山，反动派还派来嫡系高桂滋师，加上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以数十倍的兵力从四面八方来围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他们把红军当作赤匪，把红军的领导当作匪首，把红军的活动当作流窜，把红军的根据地叫做盘踞的巢穴。现在我们自己人为什么也用同样的腔调？把红军和干部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这种立场究竟是和谁站在了一边？谁会拍手称快？为了创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牺牲了多少革命人民？在陕甘边、陕北的人口中，几户人中就有一位烈士。没想到三、四十年之后，他们这些流血牺牲的壮举却被某些人看作是反革命历史。好不使人痛心！去问问那些烈士们的家属，他们家中的人是跟着革命队伍打仗牺牲的，还是跟着反动派打仗牺牲的？是打白军牺牲的，还是打红军牺牲的？历史岂能容人随便颠倒？

现在，我虽然已失去自由，这也算不了什么，我还是要说话的，不管我的话会带来什么恶果，我都要明确地对你们说：“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因为你们这种观点是违背人民意志和普通常识的。”

李建彤

专案组拿去看了，又退回来：“这样写法不行，这是反攻倒算！”我把材料放下，自己在上面注明，此材料专案组不肯收，作废！他们命令我再写一个补充，我又将上次写的作个摘要。他们加了批语：“李建彤系反党份子，此材料仅供参考”。事情并没有结束。过几天，青海人把我带上楼，在另一个办公室里，坐下后，徐州人和广西人轮着向我训话：“你来这里后有几百起人来找你，人家找你一次也不容易，都要走上千里路，还要经过军代表批准才能见上你。可是你毫无诚意。凡是来过的人对你都有意见，告你状有几百条，怎么得了？”我说：“虱多不咬，债多不愁，有一千条意见我也不怕。我有个硬肩膀，能够承担一切压力！”他们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想想你的前途？”我冷冷地回答：“前途不能靠向错误投降来取得，我没有违犯宪法，没有违犯刑律，我应当有权去当农民！”我等待着对我的处置，可又怕闷出癌症，赶紧钻回木笼里唱歌。在歌声中散心、

活血，忘记那荒谬的一切。

20、刘景范被逮捕

早上起来去打饭，一出木笼看见左墙上贴了张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右边靠窗墙上也贴了一张：“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还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一看就明白是把我当成彻头彻尾的敌人了。不过，头一张写颠倒了，我如不给他们指出来，写标语和贴标语的人都得被打成反革命。今天值班的是一男一女，我告诉他们：“喂！这语录写错了！”我手指了指，那男的见了连忙说：“是，是，是，错了，错了！”他快手快脚地把那张标语撕掉，重写了一张。中午，看守押着我去吃饭。到院子一看，贴满了刘景范的大字报：“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景范好得很！”“刘景范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食堂门口贴着布告：“5月23日下午3时，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景范被逮捕！”虽然看见这些标语，我犹如五雷轰顶，但还是尽量沈住气，不要晕倒。我不动声色地从标语前低头走过，打了饭拿回小木笼一口一口吃下去，又出来洗碗。明知看守们在察言观色，还是要让他们看见我把饭吃完，此刻我仍然吃得下饭。这天下午，项目组把我押到楼上提审。他们围住我，个个横眉竖目，气氛十分紧张。我心想，没什么了不起，我什么都不怕！不就是再逮捕一次么。1月8日，他没戴手铐被送到卫戍区的；这次戴上手铐脚镣送进监狱，不就是这点区别吗？

徐州人先问：“你看见刘景范的大标语有什么想法？”我慢吞吞地说：“很好嘛！”穿军衣的问：“什么很好？为什么你说很好？”我还是慢吞吞地说：“我觉得陕北人在这个历史舞台上什么角色都得演。土地革命时，他们演的角色是打倒反动派；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演的是打日本鬼子；解放战争，他们从国民党手里夺得政权；如今他们得唱甩发戏了！”“什么叫甩发戏？”“你没见过旧戏唱的，凡是犯罪的人都得脱下莽袍，摘掉乌纱帽，脖子戴枷锁，手脚上镣铐，在舞台上甩着长发翻打。这些都是忠臣良将被诬陷冤枉。如今唱这种角色的是陕北干部，除了刘景范，其它人也一样。时代变了，陕北人就唱这种角色了，谁让他们曾有过一块根据地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就事论事，我就是这样看的，难道他们从前没有革命过？”气氛仍然紧张。他们互相对视着，对我无辞可言，至多

说我反动。既然已被说成“反动”了，就“反动”到底吧。究竟是谁反动以后再算账。有人冒出一句：“刘景范攻击毛主席，难道不该逮捕他？”我说：“他当然不该攻击毛主席。从前他可不是这样，凡是毛主席说的话，他一定听。现在也许变了。不过，我不相信他攻击毛主席！”“你不相信党？”我心里说：谁知你们是哪个党？这话我没说出口，只有沉默。把我送回木笼，看守看得更紧了，原来10分钟记录一次，今天五分钟就查看一次，记一次。

我坐在木笼里沈思：是的，景范在唱“甩发戏”，习仲勋、马文瑞呢？据说贾拓夫这个老实人已被整死。马文瑞是和我们同一天被抓走的，习仲勋早已被康生指使学生从洛阳揪到西安。我暗暗骂道：自己人杀自己人是犯罪！我这个河南人要为陕北干部鸣不平。他们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的？他们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你们受用，保护你们的安全，把你们奉为老师、领导、伟人。可谁知你们用心却如此狠毒，全国一解放，政权刚到手，就设圈套，耍伎俩，千方百计打击他们，只要是陕甘宁根据地边的干部就挨打。我冤枉你们么？不，我有根据！且不说为我这本书整了不知几万人。在这以前又何尝不是如此打击陕北干部。

例如前边提到的黄罗斌是陕甘红26军老三团政委，解放后是省级干部，曾在甘肃白银厂当厂长。从北京去了一个“大人物”，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回来写了个报告罗列黄罗斌种种罪状，结果黄被打进深渊。告发的人一时成为“坚持原则”的红人越级提拔。那些罪状全是捏造的，许多事甚至是告状者本人做的，他却反咬一口，陷害忠良。那案子至今是个黑洞。又如原内务部副部长王子宜是刘志丹老战友，1959年被贬职下放。事情的起因是庐山会议反右倾时，内务部没有右倾，领导人就找王子宜的麻烦。说王子宜反对正部长谢老，谢觉哉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他们仍然硬要写上。用这么个糊里糊涂的案子把王子宜轰出北京，下放到河南工厂任副厂长，还捏造了个“反党集团”，借此打倒一批干部。后来的发展最有意思。打人的首领钱瑛问“反党集团”成员岳嵩局长：“你是哪里人？”岳答：“我是上海人，和你一样是抗战后去延安的。”钱瑛说：“哦！原来你是上海人，我还以为你是陕北人呢！”当时内务部的一个局长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了“反党分子”。可见他们专门消灭陕北人。把这些人打倒了，就消灭了一段历史。

我又在猜测景范：他为什么攻击毛泽东，难道他气糊涂了？不可能，他不会。

平常他对毛泽东比我忠得多，就是因为毛泽东挽救过陕北的危局，1935 年把他们从瓦窑堡监狱里放了出来，他永生不忘。比如对于小说案，我说：“这是胡整！完全错了！”他说：“什么也不要说了，只要是毛主席说了话，咱们就照办，就检讨。照顾党的威信，咱们个人算不了什么。”因此他决不会攻击毛泽东，一定是骂了那个恶棍，他们不好说出来，只能说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毛主席”，以假乱真把景范骂的坏人掩盖起来。现在的战略部署可真发展了。不只打陕北干部，把各个山头的干部全打倒了。先打彭德怀，是打给长征干部看的；打贺龙，是要肃清二方面军的影响；打陈毅，是消除新四军的影响；打倒刘少奇、彭真这些人，是要削弱华北势力，以免失控。总之，打倒一个人就砍掉一大片，扫荡光了才好建立新的势力。

21、高朗亭专案和赵连璧之死

走进来一男一女，男的约 50 岁，鬓发已白，穿着发亮的皮鞋。那女的有 30 多岁，军人装束，军帽下压着长发，夹着皮包，像是个秘书。在军队上带秘书外出办事的应该是将军。什么人的问题值得将军出面提审？若真是将军，恐怕不会自己出来办案。我拉出方凳坐到木笼口。那位“将军”坐在靠背椅上装腔作势。女人也摊开本子，伏在桌子上准备做记录。男的劈头就问：“你小说中为什么写了高朗亭？”听到这句话，我已明白此人是高等军事学院的。他问的高朗亭是陕北老红军，原先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我曾去采访。他告诉我：自己的命是刘志丹救的。1935 年春，陕北左倾机会主义头子要杀他，被刘志丹硬拦住了。高朗亭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我在小说第三稿中用了他的素材。新稿只写到 1933 年的事，那时刘志丹还没有见到高朗亭，用不上他的素材。可见康生领导的项目组已将未发表的废稿也传遍了全国。本来在景范被捕后，我随时准备被升级，戴上脚镣手铐。这几天，他们没有动手，估计是想留个“舌头”，把全国被牵连进小说案的都引到北京来，从我嘴里得到材料。

我决不为康生当“舌头”，要为受冤的人当“利剑”，反驳他们：“高朗亭为什么不可以写？”“将军”动怒了：“你可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是陕北老红军，没有人否认过，难道你们现在连这也不承认了？”“将军”训斥道：“你可知道他是怎么参加革命的？”我故意漫不经心地回答：“只要参加革命，怎么来的

都可以。无论是从家里逃跑的，还是从敌方开小差的，我们都欢迎！”“将军”跺脚说：“他家是地主，他老子被民团杀了，他要为老子报仇，才拿枪去打民团。”我反问道：“那他算不算参加革命？只要他拿起枪，打的是反动派，都应当视为自己人。不要忘记，他是学生出身，当时已经是共青团员，难道不许他革命？”“将军”重复着说：“他是为地主老子报仇！”“利用敌人的矛盾增强我们的力量，有什么不好？”“将军”气得直骂我：“什么思想？怎么能同情地主儿子？反动透顶！”我也不客气地回敬：“你看样子是个老军人，难道就不懂统一战线？”

“将军”恼羞成怒，转移话题：“你书中写了些什么？连土匪赵连璧都写了进去！”我盯了他一眼：“什么？赵连璧是土匪？他抢过你家么？为什么叫他土匪？他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投降白军，为什么叫他土匪？这是谁造的谣？”“他行军带着老婆，影响很坏！”我不让步说：“把老婆带上就是土匪，把老婆放在家里就是正规军？请问日本投降后，咱们向东北进军时，你们有没有带老婆？”他没有答话。我接着说：“告诉你，赵连璧是雇工出身，28岁才娶了个寡妇。他没有家，能把老婆放在哪里？有些人家庭富裕，像阎红彦有个当土匪的哥哥，所以有钱给他娶个老婆放在家，出门在外再娶一个。还有阎红彦最崇拜的谢子长也有个当民团团总的哥哥，家庭是富农，从小就娶个老婆放在家，在外再娶一个，家中有钱有势自然有人替他养活，当然不用带着行军。穷光蛋赵连璧无家可归，只得带上老婆行军，这就犯了天大的罪，要被谢子长、阎红彦枪毙？这本来就是颠倒是非，40年过去了，还要算‘行军带老婆’这笔旧账，还要用这件事整活着的人，真是岂有此理！”这又激怒了冒牌将军，他跺着脚说：“你真是高岗反党集团干将，表现最恶劣！”我眼里冒出火星，在心里骂道：你是阎红彦的帮凶，康生的走狗！”他指示秘书：“给她记在本子上，告诉她的组织，这人表现太恶劣！”

他们踢踢哒哒地走了。我想，这是阎红彦为历史翻案的证据。否则，军事学院怎么会知道赵连璧？赵连璧是1932年三甲原缴枪事件中被误杀的一个大队长。1942年和1945年延安西北高干会和历史座谈会上都谈清楚了。阎红彦在1945年6月12日的发言中检讨了，说了前后过程，但他打了埋伏，没有说出袭击刘志丹部队，打死赵连璧是个阴谋。他只讲了枝节，没有讲本质，向组织隐瞒了几十年，到死都没有说真话。1958年我到西安采访，从杨晓初老人那里得到全部

材料，因为 1932 年张汉民（注 3）就住在杨的家中，谢子长给张汉民的信，杨也看到了。张汉民如何处理的，也向杨全部说过。谈到这些问题，杨很气愤，说谢、阎太狡诈，志丹太忠厚，受害了。我为了照顾谢子长的面子，从前在小说中没写这件事。他们竟然还要用打死赵连璧的理由来整活人。

下午，专案人员怒发冲冠地对我训斥道：“李建彤，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到这里后有不少人来提审你，可你的态度最坏。没有谁走后不告你的状。今天人家又告了你。你不想想前途吗？”我说：“我不要什么前途，目前的处境就是我的前途。”“你不为你的孩子着想？”“哼！孩子？被打倒的人这么多，被关押的人遍地是，谁家没有孩子？人家孩子怎么活，我的孩子也怎么活。”我已横下一条心，绝不当文革中的应声虫，绝不诬赖好人，绝不伤害西北干部，我不会伤害任何一个好人！我何尝不想孩子！难道会不知道他们生活在被歧视中？可是如果按康生他们的要求胡说乱写，我将遗臭万年。

22、华北局斗争张邦英和朱理治

天热气闷，小木笼连一丝风也透不进来。早晨六点前，我借口上厕所推开门，我要看看太阳，要呼吸新鲜空气。看守们整夜敞着窗户，却把我关在四面不透风的木笼中。只有早晨这点时间，我能坐在木笼口看报纸，听窗外的鸟叫。早饭后提审的就来了，这次来的是华北局张邦英专案。

1962 年冬天，小说案爆发，我和景范被审查时，有一天康生、安子文派了个特使来找景范，特使就是张邦英。邦英是陕甘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是景范的老战友，这谁都知道。可康生和安子文偏偏派邦英去当说客，说服景范检讨交代。邦英明知是圈套，还得往里跳。康生打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招牌，谁能抗拒？邦英来了，又走了，还得回去交差，这比直接挨整所受的害并不轻。邦英迟早要挨打，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因为我采访过他，他谈过耀县起义，采访记录都在康生、安子文手里，迟早会拿他开刀。可他们先要利用张邦英，用心何其毒也。5 年后的 1967 年，在地质部礼堂斗争我和景范时，就把马文瑞和张邦英都拉去陪斗了。在被揪上台前，我还瞅空问他俩身体好不好，希望他们保重。

有人透露，文革一开始，张邦英就被揪了出来，去打扫卫生了。他是华北局

的副书记，没有人唆使，不会轻易被揪斗。斗争张邦英的理由，说他也是高岗那条线上的人，因为 1942 年他在延安参加过西北高干会，批评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高岗是一个立场。如今那次会议已被否定，成了“黑会”，张邦英当然也就逃不过了。

我听看守苏州姑娘和同伙谈话，说在华北局机关开批斗大会是两台大戏对唱。一台是斗争副书记张邦英，一台是斗争另一位副书记朱理治。朱理治当年是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又为何会挨批呢？原来当时刘少奇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什么问题都往他头上堆。我在街上看过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其中有个问题就是为朱理治翻案：朱理治曾写信给刘少奇，说他 1935 年在陕北是反对高岗的，因此是正确的。从前对他的批判处理都是错误的。和他一起被批的郭洪涛已得到康生的平反。他也应当平反，请求刘少奇批示。刘回信要朱写书面材料，经他审阅后才可批示平反。只因为有刘少奇这几句话，就说朱理治和刘有勾结。群众批判朱理治：“你为什么在陕北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打击陕甘、陕北干部，搞错误的、莫须有的‘肃反’，诬陷了那么多干部，错杀了那么多人。你必须交代所有的罪恶。决不许翻案！”另一个台上又批判张邦英说：“你们为什么批判左倾路线？根本没有什么左倾路线，左倾路线没有到过你们那里。你们开什么西北高干会完全是阴谋，是个黑会！从前逮捕你们也是对的，因为你们是反革命！”群众两边跑着听，听听这边，是批判的那边；听听那边，又是批判这边的，究竟谁是谁非？有认了真的人说：“这样批判是自相矛盾，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有凑热闹的人说：“闹吧，就这样闹吧！这种互相矛盾的批判就能使中国不变颜色？就能肃清修正主义？”中国还是有不少“有心人”产生种种怀疑，想弄清历史的真相，对这样的批斗会自然会产生种种不满，一传十，十传百，竟传到了我这个单位，被苏州姑娘听到了。如果说苏州姑娘开始有些糊涂，如今可是越来越明白了。

23、朋友为我受难

看守中有个“小诸葛”，40 来岁，山东人，粗粗壮壮，说一不二。论诚实，他可算最实诚；论机灵，他比谁都看得远。他虽不是大学生，可比大学生社会经验多，他在军队是营级干部。托他打听点事儿，没有打听不到的。说起来这里的

复员转业军人都很通情达理，能独立思考，不愧是在军队大熔炉里受过锻炼。这个小诸葛和我素不相识，头一次来值班时就指着桌上的值班记录说：“记这些干什么？10分钟记一次，罗嗦嗦什么都记上了。吃一个馒头也记，去一次厕所也记，梳头洗脚统统记上。吃饱撑的！”我也试探着说：“各有各的看法，有人认为我打个喷嚏都得向中央报告，因为这是阶级敌人的动向。”他眉头一皱说：“实话说，你这个人，我们研究过，没啥。现在这么个整法多余！”我说：“我的案子可是全国第一等的。”“你写的交代我看过，人家提审你，你的谈话，大家都听过，谁心中无数？中国老百姓不是阿斗，是认真理的！”我心中一亮：原来有一部分群众是这种态度。以后每次他值班，我总要托他打听一些事。时间长了，他还会主动去打听，瞅机会告诉我。

这天小诸葛一进门就把同伴打发走，趁机告诉我：有次文化系统造反派来揪你去开批斗会，上级专案组没批准，怕把你抢走不见了。美术界的斗争会已准备好，横幅标语是“斗争反党分子李建彤大会”，但会上没见李建彤，只有拉去陪斗的美术界干部，有朱丹、刘迅和李琦。那次斗争会可真凶，3个被斗的都挨了打，拳打脚踢把朱丹打得趴了下来。听了小诸葛的话，我的心又紧缩起来，朋友们都在为我受难。

我想起这些朋友：李琦，西北文工团成员，他进团时，我已离去。50年代经过石鲁介绍在北京才见面认识的。他送我一张自己的作品《毛主席走遍全中国》。文革一开始，我发现抄家成风，封建王朝是拿着圣旨抄，现在抄家连圣旨也不用，没有任何手续就可以随便进门抄家。我一狠心把朋友们的东西一把火烧了。其中有闻捷送我的诗集，石鲁给我的信，王亚凡的诗集，朱丹为我写的条幅，李琦签名的画，特别是已去世的石鲁、闻捷和亚凡，他们的手迹已成宝贵的遗物。可当时的我气疯了，烧吧，保住朋友的命要紧，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后悔。朱丹，我们称他“老丹”，何等忠厚的一个人！30多万字的稿子，他总共看过两三次，我每送给他一次，他都看得很认真，都会写上许多眉批，特别是第五稿的每一页几乎都写上了字。他说要像“脂砚斋评石头记”那样用心。老丹眉批的最后一稿原本在我手里，康生派人来我家收手稿时，我把这本子暗中留下了，从1963年一直保存到文革都没舍得拿出去。眼看我已成了众矢之的，抄家次数越来越频繁，

实在什么也藏不住了，我才托朋友拿走。这样一来，他们再去斗朱丹，手上就没有证据了。

小诸葛说的话使我想起另两起专案，一起是田野专案，另一起是张松涛专案。这两人都是我的朋友，但不是西北干部。认识田野是因为他的爱人白利是我的同学，几十年没断过来往。我们是知根知底的朋友。当年在延安，我特意从桥儿沟到北门外参加他们的婚礼。那时白利在和平医院做医务，田野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做文化工作。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文笔很好，能诗能文。到北京后，我和他仍有来往。写出《刘志丹》第5稿后就去找田野看看，出出主意，他是内行嘛。田野是位忠厚谦虚的人，再三声明自己长期不写东西，没有水平了。我再三请求，他不好推辞，只得拿去看了，然后很谨慎地提了点意见。当然，他不了解西北历史，只能在文字上提点意见。比如说：“器宇轩昂”这样词汇不要用在刘志丹身上，志丹是另一种气质的人。像这样的意见有什么错误？竟然三番两次来提审。这位一辈子谨慎怕事的人却被我拉入漩涡。

另一专案是张松涛，是我朋友贾志先的丈夫。老张是老北京，军队知识分子，延安时的联防司令部作战科长，对陕甘宁边区地理环境挺熟。我求他为我的书绘一张红军作战地图。那图绘得真好，标准、细致、正规，谁看了都说好。就为了这张地图，他被阎红彦的老朋友吴岱峰揭发了，因为我拿给他看过。谁知这个从前陷害过刘志丹的人至今仍不悔改，连绘地图者也要坑害。因为绘地图的事，老张的单位国家计委（老张是国家计委局长）来过两三次，我深感对不起老张。在文革中，那张地图不知去向了。“反党小说案”平反后，我再写书时去求老张绘图，他已老了，血压高，眼睛昏花，绘不出那么细致、准确的作战图了。老张，多么可惜的人才。我向你致歉！

24、株连陕西的朋友

一天夜里听到了枪声，北京发生了武斗，机关驻进了军宣队。在这个犯人看管室里，他们竟然打开了窗户，让外边的喇叭声传进来，放着钢琴伴唱《红灯记》。实在烦人，我钻进闷热的木笼里沉思：因为我两次去西安采访，就硬说我在西安举行过记者招待会，或文艺界招待会，还说利用吃饭进行反党活动。1963年项

目委员会审问时就提出来了，我很坦然，这是很平常的事，我要写文章必须去采访；到西安采访，必然会遇见熟人。吃饭聊天人之常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可还是不依不饶地追查。这些天又穿梭般地来了一群人。

1958年反右刚结束，我就请假到西安采访。到西安的头一天就遇见西安市文化局长高歌。高歌是我在西北文工团的老朋友，我一说想去看看柯仲平，他便要了吉普车陪我去。柯老住在几十里地外的常宁宫。要写刘志丹必须先访柯老。1943年西北局就把写长诗《刘志丹》的任务交给了他。15年了，他搜集了不少资料。我猜想他的《刘志丹》长诗可能已写成了。到常宁宫说明来意，柯老便和我一块到麦田散步。阳历五月正是不热不冷、万物茂盛的时节，我们边走边聊。我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柯老一一作答。我也把这个题材上的新发现告诉了他。下午回到市内，高歌在饭馆请我吃了饭。西安美协主席石鲁想写《刘志丹》电影剧本，曾经来北京找过我交谈素材。这次和石鲁一见面，他也要求和我一起采访。都是西北文工团的老朋友，怎么说都好办，我们找到西安市副市长杨晓初，他参加过渭华起义。杨老很热心，要了辆吉普车，和夫人李馥清大姐一起把我和石鲁带到渭华起义司令部所在地高塘源。参观了当年司令部遗址，访问了参加过起义的苏维埃干部。近看高原，远看南山，来兵之路，退兵之峪，一目了然。返回西安，杨老和李大姐请我们吃羊肉泡馍，请的不止我一个，还有许多西北文工团的老朋友，有石鲁和夫人闵利生，有杨拯民和夫人陈影。杨拯民虽不是西工团的人，但也是西工团的“姑爷”。这段经历在1962年就一五一十讲清楚了。我知道专案委员会的安子文是李大姐的“难弟”，他们在地下工作时交往甚深，谅他不会加害于杨老夫妇。

我和石鲁又去商雒。坐长途汽车走了一整天，一路见到多处红26军1933年南下失败的地方，明白了地形给红军带来的困难。晚上到商雒城找到地委书记王杰。就因为这次访问，王杰也受了难，因为项目委员会在记录上找到了王杰的名字。王杰有什么罪？无非是1933年敌人围剿造成红军失败时，他从终南山接出了刘志丹。如今这种整法明着是整和小说有牵连的人，暗地里整的是和红26军，和刘志丹有牵连的人。

渭北第一块苏区，一定要去看看，我和石鲁同往，下了火车又雇平板车上山，

因为我扭伤了脚踝，不能爬山。我们先找到在那里的省政协副主席黄子祥请他谈历史。他是老苏维埃主席、红4团团团长，在三原还采访了一些当年的红军战士和地方干部，大家都说黄氏兄弟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功劳大。这是渭河北岸第一块根据地，给了红26军极大的支持。1932年春，“白衣秀士王伦”（1945年延安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给谢子长起的绰号）来了，要独掌军权，把刘志丹的队伍搞垮了，另一部分人吓跑了，队伍由七、八百人减少到100多人。他们向三原武字区的黄氏兄弟求援，黄氏兄弟派来100多人，才拉起陕甘游击队。1932年冬，谢子长又把队伍带出去，打得只剩下170人，再次向三原武字区求援，又派来100多人，才成立起红26军。谢子长的谋士们总想把黄氏弟兄功劳占为己有。红26军是西北第一支红军，是创建陕甘、陕北红色根据地的主力。这支军队的人马有三分之一是从三原县来的。黄子祥一家人，哥哥黄子文顶住省委的左倾路线，搞起根据地，组织起军队，但仍受左倾路线长期迫害，蒙冤数年，后来在作战中牺牲。晋西游击队明明是黄子文搞起来，带过黄河到陕北的。阎红彦却说这都是他干的。为了把功劳抢到自己手上还诬陷黄子文是反革命。直到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央专案组竟还把黄子文当作坏人。他们的一个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妹妹也牺牲了。黄子祥的女儿被王明路线派往陕甘搞“肃反”的鲁贲和安建平杀害了。黄子祥这个政协主席现在老了，在老家住着与世无争。这次我访问了他，他又遭殃挨打了。西安来说，文革开始，黄子祥就被斗争了。可怜的80老人革命了一辈子，全部家产为革命用尽，家人为革命牺牲了一半，到了老年还得挨一次打，而杀害他亲生女儿的刽子手却被保护着，没人敢去碰。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北京享清福。在这个县上，谁整了黄家的人谁就最不得人心。

回到西安，石鲁要请我吃饭，跑到山上去打野鸡，煮了一脸盆，好酒好肉把西工团的老朋友能找到的都请来了，记得有裴然、周冰、刘芳、王琳、程士铭、胡兰。我常常怀念过去，在延安时盼着赶快胜利，可以走出山沟沟。1949年进了大城市，我倒怀念起延安来。不单是那里的山水好，窑洞冬暖夏凉，主要是怀念人，和我一块相处过的人，大多纯洁朴实，亲密无间，特别在西工团时期，我们几乎还是一群无忧无虑的娃娃，互相赤诚相待，即使互相争论也是过一阵就烟消云散。我常常想起他们，每个人都像当年一样生活在我心里。可是听说为了一

起高高兴兴吃过这顿饭，他们都被拉去游街了！去年，有人借外调机会告诉我：“你不要着急！那是一出讽刺戏。起初被拉去游街的人都很生气，觉得受辱，谁知见许多熟人都在游街，也就不觉得难为情了，反正游街的人成千上万。”

1960年小说第一稿印出，工人出版社准备出版，我请他们送给原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审查。习仲勋看后说：“没有写好，许多事还没弄清楚，需补充材料，例如五顷园子分地。”我又跑到西安，这次主要是查档案，顺便在市内访问了一些人。这次柯老又请客，把西北文工团的人都找了来，而且是一对一对的，有陕西歌剧院裴然夫妇、音协的关鹤岩夫妇、美协的石鲁夫妇、作协的王汶石夫妇。柯老热情地劝酒、说笑。我过意不去，几天后也回请了一次，无非是想多玩玩，见一次面好不容易。这就是1963年项目委员会宣扬的，我去西安举行“记者招待会”，又说是“文艺界招待会”。不用举办招待会，我接触的都是文艺界的人，因为我是从那里出来的，那是我的娘家。果然，1962年柯老就被戴上了紧箍咒。因为他们查遍全国，查找还有谁写刘志丹？谁写这个人物就意味着“反党”。很多人早知道柯老写《刘志丹》，不管他有没有写成都要整他。1964年，柯老终于离开了人世间。

听说裴然被打断了肋骨，就因为他想写《刘志丹》剧本。1962年报刊选载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给我打过一次长途电话，这就是他的罪行。石鲁的遭遇更惨，他不但自己想写电影剧本，还答应为我的书插图。他说自己偏爱刘志丹，刘志丹走过的曲折道路在他身上有共鸣，他要去表现这个人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说得来，我们用通信交换过意见。被揪斗时，他不得不把我的稿子交了出去。整人的人还不饶他，批他的画，批他的诗，他画“吊梅”，说是暗含“倒霉”的意思，对社会主义不满，被批判为“黑画”。有人悄悄告诉我，《毛主席去安源》那幅画发表后，造反派拿着画去问石鲁：“这幅画好么？”他不以为然。人家就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他被斗得死去活来，拉到钟楼前罚跪毒打，他的神经分裂了。一代才子，如此下场！真是文字狱呵！一本书，一幅画，一首诗，都可成为““反党分子””或者“现行反革命”。那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指示就是“文字狱”的预告。

25、第一次思想汇报

专案组下令要我写“思想汇报”：“从今天起，你要老老实实在地每两星期向毛主席写一次思想汇报！”如果将我目前思想真实写出来非使问题升级不可，会再加多一两顶帽子。想起景范常说的：不管什么时候也得听毛主席的话，不管他的话合不合你的心意，都要听他老人家的。当初，我们的命是他老人家救的。陕甘那块根据地是中央来了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所以要顾全大局，任何时候也不要违背他的意志。因此，景范在这次事件中尽量作检讨，不是他的错也揽在自己身上。听说习仲勋也是这样，只要是毛泽东说的，他一定服服贴贴地接受，叫检讨就检讨。我刚被押送到这里，专案组里的徐州人说：“只有你最顽固，习仲勋都认帐了。”我说：“那是他编的，死猪不怕滚水浇，任人宰割了，其实根本没有他的事！”“你坏得很，谁检讨，你就骂谁！”我的思想没有他们纯洁，不会像他们那么驯服。我分析了形势后决定：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承认“反党小说”，因为这是钦定的，我硬顶无济于事。我还得承认采用高岗的素材是错误。虽然这样做是违心的，这样承认错误本身就是错误，可是不这样做，我就会被封口，无法进行申辩。我决定写检讨，原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专案组规定，除每天写汇报外，每两礼拜还要写一次思想汇报。在这次思想汇报中，我向您老人家说说我的思想。

近一个月来，专案组命我每天对着您老人家的像片请罪。专案组在“请罪词”中规定了几条语录。其中有一条是：“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跪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很明显，我的问题已经升了级，把我和汪精卫、张国焘同样看待了，所以我思想一直不通。现在我确实对党的政策不能理解了。我是什么人？汪精卫是什么人？我参加革命前是个学生，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也没在任何反动的党政军机关中干过事。参加革命后，我也没犯过大的政治错误。就是后来写《刘志丹》那本小说中发生了高岗问题，也就是在红军政治委员身上用了高岗的个别

材料，这是个很大的政治错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错误能否与汪精卫相比？“反党分子”这个内容与“汉奸卖国贼”是否有区别？

现在我是被定为“反党分子”的。我这个“反党分子”和高岗相比，可能还有区别。起码大小总还不同。如果高岗不自杀，毛主席还会给他工作，也许还不一定开除党籍。张国焘是个另立伪中央，破坏党和红军统一的罪人。在他没有逃跑之前，毛主席还给了他工作。难道像我这个因写了一本小说而犯了错误，既没有自杀，也没有逃跑的人，就已经可以和逃跑了的张国焘同样看待了？根据中央过去的政策，在革命队伍里的人，就是犯了错误，他和汉奸卖国贼还是有区别的。犯了错误以后，自杀，逃跑和不自杀逃跑相比，也是有区别。毛主席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我没有别的事，就因为写了那本小说，从1962年到1968年1月，我家被抄过数次，我挨过七斗八斗，也挨过打，停发了工资，我已被关起来8个多月了。每天日夜4个人轮流看管着我，也有人唆使小孩子等我每天打开水时截住骂我、打我、用树条子抽我、用煤块砸我。对这一切，我都没说过什么，我觉得这是群众运动，都不必去计较。我既不反抗，也不自杀或逃跑，我已下决心，无论在怎样的困难境遇，也要对得起我的信仰。已经犯过错误，就再不能犯错误。我这种态度是否和张国焘一样呢？汪精卫是个老牌的国民党右派，是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贼。李建彤是十几岁就到了革命队伍里，从来没有出卖过人民国土，怎么能和汪精卫相提并论呢？解放战争中，我们俘虏过许多战犯，他们手上都沾满人民的鲜血，国家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并没有每天把他们称为汪精卫。李建彤怎么能成为汪精卫呢？

以上就是我的思想。写出来求得指教、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李建彤

1968. 8. 26

下午，看守徐州人和广东人来收我的“思想汇报”。一看便生了气：“谁叫你这样写的？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思想汇报就要写真实思想。这就是我的真实思想，不对么？”徐州人说：“要是这样写，你就别写了！”我写得不合他们胃

口，他们不满意。

26、赵耀先、方仲儒和秦川

这几天的项目组是审问延安抢救运动的，触动了我心中的那些坟茔，在抢救运动中无辜死去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年轻美丽，洁白无私，都尚未恋爱结婚就一身清白地牺牲了，我为他们流泪。晚上又失眠了，我真疲倦，有点发烧、头晕、四肢无力，我可能病了。在木笼里，身体再疲倦也得撑着。这几天，提审的人直往这里涌进来，我得带病应战。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人向我提出了赵耀先问题。我真觉得自己是犯罪，把刘志丹少年时代的同学都牵连进来了，我对不起他们。那位老实的保安人赵耀先，总是把嘴抿得紧紧的，布满绉纹的脸是那么忠厚。他是榆林中学毕业生，解放战争年代我见过他。土地革命时，他当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经济部长，后来在宁夏管经济。那年他到北京来，我和王勉思去访问他。他听说要写刘志丹眼泪几乎涌了出来，他们是总角之交。他滔滔不绝地讲他们在永宁山读书时的故事，又讲了1928年永宁山党支部做的三件大事：头一件是撤了旧的教育局长；第二件是夺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第三件是领导饥民斗争。他讲得很投入，仿佛恢复了青春，那是在讲他的青年时代。就是这些，他有什么罪？赵耀先的身体不好，他坐过敌人的牢，已是年老体弱，现在就因为讲年轻时的故事，就把他当敌人七斗八斗，关押起来。听说几年前就死去了。将来谁还这笔债？

另一位老干部方仲儒也被他们抓了关起来。除了在他的历史上捏造罪名外，还加上我这个案子。他们问我怎么认得他的？他是西北野战争军后勤副司令，刘景范是司令员，两人在前方形影不离。我去过前方，在同一院子里住，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当然是熟人。在那炮火纷飞的年代，和全国的其它战场相比，西北战场最困难。敌人用飞机、汽车运输，我们用人力和毛驴运输。就是靠这样的条件，我们战胜了敌人。整个后勤工作是刘景范、方仲儒领导的。这些人追问刘景范和方仲儒说了些什么？那时候，他们谈的都是军事秘密，我难道会去窃听，准备30年之后向你们交代？而且，那时的军事秘密和现在的专案有什么关系？难道我在1948年就预谋要“反党”？

我访问方仲儒是 1957 年在华北招待所，与何家栋一同去访问的。他说起大革命时期在西北军中如何做政治工作，在哪个军任党代表，刘志丹在哪个军任党代表。冯玉祥如何清党，他们如何被驱逐。他们怀疑我 1960 年去西安采访，是方老在介绍信上批了字，省委才给我介绍了那么多地方。他是省委负责人之一，当然可以批示。但到了陕西比到我自己老家河南还熟，找任何一个负责人都可以批。即使没有批示，我不带介绍信找到那些老红军、老干部的门上，人家也会谈。谈刘志丹事迹，西北干部中 99% 都很热心。他们追问：到底是赵伯平批的，还是方仲儒批的？其实谁批都一样，他们都会批，也都可以批。问得好无聊。他们问我，为什么住在芷园，谁批准的？那时刘景范在西安养病住芷园，我到西安当然住在芷园。这些老干部都因为我登门访问而受苦。方老在敌人牢狱中受过鞭答，现在又受“自己人”的鞭答。

有些想不到的人也受到株连。不知是哪个机关的造反派又跑来调查秦川了。追问我怎么认识秦川的，有哪些来往？在延安，我就知道他，也见过，但没打过交道。解放战争打榆林时，我们都参加了随军工作队。沙家店战斗时，我们都在离战场不远的山上观战。在村里设了接收站，准备接收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沙家店战斗后，我又和秦川等人一起从榆林走到绥德地区，过了黄河。过河后各回各的机关，他回西北局，我回边区政府。全国解放后，他在中宣部工作，我不知道。我去找苏一平时才遇上他。那时我正找人看书稿，提意见。因为苏一平在中宣部文艺处，又是老熟人，我这个不速之客就找上了门。后来听苏一平说，秦川也看了书，我就请他提意见，就在苏一平家里说了一阵子。秦川的头脑很清楚。在延安时他旁听过高干会，对陕北历史有些认识，也知道刘志丹的事迹。他热情地一夜就把 30 万字看完了。也许就因为这句话，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感到对不起所有的好人。可我没办法，只怪我没把那些人想得那么坏，更没把某些领导人想得那么坏！

27、两面派吴岱峰

看来今天的提审者很了解情况，问得头头是道，又问得奇奇怪怪。来的两个

人都是男的，一个高个子是主审，他问：“你访问过吴岱峰几次？”吴岱峰是老红军，在中央某机关当局长。我答：“1957年夏天我去采访他，谈了一整天，是拿工人出版社的介绍信去的，说明是写刘志丹传记。1958年第一稿印出后，分段征求意见，核实材料，给他送过一段，他看完后，我又取了回来。1959年我又采访他。1962年，我给他送过第五稿。同年，我和画地图的人又去访问过一次，要他回忆一些作战地点。”“你为什么那么相信他？”“我还没发现不该相信他的理由。”“他谈了些什么内容？”“从晋西游击队谈起，一直谈到陕北第二次反围剿，中间还谈了反帝同盟军、陕甘游击队、红26军和南下终南山，凡是 he 经历过的战斗以及和刘志丹有关的活动都提到了。”“他对陕北的一些历史事件是什么观点？”“很难说，因为有些观点他说了，有些没说。”“他对陕北‘肃反’怎么看？”“对1935年陕北发生的‘肃反’事件，他认为不应该把刘志丹抓起来，郭洪涛的做法不对。虽然他本人没有被捕，但他认为不对，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恶果。”

提审人变了脸，忽地站起来，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你说话不老实！他再三声明，一贯坚持1935年‘肃反’是对的，被捕的人都是应该捕的，一个也不应该平反，他们是真正的反革命。”我楞住了，在采访时虽然感到他有些吞吞吐吐，可没想到是个两面派。难怪去年在地质部斗争我和刘景范时，有个胡科长指着景范说：“1935年陕北‘肃反’是对的，因为你们都是反革命，没有把你们杀掉是领导人一时糊涂！”我说：“那是毛主席放的，难道毛主席放错了？”造反派怕毛泽东，他不说话了，但那气势和表情特别可恶。当时我觉得奇怪，他为何能说出这种话？现在才明白原来康生和阎红彦已把他们的错误观点一传到底，所有的造反派都是一个观点。山东人继续问：“吴岱峰对你写的《刘志丹》支援吗？”“我印象中是支持的”“人家根本不支持，那是应付你的。”“既然是应付我，你们就别审他了，反正罪在我不在他。现在谁反对我，谁就能立新功。”“我们审问他，他反而立了功，因为他揭发了你们。不然，你们的阴谋也不会被揭穿！”

我又有点发呆：难道吴岱峰也参加了揭发，他是阎红彦的同伙？山东人问：“他对1932年陕西省委书记杜衡的做法如何看？”“他认为杜衡的行为不对，不应该撤军事首领的职。”来人皱起眉说：“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你没看过他们

写的文章？文章里不是明确说省委领导得好，两个月建立了 10 个县的根据地。”我像被打了一闷棍，原来吴岱峰真是阎红彦的帮凶，我上当了。

山东人问：“他对刘志丹和谢子长怎么看？”“他认为刘志丹指挥作战好，老谢办外交好。”“不仅如此吧，有谢子长传略。”“他没有说更多。”“1953 年他们写的《谢子长传略》上是怎么说的？”他扔给我 2 页纸：“看看人家如何评价的？”我拿起一看，上面写着：谢子长和毛主席素昧平生，但他的战略策略和毛主席无不互相巧合。”就是说，毛泽东有什么政策，他就有什么政策，谈不上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假如是我这样写书，一定说我是反革命了。可是他们没事，有康生保护着。再往下看：谢子长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因此，他反对读一切书。他说，尽读书不如无书，只要读诸葛亮的‘出师表’和‘隆中对’就够用了。”我很惊讶：他为何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全部否定了？《传略》上还写着，谢子长参加革命前在陕北军阀井岳秀手下当连长，参加过打硬肚，1921 年，谢子长屡建战功，辗转陕北 20 余县，英勇善战，为全军冠。”原来谢子长参加过镇压 1921 年饥民反抗斗争，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我也问：“这是用谁的观点写的？”“这不用你管。阎红彦和吴岱峰的观点都在内。”我暗想：他们的水平如此之低，还要当领导人。阎红彦还是中央委员呢。问：“你认为阎红彦那篇文章不对吗？”“不对！那是为王明路线翻案，伪造历史。”“那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是他们 3 个人的意见。难道你比他们还高明？”我一惊，3 人指的是谁？除阎红彦和吴岱峰，还有谁？我忙答道：“我不高明，但我知道 1932 年在错误路线领导下，陕甘游击队在关中平原作战，决不会比井冈山发展得还快。”

提审人拍桌子：“不要嚣张，允许你说话，不许你批评省委。”“为什把攻打城镇的盲动失败写成战功？那是颠倒是非。阎红彦，吴岱峰全错了，居然还有人袒护！”“你说 1932 年游击队打韩城不对？”“不对，我访问阎红彦和吴岱峰，他们说必须打韩城才能扩大影响。后来我查了档案才知道那是省委书记杜衡的错误决定，杜衡在省委有书面检讨。阎红彦和吴岱峰没见过那份材料。这本书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历史事件的参加者也不一定说得准确。”“你为什么反对攻打三原城？”我反问：“难道你赞成么？红军只有二、三百人，敌人在三原城里住有 2 个团，人力和武器都占优势，还有坚固的城墙，能攻么？这是知己知彼么？”

省委书记杜衡不懂军事，阎红彦可是个军事干部，他也不懂么？盲目执行的结果如何？自己几乎被敌人消灭才匆忙撤退。敌人一直攻到原上，杀害了许多干部和群众。这就是阎红彦的功劳。”提审人嚷道：“住口！谁让你反驳？”“我是回答问题。”“陕甘历史上有个‘缴枪事件’，你怎么写的？”“你说的是三甲原缴枪事件吧？我没敢写。这是陕甘历史上的禁区，不让说那次缴枪事件的真相，阎红彦和他的老乡们都护着。这是他们的命根子，把这命根子一拔，他们的真面目就全暴露出来了。”“赵二娃是什么人？该不该枪毙？”“赵二娃就是赵连壁，雇工出身，一开始领导饥民队伍反对反动派。按革命原则，他不该被枪毙。谢子长和阎红彦耍阴谋把人枪毙了，罪名是行军带了老婆。阎红彦没带过老婆行军？在山西打游击把第2个老婆带到黄河边。谢子长没带过老婆行军？把第2个老婆从陕北带到张家口。按他们的章法也早该枪毙了。”“你是不是说过阎书记该枪毙？”“我说过，按阎红彦枪毙赵二娃的标准，他就应当枪毙。他克扣军饷，强奸妇女，在南梁时战士们就提出枪毙他，被谢子长包庇下来。两人相比，哪个该枪毙？”提审者怒吼：“不许诬蔑领导人！”我骂道：“兵痞！一个马弁号兵而已，流氓气十足！”

提审者嚷道：“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我说：“我是犯人，只要有人问，我就有责任说。”问：“你在吴岱峰处，还看过什么？”“一份旧文件，是郭洪涛向北方代表写的报告，诬告陕甘地区干部，他要陷害人。”“你为什么看那份东西？”“我不知道吴岱峰有那份东西，他翻箱底无意中给了我。我一看竟是郭洪涛的杀人罪证。难道现在吴岱峰后悔了？”沉默。问：“书中有没有写吴岱峰？”“也算有，也算没有，因为是小说。”“戴鸿远是谁？”“谁也不是，他们没有资格往自己身上套。”“为什么吴岱峰说是他，阎红彦又说是自己呢？”“阎红彦不是把周光当作他么？他就为此诬告我为高岗翻案。”“你为什么把书稿送给吴岱峰？”“我高抬了他，把他当成西北老干部，征求他的意见。”提审人说：“不是为了抓你辫子，人家才不看你的书呢！人家都立了功，要打得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提审人走了，我出了一身冷汗，倒不是因为被他们吓唬，而是今天才算认清了吴岱峰的真面目。从前听别人说，1935年陕北“肃反”时，他暗地和王明路线勾结，专门提供假材料，那些杀人者把他当知己。当时我还不相信，从表面

看，他表面挺老实，见人也热情。他有点聋，有人说他装聋，干起坏事来可精明。

28、李景林的说客

提审人中五花八门都有，这次来的是一批宁夏大学生，年纪轻，可很老练，像是来当“说客”的。去年就有一批学生半夜来我家硬逼着刘景范承认李景林是好人，是革命干部。景范说：“那是个坏人！”他们动手就打。原来李景林成了宁夏造反派的后台。不要以为文革把老干部都打倒了。有一些被造反派保着混水摸鱼，想洗刷自己的历史罪恶。

提审人绕着弯子问：“你是否了解李景林的历史？”他们是来调查李景林历史的，不是追查和小说有关的问题，我本来可以不答。可是这个人，大家都说他坏，大多数陕甘干部都被他迫害过。我掌握着许多材料，今天我不说，恐怕没人敢说，因为大家都在挨打。我回答：“听说过一点，坐过牢，向敌人下过跪，求过饶。出狱后失掉组织关系，回家抽上大烟不想干了。后来郭洪涛招兵买马，才把他挖出来。”提审人忙说：“不，据我们了解，他不是这样的，没有向敌人磕头求饶。”他们又问：“他在‘肃反’事件上有责任吗？”“据我调查，他是陕北‘肃反’头目郭洪涛的三大金刚之一：一个是派到神府杀人的‘大板嘴’，另一个是派到关中杀人的鲁贲，还有一个就是派到陕甘杀人的李景林。”“据我们了解不是这样的。安建平大姐说，那时主要应由鲁贲负责，和李景林没有关系。”他们居然叫起了“安大姐”，可见早已接上了头。他们不提安大姐尚可，一提这个人我就火，不禁“哦”了一声。鲁贲和她本是夫妻，要杀谁都由他们两口子定。很多人揭发他们是刽子手。鲁贲已死去40年，就把罪责都推给他。舍去一个死人，保住一个活人，保的正是她的老搭档。那时候，安建平是在陕甘、关中两头跑，而陕甘地区杀人的指挥者就是李景林。

提审人说：“李景林说，搞‘肃反’时自己在前方，不在后方。这点能不能信呢？”我说：“你们知道当时前线在哪里？在延安附近的劳山，正和东北军作战，捕人的和被捕的都在劳山前线。刘志丹就是打了胜仗刚从前线下下来，就被捕了。刘景范也在前线，刚回后方，李景林就通知他去开会。刘景范听说这是陷阱，就借故返回下寺湾。李景林见他回来便慌了手脚：‘你怎么回来了？’当时李景

林已占了刘景范的窑洞，以为他永远回不来了。李景林催促说：‘前方正等你开会，快走吧！程子华政委等着你。’”所谓开会，就是逮捕的代名词，多少人都是去开会而被捕的。提审人说：“据我们看，他在陕甘的工作还是有贡献的。”我说：“陕西有个副省长叫杨玉亭，当时在陕甘苏维埃政府当经济委员长。他在苏区设立集市，发行货币，活跃根据地经济，允许自由交换，白区商人也可来贸易。自从李景林到陕甘边区后，就废除这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取消集市，宁可把红军困死冻死，也不设法解决问题。”“恐怕不能算在李景林帐上，他一个人有多大能耐？”说客又在为他开脱。我说：“一个人？他是没那么大能耐，但他有后台。”我想起眼前的现实：在这场文革中，又是好人死得多，坏人都活着，享受高官厚禄，真令人费解。提审者问：“别人来找过你么？”我说：“来找我的人多得数不清，各有各的目的。”我不愿再说话，他们才怏怏而退。

29、孩子们去插队

每月大女儿米拉来给我送粮票，都被人监视着，不让说话，也不让进我的木笼。8月底，米拉又来了，当着看守的面说：“妈妈，现在动员中学生去插队，我和弟弟都要去插队，很快就会走。”我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把弟弟带上一块儿走。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也是带着弟弟走的。”

早听到风声说，中学生一律到建设兵团或农村插队。建设兵团都在边疆，东北或者内蒙古。我忧心忡忡，怕孩子受不了，特别是战争中出生的米拉，落地才4磅重。她生在陕北绥德义合镇的郭家沟，那里有卫生部的战地临时医院。生完她，机关已经撤走。到50天后，我雇个毛驴抱着米拉就走，在延安休息几天就到了前方，跟随军队紧追在敌人后面。每到一个地方都喝被敌人糟塌过的脏水，特别是黄龙山一带传染病很多。米拉患上肠炎，一路上都没好，身体变得很弱，一周岁还不长牙。好不容易长大了，高中刚毕业又遇上这场灾难。她平时最怕冷，到了冬天不管穿多厚，手脚总是冰凉的。如果去了东北，零下30度，怎么受得了？由于思虑过度，我又连夜失眠。

有一天，小诸葛来值班，我悄声问他：“中学生都要去插队或去兵团，我那孩子身体太弱，我不放心，你可知道些情况吗？”他说：“你先别急，我帮你打

听一下，看看情况如何？”过了一星期，又轮到小诸葛值班，他趁搭挡去打开水的机会告诉我：“不要紧，可以不去兵团。听说兵团要求高，家庭有问题的不让去，兵团都在边境上，怕他们越境逃跑。”我放下一半心，“家庭有问题”似乎还有点好处，可以不用跑得那么远。米拉又来了，说：“我已和学校商量好，把都都调到我们学校，和我一起去内蒙。”我听说去内蒙，心又一紧：“好冷呀，你受得了么？”米拉说：“妈妈，不怕，我们班的都在一个村，都是熟人。”“衣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把家里的东西卖掉一些，备了行装。”这次看守管得更严，不许多说话。隔几天，孩子再来时，看守不让她进门，孩子在门外伸个头说：“妈妈，我走了！”我一狠心说：“走吧！勇敢些，什么也别怕！”其实，孩子一走，我的心也被她带走了。

下月初，小女儿来给我送粮票，说哥哥姐姐已经来信，他们到了农村都很好，一下车就有羊肉吃。我想，孩子们怕我担心，是在报喜不报忧啊。就是这些话，看守也不让说。小女儿说话时，看守站在我们娘俩中间。小女儿走后，我在小小的日历上划记号：9月2日画个圈，是起程日；9月10日画个点，是来信日，只要听见一点儿消息，我就划记号，有各种各样的记号，别人看不懂，只有我自己懂，可孩子到了哪里，我并不知道。从那以后，再也不准小女儿给我送粮票。我日夜想念着孩子，想象他们在远方的生活。过这个时候，听说又一批青年去云南西双版纳。我就想也许南方会好一些，西双版纳很美，那是从电影上看来的。小诸葛偷偷告诉我：“不好，那里是森林地带，闷热，不服水土。虽然是南方，可吃的都是老玉米。”我信他的，因为他当过兵，见识广。又过几天，听说一批青年去延安，报纸上还宣传，江青到车站讲了话，把孩子们送走。这个囚室里的看守人员也有议论：“她为啥不送自己的孩子走？他们那些新贵的孩子都走么？恐怕一个也不走。”有个女看守悄声说：“在火车站，车上车下一片哭声，谁家的父母愿意把儿女送到不知深浅的地方？都还未成年啊！”是呀！高中生最大的不过19岁，初中生最小的才12岁，到陌生的农村会遇到些什么困难？他们这一手可得罪了全体人民，谁家没有孩子。这么一想，就觉得孩子生不逢时，不该生出来。我开始羡慕农民，世世代代在那块土地上耕种，谁也不离开家，不用牵挂儿女。早知如此，我不如在几十年前就去种地，给儿女安下个窝儿，免得孩子满天飞。

又羡慕起家乡的那些农民亲戚。她们都自由地过着耕种生活，哪像我竟成了犯人。我在想什么时候能允许我下乡务农呢？

30、政治混子李景膺

今天来了两个机关的老熟人，一个是机要员小韩，另一个是程副部长的秘书小吴，现在都是部里的造反派。他们俩在 1967 年就曾两次到地质学院找我外调，态度特别好，把地质学院的看守支开后，和我有说有笑地攀谈，还给我递烟。他们是来调查副部长李景膺的。这个李景膺就是陕北“肃反”时把人吊在屋梁上折磨的政治混子。因为我和他同在一个单位，却不知他的底细，便就近向他做过采访。小韩他们来告诉我：“李景膺又编了不少谎言，1955 年，习仲勋到过监察部开了个会，指示刘景范写小说《刘志丹》。”说李景膺是郭洪涛的亲信，看来一点不假。这个人表面看上去，胖墩墩的，说话结巴，像个老实人。当年的历史错误或许是出于年轻幼稚，或屈从权势，但到现在他已是 50 多岁的人，当了多年副部长，还在编谎言陷害人，显然是政治品德问题了。

1955 年，刘景范已经离开监察部，即使习仲勋去监察部也见不到刘景范了。刘景范根本不会写小说，连看也不看。即使我在 1955 年也还没打算写小说。习仲勋一贯反对我写《刘志丹》，因为他怕惹事。他预料一写刘志丹必然涉及他受的迫害，而迫害他的那些人一定会报复，这些人解放后仍有权有势，报复起来非同小可。他很谨慎，虽然没有明说，但我能领悟到，可惜没有听他的劝告。记得 1957 年，我开始采访时，找习仲勋提供素材，被他拒绝说：“别人要写刘志丹，让他们去写，你不要写。”我说：“我也是中国的公民，为什么不能写？”他说：“你是景范夫人嘛！你写了，别人会赖我们这些人有政治企图。”竟然让他说准了。不过，当时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辩解：“毛泽东时代是最讲理的，如果不能写出刘志丹，那就不是毛泽东时代。”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错了，毛泽东时代并不那么宽容。

我还记起 1958 年冬写出第一稿时，李景膺看了一部分后说：“千万不要写‘肃反’。我已找过习仲勋同志，提出千万不要写‘肃反’”。当时我很纳闷，他为什么那么关心“肃反”问题呢？莫非他在当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原来他亲

手杀过人。有一位被判处死刑，布告也已贴出来了，恰巧中央红军赶到才刀下留人。此人现在是外经部的副部长。我曾向李景膺表示自己意见：“‘肃反’问题还得写，因为那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陕北后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毛主席的一大功劳。现在许多书上都写着，党中央到了陕北，挽救了危局。所谓危局就是指纠正了‘肃反’乱捕乱杀的错误。如果不写这件事，就否定了毛主席的功劳。”李景膺连忙说：“应该写，应该写！”他怕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对两条路线斗争，他也反对写：“现在写书不能写两条路线斗争，什么你对我错都不应该说。”这可能是犯过路线错误人的通病。我说：“中央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时说：革命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全国都一样。”“党中央可以讲这样的话，别人不能讲。”“难道我们和中央不应该一致？中央说东，我们就说西？”“当然不能，当然不能。”

这次小韩和小吴的态度大变样了，大概是听说我被正式关押了，要和我划清界线。他们气势汹汹指着我说：“李建彤，你和李景膺是怎么勾结的？”实在莫明其妙：我被关押着，怎么能见到他？他们说：“李景膺交代了。前几天他见了李建彤，订了攻守同盟！”我不忍伤害这两位年轻人，只是解释说：“我已被关起来10个月，日夜有4个人看管着，哪有可能自由外出呢？这里值班人员有记录，你们去查查看。”我看出这是小韩、小吴找借口来审审我，也许是李景膺又编了什么谎言。小韩问：“李景膺在高岗问题上是什么态度？”我说：“他是反对高岗的，一贯反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正确’的。”“他自己为什么说自己是站在高岗一边的？”这真是千奇百怪，我几乎笑出来。稍加思索才明白过来：这个投机分子是无所适从了。从前，高岗是反党野心家，他便表示一贯反对高岗，投靠安子文一边。现在安子文被定为叛徒，他再三掂量，反党野心家比叛徒还强那么一点，便一转身说是站在高岗一边的。现在是宁愿落个高岗的漏网分子，也不能沾安子文的边儿了。”我问：“你们相信么？”他们反问：“你怎么看？”我说：“有一次，我在监察部听钱瑛传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情况。她说：‘安子文同志讲过，西北干部里只有李景膺是好干部。他在组织会议上能反对高岗他们的意见，坚决拥护安子文的意见，拥护在农村把富农发展成党员，共产党员可以当富农。这事也许我记得不全面，你们可去向钱瑛核对。’”小韩说：“我们已调查过，

钱瑛也供认李景膺从前是反对高岗，拥护安子文的，可现在李景膺死也不承认。因为他看见《人民日报》正批判安子文的这个问题：说党员不能去当富农。”

其实，就是因为李景膺曾站在反高岗的一边占了大便宜。他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工作出了问题，所有领导人都受了处分，唯有李景膺没受处分。钱瑛去贵州视察工作，把他包庇下来调回北京，又当副部长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拥护安子文，钱瑛也是安子文的人。他们有权，官官相护过了关。我才发现李景膺是个政治混子，转来转去不能让自己吃亏。小韩又说：文革以来，他就领着一派人反对我们部长想取而代之，成了派性的后台。”这话我信，因为当时造反派最时髦，最容易升官。我见过他们单位的造反派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一开口就说“打倒一切是我们造反派的脾气！”后来周恩来总理保那位部长，说他是革命干部，李景膺又慌了，连忙跑去道歉：我错了，不该反对你。一转脸又起来反对另一个副部长。李景膺觉得自己最聪明，其实，到头来没人愿意理睬他。打倒“四人帮”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袁老说：“我谁都可以去看望，就是不会去看李景膺。这个人坏透了，你还是个副部长嘛，怎么能翻来覆去，还造什么反呢？”

31、请求给景范带用品

地质部军代表：

天气快到严冬，刘景范有病，我要求组织上把我家那条皮裤子送给他。那是20年前在西北战场上穿过的。家里还有他一条被子，也带给他。

另外，他的毛衣、毛裤、棉衣、毛袜、棉鞋、围巾、手套、皮大衣等，如果不在他身边，也请送给他。监狱中如果买不到日用品，请送给他点牙刷、牙膏、毛巾、肥皂、纸烟、火柴等。

李建彤

1968. 10. 23

这是我写的一封信，多么希望这个要求得到实现。自己的人在一个监狱，时刻挂念着他的死活，因为他患十二指肠溃疡、肝病，深怕他熬不过这场灾难。

第二天，专案组的徐州人和广西人来了。在那一刹那，还以为他们要告诉我，军代表答应了呢。出乎意料之外，他们的脸变得像庙里的周仓，把我训斥一顿：“你很反动，为什么说到皮裤子还带上 20 年前在西北战场上穿过的这句话呢？是说我们把上过战场的人也逮捕了，不合理吗？”

我想，你们说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他确实是立过战功的人。刘景范在 1934 年开辟了保安等几个县的根据地；1935 年当过陕甘地区军委主席，领导五次反围剿；当年冬天，左倾造成的三边反水，是他带军队去消灭叛徒，收复了几个县。我说“20 年前西北战场”也不假，那条皮裤真是在西北高原冰天雪地转战时穿的。解放战争中，他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难道你们想否定这些历史？”广西人继续训斥：“不要妄想，我们不会给他送东西。刘景范的事你不要管，不许你用资产阶级反革命感情问寒问暖！”我这几天情绪不好。报纸上正在宣传政策，我顺手写了份“思想汇报”：

报纸上的社论说，“把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坚决清除出去。”在政策上、理论上，中央是这样规定的，究竟怎么执行？我不了解情况，不知现在有无实际例子？比如说，某人按问题的性质，他是个走资派。但是，因为认识了错误、承认了错误，不再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没有成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所以没把他当成敌我矛盾处理。

关于这个政策界限，涉及到怎样才叫‘顽固不化’的问题，现在我还没弄清楚。比如，以我这个人的实际情况讲，就是写了一部小说，怎样才叫“不顽固”呢？写书的过程，产生错误的原因，我都讲过了。此外，是不是别人提出什么问题，我就承认什么呢？比如，他们说：习仲勋交代了，他对写那本书，有他的打算，他想把那块根据地写成正统，他想当那块根据地的第三继承人，我就按他们的要求马上承认说：对对对，他就是那样说的，我就是按照他的意见写的。这样是否就算我彻底交代了呢？不顽固了呢？比如我说：他那样的思想我不知道，他没有对我说过。这是否就算我顽固呢？在我身上，这是个实际问题。中央的政策是宽大的，但是在我的问题上，究竟怎么才叫“不顽固”？怎样才算“交代清楚”了呢，我感到这是个无底洞。

对《刘志丹》这本书，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5年去掉，从1967年开始，也已经打了两年人民战争。你们都说，这本书的要害问题是“为高岗翻案”。我敢断定，就在这场人民战争中，也没有人敢说我和谁商量过“要为高岗翻案。”我访问过那么多老干部，从来没有议论过这些问题，可见那事情的本质，并非某些聪明过度者所想象的那样。如靠想象，我也可以想象出某些人正在做陷害人的文章。

李建彤

1968年10月25日

项目组规定了题目，要把我的思想系统地挖出来，摆在桌面上，供大家批判。当然是这份思想汇报惹出的麻烦。我只能在“检讨”中写出“反检讨”，在“承认”中写出“不承认”，“顺从”中写出反抗。我按规定的题目写道：

一、我的认识过程

确实，我没想到，这本小说是反党的，更没想到有这么大的恶果。1967年1月以前，就是中央领导人（康生）讲话之前，我始终认为这个案子是阎红彦与安子文之流勾结起来搞的鬼，怎么能说是“为高岗翻案”呢？根据是什么？什么叫“翻案”？所以当问题发生之后，旧中组部专案组找我谈话时，我的情绪是这样的：“我没有宣传高岗，是姓阎的宣传高岗。”“我写的不是高岗，谁说我写的是高岗，拿出证据来，罗炎身上有多少高岗的材料？”专案组有人说：“基本上是高岗的材料。”我说：“什么叫基本？60%以上才叫基本，不到60%不叫基本。那是个综合人物，7个材料中只有他的两个半，还不到50%，怎么能叫基本？”我说：“既然高岗历史上是个坏人，我书中写的省委干部罗炎是个好人，是五、六个人的材料揉合起来的，所以他不是高岗。谁说他是高岗，就是谁为高岗翻案。为什么不把那个叛变了省委书记杜康当成高岗？为什么不把那个有毛病的军委书记江力当成高岗？为什么不把那个戴眼镜的政治委员李可夫当成高岗？为什么不把游击队里的大队长周光当成高岗？偏偏要把罗炎当成高岗呢？又说他历史上是个坏蛋，又说一看罗炎就是高岗，罗炎可是个正面人物，这矛盾如何解决？”我也曾拿现实的事例作比方，比如阎红彦是某省的省委书记，现在是红极

一时的人物(指1962年),如果以后他发生了什么问题,再查到云南省的历史时,就再不能说这里曾经有个阎红彦了?如果再提起他,就是为阎红彦翻案?我的思想就一直处于这种状态,虽然在1962年的专案委员会,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但对这件事的性质,我不能认识,我也没有写过思想检讨。1967年1月,中央文革的姚文元写文章点了我那本书的名字,我才感到事情越弄越重了。为了维护毛主席的路线,不理解的也得去理解,要多从错误方面去想,从大局着想,为了大局利益,要上纲,从那时起,我才在思想上的把小说定为反党了。

二、我的反党思想和罪行

我的反党思想和罪行是表现在我的《刘志丹》小说里。每次批斗都说本书的要害问题是为高岗翻案。高岗早已定为“反党分子”,世人皆知,为什么书中发生了高岗问题,这就是我的反党思想所在。开始是有所警惕的,在第一稿的写作过程中,凡涉及到高岗都回避了。到第三稿改成小说时就变了样子,要塑造各种人物就需要个红军政治委员,谁的材料也可以用,反正是写小说嘛!文艺作品就是虚虚实实。红26军政治委员身上,牵连到用不用高岗的材料问题,我和工人出版社的杜映、何家栋一块研究过。认为他的材料可以用,不过要尽量少用。从历史上也找不出不能用的理由,过去没有经验,也没看见什么规定,只有从书上找根据。杜映和何家栋从出版社找来《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那里曾提到毛泽东也受过陈独秀思想的影响。陈独秀早已被否定,可是毛主席自己讲的受过他的影响。我又翻开《联共(布)党史》提到普列汉诺夫时,肯定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也承认他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根据这些先例,我就认为高岗的材料也不是不可用,历史唯物主义嘛!我给自己的反党思想找到了根据,讲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我的反党核心。我的罪行是在第四、第五稿中,罗炎身上用了高岗的两个半材料,我认为土地革命时他是对的,那时打倒反动派,建立工农兵政权,不能说那时就是错误。这就是我用他材料的根据。按新的规定,既然是“反党分子”就应当把他的历史一笔勾销。中央已指出来了,要“把他对革命的局部贡献一笔勾销”。我理解这句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不否认他过去是革命队伍里的人,而且有“局部贡献”;另一个是要把这“局部贡献”一笔勾销。我没有照中央的指示做,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措施,这个行为就是反党的。至于《我们的老高》那

本书，是1962年中宣部某负责人找我谈话后，我告诉了出版社的编辑们。因为那负责人说：“高岗也可以写，毛主席说，过去他还是对的，在延安时我还是听他的多！”何家栋就去借了那本书，我没有看，不打算再增加材料。

在批判中说我的第二个罪行：是书中剽窃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说的话过早地、不恰当地用在别人身上，就变成了反对毛主席的性质。例如“星星之火”，“武装割据”、“钦差大臣”、“愚公移山”等话的用法。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我认为那些都是古人说过的话，用早用晚没关系，谁用都可以，这就是我的反党思想。怎么能把伟大领袖用过的话用在别人身上呢？真是罪大恶极！

批判我的反党罪行之三：我的书中写了一堆“反党分子”，因为过去和刘志丹一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人，特别是陕甘根据地的一些领导人，除早已牺牲者外，能活下来的都被高岗之祸牵了进去，能站住脚的已经不多，可以说，陕甘根据地一扫而光，都成了“反党分子”，或者“反党骨干”了，只要我塑造人物时收集他们的材料，必定是反党行为。

批我的第四条反党罪行：1962年我改动了采访记录，那是我认为安子文和阎红彦结合起来要消灭陕甘干部、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干部，怕他们借我的记录陷害别人。其实，谁谈材料都是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打过什么仗，谁陷害过谁，谁搞的“肃反”，我怕安子文借记录挑拨干部关系，借刀杀人。我还认为：记录是我的，我有权修改。我认为：我是正义的，要保护大多数人。如果一定要追究，我宁可牺牲自己。这种义气是“反党”的。

三、当初写小说的动机

写《刘志丹传记》是工人出版社提出来的。这个动机可能是在1956年那种写革命回忆录的空气中造成的，中宣部、出版社都有写刘志丹的计划。后来改成小说也是工人出版社提出来的，觉得我写出的真人真事人物太多，不好处理，便改成了小说。至于我自己的动机很简单，在延安当学生时就听过刘志丹的故事，唱过刘志丹的颂歌，觉得刘志丹是革命烈士，他胸怀全局，应当学习他，把他写出来。大家学习他的风格，他艰苦朴素，忠于人民，在任何情况下毫无怨言，直到牺牲，正像毛泽东给他的题词中写的“他的牺牲是出于对人民事业的忠心耿

耿”。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所以我写他时倾注着很深厚的感情。那本书的前半部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后半部是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王明路线的存在是中国革命的真实，可查看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中说：在遵义会议以前，即从1931年初到1934年底，中国的党是被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着。毛泽东在讲到王明的路线造成的恶果时说：“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损失”。王明路线的浪潮自然也涉及到陕甘地区，那个路线的黑手也伸到了陕甘地区。不写这些就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我写到这些问题时总是强调只有毛泽东主席才能挽救革命。那些受王明路线迫害的好人日夜盼望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记得在第三稿的最后（1935年）曾特别写道：“毛主席救了陕北”。那时写书的真实的想法就是这样，因为书中用了高岗的两个半材料就造成了恶果，成了相反的东西，使人掀起了一个打《刘志丹》的运动。

四、小说和习仲勋的关系

按事情的过程，就是从前说过的那样，我曾请他谈材料，他不谈。1958年，我把初稿的照金地区部分送给他看，那是核实数据，他没表示支持。1959年冬，出版社用公函给他送去第三稿，1960年他才看完，他认为没有写好，不同意出版，要我修改。我和何家栋又写了修改提纲送给他，并要他谈点材料，他才谈过一次，参加的有出版社的总编吕宁，出版主任周培林和我。3个人都做了记录。那次最高法院副院长马锡五也在场，这实在是个阳谋，不是阴谋。第四、五稿也送给他，他没看完，没表示态度。我们写的那个修改提纲，习仲勋是看过，但在整个过程中，我把它抛在九霄云外，自由发展了。在修改第四、五稿中，也接受了习仲勋一点意见。现在回忆起来，大的问题可能有这么几点：（1）他认为我们对刘志丹还不理解。他对刘志丹的看法是：志丹是好人中的好人。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那个地区，他有代表性。他讲之后，我和吕宁、周培林、何家栋一块研究过，怎样去理解刘志丹。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为刘志丹的题词，认为他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英雄。我又翻资料，陕北的群众那样喜欢他，到1935年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中央未到之前），几乎每打一仗，当地

群众都编有歌。刘志丹每到一地，干部和群众就把他围起来。敌人呢？又是那么恨他，对他作过专门研究，把他当成西北地区的“匪首”，当成陕西，甘肃的祸根。他牺牲了，革命队伍里的人都悲痛万分，开追悼会，人们哭得天昏地暗。敌人则是那样高兴，开了庆祝会，把打死刘志丹的那个部队全体升了级。这样鲜明的对比就说明了一切。我没有见过刘志丹本人，但当我去写时，也要写出他那“民族英雄”的气概，“群众领袖”的风度。（2）习仲勋说，在最困难的时候要对敌斗争，又有党内斗争，这时敌强我弱，斗争很残酷，人那么少，天天都有牺牲，能多团结一个人也是好的，所以那时对高岗是尽量团结。在路线问题上，高岗也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反对过右倾，也反对过左倾，但那是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我在改稿中没把高岗的材料完全用光，没有按他说的“不必提了”。这是我的错，不是他的责任。（3）在永宁山一章中，我本来写的是个红色堡垒，意思是说，这个县的军权、教育权都被革命者掌握了，成了我们活动的据点。他看后说：这是个白色堡垒，不是红色堡垒，因为整个政权还在敌人手里，虽然有革命活动，最多是点“星星之火”。我改稿子时，就把标题改成了“星星之火”。出版社编辑主任杜映说：“考虑考虑这句话能不能用，因为毛主席在南方的根据地是称‘星星之火’”。我说：“毛主席在南方的根据地是全国的红旗、全国的榜样，毛主席把全国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都是当成星星之火的。况且这是成语，古人用过的。永宁山的革命者夺了一个县的军权、教育权，也可算一点星星之火。不会有人说，这句成语别人能用，我不能用。习仲勋和这本书的关系基本上如此。专案组说：“习仲勋思想里有什么打算，要在这本书里捞个什么资本，他确实没有对我说过。什么“正统”，什么“继承人”。我脑子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我不能瞎说。

李建彤

1968年10月30日

32、难友们

1968年11月27日，我又被搬进地下室。刚进来空无一人，以为又是把我单独囚禁，可是房里放着4块木板床。我先进来就住了靠窗的床。地下室的窗户

大半截在地下，一小块露在地面上，透进微弱的光，白天晚上都需要开灯。我刚铺好床，看守又押进一个女人，行李放在对面床上。此人很面熟，在木笼外也曾看管过我，一张热情而机灵的脸。虽然她是看守，我是犯人，不能多说话，但我喜欢她。现在我问她：“你派到这里来看管我？”她摇摇头苦笑着说：“不，我也被关押了。”她很年轻，只有三十四、五岁，为什么会被关押？我问：“你有什么问题？”她说：“我出身资本家家庭。”我有点纳闷：家里是资本家也是被关押的理由？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是工人家庭出身呀。我打听她身世。她坦然地说：“我叫张坤娣，是地质学院 56 届毕业生，大学加入共产党。母亲是唱京戏的老演员，父亲早年在东北开银行。我母亲生了我们姐弟 3 个，父亲解放前就去世了，只剩下一幢楼房，母亲靠出租房子养活子女。”原来只是靠出租房子谋生的“资本家”。

又进来一个女人，齐耳短发，精瘦精瘦的，额头上绷着根黑带子，像个小姑娘。我打量一阵说：“你这么轻年纪，到这里干什么？”此人也够直率的，毫不犹豫地说：“我叫钱凝，是右派。我不年轻了，已 39 岁，学物理的，解放后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我一算打右派那年她才 26 岁：“当右派已这么多年了，还要被关押？”“斗争我好久了，我有海外关系，父母在美国。”不知为何我心疼她。虽说已有 39 岁了，可看上去好像 20 来岁的中学生，瘦得只有 70 多斤，穿一套蓝布棉袄裤，一说话就低着头。她们俩互相认识，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聊了起来。钱凝问张坤娣：“你孩子留给谁了？”坤娣哭丧着脸说：“小女儿还不满周岁，仍在喂奶就把我揪来了。”钱凝擦着泪说：“我的俩个孩子都交给了阿姨，大的 3 岁，小的才 1 岁。唉！有什么办法？我爱人也被抓走了。”

这个囚室热闹起来，不像木笼子那么冷清。快到中午时分又送来一份行李，跟着进来一个半老太婆，原来是我在延安抗大时的同学。我叫了一声：“宋克，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她把脸一扭不理我，看她那胆怯的样子是避我这个全国著名“反党分子”。可她自己有什么问题呢？1938 年，我在抗大学习时就听说她在开封女师念书时集体参加过反动组织，参加革命后就交代了。大概就是那件事又被翻出来了。30 多年前交代过的旧事还揪住不放。后来才知道是专政办公室规定不让宋克和我说话，因为知道我俩是抗大同学。这里和木笼子不一样，不是

派人押着我去食堂打饭，而是派人送到地下室，拿来什么吃什么不能选择。开饭时开锁，打完饭门又上了锁，吃罢饭再叫人开锁出去洗碗。晚饭后想休息一下，可房顶上挂的日光灯照得人刺眼。想关掉，看守在外面嚷着不许关灯。他们要监视犯人的一举一动，房门玻璃不许封纸，不许挂布，不能挡住看守的眼睛。钱凝悄声说：“我可以做个灯罩。”他们指定宋克当组长，我们请宋克去找来两张旧报纸，钱凝动手做了一个活动灯罩。晚上拉起灯罩，虽不熄灯但光线暗多了，屋里的人可以睡觉，看守也可以从外面监视。白天把灯罩拉下来，满房子亮光可以看书。我们夸钱凝到底是个学物理的。按规定犯人晚上9点以后才能睡觉，9点以前不许躺在床上。吃完饭4个人一起敲门要求上厕所。看守开了锁，我们被押着一起上一楼女厕所。门关上后把看守留在门外，正是谈话的好机会。我问宋克：“他们要求你汇报吗？咱4个人在这里说话，你可千万别汇报，他们一上纲就乱套了；不讲话又能把人憋死。”宋克点点头说：“我明白，和你想的一样。”回到囚室只能4人对坐着。单身牢房最苦，会使人变成哑巴。现在4个人可以动舌头说话了，但必须抱成团互相帮助、互相掩护、互相体贴，才能熬过这苦难的日子。

我们在屋里说话，门外总有人偷听，有个人头在玻璃窗外晃来晃去。我们就想办法对付。我床前有个两屉桌是写材料用的，我把书报叠起来遮住脸，使门外的人看不见我在看书，还是在说话。张坤娣床前的两屉桌是供他们3人合用的。坤娣坐在床上，宋克坐在朝门的一头，背刚好挡住门外人的视线，她俩可以悄声说话。钱凝的床铺在门背后的墙角里，从玻璃窗往里看没法看见她。看守们要进来，锁一响，大家就正襟危坐。张坤娣经常边流眼泪边给女儿织毛线。钱凝常常唉声叹气。我小声问：“钱凝，你在想什么？”“我想孩子，我国内没有亲人，孩子那么小就扔给了阿姨，我怎么能放心？”“阿姨好吗？”“还行，是南方人，我怕造反派把阿姨赶跑，孩子就更惨了。”我们小声劝她：“这种境遇不止你一家，阿姨和孩子有了感情会想出对付办法的，困难总会过去的。”我又问钱凝：“你为啥没去美国？”“我父亲是工程师，当初是随厂迁到台湾，后来又转到美国去的，我舅舅在美国。我那时正在上高中，想等毕业后考清华大学，我喜欢清华，不愿随父母走。”“你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我给领导提意见说他们官僚主义，不

了解下情。他们就说我攻击党。”我同情她太幼稚。“项目组还命令我每星期写一次思想汇报，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你们写过吗？”她的头低得不能再低了。宋克和坤娣也说不知道怎么写。我说：“不要怕，很容易，我常写。我的办法是借他的风，行我的船，给他们留下历史记录。我们这段历史并不是耻辱，他们这段历史也并不光荣。”钱凝一夜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

早晨要集体向毛主席请罪，对着毛泽东像唱颂歌。我们4个人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唱《东方红》。4个人4个调，乱七八糟地互相串音，唱着唱着忍不住笑起来。唱完颂歌就开始请罪。宋克是研究所负责人，为没有开好“钻头会议”而请罪；张坤娣检讨不该吃资产阶级家庭的饭；钱凝检讨不该给领导提意见；我则是背诵那条针对我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4个人各说各话，越说越乱，逗得大家憋不住了笑出声来。突然坤娣一扭脸叫了声：“门外有狗！”原来门楣玻璃窗上有张脸，瞪着圆圆的大眼睛。

33、关押的「反动分子」

地下室有10个囚室，我们女囚室是第3号。外边哨子一吹：集合，放风！10个囚室里的人就在走廊里排队报数，带队的也是个“犯人”，名叫董西。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报到最后是27个人，排在最后的那个不能报27，要说满伍。那个说“满伍”的人是一位70多岁的高级工程师，名叫盛继夫，浙江人，常把“满伍”说成“麦喔”，惹得我们只想笑，从此“麦喔”就成了老工程师的外号，辛酸的外号。董西带队上一楼，出了院子，在东专业馆门外排队，对着毛泽东像三鞠躬请罪，再由专政组长朱山领头背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家低头向毛泽东请罪，听头目训话。突然有人喊：“宋克，低头！”宋克却突然把头一仰朝台阶上望一望，想认清喊话的是谁。老宋在这里工作多年，对每个人很熟悉。那个专政组长朱山就是她手下的一个技术员，如今成了造反小头目，有点得意忘形。

朱山又气势汹汹地吼：“黄汲清，你今早请罪了没有？唱歌了没有？”黄汲清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的地质学家，已近70岁了。他怯生生地说：“我唱了，和那个朝鲜族青年一道唱，一块请罪的。”朱山吼道：“我在窗外听见

你没唱！”真是有口难辩。朱山让黄汲清站出来，到台阶上独唱，这不是存心耍弄人么，我替黄老捏一把汗。他这么大年纪，混在大家一起唱还可滥竽充数，让他独唱实在是让这个老知识分子难堪。黄汲清不敢违抗，只得迈上台阶弯着腰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到“呼儿嘿哟”再也唱不下去了，只能在那里不断重复。最后朱山厉声喝令他下去！黄老弯着腰羞辱难当，忍声吞气地归队。请完罪就开始跑步，边跑边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我心脏不好，请假不参加跑步，可以在汽车库外的小广场上散步一个小时。这个不大的广场上有副院长、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党委书记，男女老少一大群，都是“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出来的“反动分子。”我在一次思想汇报中写道：“从11月30日起，允许我们每日‘放风’一小时，可以见见太阳，散散步，呼些新鲜空气。真感谢毛主席，还让我们这些人放风！”其实，只有囚徒才说得上“放风”，现在大批知识分子就是在过着囚徒生活，我也在其中。我记载“放风”二字，就是要留下他们侵犯人权的历史记录。

这几天特别紧张，听说院子里刷了新标语，又在动员坦白交代。我们几个女犯人在囚室里悄悄说话，忽听门外敲打：“为什么用报纸遮住玻璃？”宋克高声叫道：“我们要洗澡”。老宋真机灵，把看守顶回去了。我们仍旧说我们的。坤娣特别愁：“又动员交代了，还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呢？”钱凝说：“想怎么斗就叫他们斗去吧！我只有70斤全交给他们斗去，我豁出去了。”老宋强忍住不说话，有一派经常把她提出去游斗，听说曾用卡车拉到宣武门外。从1966年到1969年，北京这股疯狂劲头还未过去。我当然估计到他们会怎样整治我，可我心中有数，再榨也榨不出油来了。我想使大家安下心来便说：“凡事都有个规律，有起就有落，有张就有弛，有开始就有结束，这是辩证法。这场运动发展到沸点自然会落下来。不要紧，大可放心”大伙都笑了：“你真乐观啊！”

34、马文瑞

两个专案人员，一个浙江人，一个青海人，拿了个木牌往专政办公室一放就把我领走了，是要提审。一个木牌换走一个“犯人”。自从第二次把我锁在地下室，我就充满愤怒：凭什么锁我？我跟随项目人员走上楼梯，故意用脚把楼梯踏得很响。

在二楼一个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大个子军人，胶东口音。我刚坐下，他便从军大衣口袋掏出我的采访本晃着说：“看我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向我暗示是中央专案组来的。因为只有中央专案组的人才能拿到我的采访记录。那是 1962 年中央专案委员会从我家里没收的，现在交到了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我盯着他看了两眼说：“我明白，你手上的东西说明是从上面来的，你有权力！”他用居高临下的口气问：“你到这里后有什么想法？”

“自从我被捕那天起就没想过再出去！”“谁捕了你？这不是监狱，这是群众专政！”

“不是监狱，为什么落锁？为什么提审？为什么放风？哪一点不是监狱的做法？”他无言对答。其实，我还忍着没说出口：恐怕是犯人太多，大监狱装不下，才会各单位设监狱吧？”我们单位近 800 人，被关押的就有近百人，超过百分之十。除了各地下室，对面大楼里也关着几十个“日托”，白天被关在那里，晚上可以回家睡觉。

胶东大汉板着脸向我摊牌：“把你和马文类（瑞）的来往交代清楚！”原来他是管马文瑞专案的，可惜连“瑞”字也说不清。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是“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自从贾拓夫死后就补上马文瑞，变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马文瑞也成了头目之一，没有他就拼凑不成“集团”。马文瑞是和我们同一天被监禁的，1968 年 1 月 8 日。胶东人问：“马文瑞跟你说过些什么？”当年采访马文瑞，他谈到：刘志丹牺牲后的档案里还写着“严重右倾”，虽然不是反革命了，可是还按“右倾机会主义”对待。我听了几乎哭出泪来。刘志丹是背着政治罪名上前线，牺牲在战场上的。我非写出来不可！但是我不能对专案人员说这些，只是回答：“很简单，在延安时马文瑞是西北局组织部长，我见过面，但不算认识。我写《刘志丹》应当向他采访。他说了亲身经历的刘志丹事迹，都在记录中。”胶东人的眼珠滚了两下说：“马文瑞对陕北领袖是怎么排列的？”

“他按中央规定的排列说，即刘志丹、谢子长、高岗。”

“他对西北党校的人说的是刘、高、谢。对你怎么会有另一种说法？”

“他对别人怎么说的，我不清楚，反正对我就是这么说的：刘、谢、高！”胶东人和我争起来：“刘、高、谢！”我坚持：“刘、谢、高！”就这么争了几个回合，我脱口而出：“你手里拿着我的采访记录，打开让大家看看嘛！”他不得不摊开记录，他用手死死捏住的那一页上明明写着：刘、谢、高。我说：“怎么样，谁说得对？”虽然采访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无奈地说：“你还记得呀！”我冷笑一声：“这是关系别人政治生命的大事，我能忘记吗？如果我忘记了，马文瑞这一辈子也洗不清了。”我仍然盯着这个胶东人看，周围的人好像松了口气。这个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的人走了。他们从来都是来去诡秘。

35、背后暗箭

搜查铁器是专政办公室的决定。只听门外咚咚的脚步响，不知有多少人来检查铁器了。我们隔壁房里吵得嗡嗡响，不久就有人大声喊话：“朱效成！站起来！”是朱山恶狠狠的声音：“你留这东西干什么？必须交待清楚！进来时对你说清楚没有？连根针也不许带，你为什么留这把剪子？”大个头的院长朱效成是位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老头子，从来不隐瞒任何事情，没听说他捣过鬼，连说话都不会小声。我们在墙边只听他瓮声瓮气地说：“我留它干什么？难道我还会自杀？这东西是我剪脚垫后压在褥子下忘记了！”“胡说！这么大把剪子能忘么？你到底想干什么？”老朱气得“唉”了一声：“你们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真担心老朱会挨打，在这里是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我轻声问宋克：“咋办？会打起来吗？”老宋说：“不要紧。如果真有人动手打，也会有人拉，那边住着工程师程浴琪、年轻工人王小成，他们一定会保护老院长的。”我和老朱见面不多，却很熟悉。老朱已近70岁，又是老资格。他是被一派群众管制着的，可老头不在乎，照样吃饭、睡觉，吃饱睡足就找工人下棋。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生气时候少，笑的时候多。直到现在还听见他和人辩论：“就不许人有个忘记？”只听朱山嚷道：“先没收，朱效成你等着受处罚！”已被关进囚室了，还有什么可罚？看守把老朱的剪刀拿走，又到别的囚室去了。他们进门就嚷道：“搜查铁器！”我站了起来，不说话，任凭他们搜桌子、床。他们理直气壮地把我们的东西都翻了个遍，连堆起来的旧报纸也要抖落几下。临出门，朱山瞪着眼说：“这是专政！决不能有一点铁器，这是上边规定的。”他们走后，老宋像个小

孩儿吐了吐舌头：“我的针。”原来老宋把针藏进眼镜盒内没有被搜走。

提审者规定，凡是要我交代的人物都得写上“某某的罪行”。我拒绝用“罪行”二字，他们何罪之有？去年有一拨提审者临走时给我留下字条说：1962年告诉你“为高岗翻案”的不仅是阎红彦，还有贺晋年、吴岱峰，是在贺家预先策划好的。他们几人出谋划策，阎红彦出面告状。阎红彦找了很多门路：共青团中央、总工会、中宣部、中央办公厅都没告准。最后找到了康生一拍即合，两人结合了起来。我明白，阎红彦、贺晋年、吴岱峰是个小小的乡亲集团，还沾点亲戚。他们做出这件伤天害理的事，诬陷了这么多人。可我对他们仍一视同仁，他们可以不仁，我却不能不义。有提审者调查贺晋年的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

一、我向贺晋年采访过，谈的内容是1935年的陕北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的主要战斗。他也谈到刘志丹的战略战术思想，佩服刘志丹的指挥才能。

二、我写的部分初稿，他核实过。他提出的意见是：不要把谢子长写得和刘志丹意见不一致，不要使人看出谢子长有错误。

三、“肃反”事件：他说他不赞成，他本人虽未被捕，因为被捕的人太多，他也愁得吃不下饭。

四、是否同意1942年西北高干会观点？根据他说话的语气还是赞成的。（也许他内心并不赞成，因为是对我说话不得不做个姿态）。

五、他没有谈两条路线斗争。他说：“我是军人，只管打仗，不管他路线不路线。”

我认为，这其中潜台词很多，不必提了。这份材料很难写，因为最初我对西北干部印象是好的，把他们当成有着共同经历，共患难的战友，从未想到有人会在背后搞鬼。阎红彦的暗枪冷箭使我体会到刘志丹当年的苦衷。事后得悉，文革初期，贺晋年也被群众批斗关押过，是把他当成拥护写《刘志丹》，为小说提供过炮弹而斗的。于是他再三声明：“我是反对小说《刘志丹》的。来我家的不是习仲勋，而是阎红彦。阎红彦在我家商量好了对付的办法，向中央告发了《刘志丹》小说。”这一表白很快就洗清了怀疑，他获得了“解放”。对于这种情况，我

丝毫不知。1975 年我们搬进万寿路招待所，听说他生病，还特地去医院看他。见他神色不定，躲躲闪闪才产生怀疑。直到后来听到他家人的口述，我才恍然大悟。

36、中央项目组又来了

自从文革以来，我遇见的是一阵子官斗，一阵子民斗，都不讲理。我总在想也许上面的人会清醒些，按道理水平应当高一些，不会那样胡说八道。如果上面派来个有点水平的人，我就会和他们摊开讲理。这一天终于来了。看守把我押上二楼的“李建彤专案组”办公室，屋子里坐着七、八个人，主位上坐的是个军人，其余分别是地质部“刘景范专案组”的邓中和、李某、石某和地质科学院“李建彤专案组”的于某、杨某、林某。那个军人是主审，先开口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要全面审查你的问题。几年了，你没有写出一份象样的交代。这次要彻底弄清楚，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这是个中年人，鬓角已有几丝斑白。我诚恳地说：“早就盼望毛主席派人来审查，我感谢毛主席。”其实，最早的那个中央专案委员会难道不是毛泽东派的？不也是那么荒诞不经吗？那些人的资历更老，地位更高，有些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又有哪一个是实事求是的呢？

我一转眼看见那个戴眼镜的邓中和就来气，质问他：“1968 年 1 月 8 日，你们在批斗会上讲的是真话吗？能按那 10 条罪状定案么？完全是捏造，虚构，无稽之谈！”邓中和很尴尬，摸摸眼镜，支吾不语。我说：“你是重点发言人，那些假材料是你搞的，我要反驳！”军人连忙替邓中和解围：“他是群众。”“什么群众？冒充群众，他是党员处长干部，还如此恶劣！”邓中和原是部长秘书，文革开始后是一个最活跃的造反派。

军人说：“1 月 8 日的事暂时放下，今天是审查你的问题。”他随手拿出语录卡片，一张张地念：“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敌人是不会自动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我越听越不对头，把我当成敌人了，便冲口嚷道：“住口！”他们一愣。我对那个军人说：“既然你说是毛主席派来的，就应当讲政策，不许对我这样念语录。我不是地主阶级，

我是无产阶级！”那人倒也机灵说：“你既然是无产阶级就交代吧，把反党罪行全部交代出来。你为什么要反党？”我劈头就问道：“你先说说什么叫‘反党’？”他张口结舌，过了一阵说：“你写的小说是为高岗翻案，就是反党的。”我仰起头大声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事总要给世界做个榜样。如果我的小说已经定案就请在《人民日报》上向全世界公布吧！就说我写了 30 年代的事情是为 50 年代的事翻案。刘志丹是 1936 年牺牲的，高岗问题是 1953 年发生的，相距 17 年之久，怎能连得起来？《毛泽东选集》发行到世界各国去，书上也有刘志丹和高岗的名字。”军人说：“不用提世界，只说中国，你的问题必须解决。要提高认识，不认识到反党的高度就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毛主席说了话的。”我反问：“我写了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这是反党吗？”军人说：“你书中问题很多，剽窃毛泽东思想，例如武装斗争、农民运动等等。你要挖出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为什么要那样写？”“你说该怎么写？马克思主义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诬告者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反党的。我写的小说哪里违背历史唯物主义了？请指出来！做什么事都要讲理，不讲理就要碰壁！”双方僵持不下，只得宣布停审。

37、贾拓夫之死和马明方专案

“习、贾、刘反党集团”第二号人物贾拓夫被整死在北京西郊，至今真相不明。在这本小说中我只用了他提供的一个素材：1933 年省委破坏时，他和高岗从敌人的包围中跑了出来。高岗去照金，是带着省委指示去的，要恢复红 26 军。我被提审时说：“书中只有高岗的一条素材，就是带着省委指示去恢复红 26 军。”审问者说：“高岗的一个素材都不能用！”就为了这条真实史料，断送了一条老布尔什维克的性命。

贾拓夫是陕西神木人，早年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就参加了革命。土地革命时期，他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1934 年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然后到江西瑞金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1935 年随中央红军长征。红军到了甘肃境内看到《晋阳日报》上有一条消息：“陕北刘志丹赤匪占领 6 座县城，拥有正规军 5 万多人。”长征队伍中只有贾拓夫是陕北人。毛泽东、叶剑英向他了解陕北情况。他汇报了陕甘游击队和红 26 军的情况。中央决定往陕北走，寻找这唯一保存下来的根据地。贾拓夫带着一连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他在下寺湾见到红 15 军团的程子华

和郭洪涛。得知他们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陕北红军领导人都关了起来。他及时向党中央汇报，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并派贾拓夫、王首道、刘向三一起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并向中央报告为刘志丹等人平反。毛泽东到瓦窑堡后立即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人，周恩来亲自为刘志丹松绑。

贾拓夫在解放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一直勤勤恳恳工作，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才获平反。但不久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因康生制造的小说《刘志丹》案，被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要员。

我和王勉思采访过贾拓夫两次，他认真回忆了当时的历史。我的小说稿没让他看过，当然他更没给我提任何意见。硬说他是小说的后台太冤枉。他被康生套上“反党份子”枷锁后，下放到北京钢铁公司当副经理。文革一开始，康生说：“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从此对他的斗争变本加厉。1967年的某一天，他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折磨了一夜。第二天中午被押送回来，一夜竟然满头白发。他疲惫不堪，匆匆喝了碗面汤，又被来人押走。第二天，有人在西郊的树林里发现了贾拓夫。他已经没有了呼吸。他是怎么死的？谁害死的？到现在仍是一个谜。

我被带进提审室，来人一说马明方的名字，我便知他们是东北来的。马明方是东北局副书记。他在大革命时当过陕北特委书记，后来是西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副书记。提起马明方，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几年，他们为了陷害马明方已来提审我多次。据说在沈阳大街上到处贴满他的大字报，诬蔑他是“新疆叛徒集团”头目，又说他参与写“反党小说”，为高岗翻案。我采访过马明方，他回忆起和刘志丹的战斗友谊。在陕北选举苏维埃主席时，刘志丹曾提名马明方为候选人。可见刘志丹对他是非常信任的。我的小说初稿曾请他看过。我问：“你看这样写人物行吗？”他笑着说：“小说是镜子，让大家去照镜子吧！照出来像谁就是谁。好人坏人大家都知道，本人更清楚。”真是一言中的，确实，每个人都最了解自己。嘴上不说，心中有数，不然阎红彦为什么会从小说中的“周光”，而不是“罗炎”身上，照到自己的影子呢？

提审人不断逼问：马明方是否主张写高岗？没有，明方再大胆也不会谈高岗。那个时候“高岗”二字是西北干部心里的禁区，每个人都噤若寒蝉，因为谁不怕家破人亡？提审人还再三问：“你剽窃毛泽东思想，马明方难道没有看出来。比如农民运动，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是1927年春发表的，小说中写刘志丹也在1927年谈农民问题，岂不是有意剽窃？你不明白，马明方也不明白？你们岂不是同谋？”其实，关于农民运动问题最早写文章的是彭湃和邓仲夏，毛泽东最初讲农民问题也早于1927年。何况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列宁就说过，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他们正等待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眼下大街上还贴着批判彭湃的大字报，我不能讲彭湃，就把列宁抬出来。果然东北来的专案人员就转话题了。我想，还是列宁的份量大，能压住中国的“最、最、最”。否则，这个问题不知还要纠缠多少年。

我想起马明方的音容笑貌。他那么善良正直。我每次去采访，他都把我当成自己家里人。可是我现在是“敌人”，我说任何他的好话，反而会加害于明方。为保护他，我只能沉默。1975年，我听说他被关押在北京监狱，身患重病，送医院时还有背枪的人押着。他神志不清地躺在病床上，在昏迷中还高呼：“冤枉，我没有问题。”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曾有几个日日夜夜不能入眠。

38、张鹏图和王世泰

这次提审是来调查张鹏图的情况。我回想起刚进城时的单位——政务院监察委员会（1955年改为监察部）。机关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88号（现四川饭庄地址），那里原是满清的一个王府，机关进驻后新盖了小楼、礼堂、俱乐部，满院的花树盆景。张鹏图是部办公厅主任，整个机关大院重修在他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刘志丹》小说案尚未发生，就有人想整他，只因为他是陕北红军。1959年监察部撤消，人员要分散，张鹏图调走时，大家都说他工作兢兢业业，也能团结人。可他一走，监察部长钱瑛就勾结管人事的副部长李景膺在鉴定中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采访过张鹏图这个陕北老红军，后来他就受到株连。1959年监察部撤消后，他被分到甘肃省当副省长。但1962年我的小说被诬陷，1964年他便下了台，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就失去联系。我采访他时，他充满感情地说，当年很想见刘志丹。1936年，红军到了他的家乡，群众都去看刘志丹，

他也跟去了。走进一个院子，但见人山人海，他挤不进去，只能远远地看了老刘一眼。他的谈话内容都在采访记录上。纪录被没收了，他就为这“远远地看了一眼”被株连成了“反党集团”成员。

1969年元旦，专政组长宣布休息两天。我可没能休息成，因为甘肃兰州造反派“红三司”的“王世泰专案组”来提审我。也许因为小说中写了个名叫“石太”的人物，他们想当然以为一定是王世泰了。连康生也认定“石太”一定是王世泰了。全国闹“三结合”那阵，甘肃有一派群众提出结合王世泰（文革前他是副省长）。康生听后火冒三丈：“要结合王世泰，还不如把高岗的尸体抬出来呢！”康生讲话对王世泰压力之大不言而喻。其实，那是几个人的素材揉合而成的，里面还有马福记等红军干部的素材，原型人物至少有3个。从1966年到1969年元旦，不知有多少个“王世泰专案组”，也不知来过多少次，多少人。记得1967年春有个兰州大学的王世泰专案组，到我家看见《康熙字典》就抢走了。来人总是声色俱厉地对我吼：“老实交代王世泰的反党历史！”我说：“我怎么能写得出王世泰的历史？”“你写小说还不了解被描写人物的历史？”我若把写的每个人物都写一部历史，岂不成了人物列传？我只是写事件，不可能仔细追问每个人的历史。他们当然不满意。

这次他们问的是：王世泰怎么为高岗翻案？我回答：“高岗是禁区，采访时谁也不敢谈。谈者格杀勿论。谁能不要命？”谁提起这个名字都小心谨慎，似乎不骂他几句不足以表现立场坚定。王世泰那样的老实人既不提，也不骂，只当历史上没有过这么个人物。他们追问：“听说你请王世泰看过稿子。他说了些什么？”我说：“他不赞成小套人。所谓小套人，就是把许多人的素材揉合在一起，塑造出来的人物。”头一天就纠缠了这些。第二天他们拿出事先写好的草稿要我照抄签字，内容是王世泰为高岗翻案。他们欺人太甚，哪有这样强加于人的，就和他们争论起来，最后说明天答复。晚上加班写反驳，一条一条驳回去。第二三天在地下审讯室里，3个人抢着轮番审问。有人伸手夺我手中的反驳稿。看完就气得狂吼起来：“这是什么？竟敢反驳我们，太狂妄！交给你们组织上处理。”我顺手递给陪审的浙江人，是我的项目人员。他竟然不动声色地把那几张纸折了起来，抹来抹去用来擦桌子。

一连三天了，王世泰专案组硬是不走。最后一天，我和他们 3 个人在审讯室对骂起来。他们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反革命。我心一横拉高嗓音说：“今天你们就是把我吞掉，也休想让我照你们的要求说。没有的事就是没有！”斗了半天没招了，只得放我回囚室。我累瘫了，坐在床边直喘气。难友们真是亲人。老宋忙送来一杯泡好的热茶。钱凝帮我打饭，坤娣为我端菜。可我哪能吃得下？又气又累。老宋悄悄问：“怎么样？还是昨天那一拨？王世泰我认识。他若知道你在这里为他受的罪，不知会怎么想呢。”我叹了口气：“我们这些人将走完自己的一生，千万不能说谎，一句谎话也不能说。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历史，是别人的历史，也是自己的历史。不能往别人脸上抹黑，也不能给自己脸上抹黑。”老宋说：“对，我赞成！是得这样子。”

第二天，我头疼却还得去参加大会，叫做受教育。会上宣布“孟宪民畏罪自杀了。”孟宪民是高级工程师，关在我们楼上的囚室，过年不让他回家，就跳楼自杀了。自杀还得说是“畏罪”，没有罪也是“畏罪”。自杀还有保密的。有人悄悄说打字员柳巴也自杀了。因为她是外国人就被隔离了，不让她与丈夫见面。

会场里还在呼口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最后有人在喊“打倒刘少奇”时喊错了，“打倒毛……”还没出口立刻被揪了出来，定为现行反革命，斗来斗去，从此他就到院子里推煤去了。这个人就是看管过我的工程师王奋。因为家庭出身好，当了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一转眼就从天上落到地下成了劳改犯。

39、杨明轩老人

穿军衣的中央专案组人员又来了。今天他们抽出两张语录卡片让我自己念。一条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另一条是：“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我感到毛骨悚然，毛泽东竟然这样看待彭德怀的，而且把他和高岗联了起来。这几乎就成了死案。主审还是那个穿军衣的，我对他说：“你看来很会说话，是做政工的吧？哪个部队的政委？将来我再写小说会把你写成‘通天政委’。”周围的人面面相觑，“通天政委”这个绰号就算定了下来，因为没有一个人反对。

在这个囚室里很无聊，不想让时光就这样流失，真得很想写点东西。我写

了个小说提纲，给看守们一个个取了绰号，还编了号。除了通天政委，还有个叫“小老虎”的，兰州大学毕业生，青海省人，30来岁，是专案组里最年轻的。我正在写小说提纲，小老虎突然跑进来：“有人找你！”我知道是要提审，桌上摆开的东西来不及收拾被他瞅见了问：“这是干什么的？我理直气壮地说：“写小说用的提纲。”他有点无奈：“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还有心写小说？”他拿起提纲，押上我走到提审室。看守们一看我的“小说提纲”气就来了。通天政委问：“你为什么想写小说？”我说：“这是将来的事，我决不会在这个地方住一辈子。”要把这案子写成‘小说’或‘纪实’是早在1962年事情一发生就定了的。

通天政委提到了杨明轩老人。一提起这个名字，我真是又悔又恨。当初为什么把书给杨老看呢？每年旧历除夕，他都会到我家来，大年初一我们去给他拜年。他德高望重，是刘志丹的老师辈，又因为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景范同为副主席，我们来往就较多。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我问他：王懋亭是否在绥德师范教过书。他说：“那是1924年我在绥德师范当校长，王懋亭当国文教员。听说志丹入党是王懋亭到榆林中学去发展的。”杨老对写刘志丹的事很热心，提出想看看书稿。我当然愿意请他指教，就取出一本送上。过了很久，老人拄着手杖来了，说：“书稿已经看完。志丹的道路太曲折，左倾路线总是对他刁难，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气，还在坚持。你把我写哭了。”老人直抹眼泪，他对志丹的真实感情使我很受感动。那天杨老临走给我留下话：“我已交《光明日报》，让他们选一些发表。”那时杨老是民主同盟主席兼《光明日报》社长。后来《光明日报》便选“渭华起义”连载了几天。

前几天从报纸上看见杨老去世的消息，心里直嘀咕，是不是我的书牵连了他？我想，他和西北早年的土地革命没关系，身份又是民主人士，况且《光明日报》选登的文章根本沾不上高岗的边。也许是有人要给他脸色看，给他气受。为杨老的去世，我深深不安，因为不能去参加追悼会，不能去慰问他的家属。

通天政委今天审杨老的问题，不知安的什么心？我说：“书是我请求他看的，让他纠正错误。”通天政委突然问：“还有谁对你的书感兴趣？”我故意说：“感兴趣的人多啦！因为那是几十年来人们渴望看的书，我写出来了，写得好不好

也是新鲜的！”“你说具体些，还有谁感兴趣？”“我在路上遇到个老同学，一见我就说，你真有决心。看了你的书很痛快。”“这个人是谁？”“是个女的，抗大同学，名字记不得了，也没问她在哪里工作。不过她很有头脑。1962年我的书已成了反党小说。她看过供批判用的书稿，1965年在大马路上竟敢大声称赞。”通天政委更急了：“你必须把这个人回忆起来！”“我想不起来，近30年不见了，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了，实在爱莫能助。”其实，我当然记得起。在那个年头，太生疏的也不敢对我说心里话。她是内蒙古的女干部乌兰，是个大胆洒脱的女性，穿着靴子和裙子，在西城丰盛胡同东口和我相遇，匆匆吐露了几句知心话，就各奔东西了。

40、工人出版社的朋友们

工人出版社总编辑吕宁项目组来提审。没见人，出了题目让我写答卷，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几次书稿是怎样形成的？我想再写一遍，留个底稿，今后再有人来纠缠，抄给他们一份就行了。形成过程是：

1958年和1959年的两次稿都是我一个人写成的。书稿经过工人出版社总编吕宁、编辑室主任杜映、责任编辑何家栋、王勉思等集体研究，认为写真人真事，人物太多，军队干部牺牲一个换一个，一个连牺牲10个连长，第11任连长仍在火线上。不如把人物集中，改成小说。于是就采取集体讨论，由何家栋执笔的办法。何家栋是位老编辑，已经写过几本书了。何家栋写后，杜映修改，我再改。我发现和何家栋的文字风格不同，问题提法也不尽相同。这就是小说的第一稿。写成了准备出版，我提出送习仲勋审查，因为他当过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把书稿给否定了，说没有写好，许多事情没写进去，还有些事没写清楚，不能出版。我开始着手搜集素材，亲手写第四稿。从头到尾重写，特别是开头几章数据越多越好写，除了改动文字和结构外，又增写了第三部分，即陕甘游击队、红26军和创建照金根据地等章节。第四部分也有增减，修改了很多。这一稿印出来后请有关人士提意见，我再修改，写成第五稿。有些报刊要拿去发表，我就边修改边发表，形成了第六稿。何家栋和我开玩笑：“我要当拐棍，你要丢拐棍。”我们确实是在行文和提法上有不同，我只得一个人包办。最后这就成了《刘志丹》上册。所以这部书的问题全部由我负责，与吕宁、杜映、何家栋他们毫无关系。

可是案子一开始，他们以及管出版的周培林都被牵连进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也被康生再三点名批判。1962 秋，康生派人到出版社调查小说《刘志丹》，高丽生站出来说话：“我认为是部好书，再过 20 年我还要出这部书！”为此，他被发配到外地改造，文革中再揪回来斗争，听说遭到灭绝人性的毒打摧残，可能已不在人世了。他为了一本书而献出了生命，可惜我和这位知音从未见过面。总编辑吕宁被打得死去活来，痛得直冒汗，汗水浸湿了一大片地板。如今也不知下落。杜映挨整时，连她的丈夫，一位长征老红军、某部政委也被株连。何家栋，造反派专打他的脑部，震坏了他的眼睛，使他几乎双目失明。他的全家被下放到农村，这期间他失去了老母亲和两个儿子。王勉思在外地，虽不知道她的境况，但从报上看到她丈夫康濯在湖南被斗的消息，想来他们也绝不会放过她。周培林在康生派人收书时，他悄悄留下两本托人带回老家乡下，不敢藏在自己家，只能放在老贫农家。文革中造反派用电刑拷打他，追查书的下落。想不到我的一部书被诬告，竟把出版编辑人员全都扯进去了。我思念那些为我受害的朋友。

41、习仲勋和周扬

自我被囚禁后，只听项目人员提及习仲勋，还未见过习仲勋专案组的人。今天把我带上楼提审，习仲勋项目组的人到了，是个一身戎装的军人。他神气活现地在我面前踱着方步，操着河南口音说：“交代你和习仲勋的阴谋！”我毫不客气地回击：“什么阴谋？是阳谋！”声音至少比平时高出 4 度，我太气愤，声音都变了。他说：“你被审查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是这种态度？”“你开口就说是阴谋，你懂辩证法吗？”“我们都不懂，只有你懂。”“你懂也不会用，没有自己的头脑。别人说什么，你就跟着说什么。没见过这样审案子的，一张嘴就钻进死胡同。”他搓着手站了起来：“你这么嚣张，这是向我们进攻。”我说：“我就是个进攻型的人。你接着说，说完了，我还要进攻。”我豁了出去，沉着脸，两眼直视着他那张故作镇静的脸。我们单位陪审的专案人员都在捂着嘴笑，似乎是看不起这些自以为是的中央专案人员。军人捋着袖子吆喝道：“把你们的阴谋都写出来！”我抬起头，盯着他那张四方脸说：“拿纸来，我当着你的面写。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阴谋，全是阳谋！”我心中有点好笑，习仲勋专案组的成员竟是这么个楞头青。我几乎有点可怜他的浅薄，想使气氛缓和一点，问道：“河南人吗？”

他回答：“是，河南巩县人。”“对不起，我就是这个脾气，要辩论，我能和你们辩论一天。慢慢讲，我也可以慢慢讲理。”他说：“我们都知道你。”我心想知道更好。他没有更多的话说，只是咬定“阴谋”二字要我写出来，我就用“阳谋”二字顶回去，那人无奈地走了。

从前有人透消息：康生说，“李建彤是个年轻人（其实当时我已42岁），她怎能知道那么多事情？给周扬的那封信一定是习仲勋写的。”安子文和钱瑛审讯刘景范时也说，“李建彤是个小女子，她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事情？应当说是你和习仲勋写的。”刘景范反驳说：“她已40多岁，不是小女子了，她什么都懂。她看的书多，采访的人多，查的资料也多。”当时景范倒不是想为自己辩解，只是想保护习仲勋。自己家里人写书，把人家牵连上了，于心不忍。我也是这样想的。他们为了把习仲勋牵连进来，拿着没收的采访记录一字一句地抠，断章取义地瞎编。例如，习仲勋对我说，“高岗过去是对的，但那是过去的事，不必提了”。他们省略了后面的话，抓住前面说“高岗过去是对的”这句话做文章。他们说：“看看习仲勋是什么人？他念念不忘说高岗过去是对的。十足的反党头子，反革命嘴脸。习仲勋吹捧刘志丹，吹捧高岗，就是吹捧他自己。排第一的刘志丹牺牲了，排第二的高岗自杀了，就轮到他了。他成了第三继承人，想当全国的领袖。”原来他们是担心有人夺取领袖地位才这么整人。有一次，专案组的人说：“习仲勋已经交代了。他说写死人是为了抬高活人。他想当西北的第三继承人，才支持你写书的。”我当下就骂出了口：“那是你们逼出来的，他是死猪不怕滚水浇了，你们逼啥他说啥。我写书时没有听过他有那个意思。如真有那个意思，就是他发了昏！”我一横心骂了习仲勋，其实还是为了保护他。习仲勋是什么人？他是陕甘边区的老干部，是刘志丹的战友。

接着来的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专案组。我看来者不善，是要找周扬的麻烦。我的书请周扬看本来是正常。以公而论，他是中宣部管文艺的副部长，我写的是小说，又是陕甘宁边区题材，当然要给他看。以私而论，他是我的老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我是“鲁艺”的学生。提审者突然问道：“你给周扬看，有没有找过陆定一？”看来他们还想把我、周扬和陆定一拉成一个案，因为陆定一的案情更严重。文革一开始，他和老婆严慰冰就被逮捕，头一条罪状就是严慰

冰写信骂林彪，这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现行反革命。老婆的事株连丈夫，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况且，砸烂“阎王殿”中宣部时，陆定一成了“大阎王”。我说：“我应该找他，但没来得及找到。既然他是中宣部部长，我写小说归中宣部管，应该找他提意见，这是他的职责。”来人自讨没趣，只得转回话题：“你说说和周扬接触过多少次？”我本想顶他几句说数不清，我在“鲁艺”3年，几乎每天见面，你说见过多少次？可是话到喉咙口又咽了回去，懒得和他玩，我懒洋洋地回答：“全国解放后，我只见过他两次，一次在晚会上，一次是请他看书。”“书是你送去的，还是苏一平送给他的？”“我送给他的。”“苏一平承认是他送给周扬的。”“他记错了，是我送给周扬的，送到中宣部传达室转上去的。”“周扬为什么找你谈？”“是我自己要求的。苏一平是文艺处长，他派苏来我家传达他的意见：书可以出版，修改一下也可以，不修改也可以。我提出要见面谈，有些问题要当面请示他，我以为中宣部长可以解决许多难题。”“谁约的？”“我自己，我打电话请他的秘书约时间。”“为什么不让苏一平打电话？”“各有各的历史关系。苏一平是延安西北文工团团团长，周扬是鲁艺校长。我既是西工团，又是鲁艺的。我可以直接约，免得节外生枝。”我怕把周扬和苏一平连在一起，有意把他们分开。

“周扬对你谈了些什么？”提审者发问。我脑海里出现了当年在周扬办公室见他的情景。那次是和北影导演水华一起去的。周扬先表扬了一番：“你带了个头，起了榜样作用。你本来是学音乐，不是学文学的，竟写出了小说。我很早就想叫人写这么一本书，你写出来了。我们全家都看了。这个本子可以出版。修改一下可以，不修改也可以。还可以拍电影，你俩谁写电影剧本？”我说：“水华同志写。”水华说：“建彤同志写。”开了个头，我开始提问：“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写？”周扬说：“当然可以写，都是有结论的嘛。”我又问：“三甲原缴枪事件可不可以写？就是谢子长缴了刘志丹部队的枪。”周扬说：“具体事情我不清楚，还得问西北的同志，看他们的意见如何？”我说：“有人说能写，有人说不能写，犯过左倾错误的人不同意写。”我又问：“高岗的素材能用不能用？”周扬说：“高岗的事也能写，历史唯物主义嘛。如果他过去没有功劳，全国解放后能给他那么高的地位？”我觉得周扬说得很对，到底是文艺理论家，别人是不敢这样说的。

周扬兴致勃勃地说：“你写刘志丹不要到处贴毛主席的标签。因为当时他们南北分隔，相距万里，又没有电台，无法通气，毛主席著作也不是到处宣传，到处能看到的。刘志丹在实践中的做法也许会有不谋而合之处，大家都在实践嘛。”我觉得周扬很有见识，很大胆，到底水平高一筹。

这些情景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可如今我决不能和盘托出。提审者催着说：“快讲嘛，在场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说：“是呀，但我没做记录，你们看别人有没有记录。我是向周扬提了些问题，可他说不了解具体历史不好答，还得请教西北同志。”“你不交代有人交代，工人出版社的人都说了。”我一想当时和出版社编辑关系很密切，有关书的事无话不谈。从周扬那里回来，我高高兴兴得把什么话都说了出来。现在大家都被打得焦头烂额，就不能不交代。这么一来，可真要给周扬加罪了。提审者说：“你以为周扬对你那么好吗？他吹捧过你，但事情一发生就慌了，到处通知不让理你。”我明白他是在挑拨离间。在这个国度里，一桩政治事件或一个政治动乱来临之后，即使有人被逼那样做了也是合理的。我决不怪罪于他。

提审者又让我讲第二次见周扬。第二次见面气氛全变了。那是1962年中秋节，中宣部打电话叫我到周扬办公室。我去了，在座的有中宣部秘书长童大林和周扬的秘书。周扬的表情很严肃，但又在为难，头一句话就说：“你犯了错误，陕北干部是反党的。”我不禁黯然泪下，不仅是自觉委屈，也是对他的信任和同情，知道他在被迫做违心事。我倔强地说“我没有错！”周扬问：“你那两封信是谁写的？”他指的是我批驳阎红彦的两封信，是写给中宣部周扬的。我说：“是我写的。”“人家说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的，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谁让你写《刘志丹》的，难道是在鲁艺学习时受的影响？”“信是我写的。我看过许多档案，别人没看过。我调查过的东西，习仲勋他们也不知道。我访问过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实际上，他们没有我掌握的材料广泛。”周扬没再说下去，只是说：“你要好好交代！”我临走时，秘书把我送到门口，她说：“你不要难过。这部作品出了事，还可以写别的东西嘛！”善良的姑娘在这时候还敢对我说宽心话。我感激她。关于这些，我能向提审者供出来吗？当然不能，那是坑害好人。我只能说：周扬批评了我，说我犯了错误，陕北人是反党的，那封信不是我写的，是习

仲勋写的。这当然是康生的陷害和栽赃。其实，周扬找我谈话后，中监委的副书记钱瑛又提审我。她问：“最近谁找你谈过？”我说：“周扬。”她说：“那是我们叫他找你谈的。”我明白了，周扬是被迫的，说陕北干部是反党的，决不是他的真心话。

在此之前还有个插曲，周扬在某次会议碰上习仲勋，告诉他，李建彤的小说写得不错，可以出版。习仲勋打电话到我家转述了一遍。因此，周扬的内心决不会把小说看成是反党，也不会把陕北干部看成是反党的。虽然他有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可他有正义感。听说 1962 年小说事件发生后，周扬见了毛泽东便说：“我犯了错误，支持了小说《刘志丹》。”毛泽东说：“你是管文艺的，发现了人才，发现了好作品，当然要支持嘛！”似乎是谅解了他，没事了。谁知一到文革就翻了脸。从 1962 年秋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关心着他的讯息，听说他在体育馆和许多老干部一起被揪斗了，我的心缩成一团。他有病，是刚动过肺癌手术不久的人。对一个病人岂能如此凌辱！

42、苏一平和闻捷

他们决不会放过苏一平。文革以来，记不清他们已经找过我多少次了，一次换一拨人。整苏一平，也连带着曹冠群。我和苏一平、曹冠群夫妇相识几十年了。从 1940 年起，我就和苏一平在一起工作，相处得很融洽。我请他看小说，因为他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我突然上门令他意外，没想到我会写起小说来。我和文艺界的关系已经中断十多年。他说，中宣部不事先审查小说。我说：“不让你代表中宣部，作为私人朋友看看，提点个人意见。”就这样，我把书放下，让他们夫妇俩看。苏一平从文艺角度提意见，曹冠群说是要向刘志丹学习，因为她正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想看看刘志丹如何度过逆境。我很能理解，是有人要找她麻烦。这个陕西妇女干部特别直爽，她是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1959 年她下乡看到农村发生的情况，回来就在会议上讲。于是那些满脑子教条的人就认为冠群是“替地主富农说话”，是“右倾机会主义”，她被斗争了。苏一平为人太老实。在这不讲理的年代，越老实的人越挨整。1959 年斗争彭德怀，他却说：我对彭德怀的印象是正面的。人家当然得斗他。就因为这些，他们夫妇就没有清闲过。文革以来，不但中宣部的人找我调查苏一平，全国妇联也来调查曹冠群。他们贴大

字报，画漫画，把“反党分子”李建彤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曹冠群画在一起，说我们俩正在密商“反党”。想到苏一平夫妇的遭遇，我心里就不平。要我写苏一平的材料，我写后他们总是不满意。我说：“那就算了，我什么也不写了。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专案人员就对我施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通天政委”。他说：“一谈周扬和苏一平的事，你的抵触情绪就很大。周扬是文艺黑线代表，苏一平执行文艺黑线也有很大责任。”我说：“不管黑线红线，都与我无关！”我心想，那线头儿在哪还很难说。现在不要说路线斗争，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分不清了，只凭有权的人说。

苏一平的事要审查，连我们西工团的同志们在一起吃了顿饭，他们也审过我一次。就在1962年那个夏天，闻捷看了我的小说后，见过一次面，谈得高兴，我就请老朋友吃顿饭，在新街口的西安饭庄。来的人不少，除了闻捷夫妇外，还有苏一平夫妇、朱丹夫妇等十来个人。我们已近30年没有相聚了，快活的青年时代转眼即逝，朋友们都步入中年了。那天谈得高兴，喝得痛快。闻捷可能喝多了，举杯说：“祝你成功，不能退却！”事先我告诉他已有人企图在捣乱。我也举杯回应：“即使为这本书坐牢，我也要写完！”饭后，我们在北海茶座叙旧情，海阔天空地聊天。这样一桩极平常的事也成了“反党”活动。凡是沾了我的边，就是“反党”，他们实在是欺人太甚。“通天政委”被我顶了回去，只得罢手。后来听说闻捷在上海去世。他的一生坎坷，那瘦弱的身体、苍白的脸孔，蓬松的乱发，经常浮现在我眼前。我们曾以姐弟相称，我怀念闻捷。

43、刘志丹的战友

刘志丹的战友都成了提审我的调查对象。东北局书记宋任穷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专案人员已来过4次。1967年来的那些大学生，在北京待了两三个月，隔几天就到地质学院来打扰我一次。过几个月，我被放回家。从“小报”上看见东北在揭发宋任穷为高岗翻案。此后凡是东北来人审我，我便质问：“谁说宋任穷为高岗翻案？高岗不在红28军，宋任穷和他根本沾不上边。你们在小报上造谣，不怕给文化革命抹黑吗？”1969年又有人来调查宋任穷，诱供说：“你要学张体学，不要学宋任穷。”我问：“张体学怎么啦，宋任穷又怎么啦？”他们说：“报纸上不是登了吗？张体学交代得好，他当了三结合的老干部代表。”另一个

人接着说：“你交代彻底，也可以当代表嘛。”还有人插话：“还可以当副总理呢。”我把脸一沈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也不想当官！”他们又说：“那你是要学宋任穷啰？”我问：“宋任穷怎么啦？”“宋任穷和邓小平是一个县上的，死顽固。”我说：“哦，原来宋任穷和邓小平是同县的，为什么听口音不像老乡呢？”他们说：“不是一个县，是一条线上的。”我想：难怪你们一打一大群呢，原来把人都穿成线了。

很多红 28 军的干部都因我而受累。裴周玉专案组也来提审过，因为我采访过他。我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新疆领导人名单中还有他，就放下心来。谁知没有过几天，他的专案组就到了北京。他们硬说《刘志丹》第三稿是裴周玉替我定稿的，这当然是诬陷。但他们说：“为什么他写的《英雄血染黄河水》结尾和你的《东征》结尾相同呢？是你抄了他的，还是他抄你的，怎么互相勾结上的？”我一句话打发了他们：“编辑喜欢那几句话，从报纸上剪下来贴上去的，和他和我都无关。”

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在宋任穷家开的那次会。我说：“宋任穷和刘志丹是战友，一个是红 28 军政委，一个是军长。宋老是红 28 军目前健在的最高领导人。1958 年夏天，在他家院里开了一次核实材料会，那是我要求开的。因为东征时间短，好多人记不清战斗的时间和地点了，特别是南方来的长征干部不熟悉陕北地理环境，记不清地名，要和陕北干部核对。会是晚饭后开的，当然是宋任穷主持，参加的人有：红 28 军参谋长唐延杰、特派员裴周玉、一团政委王再新、二团长于占彪和政委张家吾、葭县游击队政委张俊贤、神府红三团团团长王兆相。他们说的都是战斗故事，大家互相谦让，没有人争功倨傲。

宋任穷赞扬刘志丹，是我单独采访时谈的。他说：那时志丹刚从自己人的监狱放出来不久，指挥打仗还是那么机智勇敢。大家都知道他受了很大委屈，但他从来不提那件事。有一次我问他：“你看陕北‘肃反’的错误应当由谁负责？”他说：“我不想提这件事。如果认真问起来，我认为应该是本地干部郭洪涛负责。因为外来干部不了解情况，不能责怪他们。”对于那次错捕错杀的“肃反”，刘志丹只表了这一次态。

44、难友钱凝

我们4个女难友被分开了。专政办公室宣布：李建彤和钱凝搬进小仓库，由李建彤负责。宋克和张坤娣住原来的房子，由宋克负责。宋克眨眨眼开玩笑说：“1938年咱俩在抗大学习时是两个班长，每人带十来个人，现在咱俩又当了小班长，每人带一个兵。”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她说：“大概是看守们透过玻璃窗看到坤娣和钱凝在说笑。”

我和钱凝搬进仓库。这小仓库可真小，只有五、六平方米，四壁还堆满木箱，只有门口留出一条路。在木箱缝里给我和钱凝铺了两张木板床。我对钱凝说：“你看，这房子没窗户，房门一落锁像个方铁筒，一点儿空气也进不来，能把人闷死。再说没有窗口能让看守窥视，他们能甘心吗？”钱凝是个机灵鬼，听我一说就四处翻腾起来，查看有没有窃听器。她几乎把每个角落都翻遍了才摇摇头说：“没有，他们还来不及装。不过，咱们说话要小心，尽量用手势和用笔谈。”特殊环境能产生特殊感情。一个“反党分子”和一个右派就是这样亲密无间。我了解她，喜欢她。晚上，我俩躺在床上头对头地说话。我问她参加过什么党团？她回答：“没有，我受家庭影响，君子不党，所以什么党团也不参加。”我轻轻笑了笑：“好个君子不党。”她说一解放就考入清华大学，考分是前三名。清华毕业后已掌握了英、俄、德、法4门外语。我爱才，真心喜欢这个才气横溢的女孩。她那双眼睛很特别，瞳孔像透明的黑宝石，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眼睛。

我被命令去打扫楼道，清除垃圾。我有严重的关节炎和白内障，走到光线暗的地方摔倒了，胸部压在竹筐上受了伤，疼得钻心，回到房里就躺下了。这可把钱凝吓坏了。她向坤娣借来暖水袋捂在我受伤的胸部，晚上怕我有事就和我睡在一张床上，我俩又喃喃地聊起来。她告诉我：被打成右派后就遭到逮捕。进公安机关的当天说是要搜查，全身脱得只剩下背心和一条裤叉。我捏着她的手偷偷流泪。在这个队伍里几十年，第一次听说公安机关这样侮辱一个年轻姑娘，一个清华大学高才生，一个懂四国外语的科学家的。她说：“我去的那个地方不是一般人说的北大荒，而是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冬天气温在零下40度，屋檐上的冰柱粗得像小棒槌。把腿用很厚的棉花裹起来出门走一趟，手脚就冻僵了。最能吃苦的人都吃不消。那里什么人都有，小偷、妓女、政治犯、右派。”我安慰她说：

“钱凝，你在北大荒受苦了，但你能出污泥而不染，最可贵的是还能这么纯洁。”我问她是怎么从北大荒回来的？”她说：“是物探局的何局长找我的。打我右派时，也是他经手的，还用手枪吓唬我。几年后，他们需要我这样的物理探矿人才就又把我也找回来了，可是政治上仍把我当右派对待。”钱凝的个性很倔强。怎么斗她都不低头。打在她身上也不哭叫。那个姓朱的专政组长最可恶，动不动就虐待她，不时踢上她几脚。

有一次，她受了折磨回来抱着我的腿说：“给我出出主意吧！他们这么凶恶地整我，我怎么办呢？我实在没有可以交代的東西呀！我和家里几年不通信了。在北大荒劳改期间，我祖父从杭州来找过我。他到机关打听我的消息，机关的人骗他说我出差去了。他老人家在北京住了几个月，等不到消息哭哭啼啼地走了。我叔父从香港来找过我，也得不到消息痛苦地离去了。我不敢给亲人们写信，怕他们知道我在北大荒劳改。但专案组还是不断审问我，硬说我有问题，怎么办呀？”我边安慰边鼓励她：“你真坚强，受了这么多折磨，精神都没垮。说明你心里是踏实的，没有做错事。对付这些人，他们用软的，你也用软的；他们来硬的，你也来硬的。不要和他们对骂，他们会打你，眼前这种状况，打死也白死，生命没有保障。你没听见最高指示，‘好人打了坏人，活该！’什么是坏人，眼前没有标准。他们说咱们是坏人，过几年后说不定他们就成坏人了。”她坐在床上两眼望着我：“他们会不会把你打死？”我说：“估计不会，因为我是大政治犯。他们认为有个反党集团，想从我嘴里掏口供。打死了，就没办法整别人了。”“你会给口供吗？”“我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我的每个字比金子还贵，决不让任何恶人得逞。我也不会自杀，还想留着这条命回家给我丈夫做面条呢！”她把我当成大姐姐，依偎着我说：“和你在一起很光荣，你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我说：“咱们在这里虽然是偶然相识，但成了好朋友。我相信你，你是纯洁的。你将来会到美国去探亲，希望你到国外不要说出你和我一起关押过，也不要说你认识我。我不想让『刘志丹』的案子传出去，对国家影响不好。你也不要说出在北大荒的遭遇，因为仇视中国的人会借口攻击我们。中国人民是好的，这个队伍里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善良正直的。只是少数坏人整人，诬陷人。你是爱国的，千万要顾全大局。”她搂着我哭起来：“你真好，你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听你的，

将来万一出国探亲决不写文章骂中国。”她说着淌下了泪珠。

春节前，我们这些“犯人”被获准洗澡，我被关在这里快两年了，还没有洗过一次澡。我们四个女犯人在澡堂里说说笑笑，苦中取乐。第二天晚上，那个押解我们的女人找上门来了。她个子不高，圆脸小眼，凶得像个“母夜叉”，冲着钱凝拍桌子吆喝：“你说，还有啥问题没向组织交代？”钱凝吓得有点口吃：“没，没有呀！”“哼！昨天洗澡时你磨磨蹭蹭在干什么？”“我裤衩里有一张存款单。我怕洗湿就，先掏出放在干净衣服里。”“你为什么不出交出来，上面有规定，你们这些人的钱都要交出来。”“我交过呀！”“为什么不交彻底？裤衩里就放了1000元的存单，还有没有？”“没有了。”“这一千元就没收了。早知你不是好东西，我专门盯着你呢。”母夜叉说完，把凳子一踢走了。钱凝几乎哭起来：“怎么办？他们会揪住我不放的。”我安慰她：“不要紧。他们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没收了还得还你。你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是劳动所得。”钱凝哭丧着脸，悄声对我说：“我的办公桌抽屉里还有存款单，是用纸贴在桌底下的，抄家没抄出来，我不能不这样做。两个孩子需要吃、用、请保姆照管。孩子生病花得更多，我又不愿接受父母弟妹的接济。”不用她说，我都看见了：她的衣服上缝满了补丁，毛衣袖口都烂了。吃饭时连一粒米掉在桌上也要用指头粘起来放到嘴里。她有6个在国外大学工作的弟弟妹妹，她自己是一个懂四国外语的科学家，生活却是如此简朴。省吃俭用下来的钱却要被没收！钱凝闷头想了一阵问我：“剩下那些存款单交不交？”我说：“不交！你有孩子需要抚养，这是合理合法的。”

45、饺子风波

老宋到门口送开水，故意把门敲得咚咚响，我和钱凝叫看守开门。对面他们囚室的门也开了。坤娣扔过来一把巧克力糖，说是“小羊子”的老婆送来的。她是个工人，所以能来探监。那年头工人阶级吃香。小羊子慰问大家，让每个难友都能吃上糖。两年没有吃糖了，大家都像小孩一样高兴地把糖塞进嘴里。小羊子为人厚道。前几天集体到大门口扫雪，老老少少的犯人都去了。小羊子故意往老人身边挤，见70多岁的老工程师步履艰难，他赶快帮着把老人身边的厚雪铲掉。

转眼就要过春节了。老宋在楼道里喊道：“食堂挂了牌，春节有饺子吃。”这

天在车库小院里放风，看见卡车运来了白面和大白菜。宋克悄声说：“包饺子，包饺子哩！”副院长黄汲清也嗫嚅道：“我要买一斤饺子。”副院长朱效成也大声说：“一年多没吃饺子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多买些，北方人嘛！”当晚，老宋忽然给我打手势，愤怒地比划着告诉我：春节的饺子没我们这些人的份。热切的渴望终于落空了。我心里也很别扭，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凭什么不让我们吃顿饺子庆祝？我们在莫名其妙地失去自由后，如此简单的要求竟都得不到满足，比监狱里的犯人还不如。我越想心中越有气，顺手拿笔在纸上写了一段顺口溜：

说饺子，道饺子，大娘最爱吃饺子。手里比划包饺子，嘴里念叨煮饺子。

想饺子，盼饺子，外边风传有饺子。食堂黑板写饺子，过年一定卖饺子。

思饺子，念饺子，心中难忍馋饺子。不管是否有饺子，大婶夜夜梦饺子。

恨饺子，怨饺子，咱在纸上画饺子。囚室不让吃饺子，大娘跺脚骂饺子。

写完抄了一张，趁开饭时，我便揉个纸团扔给老宋。不久就从对面囚室传来老宋和坤娣的笑声，钱凝也抄了一张放在手边。不料，看守突然开锁进来，一把抓住她问：“谁写的？”她只得说：“李建彤”，穷凶极恶的看守拿起就走。我追着嚷道：“我的饺子呢？还我20个饺子！”看守扭着脖子说：“我要把它交上去！”第二天，小老虎来提人，把我带到专案办公室，通天政委已端坐上方，劈头问道：“你为啥写那么多饺子？”我不理不睬地答：“想吃饺子！”他问：“都有些谁想吃饺子？”“都想吃！都是人！”“你们都是老干部，一顿饺子不吃就那么大意见？那么馋？”“你不馋？我们都被关押一两年了，又不许家里送饭，想吃口饺子也犯法吗？大家都有饺子吃，偏偏不给政治犯吃。你们虐待政治犯。”通天政委这一群人都哑口无言。

我和钱凝刚搬进仓库时，托人买了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贴在囚室的一个木柜上，对着钱凝的床头。当时全国正开展“三忠于”运动，到处是贴满毛泽东像和“忠”字剪纸的红海洋，囚室当然也不例外。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就是思想没有改造好的表现。有一次，看守们来查房，发现画上毛泽东的下巴上有一点破损，急忙追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俩都说：“不知道，

我们没有碰过。”不料，这就成了重大政治事件。两天内派人轮流来审问，追查我们是否有意破坏毛泽东像。我们确实没碰过那张画像，早知会惹事生非就不该买。

我们坚持说不知情，他们查不下去了就把梁大爷找来了。梁大爷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会做木匠活，常见他在楼道内修补木箱、篋子等用具。他不但做事勤快，而且心地良善，对人诚恳。他见我在吃力地扫地，就不声不响地给我找来一把长条帚说：扫地要用长把条帚，否则腰弯得太久会痛。因为梁大爷管仓库，常进来倒腾箱柜。项目组就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梁大爷一口应承：“那是我搬箱子时没注意，碰在画像上了，请求处理。”他们见老工人满口应承也无法怪罪，老年人搬箱倒柜难免磕磕碰碰的，不好处理。我和钱凝出了口长气，暗自感谢梁大爷免了我俩的一场大灾难。如果不是这位正直的老人承担下来，一个右派，一个“反党分子”岂能如此轻易过关？

46、少年同窗

小老虎下楼来，只说了一句简单的话：“走，谈一段你的历史。”我的历史？有啥谈的？在这个队伍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最不怕谈历史。从第一天起就得把历史说得清清楚楚。到一个单位填一张表；经历一次运动谈一次历史，连童年生活、恋爱婚姻都说得一清二楚。我平静地跟他走。在提审室里坐着两个军人，一开口就听出是云南口音。他们问我是否认识李淑娟。这句话把我带回到几十年前的岁月。淑娟，后来她又改过几次名字，现在已不叫淑娟了。前几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各省到北京出席会议的革命干部代表中还有她的名字。在文革高潮中，能作为省里选出的革命干部代表上天安门是绝对被信任的。既然被信任，为什么又会被调查？我说：李淑娟在小学、初中都是我的同窗好友，我最了解她。她品德好、政治纯，没什么可挑剔的，你们要问什么呢？他们问的是1936年冬，她是如何离开许昌的？和谁同路，谁送走的，什么原因？这件事也只有我能证明，难怪他们千里迢迢到京城来找我。

“1936年寒假，我从上海回到许昌就去看淑娟。那时她在义务学校教书。她的家境不好，继母虐待，经济窘迫，初中毕业后就不能继续升学，只能教书，

每月薪金 15 元，还要抽出 5 元交给继母，她的生活很苦。当时有人要找她麻烦，县立第一小学校长高洁亭，在教育界有些权势，找淑娟谈话，要她加入国民党 CC 系统，否则就不能再教书了。”来人问：“在那种情况下，李淑娟怎么办？”“她只有一条路，就是一走了之。她和我商量想远走他乡，哪怕到外乡沿街乞讨，也不能再留在这里。我赞成她走。淑娟告诉我，李君实也要走。君实是我高中一年级的男同学。他从开封回到许昌后，和淑娟一起组织了读书会。淑娟说，君实是领导人，他在那里宣传革命和抗战，国民党县党部已经盯上他，从邮政局检查他的书信。他订购的进步书籍都被没收了。看来他已站不住脚，只能远走高飞了。君实说去太原，至于到太原后如何落脚？他暂时也不交底，他的纪律性很强。”

“后来怎么决定的？”“我们 3 人商量还是决定走。无论如何，淑娟和君实一起走，我是放心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仍然回上海，他们去太原，商量好随时通消息。如果他们在太原待不住就到上海来。我在上海待不下去就去太原，所谓狡兔三窟。后来才知道这完全是多余的。他们是 3 个人同路走的：李君实，李淑娟以及淑娟的一个女学生。那天晚上是我把他们送上火车的。”“以后呢？”“我到上海后住进艺术学校，接到淑娟来信，说他们进了太原国民师范接受政治军事训练。淑娟是学员，君实是指导员，说明君实早已是共产党员了。”我讲完后在笔录上签了我的原名和现名，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天我的心情很好，是被关押以来第一次，总算为少年时代的朋友做了证明，她确实是清白的。当晚，我彻夜难眠，几十年来的往事浮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1938 年夏在延安与淑娟重逢，淑娟告诉我，君实牺牲了。当初，我为什么不听君实的劝告，和他们一起儿走呢？我舍不得学业，其实我一生进过 3 个艺术学校都没能毕业。1935 年，考进开封的河南艺术师范，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因参与学潮被迫离开学校。1937 年考进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暑假就遇上“七·七事变”，离开上海。到延安 4 年后又进了鲁迅艺术学院，第二年就遇上“整风”和“抢救运动”，搞了 3 年半的政治运动，白费光阴，又哪能算毕业？

47、宋克获释

除夕夜，犯人被允许在囚室内自由活动，我们几个女犯人都拼命唱歌。那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首《延安精神万岁》，这首歌被大家藉以倾吐郁闷之

气。我们唱啊，喊呀，整整闹了一夜，也没见看守干涉。时局似乎有点变化。春节开门打饭时，老宋和坤娣往我们房间扔了许多纸烟和糖果，都是家里送来的。我家不准送东西，钱凝又举目无亲。我只能给她们几根蒜苗，这是我在水碗里泡了几个蒜头长出来的，从木笼一直带到这个女囚室里。

春节后又是一场大雪，犯人们被倾巢赶到院子里扫雪。宋克边扫边叫我：“来，到这边扫！”我跟在她后面，慢慢扫到没有人的地方。哗哗的扫雪声掩盖着我们的说话声。她悄悄对我说：“我已接到通知，说我的问题是从前交代过的历史问题，不必再专政，明后天就可以放出去了。我走后，你要注意身体。你有话要往家带吗？家里有什么事要办吗？”老宋真好，但我能说什么呢？只有祝贺她重获自由，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30年才聚一次，竟然是在囚室，转眼又要各自散去了。她要帮我带话出去，我想了想说：“不行！有话你也带不到，你和我家里人不熟，无法进门，院子周围有狗。”这几天放出去了一大批人，剩下的不多了。坤娣也走了，我和钱凝离开仓库，搬进原来的囚室，宽敞多了。我预感到自己将是最后留下的一个人。我是中央专案管的，他们无权放我。大多数人都能重见天日了，我默默地祝愿他们获得自由。

看守们给我和钱凝找活干，先叫我俩到院子里清理垃圾，后来又让我俩推车从后门出去往小胡同里送垃圾。这一来，我俩总算可以从后大门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我一高兴编了首“垃圾之歌”，现在只能记得几句：垃圾垃圾、怎样到人间来的？你前门进来，后门出去。歌词很长，讽刺当权者需要用人时从前门请进来；用不着时当垃圾踩在脚下，扔出去。我俩推着垃圾车边走边唱，真是自得其乐。垃圾堆距离前门很远，几乎遇不见人。我和钱凝就在那里尽情畅谈，说笑，有时还唱我自编的曲调。我给毛泽东的诗词“昆仑”配了曲调抒发自己的情感。我最得意的是那两句：“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反复地唱，充满激情和悲愤。眼前的一切是正是邪，是对是错，是功是罪，让后人去评说吧！

老宋、坤娣走后，轮到我打开水。有一次，在开水房附近遇上老宋，她很远看见我就停住脚步，有意等我走近，便从衣袋里掏出糖和苹果，动作敏捷地塞进我的大衣口袋，又装得若无其事。老宋告诉我：“出去后，你女儿的一个同学到我家玩，我故意说起你的情况，暗示她转告你的孩子，让他们放心。”我点点头，

没说话，心里暗暗感谢她。

48、为刘志丹辩诬

我和钱凝正在吃宋克送来的礼物，专案组来提人，我只得跟他上了楼。这次我带了写好的《上书》，长达两三万字，是我在木笼里开始写的，不是为自己申诉，也不是为小说《刘志丹》申诉，而是为刘志丹的名誉申诉，驳斥对他的种种诬蔑。我和刘志丹没见过面。只是出于对革命事业和当代人物的探讨才去接近那些史料，探索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遭受的迫害。他的存在对有些人是个威胁。在这场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感觉像回到 1935 年王明左倾路线时代。别的且不论，只要看对刘志丹的种种污蔑就很说明问题。这些诽谤他的谎言都是在小报上和提审中听到的，如果不是阎红彦向康生诬告，这些奇谈怪论是不会出现的。我《上书》涉及的问题是：

（1）为什么凡是写《刘志丹》的作品统统列为毒草？连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老百姓唱的陕北民歌《刘志丹》也成了毒草？难道那时陕北的老百姓就是反对共产党的吗？

（2）刘志丹家中不出租土地，为什么称为地主？按照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规定》，他们家只能算是中农，这个问题和 1935 年王明左倾路线时对他的诬陷有什么区别？

（3）关于共产党和军阀打交道，做兵运工作问题，为什么是两种对待？谢子长同样在军阀中做兵运工作被某些人称誉。那个旅长的职务从未到手便到处夸耀说：“他当过旅长”。刘志丹做兵运工作，真当过旅长，就被上述人诬陷为“勾结军阀，不打红旗”。为何一个问题两种逻辑？

（4）刘志丹在邠县坐过牢，是南汉辰、杜斌丞营救出来的。现在那个“三甲原檄枪”的副手阎红彦出面诬陷他是叛徒。这是 1935 年那个南方来的 25 军保卫局副局长戴季英对他的诬陷。现在这一诬陷又被戴季英的同伙拿出来，照用不误。现在可是毛泽东时代呀，为什么和王明时代用同样的方法诬陷人？那些问题都是从前作过结论的。

(5) 三甲原缴枪：谢子长、阎红彦暗中布下阵势，向刘志丹部队突然开枪。这本是他们的错误，反诬刘志丹不打红旗。试问：他们要归陈圭璋编旅，又要归杨虎城编团，难道是打着红旗归人收编？人家那时要你的红旗吗？他们把一个雇工出身的干部赵二娃打死，说他不该娶个寡妇跟上军队走。而那个赵二娃是穷得无处安家啊！相反谢子长、阎红彦两人，家中都是富人，每人都结过3次婚，而且是互相交叉。按照他们对待赵二娃的逻辑，娶一个老婆就得被枪毙。那么谢子长、阎红彦就应当每人枪毙3次。

1958年我在西安采访时，西安市副市长杨晓初老人告诉我：1932年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曾派阎红彦去西安找张汉民，送上谢子长亲笔信，求张汉民向杨虎城说情，要求把反帝同盟军编给杨虎城。汉民去说了，杨虎城表示：要我收编，必须先缴械。汉民觉得不妥，自己刚搞起来的军队怎能把枪缴给别人。他赶快派人去说服谢子长，千万不可这么办。杨老叹息说：“为这件事，我心里窝了许多天。我们这些干部为什么会想入非非，想当官么？那时的杨虎城可不是西安事变时的杨虎城，完全不同。听说那件事是谢子长瞒着刘志丹干的，也是瞒着省委干的。后来接着就搞三甲原缴枪，打死打伤志丹的主要干部。那是什么意思？令人深思！”杨老说：“那时张汉民就住在我家，我们无话不谈，谢子长的亲笔信我也看了。我为他害羞！现在我说句心里话，那人不可交！”

1958年我采访郭洪涛时，他说了一句实话：1934年谢子长对我说，三甲原缴志丹的枪，是因为志丹不打红旗。多么恶劣！你要去投靠军阀，你能打着红旗去么？你成了白旗，反诬别人不打红旗。就是因为谢子长捏造刘志丹不打红旗的谣言，“肃反”时竟然成为刘志丹的重要罪状之一，把他当成反革命首领，逮捕并用了残酷的肉刑。若不是中央红军赶到陕北，刘志丹差点儿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杀害。

为这3件连起来的事，我在西安憋了几天气，连饭也吃不下。我发誓要把这些事情写出来。把那些质量恶劣的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教育后代人，千万要提防恶人陷害。就是那个处处想陷害刘志丹的人，原来是陕北军阀井岳秀手下的一个连长，在加入共产党前曾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的喽啰们曾为他写了传记，夸耀他镇压“硬肚”时的英雄气概：辗转陕北20余县，英勇善战，为全

军之冠。按历史上的说法，“硬肚”也是农民反抗官府的一种力量。按现在的政治标准，应当说他是历史反革命。而这个人却是王明路线重点保护的對象。如果那个人健在，遇上目前的清理阶级队伍，他定会被群众清理出来，被群众关押或送进卫戍区。然后再被康生保回去。因为他们是他们的同类。

(6) 刘志丹和谢子长的分歧，一开始写《刘志丹》时我就写过。贺晋年等人看后说“千万不要被人看出谢子长和刘志丹有分歧，不要让人看出谢子长有错误。”原来他们最怕把错误暴露出来，毫无半点光明磊落，哪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者的气味？请求有关部门审查那段历史。

(7) 和刘志丹一块战斗过的人是不是都反党？据我的调查，他们是反对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为什么说他们反党？难道现在的领导人和反动派坐上了一艘船？否则，为什么来的提审者大都是被我采访者的项目组？难道被我采访过一次就成了有反党罪行的人？这些项目人员是为谁服务的？

(8) 1935年中央来陕北前，陕甘有无根据地？现在有人说，那里没有根据地。可毛泽东主席说是有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说：“我们队伍里出现了老套的人们，对敌人采取的反动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阴谋家掩盖不了历史的真实。

(9) 1934年敌人围剿陕甘地区时，把刘志丹当作祸根，挖祖坟，砸石碑，斩剿满门，那是敌人的面目。1935年左倾机会主义者逮捕了刘志丹本人，杀害了他的战友，迫害家属。那是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面目。可现在为什么又走老路？逮捕战友，迫害家属，无一不是重蹈覆辙。我脑子里反复想：眼前的敌我面目不清。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西安关押着许多老干部不少是刘志丹的战友，是1935年错误“肃反”中被押过的，而1935年那些专门错杀人，错打人，打黑报告的人依然逍遥自在。目前究竟是谁和谁在斗争？

49、驳阎红彦

原稿写得很详细，交上去了。我准备好因这份《上书》再挨鞭子。果然几天后通天政委找上门来了。他的全班人马都到齐了，个个脸上肌肉紧绷，劲头都憋得挺足。

通天政委的嘴巴高高翘起，把那篇《上书》往我面前一推说：“我们研究过，这篇东西是你的另一次反党活动。为什么要这样写？谁让你这样写的？必须说清楚！”“反党？凡是我写的东西都反党？我是反驳阎红彦，如果反驳他的错误也能成为反党，组织上是否承认他就是党，党就是他？如果他就是党，我宁愿脱离这样的党，和这个不讲理的党分道扬镳。”谁也没想到我这样提出问题。他们有点发愣，一时应付不来。我说：“如果他是党，我也是党。他反对我的小说，他是反党。既然可以随便扣帽子，我也可用同样的帽子扣回去。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对的，他是错的。谁支持他也不行，老祖宗支持他也不行。大家都知道他已在1967年自杀了。我被诬陷成这样还未自杀，他倒先自杀了。为什么自杀？是我的小说逼他自杀？是群众斗争逼得他自杀？都不是，是他自己心中有鬼，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时他仍担任省委书记，还兼着军区政委，而其它各省的书记省长都在被群众围攻，戴高帽、游街、坐喷气式。尽管群众要求，阎红彦就是不露面。他请示中央文革要不要见群众。中央文革回答应该见，他就服安眠药自杀了，还留遗言说是陈伯达把他逼死的。他去世后，陈伯达声明：“我和他是好朋友，我有病时，他还来看我，我也去看他，无话不谈，怎么会害他呢？我不能不让他见群众。大家都见嘛，群众说话无非是难听些。”周恩来总理也说了话：阎红彦在西南本来是反对李井泉的，好嘛，你何必自杀？一自杀就成了和高岗一样的“反党分子”。有个提审者说：“是呀，阎红彦是反党的，他不让你反党，你俩抢着反党。”我看了看此人，有点面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专案人员。

通天政委突然问：“你对三甲原缴枪怎么看？”我直截了当地回答：“缴枪是错误的，是违背井冈山道路的。对新整编过来的队伍如何整顿，应当按毛主席说的：只有加强教育一法，决不能用枪毙、开除的办法，革命初期来投靠的人很不容易。刘志丹是这样主张的，可是谢子长不同意，便和阎红彦等密谋设圈套，突然开枪。刘志丹部队没有还手，被打死2人，打伤几人，又被宣布全部解散。400多人的队伍啊！在白色恐怖下好不容易聚集锻炼出的人马，在左倾机会主义和别有用心的阴谋下毁于一旦。谁能不痛心？他们是要弄得刘志丹无一兵一卒，用心非常恶毒，手段特别下流。谢子长竟然把刘志丹关押起来。其实刘志丹的实力

比对方强，可他不愿自相火拼，就都忍了下来。现在他们还想闹什么？闹他们正确，杀自己人有功？就是说到天涯海角也是他们不对。他的老祖宗也包庇不了他们。这就是刘志丹在三甲原第一次被自己人阴谋缴枪。”有人插嘴：“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我到处采访，查史料。这些事在档案中都有。你们不是知道我访问过马锡五、赵子实吗？他们都是当时被开除的人，亲眼看见阎红彦打死赵连璧，看见贾生财被打得跑下山原。这两个人都是刘志丹部队的大队长，不使人痛心吗？”通天政委哼了一声说：“你好像批得满有理，难道你的意见全部正确？”“不正确的你可以提出来，全部数据都在你们手里，就看你敢不敢用。”

他当然不露口风。小老虎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到通天政委身上，看他是否发怒。通天政委却强忍着问：“你说在南梁曾批判阎红彦，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们可以查 1945 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阎红彦自己的发言。他承认到了陕甘边界的南梁地区，他自己部队里很多人提出要开除他、枪毙他。没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大家不会那样要求，众人眼睛是杆秤。他所以没有被枪毙或开除，是被他的老上级、老朋友包庇了下来。这个人就是和他密谋三甲原缴枪的主要负责人。”通天政委哑了哑嘴，一时插不上话，有个戴眼镜的站了起来：“照你的说法，人家写得战斗回忆，你都不承认？”“不是不承认，而是他写的那些战斗都是失败的，而到他笔下都写成成功的。比如山河镇战斗，游击队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县城，攻了一个多月也攻不下来。敌人从城墙上往下用机关枪扫射，游击队大量伤亡。这种左倾冒险的战斗当然是失败的。还有攻打三原县城一事，那个县城比山河镇还大，驻有敌人一个团和一个师直属队，游击队只有 300 人拿着步枪去攻城。结果把敌人引到三原县武字区的革命根据地。黄子文等本来在那里经营多年，建立了革命政权和游击队。阎红彦去那里本来只是求助，却不自量力，胡打乱冲，把武字区的革命力量完全暴露给了敌人，使那里受到很大损害。他反而颠倒黑白，吹嘘是自己帮助了人家，把创建游击队和革命政权的功劳算在自己头上。他要靠这个功劳在解放后升官。”

我这几句话说得很重。由于周恩来说过“阎红彦自杀也是反党”，专案人员也不好太护着一个“反党分子”。戴眼镜的在屋子里踱了几步，挖空心思在找进攻的缺口，过了一阵，他突然问：“难道你比当事人知道得还多？”“我不敢说知

道得多，但这些事件我都调查过。比如去打韩城，那么点兵力兜了个大圈，转了十多个县，中途队伍曾增加到 1000 多人，最后又惨败。为什么？我向阎红彦、吴岱峰等人请教。他们都说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他们都是当事人，答复却都不得要领。为解除内心的疑团，我到西安去查档案，整整翻阅了一个月的陕西省委历史档案，才发现原来省委书记杜衡有检讨：他命令游击队去韩城建立苏区是犯了右倾错误。其实他是犯了左倾错误。这说明游击队在平原打了一年仗一无所获，省委只得命令他们去韩城，根本不像阎红彦说的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通天政委的眼睛盯了我一会儿说：“照你的说法，阎红彦就没有干过好事？”我说：“从 1932 年 12 月起，阎干的坏事比好事多。部队每次失败都和他有关系。不是他不能打仗，而是思想太歪，质量太恶劣。”戴眼镜的给通天政委倒了杯水，然后坐下，扶扶眼镜，猛然问道：“你说，谢子长和阎红彦是怎么离开部队的？是否省委右倾机会主义对他们的打击？”“不是！谢子长、阎红彦的问题和刘志丹不同。他们夺得领导权后，把部队带东带西，打得只剩下 170 人，又分为 6 股，分散到边远地方，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再有谢子长、阎红彦枪毙人惯了。省委派去的政委触犯了他们，他们便到处嚷着要枪毙政委。因此，成立红 26 军时，杜衡就不敢留他们了，后来的红 26 军中就没有谢子长和阎红彦两人。”

戴眼镜的说：“你算是把谢子长、阎红彦贬完了！”我说：“不是我贬低他们，是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留下的脚印。谁的历史都是自己写的。如果他们文章写得实事求是，我决不会抨击他。凡事自有公论嘛！他为什么无法反击我？”“现在就是反击。人家对你的小说告状，就是反击！”我冒出火来：“那是恶人先告状，怕揭他的疮疤，先来个诬告。我没有写高岗，哪来的翻案？那是转移目标，无中生有！”说到这里，我气不打一处来，因为阎红彦的诬告株连的人太多。最后我表示：“关于这个问题，我永远不会检讨！”

50、钱瑛

最近像上班一样，每天到楼上提审室和那些人打交道，接受重复提审。这一天，他们一提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的名字，我马上说：“她是我手下的败将！”这句话差点把提审人老广西的嘴气歪了，小眼一眯，从牙缝里挤出几句：“你总是这么嚣张，谁都不放在眼里，她比你职位高得多。”我说：“地位和思想

水平不相等，地位高不等于思想水平高。”通天政委说：“现在要你交代，她是怎样审你，怎样包庇你的？”“她包庇我？不要看她地位高，是监委副书记。其实水平几乎低到了零度。她左得出奇，和我不是一个观点，绝不会包庇我。”我也纳闷：后一拨的项目人员要审前一拨项目人员。这大概又是康生的新花招，克格勃专用的手段：用他们一拨打击我们，现在又打击他们，都是可怜的牺牲品。钱瑛在历史上一贯是出名的打手。我们挨打，清夜扪心不欠他人债。他们则不同，各有各的债。

我想起 1962 年钱瑛在办这案子中的表演，有两场突出的戏。第一场是“三堂会审”，钱瑛最左，伍云甫最胡涂，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比较讲理。钱瑛说：“《刘志丹在桥山》谁给你出版的？你们是否有个地下出版社？”我说：“你们都写回忆录，谁给你们出版的？难道你们是有了自己的地下出版社才能出版的？”钱瑛在第二场戏里仍然是第一女主角。她带着李振海处长提审我，专替阎红彦说话。她说：“你写信批判阎红彦。人家对你的书也提出了几十条意见。我说：“拿出来，摆在桌面上。我的意见是摆在桌面上的，你们也放在桌面上，大家争论嘛！虽然你们没收了我的采访记录，可是没收不了我的大脑，一切都存在我的脑中。阎红彦如果提出 1000 条意见，只要有一条是对的，我可以投降。”她始终躲躲闪闪，没有把材料拿出来。其实，她心中也无数，赶快转移话题：“你为什么在小说中把阎红彦写成自杀了？他是高级干部，中央委员！”“我小说中哪个是阎红彦？他照镜子了吗，找到自己了？书里堂堂正正的人有的是，难道没有一个是他吗？”“那个周光是谁？阎红彦说，那写的就是他。”“他不要给自己脸上贴金。周光身上有红 26 军 2 团参谋长郑毅的素材，真正自杀的是郑毅，他怕左倾的政委整他，是坐在敌人面前被乱抢打死的。阎红彦还不够格，没有那个胆量，更没那个气魄！”“阎红彦自己说的，那个周光就是他，特别是你写的那个方块头、大嘴巴的模样。难道人家冤枉你了？”我真想挖苦她一顿，难道世界上就是阎红彦一个人长了个方块头、大嘴巴？中央监察委员会还有这样的任务，监察谁的小说写了方块头，大嘴巴？真是庸俗无聊。我说：“谁说他的脸不能当模特儿？我把他当成人才有资格放在我书中。我又犯了什么法？”“阎红彦告你，他告得对！别人也说过你的小说中有个人像高岗。”“除非他在土地革命中也杀了自己人。凡

是这种人都想拿高岗问题做文章。这是一个可以钻的空子嘛！现在你们都站在阎红彦一边。告诉你，真理在我手里。我内心踏实。你们站在他一边也没关系。现在阎红彦成了告状英雄，我是“反党分子”。不过，谁也不能一手遮天 200 年。将来说话理直气壮的还是我。”这就是我和她的较量。

关于钱瑛的为人，我们曾经在一个单位共事过，有些了解。钱瑛有来头有靠山。她从苏联留学回来到了南方某根据地，跟着错误路线搞“肃反”。和她一起从苏联回国的同学和战友、都被她伙同夏某人在苏区杀尽了，只剩下她一个人，从此平步青云。她踩着自己同志的脊背爬上了高位。一个时期，消灭西北干部成了热门买卖，她就抢手干上了。钱瑛到了监察部，在她主持下，竟打了 15% 以上的右派，超额完成任务，受到中央表扬，还当了中央委员。她要独揽大权，也有人支持她揽权。她让秘书长、部长助理在会议上吹捧：“监察工作走了一个之字形，从正确到邪路，直到钱部长手里又扭过来，才走上正路。”凡老监察部的人都明白，是到了钱部长手里才走了邪路，越走越邪，邪到回不了头，只得把监察工作取消。为什么撤销监察部？她不能自圆其说，找个借口：“人民公社化了，以后没有人违法乱纪了，用不上监察工作了。”可见她的水平有多低。可是这位部长大姐又高升了，带着她的亲信到另一个部当了部长。

51、张秀山和张策

这两天又来了两拨人：一个是张秀山专案组，一个是张策专案组。我只访问过张秀山一次，康生他们就揪住不放。张秀山担任过陕甘特委书记，那是 53 年前的事，当时他才 23 岁，是榆林中学毕业生。榆林中学是陕北最高学府，是中共早年在西北传播革命火种的一个据点。张秀山还任过红 26 军 42 师政治委员和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他是陕北人，长期在陕甘边区工作，领导三原武字区、照金根据地、南梁和下寺湾等地党的工作。给人的印象是有文化、有魄力，头脑清楚。

在搜集刘志丹的史料时，从档案中看到他的一些事迹，重要的是在 1945 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讲得全面实在、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不夸大不缩小，有理有据。把陕甘发生的对敌斗争、路线斗争讲得泾渭分明，是非清楚。对坏人

坏事不因某人位高而嗫嚅；对好人好事不因某人位微而不顾。例如，他讲到阎家洼会议，痛斥那位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是“白衣秀士王伦”。刘志丹他们在敌人三不管的南梁地区开辟根据地。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使红26军由一个团发展到5个团，开辟了20多个县的根据地。事业刚有起色，北平派这个“钦差大臣”来指手划脚，指责这也不行，那也不对。把在山区建立根据地诬为“梢山路线”；把游击战争诬为“逃跑主义”；把武装夺取政权诬为“枪杆子万能”；把收编黄龙山土匪改造成红军诬为“浓厚的土匪色彩”。正是这些颠倒黑白的指责吸引我到处去寻找答案：为什么会这样？

我曾问过张秀山：如果谢子长、阎红彦那帮人都在，陕甘根据地能不能建成？他回答：“当然建不成。头一条，他们绝不同意红军到南梁站脚。再一条，在作战方面他们能搅和得你打不成仗。他们迷信打平原战。第三条，所有的政策都不可能执行。他们闹宗派主义，只认自己那一小撮。觉得有刘志丹这个人，对他们是个威胁，千方百计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张秀山在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时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不向作恶者求饶，不为自己的遭遇哭泣，但为红26军战友而哭，请求不要再杀红26军的指战员。26军为了这块根据地已经牺牲太多，自己人千万不要再杀害他们。他的自我牺牲精神震惊了从北平新来的党代表”，促使他冷静地思考：他为什么不求饶，只要求保住红26军？难道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反革命？我访问他时，他言简意赅讲得很清楚。如用雨原战斗、马栏战斗为例，说明刘志丹战略战术的灵活；用开辟陕甘根据地为例，说明刘志丹的高瞻远瞩。他对细节都回忆得逼真，连当时报上登载西北红军消息的年月日都能脱口而出。我为他的记忆力而惊服。

日本投降后，张秀山被派往东北，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在东北剿匪，歼敌、组织建设工作中功勋卓著。解放初被定为国家四级干部。可是高岗事件后，把他打为高岗的“五虎上将”，减了薪，降了级，被贬职去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当副厂长。他上有老母，下有一大群小孩子。全家挤在一间小屋里，除了床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老母去世后，他穷得只好自己掏钱买汽油到野外去烧尸。在这样的逆境下，他仍乐观热情工作，在农场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去访问他时，他住在一个破烂的小招待所里。这个四级干部到了北京到处吃闭门羹，很多熟人都怕沾边

不敢接待他。他想参观新建的首都体育馆、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却进不了门，因为没有介绍信。我不禁感慨万千，功臣下了台，丑角当高官。东北数次来人审我，要我交代张秀山的反党罪行。我说，他的问题在 16 年前已清算过了。他已成为“反党”集团一员，我还能有什么新材料。他们说他是死老虎。既然是死老虎，为什么还要穷追猛打？

张策专案组不知来过多少次了，这次又来了四五个人，为首的是个青年军人，满口地道的关中话。50 年代，我采访过张策，在他的办公室。那时候，他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他谈话很痛快，开门见山说：土地革命时期，只有刘志丹的航船能通行，因为他的航线是对的。别人走的不是正道，总是碰壁。刘志丹的船航向是甚么？就是在陕甘交界的山区建立红色政权。张策讲话就像他的性格，嫉恶如仇，眼里揉不进一粒沙子。土地革命时，他在家乡陕西高陵县担任县委书记，也在保安县和南梁地区担任过领导工作。他在红军中是个很优秀的宣传干部，我小说中的那个宣传科长的原型就是他：在战场上，司号员牺牲了，他就是司号员；担架队有伤亡，他就是担架队员；谁受伤了他就顶谁的岗位。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曾潜入西安，安排周总理和张学良见面。后来他从西北到华北，最后到东北担任省委书记。高岗事件发生后，他受牵连而被降级。降级就降级吧，他并不在乎，仍是兢兢业业工作。最后又被调出北京，到西安当市委书记。我到西安又采访过他，那次采访都在记录上。这次来的专案组就用那份记录指手划脚。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关押了，关在西安市建国路 73 号，那里和监狱没有两样。陕甘根据地的干部，1935 年押在瓦窑堡坐牢，1968 年关在西安城坐牢，坐的都是共产党的牢。

52、交锋

第二天又来提审，先开口的照例是通天政委。有人悄悄告诉我：这个以通天政委为首的专案组常常向康生汇报，信封上写的是“曹轶欧大姐并康老”。

今天通天政委说：“你思想形成的过程没有讲清楚。采访中你究竟增添了什么思想？1942 年高干会精神是什么东西？你接受了多少？你对阎红彦为何那么反感？三甲原缴枪问题上，你为什么和阎红彦持相反观点，为什么会有和高岗相

同的反动观点？在高岗问题上有什么罪错？对钱瑛和伍云甫的看法是怎样形成的？刘景范有些什么问题？小说有没有受他的影响？人和人的关系不仅是同志关系，也是阶级关系。”照他的说法，我和刘景范也成了阶级关系。刘景范是什么阶级？我是什么阶级？康生又是什么阶级？我气得直皱眉头。

通天政委继续往下说：“你写小说难道是被动的？实质问题到底是什么？谈原则问题，还要有具体事例。例如，你说是根据 1942 年高干会精神写的，但你不讲具体的，不讲从中吸收了哪些观点？炮制反党小说的具体活动中，他们给过你什么具体帮助？你现在说的话哪里像在认罪，像是在说明问题。”他还说：“那块根据地的创立到底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还是毛主席思想教育的结果？”专案组成员憨厚老三也插了一句：“就算那时毛主席还没到陕北，在敌人报纸上也能看到些东西，也能起指导作用。”这个人还算老实，承认当时毛主席还没到陕北，也没发过指示。但“从敌人报纸上看东西”就创建出一块根据地，只是幼稚的幻想和神话。岂能用来作为审案的基础？通天政委不断地问：“习仲勋开了两次座谈会的性质，在你思想上起什么作用？从三稿到四稿有什么变化？讲素材、看稿子的人都起了什么作用？如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张秀山、马明方、王世泰、白坚都有些什么责任？”

从他提的问题来看，左倾机会主义者真得翻了案，把西北高干会也否定了。我必须予以回击：思想形成的过程源远流长，不在于一时一事。采访当然能听到许多。人们的谈话都有自己的观点。如问谁有 1942 年西北高干会的思想，依我看全部都有，因为那是党的决议，是毛泽东主席提议的，他还到场讲了话。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每天到会，不是私人集会，也不是一家之言。不仅西北干部，其它地区的干部只要不是王明路线执行者，都有高干会的思想。我在延安就听过传达，看过《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头脑里早就有了相同的思想。通天政委声调高亢起来：“高干会是高岗主持的，那是个黑会。”我也抬高了嗓门：“如果中央不主张开，别人能开成吗？难道是每天半夜里偷偷开会，没有见过报？”通天政委说：“中央主张开，可没有让讨论两条路线斗争。”“请你读读《毛选》。毛主席 1935 年到陕北，1936 年就写文章谈两条路线斗争。你知道‘七大’吗？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批判王明左倾路线。现在为什么怕提两

条路线斗争？”我一闪念突然明白过来：从苏联回来的人都说，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王、康路线”，康生是王明的副帅，所以现在康生才用左倾路线观点来压我。

我继续说：“对钱瑛、伍云甫等人的看法，是我亲身耳闻目睹了他们的言行才产生的。他们提审过我，我对他们采取轻视的态度。至于三甲原缴枪事件是阎红彦先提出来的。他既然提了出来，我就得深入研究，就得找有关人员调查，如马锡五、赵子实等。他们都谈得很具体，都说阎红彦是第一号打手。在这件事上是有罪的。刘景范和别人一样是挨打的，和马锡五一起被赶出部队的。他只谈自己经历过的事。我查过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的发言记录。阎红彦的发言也承认了自己的责任：‘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是老谢，我只是协从’。现在还有什么可以抵赖的？”通天政委问：“你在哪里看档案的？”我说：“在中央档案馆，前些时候中央档案馆造反派不是来提审过我吗？我手续齐全，为什么不可以应用档案？”

我继续回答通天政委的问题：“根据地的创建，西北干部和中央没有任何关系，派去找中央的人都牺牲了，一个也没能回来。”通天政委固执地要我承认是有了毛泽东思想才能创建根据地。我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就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全党都要执行。有执行好的，有执行失败的，也有没有执行的。最初指导西北干部思想的就是‘六大决议’。那时毛主席还没来，中央也还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通天政委指责我的书中没有处处都提毛泽东思想，是极大的错误。他的话音未落，我便把话接过来：“按现在的标准说，1942年‘七大’前大多数人写的文章都是错误的？因为那时都没提毛泽东思想，更没有引用语录。”他气得直瞪眼，但也拿不出甚么办法，这就是无情的历史。

我告诉他们：“写小说不是被动的，早就想写，只是时间问题。”通天政委说：“你的小说是高干会决议的具体化和艺术化。你的罪恶不轻，一定要交代吸收了什么东西。”“我吸收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闹革命不能死搬教条，不能违背中国的实际；不能右倾，也不能左倾；要实事求是。”这话说得有点不客气。陪审的秀才老二抬起头，放下笔说：“照你这么说法，高岗是正确的啰？”我马上反击：“不能把高岗和高干会混为一谈，没有高岗照样会开高干会。不能因为高岗出了

问题，就把高干会也否定了。前些时候，《人民日报》批判《红河激浪》时说：‘高干会是个黑会’。难道中央有新的决议吗？”只要一提到高岗，他们就硬说是为高岗翻案。我就故意问：“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是干什么的？”通天政委和在场的项目人员都不作声。他们知道如果照实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我便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提到刘少奇，也就是为刘少奇翻案。通天政委就转移话题问：“在高岗问题上，你具体做了些什么事？”“在高岗问题上还轮不上我做甚么事，我是个芝麻粒儿，最多只能对他的孩子表示一点同情，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小老虎左看右看，好不容易憋出一句话：“你还是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呢！”我回敬道：“无产阶级更讲人道主义！”

过了几天之后再次提审。这次不用通天政委唱独角戏了，所有专案人员都被动员来整装上阵。但事实上，人们早已厌战，情绪不高。还是通天政委作开场白：

“应当说，这几天有进步，但有些问题还不太清楚，你谈了些问题，我们还没来得及研究。有些问题你还未谈出来。把这两天谈的整理一下，写成书面交代。”我说：“前些时候，我不是写了个很干脆的交代，说写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党。还要怎么交代才行呢？”小老虎插话说：“那是气话，是顶撞，你应当冷静些！”通天政委又在婆婆妈妈地劝说：“要和旧思想彻底决裂，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毛主席一边，和高岗的思想立场作斗争，尽快把问题交代清楚，用实际行动争取宽大。”我不理睬他，通天政委再三说：“你的态度比刘景范差，他比你转变得快。习仲勋也有变化，都认账了。”一听就知道他又在耍阴谋了，想往刘景范、习仲勋脸上抹黑，来对我诱供。即使景范在逼迫下承认书是我受了他的影响才写出来的。那也是顺水推舟，把责任拦在自己身上，希望减轻我的压力，能把我放回家，因为我是孩子们的母亲。

53、陕甘宁边区是黑窝吗

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好，小老虎拿走了。几天后，通天政委对我说：“你写的东西我们看了，不行！你会写小说，可不会写交代。还是我们帮你写吧。”他们替我写交代已经好几次了。到写第七次交代时，他们硬要我承认写小说是受习仲勋指使。他吹捧刘志丹，就是吹捧自己，想当全国的领袖。我故意反问道：“他

怎么可能想当全国的领袖？西北领导人里要能当领袖的排起队来能排上他？”通天政委说：“那你说哪些人能排上？”我说：“有能力有威望的人还很多。比他功劳大的也大有人在。”听我这么一说，通天政委急忙追着问：“还有谁？你说！”我答道：“我说不准。掌管全国干部情况的是中央，又不是我。你们把西北干部排排队嘛！”通天政委说：“你就是钻进去出不来，还在包庇他们。陕北是个黑窝儿，没有几个好人！”这句话可真露了馅。他们的思想核心就在这句“陕北是黑窝儿”。这不仅是通天政委的想法，也是康生和中央专案组的意见。我估计得没错——他们就是碰上陕北人就打，更准确地说，碰见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工作过的人就打，碰见和刘志丹意见相同的人就打。这已经有多年了。

前年，陕西省有人来北京外调，曾向我透露：我当年采访到过的地方，项目人员都去寻踪。我采访过谁，项目人员就去找谁的麻烦。在我采访足迹到过的地方，多少人被他们迫害得伤痕累累，家破人亡。例如，陕北保安县金汤镇王家是刘志丹的舅家。刘志丹的表兄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他的儿子王悦贤只是为我去南梁采访带过一次路，就被打成反革命，毒打致残，最后实在忍受不了屈辱而自杀了。刘志丹有个堂妹不承认刘景范是反革命，被打得遍体鳞伤。庆阳地区受迫害的群众有上万人，致死者有两千多人，都被认为是“彭、高、习反党集团”黑爪牙。南梁的群众挨打的也不少。他们要斩草锄根。我的采访竟使陕北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今天，通天政委的话又激起我的满腔怒火。我反问道：“陕北真是黑窝儿，都是坏人？请你去问中央：中央到达陕北时，那里是红区，还是白区？如果是红区，就是那些“反党分子”创建的。这些坏人创建的根据地，中央来了要不要？”一阵沉默，谁也不说话，我又说：“如果你们答不上来，去请示中央。中央不解答这个问题，就无法再谈下去。”

全世界都知道，毛泽东主席是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他还没有到达之前，那里已经有了一块30多个县的红色根据地了。如果没有这块红色根据地，真不知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落脚？也许我确实太幼稚了，以为只要是真实的都可以写出来。其实不是，看来《刘志丹》一书是犯了大忌，因为那是一段不能写出来的历史。在陕北时，刘志丹已经臣服于毛泽东，听从命令听指挥，直到在战场上牺牲。虽然他没有为自己争过功劳，但有人就是不

能让他的功劳流传于世。

我默默记住这撕裂人心的统计数字：为我这本书，全国株连约六万多人。这个古今奇案究竟该记在谁的账上？

54、谁在剽窃

连续几天都在争论，他们硬要替我写上：书中写的陕甘根据地的各种政策，都是“剽窃毛主席的思想”，企图“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我说：提“分庭抗礼”是不科学的。这个提法对中央是不利的。陕甘那么个山区，怎么能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呢，这岂不是贬低了中央苏区？”通天政委说：“你们就是要贬低中央苏区，把那块根据地写得那么好，是在歪曲历史。”我不曾想到他们会这样提问题。凶相毕露了，也许全国解放后对打压西北干部和这个问题不无关系。我当然寸步不让：“我歪曲了哪一段历史？歪曲了哪一件事？我写的哪件事是假的？哪件事没出处？请你们拿出根据来！真正企图歪曲历史的人反诬我歪曲历史。中央为何听这种人的话，不加分析和调查就处理我？”通天政委气急败坏地说：“你说，你写的哪件事是对的？”“我写的重要事件完全是事实！谁也拿不出材料反驳我。”他极为愤怒：“你写的经济政策、土地政策、干部政策等全是剽窃毛主席的，把那些写在陕甘苏区是什么意思？”

难道大政治家也有嫉妒心吗？我蔑视他们这些人，就玩世不恭地说：“那你就记下来吧：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优待俘虏政策，再加上‘可教育好子女的政策’等等，我1962年写的是1935年的事，但剽窃了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政策。”这是对他们的挖苦嘲笑。在一旁的小老虎和其它项目人员望着通天政委看，那神情似乎表示：看你有什么高招反击？通天政委楞了一阵才吞吞吐吐地说：“你能记得写了些什么？写过‘可教育好子女’的政策吗？”我说：“当然记得！”我便复述了第三稿中写的情节：打土豪时，老地主跑了，游击队把地主儿子拉了来。刘志丹看见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便命令放他回家，还派人找他谈话。那个孩子说自己已是小学毕业，能看报纸，也能看书。爱看红军的报纸，觉得红军好，地主不好，他坚决要求当红军，永远不回家了。刘志丹就批准把孩子留下了，说任何人都可教育。只要愿意革命，我们就把

他留下。这个地主的儿子开始在宣传队，后来当通讯员，表现很好。讲完，我问：“这是不是可教育好子女的政策？中央在‘九大’以前有这条政策吗？”通天政委无可奈何地说：“这一条可教育好子女政策，你不必写进交代中。”我问：“其它要不要写呢？难道都是等中央有了政策，从万里之外辗转送到陕甘根据地来，才能解决问题？难道人们不能从实践中想出办法来？马克思把和他同时发现问题的人称作同行、战友，可从来没有说人家是剽窃。”通天政委理屈词穷说：“你不要给我们讲马列主义。这里不需要马列主义，我们只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原来如此，我现在对这帮人看得越来越清楚。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又连续两天论战，他们重复说教。到了1969年11月18日，又进入白刃战。我对他们代替我写的第八次交代厌恶透了。通天政委神气活现地正面而坐，其它项目人员围着他，活像众神捧着一尊佛爷，继续上演连续剧。我目不斜视地一个一个阐述自己的意见：

“第一，关于农民运动，从前我已说过，现在不得不再重复一遍。那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中国共产党未成立之前，列宁就针对中国情况说过：中国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正等待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所以中共一成立，就有彭湃、邓仲夏等人搞农民运动，继而毛泽东同志也去搞农民运动。你们可以翻阅《政治周刊》，见识见识别人的早期文章。”通天政委捂着嘴不作声，其它人都仰脸望天。

我接着说：“第二，统一战线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过统一战线问题。马克思要共产党人赞助一切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列宁在《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中说得更具体：要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最精细地，最留心地，最谨慎地，巧妙地、利用敌人中间的任何即使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中间以及各国内部，或各类资产阶级中间的任何利害冲突。统一战线问题究竟是刘志丹剽窃毛主席的，还是剽窃列宁的？”他们装聋作哑，不答话。

我继续说：“第三，武装斗争。1927年，第三国际指出：中国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难道陕北人不能开展武装斗争吗？通天政委说：“第

三国际提出武装斗争，陕北干部也不可能知道。”“刘志丹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难道就听不到党内传达？”“他们不可能听到。”“1927年刘志丹已是西北军第四路军党代表。何况西安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第二中心，住有苏联顾问。刘志丹当然可能听到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通天政委硬着头皮叫嚷：“他们就是不可能听到。”我压住火气说：“就算这样，但中国农民起义也是武装斗争，陕北有李自成起义，陕北人总能知道吧。”通天政委用无赖的口气说：“他们年纪太轻，不会知道。”“《三国演义》和《水浒》总该读过吧？俗话说，老不看三国，少不读水浒。怕老年人看了三国计谋多，年轻人看了水浒敢造反。”“那些书是虚构的小说，不可靠，不能用。”“《三字经》说：兵不伐，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这本小书是几岁娃娃念的书，陕北人总该读过吧？”通天政委张着嘴，瞪着眼问：“那是什么意思？”其实，那是我五、六岁时念过的书，从前老师是如何讲解的早就忘了。如今只有按着自己意思解释：“如果不用兵，皇帝的纲领就实现不了。不但要用兵，还得做宣传工作呢。”通天政委一听又和他的想法不一样就说：“那是娃娃书，他们不懂。”“照你这种否定一切的态度，我只有承认剽窃了？”他们硬是指鹿为马。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只能是毛泽东的专利权，如果说刘志丹等人在毛泽东文章发表以前，就领导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就是“剽窃”。对这些僵化愚昧之徒，我已经没有道理可讲。

55、我是“基督徒”

这几天，我很寂寞。钱凝也放出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独居在空空荡荡的囚室。没人和我说话，我就对着那半截窗户大声唱起《囚徒之歌》：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你要监视你就监视，我决逃不出牢监。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挣不脱千斤锁链。看守们对我唱的歌莫明其妙，也无可奈何。交锋了两个多月后有了一段平静的时候，看来专案组是回大本营和“中央首长”研究对策去了。1970年1月29日，他们又来了，这次带来了代替我写好的第九次交代。

既然要我签字，就得先让我过目。我提起笔，边看边改，把那些不实之词统统划掉，然后往桌上一放。他们几个人轮流看了看咂舌摇头。通天政委说：“你这是过筛子嘛！把组织上需要的重要内容都筛掉了，只剩下些毫无价值的东西。

这份交代是我们研究整理出来的，不能改动。你如果还是共产党员，就得听党的话，在这份交代上签字。”哼！想用共产党员来要挟，我豁出去了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惊呆了，同声质问：“那你是什么人？”“我是基督徒。”“你怎么会是基督徒？难道你隐瞒了曾是基督徒的历史？”“你们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吗？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就应该再把右脸伸过去。这就是基教徒。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用不着我多说，你们应该知道的。”这些年来，他们把共产党员的声誉都给玷污了，变成了驯服工具。在这场文革中，共产党员还得跟着斗人，打人，干坏事。我不想和他们为伍，不能在捏造的交代上签字：“那完全是虚构的，你们也在写小说，写交代能允许虚构捏造吗？”在激烈的争吵后，虽然作了修改，但我也不得不让步，保留了部分无限上纲的不实之词，因为他们搬出了“最高指示”，他们身后站着毛泽东。我再也不愿说话。我愤怒至极。

回到囚室，我高声叫，高声骂，高声笑，不想让这座大监狱把我窒息而死。此时我已搬到一楼东专业馆 104 号房，和专案组办公室对门。这样他们可以顺便监视我，不再需要全班人马值班。这时正过春节，坤娣和钱凝都偷偷给我送来桔子、苹果和点心。我把难友们送来的食物吃完，连水果皮也当茶叶泡水喝了。我需要营养，需要健康，为了斗争，我要活着。

专案人员神出鬼没的走了好多天，我得到了短时间的安宁，就动手写第十次交代。我写了很多，把第九次交代中所提的问题全部推翻了。我专门写要害问题，特别指出小说第六稿：那是最后稿，一丝高岗的材料也没用，想捞稻草的人也捞不到。请你们不要看废稿，批判废稿是不道德的，应当以最后稿为准。那稿子是你们抄家抄走的，为了迁就某些领导人的错误理论，连红军政治委员也取消了。稿子就在你们手里，如果还没有看，请你们现在看看，认真看看，看后你们会明白，整了这么多年是一场空，是个货真价实的冤假案，这笔账该怎么算？丝毫不沾高岗，能扯上翻案吗？”我想，我不提，你们就装傻，装着没有这档子事儿，只是一味地整人。你们装傻，我就要提。这些年，他们就是抓住高岗问题整人。这就是我要提的要害问题。送上去之后，通天政委批上“基本上是反驳”几个字。是的，我反驳了所有的问题。只有反驳了，我才能轻松，才能睡得安稳。同时，我提出要求下乡当农民。听说我的小女儿去了江西，两个大孩子在内蒙古

插队落户。我想和孩子们一起当农民去，脱离这个充满污泥浊水的政治旋涡。

56、拒绝“解放”

2月28日，通天政委又露了面。这回他变了花招，要我写1000字左右的认罪书，在群众中宣读，表示认罪的态度，就可以把我“解放”。当然，这份认罪书得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是为高岗翻案，为“彭、高、习反党集团”制造多中心论，写陕甘宁根据地是要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书中剽窃了毛泽东思想。所谓“解放”，也就是由他们向群众宣布：李建彤交代清楚了，现在已不是“反党分子”，是革命干部了。我不屑于这样的“解放”，宁愿继续当“反党分子”。尽管我思念孩子，想出去看看他们，但如果屈膝求饶，出去有何面目见人？我不能出卖灵魂，接受耻辱的“解放”。我仍不让步，但表面答应了，写了不伦不类的两页纸送了上去，气得他们直皱眉头，当然通不过。通天政委一说不行，我倒松了口气，便顺水推舟地说，我思想确实跟不上，不写了。他们没捞到油水，当然也就不会“解放”我。我倒觉得心安理得。谁知三天后，他们就作出决定：把李建彤开除党籍，监督劳动改造。这个决定在我意料之中，但却未给我看文件，只是口头宣布一下。直到1978年我到中央组织部申诉时才得到证实。中组部告诉我：他们已将你开除党籍了。

我照常生活，每天独自到后大门与垃圾为伍，和栅栏外捡垃圾的老头聊天。他告诉我是商业部的家属。有一次，他说：“这几天很紧张，前一天夜间机关里的人几乎都走光了。”原来这段时间正在嚷嚷着备战。到了3月，把我和本单位的几个“叛徒、特务、走资派”，包括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副院长老朱、老徐、老吴编在一个组集中学习。我们几个人能在一起很轻松，可以随便说话，因为全是戴着帽的“黑人”，谁也不会打“小报告”。有人说，上边找他谈话，动员他去江西，说苏联就要打进来了。可他老伴死也不愿离开北京，说不怕敌机轰炸。她横一下条心去找当权者质问：“要打仗了，要我们走，造反派为何不走？难道你们不怕敌人？不受国家保护？为什么只保护我们这些叛徒、特务、走资派？”

这些日子每天都听到敌人要来的消息。不知上边又下了什么命令，该走的人已被赶走或吓走了不少。造反派很高兴，又可捞一把了。见谁家往外搬，他们

就去抢房子。有个造反派到老徐家说：“把你的沙发搬到我家去。”老徐就得乖乖地给他送去，否则就要受皮肉之苦。另一个造反派跑到老何家说：“我出10块钱，把你这套沙发卖给我吧！”造反派要趁机发国难财了，好像他们不是中国人，不怕敌人来。我们这个机关里的人不少去了江西，只剩下我们4个“戴黑帽子”的人。每天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可以让我们“自由谈”。他们谈完都可以回家，只有我一个人受到特别待遇，不许出大门，还被管制着。过了十来天，三个老院长都去了江西，只剩下我这么一个“反党分子”每天关门读书，或到后院拉垃圾。

57、火车上

火车开动了，我坐在车厢里，沉默着。抬眼望去，没有一张熟悉的脸。虽然有三、四十人和我从一个大门走出去，上的同一列火车，可他们都是自由人，都有卧铺睡，唯独我没有。在这个车厢里，只有我是罪人，地位最低，因为我头上顶着全国闻名的反党大案，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发明者。坐在对面的是个穿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他负责押送我。我满不在乎，望着窗外的田野、树林、河流、山脉像走马灯似地从眼前掠过，似乎看见，又似乎什么也没看见，我沉浸在往事回忆中。几年来，他们罗致的罪状都被我一驳斥，没给留下丝毫把柄。这样一来，他们没法向康生之流交代，所以我走到哪里，他们还会追到哪里。正像那个通天政委威胁我时说的：“你永远背着包袱”。是的，这个包袱我不背谁背？我不能把包袱甩给陕甘宁的干部；甩给文艺界的朋友们，我不能对不起大家。如今，我的心非常坦荡，就像清澈见底的溪流奔腾不息，绝不夹带任何污泥浊水。

中午时分，车箱里的人都到餐车吃饭去了，我忍着阵阵袭来的饥饿闭目养神。

等到人们吃完饭说说笑笑回来后，坐在我对面的人才问道：“你吃饭吗？”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跟他一起去吃饭。这几年来，我每走一步，必须有人押着，决不会让我一个人自由行动。我便答道：“吃，跟你们一起去吃。”押送人一个叫许忠，一个姓傅，还有个叫樊再三。樊再三和我坐个面对面，我伏在茶几上打起盹来。有人在车厢里叫起来：“张霞家的暖水瓶碎了，烫了女孩

的脚。”原来是一家三口，妈妈张霞有四十七、八岁年纪，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女孩还很小，脚上烫起了大泡，哭得好伤心。我心里也乱起来，为什么要把这些孩子送到五七干校？他们可正是上学的年纪啊。我问樊再三：“他们这一家到江西落户？”樊再三对我讲起大道理来：“五七干校是劳动改造人的地方，也是安置干部的地方，将来都要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我问：“那么你自己呢？”“我是第一个报名来这里安家落户的。”他说完后招招手，一个女干部走来坐在我对面，接替樊再三的看管任务。她叫郝淑琴，40多岁，还带着个5岁的孩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让她带着上幼儿园的孩子去干校劳动？郝淑琴对我说：“你趴下睡吧，我也再睡一会儿，孩子闹得我一夜没睡好。”她和我趴在靠窗茶几上悄悄说：“别听樊再三瞎吹，他是个两面派。带家属到江西安家落户，他口号叫得最响，还受到上级表扬。最后别人都带老婆孩子来江西，他却一个也没带，落个啥户呀？”我悄声问：“他是转业军人？”“瞎扯！他是个俘虏兵，最会投机拍马，入党好几年了。这次要去当咱们的指导员。”

我趴在茶几上没有入睡，思绪飞回到30多年前。当时，我只是个十多岁的女孩子，独自坐着去上海的火车，当时确实有点胆怯。既怕上错了车，又怕丢了藏在贴身衣兜里的钱，那是我全部的学费。这是第三次坐火车去上海，就不用担心了：时刻有两个“警卫员”寸步不离地保卫我，身上只有18元生活费，丢了也不心疼，他们总不能叫我饿着肚子劳动吧，这就叫无钱一身轻。

58、在上海的回忆

在上海休息一天，住在瑞金路一个招待所里。许忠问我：“大家都要逛逛上海，你去吗？”我理解他的意思：如果我去就省事了，大家都出去，把我带着走，我也跑不了。如果我不去，那倒费事了，他们还得派人看着我。在上海只住一天，机会难得，谁不想逛逛呢？我本不打算逛上海，以免触景生情，但不能拖人后腿就说：“我也去吧！”我是1937年暑假离开上海的，到1970年4月已经33年了，再未来过，自然是变化很大。大家都要逛南京路，我也跟了去。别人要买东西，我也没啥可买，因为身上只有一个月的伙食费。我也无心看热闹，从内心说真想去看看那些熟悉的地方和那些熟悉的人，但临行前项目组向带队的人交代过，到上海绝对不允许我去见熟人。我只能在街头回忆，那里毕竟有过我青

春的足迹。

我想看看母校——新华艺专，校门口的打浦桥是法租界和中国地区的分界线。那时我们吃饭是包伙给附近的一个山东饭馆，每天由女宿舍的校役陈妈去定饭。陈妈是浙江人，很勤快，每天早晨到宿舍问大家想吃甚么，只要对她简单说一句，几十个住校女生的饭食都记得清清楚楚，一点也不会出错。我喜欢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和她建立了友情，离校时把全部行李都给了陈妈。当时陈妈已40来岁，如今该有70多了，不知她是否还在人间？还有那位传达室的好老头孙大伯，工作非常认真，每天把大家的信送到宿舍，从不误事。那时我只关心两封重要的信，都是从太原国民师范来的，一封是娟姐的，一封是君石的。他们给我寄救亡宣传材料，讲太原的抗战救亡运动。那里成了最前线，群众运动最活跃的地方。

上海美专比母校还吸引我。那里有许多同乡，学西画的、学国画的、学音乐的，我们像是兄弟姐妹一家人。我和刘伟最谈得来，1937年暑假分手后就不知下落。近年来的提审把我的社会关系翻来复去地查问，也没听说他的下落。一提这些旧事便引起我的思念，真想去看看菜市路的上海美专，但带队人决不会答应我去进行“反革命串连”。还有一位知根知底的小学同学，我更不敢去看他，因为专案组提审时曾说，他替我伪造历史。大概项目人员审过他，他没有说我的坏话。他可能为我挨过打，受过气。

在街上瞎逛了半天，回到招待所就碰到火车上烫伤的小姑娘，由哥哥背着去医院治疗，妈妈跟在后边。郝淑琴悄悄对我说：“多可怜，爸爸定为地主分子，押送回福建老家劳改去了，就剩下这么母子三人。”我问：“他们姓什么，干什么的？”老郝说：“孩子的爸爸姓赵，是工程师。妈妈张霞是会计，和我同行。男孩名叫赵小斌，初中学生。女孩叫赵小英，上小学。”我刚要躺下休息，忽然听见隔壁有人叫：“妈妈，我要上厕所！”我忙跑去一看，孩子的妈妈倒在床上，血压突然升高，起不来床了。孩子的哥哥又不在，小英双脚包着纱布。我背起小英就往厕所跑。孩子解完手，我又把她背回去。张霞感激得说：“这怎么行？你这么大年纪，还帮我背孩子。她11岁了，这么大个子！”我摆摆手走了。上火车前，小英叫一次，我就去背她一次。除了我，别人哪敢这样做呢？她是地主的“狗崽子”。我这个“反党分子”当然不怕“狗崽子”。满身是泥的人再蹭点土算得了

什么？

59、寻找小女儿

从上海起身，到江西的樟树车站下车，坐上大卡车到我们的五七干校，校址在峡江县水连镇的西南角上。到了住地，我就提出要看孩子。樊再三说：“你孩子在这里吗？”看来他们在打官腔，不想让我看她。

这些年里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就是孩子们，少爹没娘的，又都成了反革命子女。这么恶劣的环境，不知他们是怎么熬日子的？他们不给我透一点信息，把我与孩子之间的联系掐断了。两个大孩子到内蒙插队去了。小女儿索拉在什么地方？我一直不知道。3个月前，我在机关院里劳动，有人突然走过来丢给我半句话：“你小女儿走了！”我忙问：“去了哪里？”他扭过脸直摇手，有人来了，再说话就要惹祸了。孩子的行踪竟然对我瞒得如此严实，是想把我逼疯吗？我去医务室看病，托针灸大夫小于帮我打听孩子的下落。过了两天，小于悄悄说：“打听到了，你的孩子和阿姨都去江西了。有人看见他们上大卡车的。”我曾利用打水的机会，托食堂炊事员老梁师傅找孩子。他说：“放心吧，我不怕，我去打听，你家住址是西四丰盛胡同2号吗？我知道。你家从前做饭的刘师傅是我师兄，我去过你家，他们都说你家人好。”过了3天，我按约定时间去水房找梁师傅。他说：“我去过了，敲了半天门，按了很久电铃，没人开门，那房子好像已经空了。”我这才相信孩子真走了。我又借打饭的机会找到坤娣，塞给她一张纸条，请她到我三妹单位打听孩子去处。一星期后，她在食堂里塞给我一张纸条，约我到厕所去谈话。到了厕所，我们把水龙头拧开，流水哗哗响，方便我们说话。她说：“我去了你说的医院挂号看病，找到你妹妹。我说是李建彤的同学，从天津来，想看看李建彤的孩子。”你妹妹说：“两个大孩子到内蒙古插队去了，春节回来过，小女儿去了江西。”这消息再确实不过了。我就要求到江西落户。

临行前，专案组的小老虎告诉我：“你去江西，可以看孩子。你的小女儿已经到了江西。”我以为，这是他代表组织通知我的，谁知到了这里又受阻拦。我便去找许忠说：“你是带队的，起身时专案组告诉我，到这里允许看孩子，他们没有告诉你吗？”许忠迟疑一下说：“我打听一下，你孩子在哪里。”下午就通知

我：“你的孩子在犁田村住，离这里有五、六里路，你自己去找吧。”我到处打听犁田村，原来是地质部五七干校家属住的村子。“五一节”假日，我去找孩子，边走边打听，到了犁田村，终于找到了索拉和阿姨的住处。

我一进屋，阿姨和孩子都抱住我哭了起来：“你怎么到了这里？”我说：“我也是来劳动的，这样可以常来看你们了。”我久久地拉住孩子看，长高了，可是身体很弱，显然是劳动过度，营养不足的缘故。一问才知道孩子平常住在十多里外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节假日才能回来。学生劳动很繁重，别家的孩子都退了出来，在机关于校随父母劳动，唯有我的孩子不许退出来。“共大”把她当成“劳改对象”，放在“尖刀班”冲锋陷阵。所谓尖刀班，是干最重的体力活，如砍柴、担粪、扛木头、修公路。她得跟体力最棒的小伙子一起干活。我不禁一阵辛酸，她才十四、五岁，是犯了什么法，还是替父母顶罪劳改啊？当晚，我可以住在这里一夜，这也是经过批准的。

我和阿姨、孩子挤在一张双人床上。孩子平时劳动太累，躺下就睡着了，我摸着她肿胀的肩膀，偷偷流下眼泪。阿姨喃喃低语，和我有说不完的话。突然隔壁“扑通”一声，是凳子倒了，草席编的隔墙在晃动，还有细碎的脚步声。阿姨忙熄了煤油灯，趴在我耳边说：“隔壁那一家是监视我们的。她爬上凳子往这边看，耳朵贴着席墙听咱们说话呢。”那一家是地质部的一个科长，造反积极分子。这家人一住进来就对阿姨说：“你为什么不走？为什么还在这种人家干活？”阿姨说：“我舍不得孩子，这孩子是我带大的，她爹妈都走了，我再走，不通人情。”阿姨人缘好，常帮家属和村里人做针线活，大家都喜欢她，这才把日子熬过来了。阿姨保存着两个大孩子的来信，第二天早上我一封封翻看，才知道他们都在内蒙武川县，女孩干农活，男孩放马。我请阿姨写信告诉他们，说我到了江西。孩子们总算有了下落，只剩景范还没有音信。

下午，索拉要回“共大”，我要回干校，正好同路走。从犁田村到“共大”是一条土公路，大卡车不断扬起尘土，我们边走边不停地躲着来往车辆。孩子虽然长得已比我高出两寸，但毕竟还有是幼稚。她问：“妈妈，咱家到底有什么大问题？前几天，我和同学去干校，一个干部过来问都是谁家的孩子，问到我时，我一说爸爸的名字，他扭头就走，好像撞见了鬼。”我说：“别理他们，将来他们

会后悔的。你要沉住气，要经受得住任何打击，这是暂时的。”孩子说：“前几天老师和我们讨论教育计划，我问，这不是学校么？怎么我们不学习，只是劳动？大家都有同样的疑问，但学校不理我们。”学校是把学生当成劳动力了。我望望孩子的脸，从前的笑容全消失了。我问“你每天吃得饱吗？饿不饿？”“我现在太能吃，吃饱了过一会儿又饿了。”我心中在流泪，从身上掏出些粮票，还有两元钱：“你买点心吃吧，虽说这里的点心不好吃，总还有点油吧。”我拉住孩子的手看看，手上有块伤疤，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是砍刀砍的。我说：“你千万要保护自己的手，不要把指头搞断了。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弹钢琴的。”孩子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不说话，好像我在说梦话。我一直把孩子送到“共大”门口，才返回干校。

60、五七干校

我们的五七干校在峡江县水边公社曙光大队。村子很美，村口有个小石山，倒挂着瀑布。村里绿树成荫，很多大樟树，还有满山遍野的杜鹃花。村后有清澈的泉水，吃水很方便，还可以从石槽里把泉水打出来洗衣服。

我们到的第三天就开始劳动。天还没亮就吃完饭，到六七里外的坑西村去插秧。我眼睛不好，只能看见人影，看不见人脸，只能随着队伍脚高脚低地走。在过河踩独木桥时掉进水里，许忠把我拉了上来，两个裤腿都湿透了。到了一望无际的水田，就脱了鞋光脚下水。我第一次插秧，只能先看别人怎么干，然后跟着学。插得最快的是随父母来劳动的中学生。这些孩子来了近一年，别看他们平时笑呵呵的，晚上也会偷偷哭。有个叫“四贝贝”的姑娘插秧时低声说：“我认识你们拉拉，她不在这里反倒好。我在这里，简直不敢看爸爸。他50多岁了还要干那么重的活，人家还吆喝他，太残忍了。”孩子的泪水滴在稻田里。四贝贝的爸爸是力学专家、高级工程师、研究所所长。我在北京见过大字报，称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午饭时，我坐在一块木头上，四贝贝坐在我身旁，悄悄说：“我再给你添一碗饭，要吃饱。老年人干活，吃不饱顶不下来。天这么热，你用冷水拍拍头。”

日落才放工，仍排着队回村。光线暗下来了，我患白内障眼已看不清路，樊再三走在跟前，见我的脚直往路边滑就拉住我问：“你看不见路？”“看不见，

冬天五点就看不见路，夏天七点看不见路。”他很恼火，但也只能收容我这个掉队的。走了一阵子，碰上一个掉队的女干部，和我年龄差不多，身体瘦弱，让樊再三把我交给她。她和我挽起手臂一起走，自我介绍说是机关幼儿园园长，名叫舒郁，解放前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她和我有同样的遭遇，丈夫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四川，多年杳无音信。她自己也因此成了革命对象。我们两个被打到社会底层的半老太婆，在这黑夜的山路上唱起了歌。一路走一路唱，回到我们住的曙光村已是深夜。刚进门，舒郁就摔倒了。原来她全身长着骨刺，颈椎和腿关节都不方便，硬是咬着牙走路。

真想不到右派的妻子也被当右派对待。有人说，全国打了40万右派，加上配偶岂不有80万，孩子也受歧视，如果按每家两个孩子计算又是80万。160万人就这样被推了出去。这一晚，我沉浸在忏悔之中。反右派那年，我们机关有个人说“社会主义带来官僚主义。”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就和他争论，最后领导把他定为右派。他的妻子不满意，领导又把她也定为右派，夫妻双双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去了。现在想来我太幼稚，受了左的思想影响。我这一生都是挨打的角色，没有打击过别人，只有这件事是我最内疚的。

一出门碰见地质专家黄汲清，穿着一身旧蓝布中山装，在村子的小路上走来走去。我向他打招呼：“黄老，你也来啦，有人照顾你吗？”“我老伴也来了。”这样一个65岁的老专家，逼他来五七干校做什么呢？每天早晨出工前，带队人总要读那段语录“除年老体弱者外，机关干部都要轮流下放劳动”，可是只读一半就跳过去了，偏偏漏了“年老体弱除外”几个字。这就是他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我问黄老：“你身体好吗？”他说：“血压高。”“你还下田吗？”“我头晕下不了田，可能会派去喂猪。”“到哪里喂猪？”“到坑西村，和矿床所在一起。”可怜的老专家留学后回国搞地质。解放后，他抱着一片爱国心留了下来，现在却要进猪圈。面对黄老的处境，我心里沉甸甸的。这几天在稻田里，我还看见地质科学院老院长朱效成、副院长徐本光、吴俊如。他们都光着脚，卷起裤腿，哈着腰，在稻田里劳动。带队人还对指指喝喝，这些人没有一点敬老尊贤。

连插了几天秧，我让人拖着走了几天黑路，他们才发现我是个半瞎子，赶快重新安排，叫我去工地喂猪。大概因为我是中央项目管的犯人，万一走夜路摔

死不好交代吧。所谓工地，就是正在修建房屋的一块乱坟地。早先来的人正在搬砖递瓦，盖顶上梁，一排排红砖新房就要盖好了，也许我们要在这里度过余生了。我被指定去找一位名叫陈立贞的女干部。这个名字我在大字报上看到过好多次，就是没见过本人。

到工地后，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陈立贞。她见到我非常热情：“你来了，咱们一快儿干吧！这里的气候，冷天能冻入骨髓，热天会让人热得透不过气。”陈立贞拉住我往另一个工棚走，那是喂小猪煮饲料的地方。她递给我一把刀，两人对坐在一搂粗的树根墩前，她教我剁饲料。她做事灵巧能干。我问：“你从前干过？”她说：“我家在广东农村，凡是南方人能做的活，我都能干。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盖大礼堂动工挖土，我担土最多最快，人家都夸我‘小蛮子能干！’”“听说你在政治部工作？”“我原是政治部副主任。”“他们为什么斗你，是不是得罪人太多？”她很坦然：“我这个人平时也有官僚主义，评工资时有些不公平，得罪了人，到了文化大革命，吃亏的人就对我很不好。”“你有小辫子给人抓住了吗？”“当然有，1938年，我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师范念书时又集体填表加入了一个团体，没有向组织报告。这次人家调查出来了，有说是学生会，有说是三青团。现在我的问题已结案，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你爱人呢？”“早离了婚，他另找了个年轻人，梳小辫的。去他的吧！我一个人过还自由些。和他一起时什么都迁就他，把他惯坏了。”她看看我的手，哈哈笑起来：“你的手指是尖尖的兰花指，没干过农活，你可干不过我。”“我向你学习，你教我吧。我是在北方城市长大的，从未到过南方农村，只知吃猪肉，没见过猪跑。”我俩谈得很投机，彼此敞开心扉。一有人进来，她马上就闭口，低头“嘭嘭嘭”地剁菜，我也学着她剁菜。

我搬进了这个养猪班的宿舍。女宿舍在工棚里，这是工地上唯一的房子，工棚是用木板搭起来的，也有窗户，棚内用木板搭了个大统铺，可以并排睡十多个人。我没有蚊帐，陈立贞把我拉进她的蚊帐里说：“你真傻，不知道南方有蚊子吗？特别是这里曾是个乱坟堆，荒草丛生，蚊子大得像螳螂，能把人咬死。”其实，我是身不由己，既不能出大门，也没钱买蚊帐呀！每月18元生活费，吃用全在里边，还能买蚊帐？我刚躺下，旁边的女人就说笑话：“你听这里老表说

顺口溜吧：‘水边水虚，蚊子大如鸡，打上三扁担，它还照样飞。’这里的蚊子比鸡还厉害，不带蚊帐简直不能活。”她说着拍拍怀里的小男孩，又摸摸背后睡的大女孩，把蚊帐拉严。男孩才两三岁，女儿也只有十来岁，我为她难过：这么小的孩子带来干什么？不禁问她：“你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她是河北人，叫紫桂，从张家口来的。为了和孩子他爸调到一起，娘仨就来了。谁知刚到这里，丈夫就被打成了反革命。中国到底还是好人多，坏人少。今天遇上了陈立贞，我心里稍微舒展些。一到这地方，谁都知道写反党小说的李建彤来了，可敌视的眼光只是少数，大部分是善意的，暗暗同情我的。

61、养猪班长

过了不久，一片红瓦房盖起来了，像个新建的村庄。这里可以眺望公路上的汽车来往，也可遥望几里地外的“共大”。我每天上午背个筐打猪草，穿着胶鞋，卷起裤腿，穿件半旧咖啡色短袖衫，各处跑，只要中午能背回一筐猪草。这里荒地多，人烟少，有许多机关干校，如卫生部、气象局、地质部、中央办公厅等。有时遇上放牛的也都是熟人。这天碰上力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见面搭讪几句。这个牛倌穿件蓝色旧工作服，牵着条牛满山转。他是高级工程师，和黄老一样，也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老知识分子。

新房盖好后，大家都忙着搬家。这里是营编制，机关的每个小单位编为一个连，我们是最末一个连，第七连。我们这个连的人都是原来在院部工作的，包括副院长、党委书记、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副主任，还有各处室的工作人员，最老的66岁，最小的14岁。连部领导人住在一幢简易平房内，其它男男女女都搬进新盖的第一排平房。女宿舍就在第一排的两侧。我们屋内住了6个人：我，陈立贞，张霞和她11岁的女儿赵小英，电话员杨玉华，还有一个是我们养猪班的班长罗云英。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我们的饲料房。有个女人走进来，摸一摸小猪，抱起看看说：“老陈，现在大猪小猪归你管了。刚买来一筐小鸭，我专管喂鸭子。”说着拉个小凳坐下，大腿放在二腿上，抽着一支烟，从兜里摸出个松花蛋剥着吃完，拍拍腿走了。她站起身，我才仔细打量了她两眼，人长得有些怪：满脸黑麻子，厚嘴唇，一笑露出几颗大门牙，满头粗头发，宽脚、厚手，身体壮得像条牛。她一走，老陈说：“这就是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罗云英，现在她要当咱

们的养猪班长。从前我领导她，现在她领导我了。”“她没有问题？”“谁知她是什么人？出身也不好，要查起来有一大堆问题。对别人追查家庭成份，还追查海外关系，偏偏对她什么问题都不查。”“她怎么解放得那么快？”“你慢慢观察吧。她很会拍马屁，对上拍，对下压，还会造谣言。你可要小心别让她在你身上使坏。”罗云英搬进来时派头可不小，连长、指导员都来帮忙，不算行李，光吃的就不知有多少：挂面、红糖、冰糖、水果糖、蜂蜜、苹果、梨子、花生、核桃、芝麻、酱肉，罐头，把木床上下塞得满满的。

早晨起床后，她就坐在院子里吃。木炭火上架着个洋瓷小盆，大米粥煮牛奶，馒头上夹着酱肉，一连吃了4个，再吃上2个咸鸭蛋。吃完后拍拍屁股站起来嚷道：“杨玉华，和我抬糠去！”杨玉华眼皮一耷拉，一声不吭地跟她走了。她俩一走，张霞开了腔：“老陈，你都看见了，早上罗云英吃的啥？杨玉华只吃了一个馒头，一碗粥，怎么能抬得过她呢？杨玉华是病人，家里很困难。罗云英每月拿130多元钱，杨玉华每月40多元钱，吃不过她，怎么能干得过她？”老陈说：“杨玉华有病谁都知道，罗云英当然也知道小杨不能干重活。”中午回来见杨玉华坐着擦眼泪。罗云英嚷道：“杨玉华，快去吃饭，下午下河捞水浮莲。不然猪就断食了。”晚上下班后，杨玉华坐在院子里发呆。我望着这可怜的女人，很同情，她为啥受这种折磨呀？晚上乘凉时，我就坐到杨玉华近旁问：“你发什么呆？吃饭嘛！不吃明天怎么干活？”“我胃不好，吃不下。”“今天干活累了？”“干也是白干，人家向上汇报，说都是她一人干的，没我的份。”“她不是和你一块去的吗？”“人家是去当指挥的。抬糠都是我和刘义两个人干。一袋糠七八十斤，刘义是壮男人，当然不在乎。可我哪有那么大力气？下水捞水浮莲，我的妇女病又犯了，流血不止。”“听说这里有中医，你去看看中医，吃些中药吧。”“我已买了中药，但没时间熬。再说这么折腾，吃药也不管事。”

正聊着，下起了一阵暴雨，我们钻进房子里让蚊子咬。刚躺下，罗云英回来了。只见她忙着点灯生火，煮了一碗芝麻冰糖水，端着就走。老陈叫住她问：“天这么黑，外面又下着雨，你到哪里去？”罗云英说：“老樊淋了雨，我怕他感冒，送一碗热汤去。”罗云英刚出门，老陈起身，坐在我床头，对着我耳朵说：“看见了吧！这种芝麻冰糖水，从前送给我喝的，现在给樊再三喝了。”我说：“你喝了

人家的芝麻冰糖水，给人家提了一级工资。现在樊再三又该给她提级了。”老陈说：“她住在这个房里，听到咱们说的话都会去汇报。等着瞧吧，有咱们受的气。”满屋的人都在黑暗里唉声叹气：“真倒霉！”别看这个不到16平方米的屋子，也是一个社会缩影。

62、阿姨挨整

我和连部交涉争得了轮休日。该我轮休的那天正是星期日，我兴冲冲地跑去看孩子。刚进门，阿姨站在房门口冲着我大声喊起来：“你不要再来了，孩子是我的，你不要来打扰我们！”事情来得突然，我有点莫名其妙说：“我来看孩子，是经过上级批准。如果我的孩子不在这里，我可以不来。”惹得孩子哭起来，阿姨也哭，我也流了泪。事有蹊跷，其中必有缘故。我想了片刻大声说：“今天我不走了，这是最后一次。谁有意见，到上级那里告我去！”我进屋吃完饭就匆匆离开。

阿姨和孩子送我出了村，阿姨哭着说：“上次你来后，他们整得我好苦呀！开家属大会批判我，说我和你划不清界限，你来了还给你做饭吃。还有人说，谁让李建彤来的，要查后台。他们还指着鼻子骂我：‘你是个什么贫农？如真是贫农，就不会跟他们家的人在一块。应当再查查你的成分！’现在我去买菜，都有人在后面跟着，我也成了斗争对象，监视对象。”我很恼火：“这是谁捣的鬼？”“是隔壁那家汇报的，他们住在这里是有任务的。”“原来人家给你们派了特务，真卑鄙！不知是谁干的？”我想了想说：“你告诉他们，叫他们找我单位调查。我从北京起身时，专案组就批准到江西后可以看孩子。他们如果有意见，可以告到北京去。不要在家属中制造混乱。”

我把阿姨和孩子打发回去后，一个人往前走去。我的脑子里很乱，心疼孩子和阿姨。原以为我来了会对她们好些，孩子能见妈总是个温暖和安慰，没想到却给她们惹下大祸。索拉这孩子从小学四年级就碰上文革，没能好好读书。到念初中时，又遇上北京疏散人口，被赶到山里劳动。妈妈到了跟前，却又不让见面，实在令我心疼。

这次我来看孩子本来还有个打算。我从北京带了本专案人员提审时，我自己

做的“提审记录”。临行前，他们要我交出去，我只交了一本，还留了个复制本。原先在贴身内衣里藏着，现在劳动，汗水太多，只得放在枕头里，可宿舍里住着罗云英这种人，怕她偷翻我的东西，便带出来想放在阿姨这里。眼下偏遇上这种情况，这里是不能放了。这里特务很猖狂，可这本东西对我非常重要，是康生一伙倒行逆施的纪录。我将来要用它揭露他们，若没了这个本子就口说无凭了。这是个铁证，另一个同样的本子在专案档案里，到时两本一对证，就真相大白了。我沿路查看，有没有可以埋藏东西的地方。路旁都是稻田，何况这里经常下雨，不能埋在潮湿的地方。走着走着，我猛然记起前些日子有人给我捎话，说景范的外甥女随丈夫到了附近的新干县，在化工厂工作。我一想，这外甥女还是可靠的，是景范亲妹妹的女儿。1960年，我去延安采访时把她带出来学中医，在西安结婚。现在随丈夫到化工厂医务室当医生，托她办事应是万无一失。我向东走到水边镇搭长途汽车。到新干县找到化工厂，打听到外甥女。时间已不早，也没敢多说，只是把缝好的小布包交给她说：“谁也不许看，请保存好，到时候我会来取。”急忙赶回峡江县，但已赶不上长途车了。回去有40多里路，我就徒步急速往回赶。

63、养猪遭陷害

这里的“五七战士”逢年过节都要集合在一起听报告。我不是“五七战士”，只是个劳改对象，所以就成了猪圈里的长期值班人。不过也没什么难的，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别人不愿干的我也去干。每天沿着独木桥到泉水塘挑几担水，打一筐猪草，剁几筐菜，搅拌在一起，便能做成几十斤糖化饲料。再从猪圈内挖出几筐猪粪，然后一边喂猪，一边看医书，为病猪治病。平常这是3个人干的活。到了节假日，我一个人也得干。猪圈还要扩大，修短墙，需要大家去搬砖。我白天做得活多，没时间搬砖。到了晚上，等猪睡了，我再去干。我的眼睛不好，就在胳膊窝里夹个手电照路，用双手去抱砖，来回走，一晚干几个钟头，能顶有些人一天搬的量。有一天晚上，我正搬砖，樊再三来了：“哟，你一个人晚上来干活呀？小心，这里有狼。”“狼不敢来，我有手电。”我想，干什么事也得压倒你们，这是我做人的原则。这不是有意表现积极，更不是向你们讨好。总之，我把全部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起早贪黑地干，权当没有他们这些人。既来之，则

安之，把这点时间和精力用上才不愧来这里走一遭。

也许因为如此，每次养猪班分工，谁都愿意和我这个“反党分子”一起值班。连那个聪明能干、身强力壮的李正也提出要和我一起值班。有个星期天，我和李正一起值班。他还没来，我就把水都担好，饲料也做好了。他来了一看，满脸乐滋滋地说：“好！今天这样吧，猪圈里的活，你全包了。我给猪圈做个地板，免得进来两脚泥。”我当然同意，自从到猪圈工作后从未脱过雨鞋。无论寒暑雨晴，总是两脚泥水、两脚猪粪，我来江西后一共穿烂了4双雨鞋，都是从阿姨那里拿来孩子们穿过的旧鞋，特别是穿上儿子的鞋简直像两只小船，晃悠悠地走不成路，不得不在里面再套上一双布鞋。李正用小车推来木料，搭个架子，拉起大锯。我见他穿着绿军裤就问道：“你从哪个部队来的？”他笑笑答道：“我是俘虏兵。解放战争时过来的，当过营级干部。”他对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在地下室写过一首打油诗，批评领导不给专政对象吃饺子，是吗？”“我写过，被他们收去交给了中央专案组，上边又派人来审我。”“哼！审你归审你，实际上是他们做得不对。你的诗拿到革委会后，李主任发了脾气说：‘过个春节，你们都吃饺子，不给地下室关押的人吃，让李建彤写诗骂出去，好听吗？’”我原先还以为，那首讽刺诗对这些人毫无触动呢。李正高高兴兴地做成了地板，往猪圈里一放，受到大家表扬，说他做了件大好事。

和我一起值班，能沾到这个便宜。罗云英就提出：凡是她休息日就派我去替她值班。因为她是正班长，不和大伙一起值班，只管两三头小猪，单独一个小猪圈。于是，每个星期我替她值一次班，成了固定的工作安排。这家伙可真狡猾，一个星期内从不打扫猪圈，只等我去替她打扫。有一次，我作了记录，一天内出了15筐粪，抱出十来捆湿草，说明她每天只给猪喂一点食，其它什么也没干。这是个典型的两面派，表面看就数她积极，实际上她在糊弄人，那两头小猪日夜吃睡在粪堆里，哪能不生病？可她却装得好漂亮，抱起小猪往怀里一搂，跑到连部去嚷嚷：“看，我们的小猪多好，我特别喜爱他们。”樊再三表扬她：“看人家老罗，把猪当儿子呢。这就说明她的思想境界有多高。”罗云英以为让我去垫背，她的真相就不会暴露，因为我是专政对象，谅我不敢说出去，说了也没人听。可她也不傻，发现我收工后在做记录便问：“你做什么？”我推说在计算时间。其

实，我在积累证据。

有一天，我在大猪圈值班，低头剁菜，樊再三来找我，进圈就问：“这两天谁在值班？”我说：“我，我每天都在。”“谁做的饲料？”“我，都是我做的。”他伸出手给我看：“猪食槽里为什么有玻璃？”我一看，是一块枣核大的三角形玻璃。我想起去担水回来时，罗云英进来过，见了我就匆匆忙忙走了。我说：“这是老罗给你送的吧？是在这个猪食槽里捡的，那咱们就看看槽里还有没有玻璃？”我拿起木棍搅来搅去给老樊看，也是怕罗云英给我栽赃往食槽里放玻璃碴。搅了好大一阵也没找到。樊再三说：“老罗说，她是从猪嘴里抠出来的。猪吃了玻璃碴就会死的。”我明白了，她是要制造一起反革命破坏案。我心一沉，便说：“你看看，这猪圈扫得多干净，做饲料的地方连一根草也没有，哪来的玻璃？”我又指指远处说：“那边房子有一块玻璃被风打坏了，窗下有玻璃碴。咱们把猪赶去试试，看猪吞不吞玻璃碴？”樊再三往那边赶猪，猪甩着尾巴只管吃食就是不走。樊再三无可奈何地看看我，再看看手上的玻璃。我说：“把你手上的玻璃放下，看猪吃不吃？”他把玻璃放在地上，踢了踢小猪，小猪扭头走了。我说：“瞧！猪也很聪明，这种东西是不吃的。食槽里如果有不能下肚的东西都会被拱出槽外，别说是玻璃，连木头也不吃。老罗怎么能从猪嘴里抠出玻璃碴呢？是她给猪塞进嘴里，还是别人塞进去的？这可是个案子，请你好好调查清楚吧！”樊再三站了一阵就红着脸走了。我想了很久：罗云英真坏，想制造假案，但却弄巧成拙。不过，她一定不会罢休，还不知要耍什么花招呢！对这种人，我决不能轻饶，别看我背着个“反党分子”的包袱，但对付这种人也决不手软。

64、中央专案组追来了

又遇上轮休日，我不由自主地往犁田村去。自从那次答应阿姨后，我已有一段时间没去了。可我还是想去，孩子在那里，我能不去吗？上次回来，我找过许忠，提出在犁田村家属中发生的事，希望他能向上级反映，也不知解决了没有？我只管往那边走，走到村口又停下了，担心又会惹得孩子哭一场。我在村口呆呆地站了半小时，向村里望了又望，终于咬了咬牙转身向前走，一直走到水边圩。唉！看不到孩子，索性看看集市算了。集上还真热闹，有小饭馆、杂货店、修理部、邮政局、卫生院和汽车站。农民也把小猪、鸡鸭、芝麻、鸡蛋、青菜、芋头

摆在街头卖，都是自己舍不得吃，用来换钱。这里的农民很辛苦，劳动重，收入少。有些生产队的工分值每天只有两三角钱。我买了一斤黑芝麻就回去了。

从水边圩走到我们工地有八里多路。走着走着，到家已是中午，迎面碰上副班长李玄子。他绷着脸说：“你到哪里去了？”“今天我休息，赶集去了。”“以后不许你离开工地！”“我这点自由是经上级批准的，怎么又收回去了？发生了甚么事？”“中央来了人，到处找你，找不着。你赶快去，他们在第三排房子等你。”我估计他们还会来找我，到底还是来了。大概是向康生交不了差。虽然我那些“交代”是实事求是的，但不会符合康生的要求，他们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初，康生、阎红彦之流都是在这个案子上立下汗马之功的，如果定不了案，就无法向中央交待，无法处理那些被抓起来的人。果然，还是通天政委带着两个人来的，其中有个女的，山东口音。通天政委向我打招呼：“在这里怎么样？”“我这个人到哪里都一样，过得很好。”“现在中午了，吃了饭再谈吧。”“我说呢，今天的空气特别紧张，原来是你们来了。刚才我们副班长宣布，再不准我离开工地。既然你们来了，就先给我解决这个实际问题，我到底能不能离开工地？有没有轮休日？能不能看孩子？请你们决定一下，向这里交代清楚。你们代表中央，虽然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也可顶一千句吧！”通天政委满脸通红：“你对我们的态度总是这样，话中总是带刺。实话对你说，大概是因为我们来了，一时找不到你，他们急了。”“急了也不能随口出政策呀！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对我就可以不讲政策？”在北京，我和他打了两年交道，知道他是康生意志的坚决执行者。

下午开始谈，还是那些问题：习仲勋、刘景范在反党小说中起了些什么作用？还是和在北京时一样，要我写交代材料。我们又展开拉锯战。他们说，我反驳。我写，他们改；他们写，我抹掉。我提出，这本书的要害不就是高岗问题么？我的最后稿中没有高岗的素材，这又算什么问题呢？岂不成了假案？我再重复一遍：你们去查《毛选》，在1964年以前《毛选》上还写着高岗。1964年以后才把高岗抹掉。1962年提审时，我就说过按《毛选》办事。《毛选》上有谁，我就用谁的素材。《毛选》改了，我也改。这有什么错呢？通天政委说：“你总是这样绕着圈子缠。我们不说《毛选》，只说你的书。”“那就没标准了。每个国家办事

都有个标准。我们国家以往办事都以《毛选》作标准，现在怎么把这个标准丢开了呢？”“谁说不按《毛选》作标准？现在是解决你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就可以不要标准？”我又说：“50年代，在南宁会议上，毛主席说过，高岗过去还是对的，延安时我还是听他的多。我听过传达，这都是我用高岗那些素材的根据。”山东女将插话：“如果真有这个讲话，那又另当别论，我们回去查查看。”他们连这么重要的事都不知道，怎么能审这么大的案子呢？尽是浪费时间。女将说：“你的书为什么不可以改成革命小说呢？”其实，我写的就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小说，他们硬说是反党小说。我顺水推舟说：“现在把书稿拿来，我改给你们看。咱们商量着改，不出三天就能改完。”通天政委装聋作哑。他们的目的根本不在小说，而是借口整西北的那些干部。就这样拉锯了三天，把我写的东西拿走了，估计他们还是交不了差。

他们走后的另一个星期天，副班长通知我：“还是允许你轮休日外出，允许你去看孩子。”我又去看孩子，走在路上心里念叨：“孩子，你可知道，妈妈来看你的权利也是斗争得来的。”

65、遭遇雷击

几个月来，我都是和地科院原副院长朱效成一起值班。老朱已是近70岁的人了，1928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但还和我们一样担水、出粪、喂猪、打草，什么都干。老朱是山西五台山人，长得还真像鲁智深那么健壮。他能吃能睡，一坐下开会就睡着了，饭量比我大两倍，老伴总要给他寄来很多粮票才够吃。老朱是个好老头。有什么话都可以对他说，他从不出卖人。谁有难处，他就帮助谁。可是这里还是有人总要反对他，把他当走资派来整，罗云英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像使唤奴隶一样把老朱吼来吼去，而老朱却不在乎。谁叫我们碰上这个小人得志的年代呢！老朱对我特别照顾，凡遇上对我的无理批判，他事后便会安慰我说：“别理他们，也不要放在心上，和他们有理说不清。”他自己心里也放得开，1967年揪斗他时，他瞅空就找工人下象棋。工人们也乐意和他下棋，都觉得他是个好老头。

我和老朱相处两、三年了，知根知底，合作得很好。有一阵子，猪圈分成

两大摊，一部分人分到南边新盖的大圈工作，我俩只管这个中等圈。我剁菜做饲料，他提水、扫圈、喂猪。有两头三、四十斤的小猪病了。我们给病猪开了小灶，喂细饲料。我还给病猪喂大蒜炒马齿苋的药汤。老朱闻着味说：“真香，人也可以吃。”我说：“是呀，我从书上看到的，这两种东西可以治结核病，是补品。对人也有好处。”“难怪你在附近种了马齿苋，原来是给猪治病。”“这里找不到马齿苋，我到曙光村掐了一些回来栽上，都活了。老百姓管它叫大叶死不了。”正说着，突然天阴下来，一时风雨交加，老朱坐在小板凳上，我坐在木柴堆上，面前放个大洋铁盆，盛着大米稀饭煮青菜。两只受优待的小猪钻来钻去，摇着尾巴，伸着头，各霸一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看它们吃得好香，老朱说：“照这么吃法，很快就能壮起来的。”“人怕出名猪怕壮，猪一壮起来就糟了。我真舍不得它们。”眼看着雨下大了。老朱哈哈大笑：“人家都说咱连的老年人太爱猪。咱圈里生下头一个小花猪，长大临宰杀时，有的同志还难过哩。军代表说，七连的老年人太重感情，把小花猪当成了人。”“说实话，小花被宰的那天，我没到食堂买肉吃。我吃不下。”

我俩正说着笑话，忽然天空亮光一闪，我和老朱同时向两个方向倒下。一刹那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了。是死了，还是晕了？我全无知觉。忽听老朱叫起来：“猪怎么啦？”我一睁眼才感觉倒在柴堆上，忙站起来。老朱也刚从地上爬起来。一看两条小猪伸腿躺着，好像是死了。我吓坏了，出了事故，怎么交代？我忙叫：“老朱，快去报告，小猪死了。”老朱往猪圈里一查看，圈里也死了两头猪。雨稍停，老朱跑到连部报告：“死了4头猪。”一时间来了不少人，七嘴八舌议论开，是雷击了？大家查看棚顶，上面有块铁板，棚里放着铁盆，都是传电容易引起雷击的东西。再看我和老朱的脚：“你们穿的胶鞋是绝缘的，不然你俩也完了。”新闻传遍了整个工地：“老朱和李建彤差点被雷击死。”我这才醒悟过来，我是捡了一条命。倘若就这样丧命，我会死不瞑目的。我的使命还没完成，许多同志还没能翻案，他们还在受难。没有人能代替我。我的命运，是和几万条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老朱那时还住在曙光村，早出晚归。第二天照常上班，老朱一进饲料棚便对我说：“昨天下午没被雷击死，晚上回去还开了对我的批判会。”我忿忿不平：

“为什么？要是在从前，你这么大年纪挨了雷击，慰问还来不及呢。如今还要挨斗，连点人性也没有！”老朱说：“要想斗谁，啥时候也能斗，啥理由也能找。他们把我买的东西拿出来展览，无非是炼乳、点心，水果等。说我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这里摆阔气，摆老革命架子。”这么大年纪，每天干活很累，吃点食品又能算甚么罪？罗云英才49岁，壮得像头牛，每天还吃补品，谁又批评过她？

自从我们被雷击后，关于雷击的传说就多了：几里外的某干校也被雷击死了一条牛。大树下雷击死一个农民。有人说，这个地区不但是雷击区，也是血吸虫病区，还有麻疯病。有人背后骂道：“就是那些军代表坚决执行上边的命令，急着找地方把我们打发出北京。随便找块荒地就安营札寨。尽管有人反映过这里是雷击区、麻疯区。他们还是坚持在这里建干校。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家属搬来？”对这些事，我半句也不议论。可麻疯病，我倒见过一个。在水边街有个修雨鞋的老头子瞎了一只眼。我上个月去修雨鞋时，他还在。以后再去就不见了。街坊说，他的麻疯病越来越严重，送医院去了。血吸虫病患者也发现了一个，是我们那位连长，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傅。刚来时是个精干小伙子，到了天热，他的腿就逐渐粗起来，越粗走路就越慢。据说是大腿根的淋巴肿了起来。听说卫生部已派人来检查血吸虫，我们被半夜叫起来抽过耳血。我心事重重地想：这一大群孩子染上病怎么办？

66、好汉只怕病来磨

雷击没有死，我又打起了摆子，这是在雷击的几天之后。八、九月间的江西，天气正热。大家都穿着短裤短袖，有的甚至光着脊梁还不停地擦汗。可我坐着坐着冷得开始发抖，把小竹椅搬到太阳曝晒处还是冷。陈立贞过来问：“你为啥晒太阳？”我说：“冷！”“是不是发烧哟？”“不知道！”陈立贞忙去找指导员樊再三，批准我去医务所看病。医务所设在工地第二排房西侧，韩大夫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大夫。他一诊断便确定是疟疾，马上开药，开了休假条。我拿了药，回宿舍吃了药，便盖着被子躺下。人们都说疟疾是蚊子传染的。

病倒后，自己在枕头上听心脏蹦蹦地跳，心脏很弱，全身不舒服，可我神志是清醒的。我从内心感谢周围那些善良的人。从我被关押起，就是韩大夫给我看

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对我这个“反党分子”都是一视同仁，给我用的都是好药，希望我能尽快好起来。护士李青也是个难得的好人。她常悄悄对我说：“你心脏不好，心律不齐，劳动时注意些。重活不要用左手干，要减轻左边的负担。”一入夏，她怕我干活多会使血压升高，就开始给我吃“脑立清”。吃过两瓶后，我的血压一直正常。想着想着，我胡涂了，高烧到40度顶不住了。忽然觉得有人揭开蚊帐推我，睁眼一看是张霞。她给我端来一碗大米稀饭，关心地说：“少喝几口吧，不吃饭抗不过病。”我只得侧身喝了几口。

我昏睡着，副班长李玄子在门口嚷道：“李建彤，你打摆子了？好好治病休息吧！连部批准你的工作暂由别人代替，还批准你吃病号饭。”我明白这是支部书记许忠的好意。前几天，我在鸭棚西头做糖化饲料，听见东头连部办公室有人说话。连长小傅汇报说：“罗云英反映，李建彤劳动不积极，消极怠工。”许忠说：“她也是上50岁的人了。一个人每天做几十斤糖化饲料，都说她做得最好，她还喂猪。哪个年轻人能有她那么踏实？她患着严重失眠症，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脸黄得像死人一样，可白天照样干活，我们看问题应当公正。”我感谢许忠这个正派人。病倒几天，真亏大家照顾。杨玉华每天给我送开水，陈立贞为我带饭，还把她为孩子做的鸡汤偷偷送给我。

过了几天，病已好转。李青大声嚷嚷着来了：“罗云英、李玄子，我给你们病号听诊来了！”她的声音几乎能传到一里地外。只要穿上白大褂，拿上听诊器，她有权去看任何人。况且当时老护士可以代医生开药，开假条。李青揭开我的蚊帐，摸摸脉，又听心脏，量血压，大声叫道：“罗云英，李建彤的心律不齐，不要多动，多休养几天吧，一累就犯。”她顺手开了假条：“心律不齐，待查，休息3天。”放在我枕边取药去了。我心想，老实人也有老实人的心眼。她对着罗云英嚷，却不把病假条递给她，是让我直接交给李玄子。李玄子老实，会交给连部。她是怕罗云英捣鬼，罗云英的坏是全干校出了名的。李青刚走，11岁的女孩赵小英到我枕边悄悄塞进一个橘子：“李阿姨，吃吧！”我在这里有几个称呼：批判审问时直呼李建彤；一般不敢接近的人叫老太太、老太婆；有人也会在私底下亲切地叫老李。李阿姨则只有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才敢叫出口。小英这么叫使我很感动，看见那娇嫩的小脸，心里实在疼爱。这么好的孩子，弄到这里干什么？

难道他们没有念书的权利么？

67、何长工

病好后，干校派我们养猪班去参观地质部五七干校的猪圈。我站在饲料间窗前呆住了。我从窗口看着眼前那个正在剁菜的人。他赤裸着上身，只穿条蓝布裤叉，瘦得皮包骨头。地上平放着一块木板，上面有许多水浮莲和烂白菜，他双膝跪在地上，弯着腰，低着头，双手舞动着菜刀，剁个不停，背肩不停地抽动着。剁一阵，他站起来把碎菜搓进筐里，放在一边，又跪下继续剁。我见到他的侧影心里猛然一颤。那不是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吗？从前，他高大壮硕，现在怎么成了这般模样？

1967年我被关在北京地质学院第12楼。有一天，造反派通知我：“今天不许出门，院子里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许动。”我站在窗前向外望。下午两点钟，锣鼓声和吆喝声由远而近。当人群走近窗下时，见队伍最前面的几个人边敲锣边喊着：“我叫某某，我是三反分子。排在第二个的就是何长工。队伍两边是押送他们的学生。队伍在12楼门口停了下来，审判台就设在那里。只听人们大声叫喊，把何长工押上来！在此起彼伏的吼叫声中，有人对他拳打脚踢。从此以后，何长工就成了地质系统的重点斗争对象，各派群众都拉着他去各处游斗争。近70岁的人在风里雨里日晒雨淋。那些坏家伙专踢他那条带伤的腿。那条伤腿是被敌人的枪弹打伤的，是革命功勋的印记。他是井冈山下来的红军将领，为甚么这样对待他？看着眼前这个形如枯槁的老人，我内心涌起阵阵痛楚。我不能向他打招呼，因为有人曾怀疑过他支持我写反党小说，尽管那是欲加之罪。我只能默默地对着他的背影祝愿他撑过这个非常年代，千万不要在这里病倒。

我气冲冲地往回走。陈立贞走到我旁边问：“你看见没有？那个跪着的是何长工。”“我没看见！”陈立贞悄声对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瘦吗？”“不知道。”“他吃不饱呀，劳动量这么重，人家都有补助粮，就是不给他，他肚子饿。有一天，在伙房捡了一块锅巴，正在井边吃着，被一个造反红人看见了，劈脸问道：为什么吃锅巴？他说吃不饱，肚子饿。那人上去就煽了他一个耳光：你还有资格吃？把锅巴连碗都打落到水井里。”我这才明白，原来何长工是饿瘦的。他

当初参加革命，为的是让人民有饭吃。闹了半个世纪革命，自己却饿得连锅巴也没资格吃。何长工是走资派吗？他是行政五级干部，但孩子多，全家十多口人靠他的工资生活，每月勉强够吃。炊事员说，每天菜一上桌，孩子们一抢而光，老头来了只能吃白饭。这怎么能叫“走资派”呢？从何长工身上，我的思绪转向自己的老伴。他还是在北京坐牢好，否则也得到这个地方来和何长工一样受折磨。他有肝炎和十二指肠溃疡，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说不定会死在这里。眼下猪还有人保护着，中央还有关于养猪的文件，可这些老红军、老将军、老知识分子有谁来保护呢？

过了几天，地质部猪圈里又传来何长工的消息，说他病了，尿血，有生命危险，送进了医院。1962年，我被阎红彦诬告，毛主席说我写反党小说。那阵子乌云压顶，谁还敢为我说一句话？但何长工竟敢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李建彤说没写高岗。”有人就攻击他：“李建彤是抗大学生，你是他的大队长，你是包庇她。”何长工确实找我谈过话：“中央要我找你谈话，说你的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毛主席还说了话。你得有个检讨才行。”我说：“我没有写高岗，更谈不上翻案。”晚上老伴回家告诉我：何长工对他说，虽然事情发生了，现在也没得办法。你是职业革命者，一生都属于这个队伍。放心，地质部不会落井下石。还有李建彤，她也是把一生交给了革命。放心，就在地质部养着她。哪里也不要去。”老人的话使我心里踏实。在这一生中，我将永远记住何长工老人。在紧要关头，他实事求是，不讨好大人物。这种品德实在难得，但也恰好是他倒霉的原因。

68、小女儿回京

到底等来了这一天，阿姨找我来了。她先到连部说要找李建彤，经连部批准后才到猪圈找到我。这是她被逼出来的办事经验。我撂下猪食，和她走到大路上。她告诉我有人透消息说，凡是北京来的中学生都可回去复学。我有点不相信地问：“可当真？见谁家孩子走了？”她擦着泪说：“已经走了好多，就是不通知咱们。听说中央文件说，原在北京念书的中学生可以回去上学。父母有错误是父母的事，不能让孩子替父母劳动赎罪。”“这个通知还满英明的。该是睁开眼醒一醒的时候了。”

我俩走在土路上，阿姨拖着有病的身体，像要被风刮倒似的。她以前没到过南方，不服水土，蚊子一咬就变成水泡，化浓溃烂，双脚烂得没有一块好肉，用什么药也治不好。她是再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应该赶快回去，最好和孩子一块走。阿姨想问题比我周到。她说：“我先到校部直接问他们，就说听到通知了，要求也让我们孩子回北京，看他们是啥态度。我先不回去，免得影响孩子走，先把孩子弄走再说。”她说的也对，如果阿姨也要求走，恐怕会节外生枝，单说孩子的事可以减少麻烦。几年不见孩子，想得发疯，到这里虽然见面机会很少，总算还能见她，真不想她离开，但我还是主张她走。

我和阿姨反复商量了多次，决定由她出面去办，只办孩子一个人。只要让孩子走，她可以牺牲，暂时不走。孩子如能走，连行李也可以不带，用得着的东西以后再给她寄。免得带东西多了，引起有些人眼红，在背后使坏。我俩决定后，阿姨就去一个个疏通关节，也不知过了多少关口，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才把事情办成。阿姨去办交涉时，他们来了个变相拒绝。一个校领导居然说：“按政策规定，你的孩子当然可以回去。但第一你们要自己找学校，第二你们要自己找住处。公家概不负责。”这些条件，阿姨全部答应了。怕他们刁难，事先我已写信给北京的三妹，让孩子暂住她家。阿姨心中有数，学校好办。孩子已给老师写了信，老师回信欢迎她回去。只有房子是个难题，公家不给房子，她三姨家太挤了，五、六口人住一间半房，怎么挤呢？可是三妹家再挤也只得去挤。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一直到把孩子送走，她都没敢来告诉我，我也没敢去看他们，怕坏人给她出难题。她是普通群众，好办，一沾上我这个“反党分子”就复杂了。孩子走了一个月后，阿姨才来找我说：“她走了。我把她送到樟树站上了火车，还有个伴儿。”孩子走后，阿姨高兴了几天，就病倒了。我去看她，她拿出孩子的来信。孩子说，三姨对她好，她和三姨睡一个床，和妈妈、阿姨一样亲。由于她挤进那个家庭，把两个表兄都挤走了。孩子需要温暖，她在三姨身上又找到了温暖。真难为她三姨了。我三妹是个普通护士，经济上比较紧张，可现在却成了我的大后方。前几年，我的两个大孩子也在她家住过，现在最小的又去了。不但房子挤，经济上她也承担不起呀！这些人总得吃饭吧，她不知欠了多少债呢。患难之中见人心。一

个老阿姨——淑敏大姐，一个三妹真给我帮了大忙。她们处处为我和孩子着想。在这样混乱的年代，和别人比，我算是幸运的。

69、书的故事

阿姨住的犁田村，屋门前有棵老樟树，树根有两抱粗，有个大窟窿，那是个白蚂蚁窝。这里白蚂蚁的能量比老鼠还大，什么地方都能钻，从树根下顺着地缝，钻进每座房屋。阿姨怕白蚂蚁把书咬坏，让我一包包往我的住处搬。其实，书也剩下不多了。记得有《鲁迅全集》、《史记》、《联共（布）党史》等，还有一部儿子的连环画《三国演义》，用布盒装着。搬书是无法保密的，这里的人都看见了。对我来说，有书看就可以忘却一切烦恼。除了上班，睡觉外，我都在看书。有人感慨地说：“她的眼睛怎能不坏，走路也在看书。”不久，陈立贞也憋得心痒痒，向我借书看。我故意开玩笑问：“你的书呢？”她说：“都卖了！”我笑道：“你还是个政治部副主任呢，怎么把政治书也全卖了？”“不卖不行啊，人家说书太重不给托运，不卖也得丢。八角钱一斤，全当废纸卖了。”我这几本书，如不是阿姨念过几天书，是个有心人，哪能保存下来呢。最后一次抄家，抄成啥样，我全然不知。那时想，只要人活着，就是万幸。

我看书，老陈也看书。不久，猪圈里就有人通过老陈向我借书，看书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看书，当然是好事。我们把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全用上了。有孩子要借《三国演义》连环画，我就连盒子一起交给了孩子的妈妈。孩子们的精神饥渴，就让他们看去吧！谁知我们隔壁的人都被《三国》吸引住了，每天都看到半夜。连部的政治干事肖木也是《三国》迷，像疯了似地和小孩抢着看。等他把书看完了，他就在会上慷慨陈词：“李建彤在这里宣传黄色书，什么《三国》、《鲁迅全集》到处传，影响我们的革命情绪。这些书必须马上禁止！”罗云英立即帮腔：“有些人没有立场，不但借李建彤的书，还请她讲《三国》。这明明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指导员樊再三也说：“看这些书会影响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五七干校是要改造思想，看那些书有啥用？只会后退，不会进步。我提议，咱们这里除《毛选》外，什么书都不要看了。”这一阵风把大家都吹傻了。我轻轻说了两句：“谁说《鲁迅全集》、《三国演义》是黄色书？你们读过《毛选》吗？毛主席的文章中常提到这些书。”肖木想不到我这个“反党分子”敢顶撞他。不过，

他不服输，到校部告我去了。有人悄悄骂道：“两面派！他看书最积极，现在又来告状。”

我打听肖木是什么人？有人好心劝我：“你别理他。他是机关前几年招进来的临时工，只念过初中，狗屁不懂，就知道造反。他说自己成分好，是贫农，要求当造反派小头头。在我们机关里，抄谁的家都有他的份。”我问：“他抄过你家吗？”“当然抄过。不但抄，还逼着我家老头子天天去替他家扫鸡窝，清垃圾，就差没给他老婆倒尿盆了。他还对我家老头说，不要看你是外国留学生，当过我们的副院长。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你什么也不是，只能听我指挥，叫你干啥就得干啥。”这就是肖木，一个文化大革命孵化出来的怪胎。进入旧历腊月，五七战士可以回家探亲，每人一个月，轮流回北京。我是专政对象，所以没有探亲假，一个人还得干两人的活。因为人走了，猪可没走。过完春节，人们陆续回来了。沈克带回好消息，故意在连部门口嚷道：“肖木，告诉你个新闻，北京正卖好书，你知道都是些什么书吗？”肖木说：“我管是啥书？”沈克说：“你不是要抓黄色书吗？你去抓吧，北京正重印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呢，都是中央批准的，说是中国文化精华。我们回来了，该你去探亲了，快回北京抓黄色书去吧！”沈克是故意说给肖木和我听的。我听后心里高兴，肖木之流听了当然泄气，再不敢胡说了。

70、两个樟木箱

阿姨总算被允许回北京了。她有病，又不是干部，只是个保姆，没理由把她留在江西。阿姨找到我们连部说：“我要回北京，李建彤的东西没人管，你们派人去运过来吧。”阿姨要求先把两个樟木箱子拉过来，那是我们刚进城时买的，装着全家人的衣服。樊再三没理由不答应，就把这事交给了肖木。肖木自言自语说：给“反党分子”运东西，只能派叛徒特务去。他找老吴去搬。这个老头已65岁了，患有严重心脏病。我怎能叫他替我搬箱子呢？我说：“肖木同志，你派个病人去怎么行呢？”肖木气焰很高：“什么人帮什么人，年轻力壮的都是五七战士，谁合适干这个？”此时，老吴已推辆平板车走过来，用东北口音搭腔道：“算啦，我去，我去！”

到犁田村六里路，去时是空车，又是下坡路，两人边走边说不觉远就到了。回来装了两个大箱子够重的。老吴推着车，我在前边用绳子拉着，一路爬坡，真把老头累死。我说：“咱们休息吧，休息够了再走，反正是这一下午了。”我真怜惜这老头。在关押期间，听说他被整得自杀，喝了什么毒药，送医院才被抢救过来。他原是东北大学毕业生，在东北军中办过报，还是个地下党员。全国解放后当过地质科学院副院长。造反派硬说他是东北军的特务。1970年元月，被关押的人都放出去后，就只剩下三个老头和我，其中就有吴俊如。我们成了难友，互相都很关心。

如今我俩拉一阵车，坐在路边休息一阵。我说：“老吴，你累坏了吧？”他擦着汗说：“这个肖木真是王八蛋！他今天是想整我。不过，给你拉箱子，我乐意来。咱们一路走，还可以聊天。”虽然已是1971年初春，还是冻入骨髓的时候，我们穿着棉衣，累得满头大汗。我俩就在这条路上慢慢往前蹭吧。走路慢也好，能多说话，我知道他全家都搬来了。前几天，他老婆被派到猪圈检烂菜，检了一阵就晕倒了。老婆比他年轻，但也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我问老吴：“你家人口多吗？生活得怎样？”“怎么说呢？我犯了错误，生孩子太多，一共9个。”“这么多孩子，你怎么生活？钱够用吗？现在发你多少生活费？”“我是行政10级，爱人是15级，全部发下是300元。连保姆，大小12口，每人合20多元。前年就扣了工资，开始每人发12元生活费，现在发15元。我有个病孩子，先天傻子，如今18岁了还要人喂饭，帮大小便。从前我们都上班，请个保姆看她，现在没有保姆了，我们下班伺候她。”看来老吴不但在政治上有压力，家庭生活压力也不小。老吴也问我的情况：“你们那位部长呢，有消息吗？”我告诉他：“从他被捕那天起就再无消息。这年头只要能活着，就算是捡了一条命。”老吴说：“那可是一个好人，你们这案子，我想不通。你读文史多，你说说，古代有这种事吗？”我说：“有，中国古代有，外国也有。司马迁写《史记》受过刑。他揭了汉高祖的老底也是够胆大的了。古今一样，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谁权大谁就有理。”再多的话，我没敢说下去。我和老吴走走歇歇，一步步捱回去，到家已是天黑了。

箱子是运来了。打开一看，反而多了一件心事。那尊毛主席石膏像还在箱子里。那是50年代给师大附中学生讲革命故事，他们集体送我一尊毛泽东像，表

达孩子们的心意，我一直精心保存着。到了文化大革命，抄家抄完了，可他老人家还在我家坐着。1969年阿姨和孩子往江西搬，也把他请来了。但怎么放都觉得不合适，万一碰着磕着他老人家，就会大祸临头，变成现行反革命。因此，只有锁在樟木箱里最安全。她们走后留给了我，让我不知所措。有一天，我抱着石膏像回犁田村，找到村干部说：“这个主席像送给你们吧！”他摆摆手说：“我们不好收哟，对不起！”看来贫下中农也怕惹事生非。没法子，我又提回来，想了一天一夜，终于想出一个绝招。第二天上午，我恭恭敬敬捧着石膏像跑到五七干校校部，对革委会主任说：“我把毛主席像送给校部吧，放在我那里不合适。”这是毛主席像，他们不敢不收，我的麻烦解决了。

71、难以捉摸的张舫

有一天，连里的头头张舫突然到猪圈来检查工作。他走进饲料间，见我正在做糖化饲料，就绷着脸问道：“你做饲料，多少糠，拌多少水，多少菜？做好后每筐是多少斤？”我也绷着脸回答：“一桶水40斤，拌50斤糠，100斤菜。拌好的饲料每筐60斤，我每天做1200斤。”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着，干活时若不十分留心，就会给他们留下继续整我的把柄。我见过他们斗争老王，为的只是上山砍木头，扛的木头小了点，就斗得很惨。如果是对我当然更不会客气。张舫不说话，满满地装了一筐糖化饲料挂在吊秤上，然后点点头就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这个人真奸，可要小心提防。

记得夏天割稻子，张舫到地头来监督。他查看每个人的脚，看谁穿鞋，谁光脚。他见一个叫王金全的处长没光脚便吼道：“王金全，你为啥穿着鞋？你看看别人穿鞋吗？就是改不了你那旧官僚架子。”王金全吓得忙说：“我脱，我脱，”一边把鞋甩到田埂上。张舫一扭脸看见我又吼道：“李建彤，为什么不光脚？”我把鞋一脱伸给他看：“我是平脚板，光脚走不了路。”他不做声了，我又把鞋穿上。张舫弯腰割起稻子来，割一会儿又站起望望远处，大声喊道：“张霞，你为啥拉下那么远？不要磨洋工。”张霞忙直起腰说：“我头晕，今天血压高。”张舫说：“血压高，你怎不早说？别人有比你年龄大的，有比你年龄小的，就你病多。快去医务室看病。”张霞把镰刀交给肖木，整整衣服就要走。刚走出几步，又返回来说：“老张同志，请你给我开点中药吧。”“现在没功夫，晚上回去再说。”

他还是医生呀？晚上回来我悄悄问陈立贞：“张舫是学什么的？”老陈说：“他既是行政人员，又是工程师，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学的是采矿。”“他多大年纪，哪里人？”“40多岁，东北人。”“为什么有人找他看病？前几天还有人找他正骨，今天又有人找他开药。我还以为他是学医的呢？”“自学的，他业余时间学了不少东西。你也可以找他看病。”我可以找他看病？想起他那付样子，我就发怵。那张长方脸上总是皱着眉头，翘着嘴巴，样子很凶。恐怕他不会给我这个反党老太太看病。张舫检查完猪圈后，我碰上郝淑琴才猛然想起，张舫常和她开玩笑，让郝淑琴的孩子叫他干爸爸，他们之间一定很熟。我就问：“老郝，你和张舫熟不熟？请他给我看看病吧！”老郝悄声说：“等吃午饭时我和他说说。我们是老乡，他老婆和我是同学。”

晚饭后，我去连部找张舫看病。那里有不少人，我当着众人说：“老张同志，请你给我看看病吧，我失眠严重，整夜整夜不能入睡，闹得心脏也坏了。”张舫沉默了一下，可能感到很意外，想不到我会突然找上门，更想不到我会要求看病。他沉着脸像审犯人一样审视着我，我也看着他。他终于说话了：“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到哪里检查？”他说：“那我先给你诊诊脉。”他坐下给我诊脉，按了半天，直皱眉头。我看到他的表情心里直嘀咕，前次在医务室看病，李青就说我脸色像黄表纸，心脏很衰弱。张舫这次能诊断出什么病来呢？最后他说：“你们宿舍里的人我都给看过病。你的心脏最弱，老罗心脏最强。这样吧，我给你先开几付药，吃完后就到南昌医院检查一下。”到南昌医院去检查？这主意若不是张舫提出，我连想都不敢想。以我这个身份，哪能允许到南昌去？他给我开了药方。我一看全是滋补用的贵重药。

我到水边圩去抓药，凡是贵重药全没有。我又找张舫，他说：“明天有车去南昌，托司机到南昌买。”我可以把药方交给司机，可身上没那么多钱。张舫很聪明，一点就明白，见我犹豫便说：“都交给我吧，我去找韩大夫。”原来只要医务室韩大夫签字就可先借钱买药，回来报销。我吃了张舫开的药，果然睡得很好，起码睡了4个小时。再请他看，他还开药。这样三番两次之后，人就熟了，我便提出：“你能不能在药方里加点治眼的药？我的眼越来越坏，白天2米远就看不清人，晚上走路要人拉着。每次到地质部干校看电影，都是陈立贞拉着我走，否

则我就会掉进井里。”他轻声说：“我早知道。你的眼必须到南昌去检查，你自己去请假吧。我先给许忠打个招呼。”我很感谢他，又想起杨玉华就说：“老张同志，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多解除一些人的痛苦。给杨玉华治治病吧，她的病可不轻。”

“我明白，一定给她治！”看来张舫还真不是坏人。他凶相是假的，其实是个善良人。现在的人真难以捉摸。

72、去南昌

要去南昌可不容易，不但要经过连部，还得由校部批准才行。我踌躇再三决定去找许忠，看来只有他能帮我办成此事。果然，我一说，他就痛快地答应了，到校部开了介绍信。校部这次是慎重再慎重，这也难怪。我这个重要犯人如出了事怎么对上级交代？他们特意抽调了一个女干部马立娟陪我去，当然是要监视我，表面上却说她也要去南昌看病。我们走到水边圩搭上长途汽车，直达南昌后，住进一个小招待所。这是一个炎热的夜晚，屋里又黑又闷，蚊帐外有蚊子，蚊帐内有臭虫，我吃下安眠药希望能睡几小时。

小马是个技术员，30多岁。第二天一早，她对我说：“老李，我真是来看病。我到妇科医院挂号。你到省立医院去挂号，现在咱们分开走。看完病再见面吧。”看来她也无心执行监视任务。我一个人边问边走，七点钟就赶到医院门口排队挂号。医院给我放大瞳孔，检查结果还是白内障，双目晶体混浊。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只有一个办法，动手术！”我问：“什么时候能做手术？”他说：“全瞎了以后才能做。”我失望地离开医院。在南昌住了一夜，就赶早往回返。南昌该有些熟人吧，是的。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原副主任潘震亚、秘书长李士璋都是江西人，早已调回江西工作了。我们很熟，真想去看看他们，可我这个身份去看他们，肯定对他们不利。算了吧，谁也别看了。

从南昌回来后，我每天下班熬药，先治失眠，其次是眼病。否则，长期下去怕要神经失常了。把十付药吃完后，又请张舫照方子开了几付，连续吃过20付药，张舫说：“你应该再去南昌看一次！”一个月后，我又要求去南昌。这次校部的人还是让一个女干部和我同路。别人去南昌看病都不需要伴，可我去就必须给找个伴。这次同去的女干部叫陈竹君，上海人，温存和气，始终面带笑容。一

到南昌，她就说：“咱们谁也别管谁，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晚上再见。”我去眼科专门医院作检查。大夫说我有多种眼疾，未必能做手术，尽量用药物治疗。回到住处，小陈笑咪咪地等着我，说已买好票，晚上请我看电影。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居然把我当老朋友对待。这是多少年来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我感到人人都在变，总有一天会从渐变到突变，至于变到什么程度，我却说不清。

我两次去南昌，把罗云英气坏了。她到连部说：“李建彤的问题是甚么矛盾？对她能这么宽吗？”没想到被张舫顶了回去：“甚么矛盾？甚么矛盾也得看病。咱们有政策，对俘虏兵还给看病呢。”许忠也说：“有病还是得看，万一病倒了，不好向中央交待。她是中央专案组管的人。”罗云英又去找樊再三，想了个主意惩罚我：“现在正是西瓜季节，那么多西瓜皮不去捡来喂猪，还等啥饲料？快派她去捡西瓜皮。”这话提醒了樊再三，大声吼叫：“李建彤，快去捡西瓜皮！”他们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对我这个劳改犯当然可以大声吼来吼去。我背个筐就走，故意大声叫着：“捡西瓜皮喽！”先跑到六连，有人看着我发笑：“咱们领导来捡西瓜皮了。写小说的手也会捡西瓜皮！”连指导员是个老干部，见我来了就热心地大声叫：“谁有西瓜皮，赶快送出来！”各房都端出不少西瓜皮来，不用我跑路，都倒进筐里，他们是在照顾我。樊再三眨着小眼睛说：“真他妈怪，她捡西瓜皮也能捡出热闹来。”罗云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自言自语说：“时间一长，什么阶级界限都模糊了。看他们对李建彤比对我们还亲。”

73、在农家做客

阿姨走后，我又去犁田村查看剩余的东西。那些乱七八糟的箱箱柜柜锁在一间空房里。我捡了两双破雨鞋，两个破铝锅扔进网兜儿走了。顺便去看看阿姨的老熟人。女主人拉住我不让走，非留我吃饭，盛情难却，我就坐了下来。老两口很热情，女的做饭，她老公就和我攀谈起来。我真想告诉他们自己的身分是“反党分子”。老头见我支支吾吾便说：“不要怕，我们是好人，你们也是好人。”我说：“老表，你不知道情况，我可不是好人。”老头说：“我们全知道，听说有人捣你们的鬼。你老公还在北京押着。现在押着的都是好人。”老头见我不说话，就大胆说起来：“许多事都是那个老婆搞坏了，我们农民清楚。我们农民靠种田

吃饭，不怕他甚么！”那个老婆指的大概是江青，看来农民也不把她放在眼里。饭做好了，一碗腊猪肉烧白菜，一碗青菜汤，还从木桶里盛出热腾腾的大米饭。我有些不好意思，老头热情地招待我。我这个“反党分子”成了贵客，内心很不安。吃完饭，女主人还捡了一兜芋头送给我。我告辞走出村口，就遇上大雨。我小跑起来，只听后边“老李，老李”的叫声。回头一看，是女主人拿着塑料雨衣追上来。我边摆手边跑，她追上我，我披上雨衣。我在雨中奔走，心里热乎乎的。

过了几天，工地上一夜之间变了样。红砖墙上的副统帅语录被红漆涂掉了。我望着发呆。回到宿舍就问张霞：“外面的那些语录为什么要涂掉？”她悄悄说：“你现在不要问，他们不让告诉你，过些时候你就会知道的。”真有意思，个个都成了知情人，只瞒过我一个。我默默地观察，人们到处都在窃窃私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民日报》公布：今年十月国庆节取消了天安门广场的游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头一次。我猜测中央内部肯定出了什么事。又过了几天，红墙上出现了大批判专栏，是批判林彪的。原来是副统帅出了问题，说他是一贯反对毛泽东的。但过去一直说他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这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杨玉华在猪圈告诉我：“我们听了传达文件，揭发了很多和林彪有关系的人，一大串名单里还有你家老头的名字。”我突然觉得心里发冷，甚至生出了一丝怜悯。政治搞到这个地步真可怜。林彪是亲密战友时，与我们不沾边。林彪倒台了，又把我们挂了上去。其实，景范没在东北工作过。林彪到北京后也没见过面。景范是个倔脾气，轻易不愿和权贵们来往。思绪纷乱，从宿舍往猪圈走，沿着草地漫步，一步一步踏着小草走。我自己仿佛就是这小草，被人踏着，踩着，但我还是我，小草还是小草。

74、群众批判会

对我进行批判是家常便饭。有罗云英带头，谁敢不听。这是第四次批判会。大猪圈里有个值班房，里面有两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和几个小方凳。这就是会场，凡是我被允许参加的会几乎都是对我的批判会。我已听惯了他们的调门，禁不住想起以前几次批判会闹剧。

记得去年8月对我开过一次批判会。那时正是夏天“双抢”季节。在40度高温下进行抢种、抢收，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他们要求我写思想汇报，写了几年思想汇报，都是老套子了。我便写了在双抢中改造世界观。这本是应景文章，不料这个题目引来一场批判。罗云英瞪着眼，翘着嘴说：“在双抢中能改造世界观吗？你改造甚么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这么轻松？你应当改造反党世界观。不这样写，就是翻案！”“反党，是哪个阶级的世界观？”我平静地问，她答不上来。我有个对付的办法，马上写信给中央专案组，要求他们修改以前的提法，把“资产阶级世界观”改成“反党世界观”，说明是这里的新规定。这封信当然是通过干校组织转上去的。

今年3月，评比“四好连队”，别人参加评比，对我则是开展批判。又是罗云英带头，要在鸡蛋里挑骨头：“你晚上为啥不到9点钟就上床？”奇怪！监狱里也没有规定犯人不到9点不能上床。这里名曰“五七干校”，也是8小时工作制。我早上5点起床，先到猪圈，值夜班的人还未起床，为了不惊动他们，我只好从北面窗户跳进去，悄悄生火把猪食煮好。7点后吃早饭，8点又上班，剁菜。12点吃午饭，下午还要打猪草，晚上5点吃晚饭。至此，我已工作10个小时，有时晚上还加班，连续干12个小时。晚上9点前已经精疲力尽，为什么不能上床休息？即使我是劳改犯，干十多个小时也可以了。为何不让我休息？我真想骂她两句，但又不想和这种人一般见识，在心里骂道：“真是狗仗人势，岂有此理！”罗云英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问我雨鞋那么烂，为什么不买一双新的？”我说：“我穷，没有钱。”她说：“不能叫穷。叫穷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对这些人还能说什么呢？明明是你们冻结了我的工资，又不准我说个“穷”字。

过几个月又开了一次批判会，这次更离奇。有人来外调，我赶快写完交出。没想到罗云英竟说：“你为什么写得这么快？难怪你反党哩，就是因为你写东西快，有反党的本钱！”我不理睬她，她又跺着脚说：“你走路为什么那么慢？猪跑了都赶不上。”我明明有关节炎，又是个半瞎子，谁都知道。

这是第四次坐进小屋，批判我的思想汇报。这次我写的是要求解决我的问题。副班长李玄子不说话，小杨说肚子痛，刘万宾是个农村小知识分子，说话看人的眼色，陈立贞的身份不好发言，老留学生徐本光小心谨慎，朱效成总是替我担着

心，于恺是老北京大学毕业生，对批判人没兴趣。就这么一群人坐下反反复复研究我的“思想汇报”。又是罗云英立场坚定：“你要求解决问题？这辈子别想！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矛盾？”我明知自己问题不属这里解决，所以那样写是想敲一敲他们，让他们表演一下。我特别想逗一逗罗云英，大家好看个热闹。我说：“中央说过，交代了就能解决问题。”她说：“你这种矛盾交代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毛主席说坦白从宽，你又不让从宽。这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谁说我和毛主席唱对台戏，你有啥资格给我扣帽子？”“毛主席没有说过要剥夺李建彤的发言权！”我接着说：“有人是真听毛主席的话，按政策办事。有人是阳奉阴违，有人是歪曲。”罗云英满脸通红，几乎要哭出来，于恺出来打诨插科：“对毛主席的话，我老婆理解得最深。文革一开始，我老婆就说，咱们得多做几条被子，可能要全家分散了。你看，现在孩子们去插队，我俩下乡，一个人去一个地方。我老婆真聪明。”李玄子是个老实人，见于恺说老婆也插进来说：“谁的老婆都能看出这门道，家家户户有准备。我老婆是个家庭妇女，也能说出这种话。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把人都教育聪明了。”扯得离题太远，罗云英宣布散会。

75、申诉还是翻案

罗云英这些人实在欺人太甚，看来是不得不写申诉书了。我必须把通天政委的话在这里公布于众。不能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通天政委和我打过无数次交道，可是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这些隐姓埋名的家伙将来也跑不了。我写上“中央专案组老周同志”，只要能转到中央，自然会知道该给谁。我利用晚饭后休息时间趴在小床上写。一连写了两份，第二份是1971年12月12日写完的。

头一条就是要求解决问题。我虽然知道现在不会解决，但还是要求尽快解决。为了一本书已经审了10多年，人生能有几个10年？我写书时还是青年，戴上反党帽子时是中年，现在已进入老年了。你们都自称是马列主义者，这种无限期消磨别人岁月年华的作法总不能算是合理吧。我的历史是清白的，十几岁就参加革命，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难道就容不得我写的那本书？要把我的生命耗尽？你们不是再三说过：“你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这么一本书，交待清楚了，就能解决问题。”至于什么叫清楚就没标准了。去年你们来，我不是交待清楚了吗？我是按事实交待清楚了。你们表面上似乎认可了，不认可，你们不会带走交代。既然

如此，为什么 20 个月没消息？这里的基层在批判我时透露：“交代了问题也不行。‘反党分子’是敌我矛盾，不会再恢复党籍。”真是这样吗？我不相信。通天政委是代表中央的，会耍两面派吗？他怎么可以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呢？

这里的人已开始分配工作，有的到外省，有的回北京。你们不解决我的问题，还要把我最后留下吗？在北京曾这样作过，把地下室关押的人全放完，最后只剩下我孤身一个。现在又要这样吗？这里无权解决我的问题，全靠中央，也就是靠你们这些搞专案的人了。希望你们说话算话。

第二条，再次核实中央专案提出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思想是从马、恩、列、斯那里继承来的，也有发展。这是说我没有剽窃毛泽东思想，若非要说剽窃，那剽窃的只是马列主义。对我的案子不能用主观臆断。第一、二稿全是真人真事，第三稿才改为小说的。中央已再三审查了工人出版社的人，他们不会瞎编，是否调查人员瞎编了案情？小说中没有写高岗，怎会变成高岗翻案？我的最后稿在你们手中，为什么不仔细看看，还是看了不敢承认？那里连高岗的一点材料也未用。虽然这种写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有人要抓的那根稻草却没有了。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一环环地核实。至于“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的罪名，那是有人要挑拨中央根据地和其它根据地的关系，中央岂能上当？

第三条，我要求修改小说。随你们来的那位女同志曾问我：“你的书为什么不能改成革命小说。”我也曾答道：“能，现在把它拿出来，我马上就改。不就是去掉一个人物么？我早已改过了。”我还要强调：我现在准备改书，手头无稿子，希望你们给我这个条件。我曾对你们说：关汉卿不改窦娥冤，他宁愿被流放。而我呢，早已主动把高岗的材料改掉了（向反历史唯物主义者投降了），难道还不行？为什么抓住不放？那个女同志说：“因为你从前是共产党员！”既然承认我是共产党员，又承认我是改了书稿，为什么又装做不知道呢？我现在又为什么不是共产党员了呢？我还曾说：用高岗材料，我也有根据。50 年代，中央南宁会议文件上记载着毛主席说的话：“高岗过去是对的，在延安时我还是听他的话多。”她答道：“如果真有这个文件，真是这样说过，你的问题可另当别论。”

申诉书写得很长，两份总有一两万字。我还是写得很婉转。明明是申辩，证

明我无罪，还得加上“我有错误”。明知他们从上到下都不可靠，把问题越搞越糊涂，可还得说：“我相信你们”。明明说清楚我没有用高岗的素材，还得说：“从前用过高岗的材料，即使是在一个人物身上用了五分之一的素材也是犯了罪。”不这样写，问题还会升级。不过，我只说自己，绝不牵连别人。申诉书交给连党支部，请他们一级一级往上转，一直转到北京的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

过了几天，女数据员史涛悄悄告诉我：“校部领导人晁非说，李建彤正在闹翻案。”我一听就火了，翻案？根本就定不了案，谁也定不了，因为没证据！我暗暗骂晁非：“你自己刚解放，就这么左，还是个高级干部，水平太低。我见过你挨打，也见过你劳改，还以为你是个正派人呢，原来也是个没骨气的家伙。”尽管有晁非的话，但他们还不敢公开批判我，因为我的专案不归这里管。相反，张舫给我看病时说：“病好了还可以改书嘛！”可能他看过我的申诉书。他是认道理的，没有跟着瞎起哄。就在这几天，有些人就要回北京。因为中央有通知，凡是工程技术人员都可以先回北京。党政干部暂放在后边，个别的也可先回去，那就是和领导关系好，有某一派组织保着的。有一天，我从猪圈里回来，正遇上罗云英下坡，笑嘻嘻地说：“我要走了。回北京再见”。她伸出手想与我和解。我点点头，将手往后一背，她红着脸说：“你对我有意见？”我冷笑一声，扭头就走。

76、女儿来了

我是多么思念孩子。两个大孩子的下落又断了，据说已不在内蒙的武川县。到了哪里？谁也不告诉我。他们怕我和孩子通信，连累了孩子们。我接连写了两封信给江苏的弟弟，托他打听消息，但很久没有回信，也许他也失去了自由。弟弟是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战争年代，只要长久失掉联系，他就会登报找我。可是如今虽不是战争年代，我们却反而长期断绝音信，已经6年无消息了。我又写信给河南许昌老家的一个亲戚，求他打听孩子们的下落。我们30多年里仅见过一面，他不会受株连。他居然回信告诉我，已打听到两个孩子的下落，他们到了陕西，他要我放心。小女儿来信了，说仍住在三姨家，公家不给房子住。幸亏还有个三姨，否则只能倒卧在马路上当乞丐了。

几个月后又接到一封信，是阿姨写来的，说地质部终于分给他们一间小房

子，在复兴门外真武庙七栋一门8号，在四层楼上。阿姨还附上小女儿的信，说单位只给了一张床，孩子要给阿姨买床，没有钱，要我设法寄些去。这又是个难题，虽然我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30元，可是哪来的余钱呢？只好勒紧肚子向老朱借了30元，加上节余寄去40元。我翻来复去看信封，突然发现信皮是翻用的旧信封，里边有“周总理亲收”字样。我着急了：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是不是给周总理写信了？此时写信给他，他也没办法。我们这个案是康生策划下的通天大案，是在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决定的，谁也说不上话，帮不上忙。如果孩子们写信给周总理，岂不是给他出难题？他的处境也不好，听说江青等人鼓动造反派到街上贴周总理的大字报呢。我马上写信给小女儿：“我发现你用的信封上有中央领导人的名字。你是否给他们写了信？千万不能这样做，不许给任何领导人添麻烦。咱们家的事情只有用时间去考验，最终会解决的。中国人是伟大的，好人多，坏人少，要相信党，相信国家，要乐观，千万不可乱写信。”这封信，我没敢在五七干校里发，亲自到水边圩发了挂号信。信一寄出，我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一路唱着往猪圈里跑。

罗云英走了，张霞一家走了，陈立贞住进了医院。屋里只剩下杨玉华、史涛和我。我感到很久没有过的清静。两个女儿要来看我，真让我喜出望外。他们怎么会允许孩子来看我呢？我心里一高兴，不由得见人就说，我的女儿要来了！院子里像从天降下了喜事：李建彤的孩子要来探亲了。大家都为我高兴。这几天，我一下班就在院子里转悠，东望望，西望望，可真尝到望儿心切的滋味。隔壁住的三个女司机曾和小女儿索拉在“共大”同学。她们到我房里悄悄说：“老李，你不要着急。我们碰上拉拉，会帮你把她拉回来的。”终于等到一个晚上，电灯刚亮，外边就有人叫起来：“李建彤，你的孩子来了！”我急忙跑出去，见大女儿米拉和小女儿索拉提着包包，风尘仆仆地从南边大路走过来。杨玉华和史涛就体贴搬了出去说：“你们娘仨好好说说话吧！”我在小卖部买了些粗点心，和孩子们沿途买的瓜果点心，我们娘仨边吃边聊。

我问是谁批准她们来江西的？索拉说：“今年春天北京有很多干部子女到国务院送信，要求找爸爸妈妈，打听他们究竟关在哪里了？信大都是写给周总理的，我也给总理写了信。信上写：我是刘景范、李建彤的女儿，我们希望看望被

关押多年的爸爸。我妈妈李建彤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眼睛患白内障已快失明，身体极其虚弱需要治疗。请批准她回北京治病。没想到这两个要求，总理都批了，批转给了中央专案组。专案组通知了地质部的军代表。他压了很久才通知我们。办公厅的林叔叔来给阿姨透信。我赶快打电报给哥哥姐姐，让他们赶回来。我们买了些东西等着，地质部来了通知，问我们几个人去？我们把所有的亲属都登记上了，让他们随时来。这次只有我和哥哥，姐姐三个人。”我问：“你们哪有钱买东西呢？”米拉说：“取我爸爸的冻结工资。地质部专案组写个条子，就可到政协取钱。我爸的工资关系还在全国政协，我们要了200元钱，包括我和都都的来回路费。”

1962年案件发生后，景范是1963年被送进中央党校学习的，是因小说之祸受审查。西北省级以上干部被送进去不少，大都是以“反党分子”名义送去的，结业后大部降级降职分到外省基层，或在群众团体应个虚名“靠边站”。1965年秋结业，中组部把刘景范分配到政协，名义上是个普通政协委员，在那里拿工资。景范全不在乎。我问孩子：“你们看见爸爸了吗？他在哪里？”“关在秦城监狱。是穿军衣的专案人员带我们去的。说话时，他们就在旁边坐着，有十几个人，弄得我们什么话也不能说。”“你爸爸怎样了？”“很胖，但胖得不正常，像是浮肿。”米拉说：“爸爸老看我们，好像不认得了。他见索拉长得高就问：是不是有什么病？我们告诉他没有病。爸爸问：你妈妈在哪里？我们告诉他，你在江西。爸爸把全家人都问遍了。我们把每个人的情况都说了，他好像放了心。”索拉说：“我们给爸爸买了些好烟，他不抽，说监狱里不让抽烟，戒了。”米拉说：“我们给爸爸买了些吃的，点心、水果，监狱不让留。大概是怕我们买的東西有毒。时间很短，就要我们出来了。”虽然听说景范在监狱，我还是松了口气，起码他还活着。这个年头活着就不容易。

我问：“都都为什么不来？”索拉说：“哥哥急着回西安，力贞姐好不容易在三原县给他找了个工厂，要去上班。”我问米拉：“你呢，有工作吗？”孩子摇摇头说：“还没有，插队的地方开始招工，但我们政审不合格。那时大妈在陕西三原县，我就写信给她，同意我们把户口转去，我和都都就去了。可是没有工作，只能住在大妈和力贞姐姐家。现在都都刚有着落，我还没有，暂时在三原城关小

学代课。”孩子们真倒霉，出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家庭。米拉尤其可惜，她是师大女附中优秀生，作文写得不错，政治头脑也清楚，是个埋头苦干的孩子。可现在呢？我看着她的脸，已瘦得皮包骨头。

这天晚上，我们三人睡在一张单人床。我睡在中间，摸摸这个孩子，摸摸那个孩子。可我们不管说什么都没哭。我告诉他们：“不许哭，什么时候也不能哭！要顶得住，熬得过。这种时间不会长，咱们家没做亏心事，没犯法，没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刘家的孩子不能流眼泪！”米拉笑着说：“妈妈，有的人心真好。这次我们要看爸爸和你。我到政协财务科去想借点路费。那个会计老头看看我说：‘孩子，你这么瘦，有病么？’我说，没啥大病，看着弱。他说：你是不是需要钱？要多少？我说：五十块。他说：你要得太少了，至少要二百。你需要住院治疗，病成这个样子，还不说？你不好说，我们替你说。他拿起电话就找地质部专案组说：刘景范的孩子在我们这里，病很重。你们应当给她找医院治疗。你们要负责任！那边说：你给她些钱，让她自己找医院治吧。政协给了我200元钱。我们买了给爸爸的东西，剩下的做了路费。看政协老会计对付军代表的样子太有意思了。”

索拉又说起地质部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妈妈，军代表造反派占了咱家以前住的房子，但我为了头上有片瓦找了他们上百次，学校也替我说情，他们就是不理。每次我去，管事的那人看着我冷笑：你们还想过从前的特权生活呀，住得舒舒服服的。现在没有了，去投亲靠友吧！要不是三姨收留我，我只能睡马路了。多亏我又找到政协，政协总务科有个管房子的张国福叔叔，他说：我求这里的军代表给地质部军代表打个电话。那军代表还真打了电话，打到地质部秘书处。林叔叔听说是政协为我要房子，赶快拨到军代表办公室。从前军代表听说是为我要房子就不接电话。这次是军代表对军代表讲话才讲通了，给了我那间在真武庙的房子，9平方米，他们还想轰阿姨走，我说阿姨就是我家的人，现在我和阿姨都住在那儿。”我们娘仨说了大半夜。我又产生了顾虑，怕孩子在这里受歧视。我问孩子：“你们走时，地质部怎么说的？带没带介绍信？”米拉说：“我们带着介绍信，是专案组写的。说我们两个来看妈妈，是组织上批准的，叫他们不要歧视我们。”我说：“那就好，明天你俩拿着信到校部去，交给他们。”

77、孩子们的苦与乐

孩子们把介绍信交给校部，校部开恩通知养猪班给了我一天假，让我和孩子团聚。可索拉又骂起人来：“妈妈，你们这儿真有混蛋，我们从校部回来时碰上个大胖女人，用东北口音冲我叫：喂！孩子，你爸爸判了几年刑？我说：我爸没判刑。我刚看过爸爸，又来看妈妈。她几乎跳起来说，你还能看爸爸呀，谁批准你去的？我说：周总理，我给周总理写了信，他就批准我去看爸爸了！她把眼一瞪：你还敢写信给周总理？我说：写了，他也批了。那女人转脸笑起来：这孩子真有本事，还敢给周总理写信呢！变脸变得真快。真他妈势力眼！”正说着，女司机三宝宝、四贝贝、小丽丽都跑了进来：“我们知道她是谁，那个半老婆子名叫廖胖子，当年还是一片组织的打手呢。”四贝贝大声骂起来：“文革中，那王八孙子可坏啦，不知把我家抄了多少次。我父母不知去向，吓得我跑到姨家，姨家也是大门紧闭。我姨父是高级工程师，听说被打得全身连一块好肉都没有了。我又跑到舅家，舅舅也是高级工程师，被造反派拉走就不见了。我只得在街上流浪，每天回家找一双旧皮鞋拿到街上卖破烂。卖一次能吃两天。直到把我家的破烂都卖完，爸爸妈妈还没有消息，我就成了野孩子。”

四贝贝嘎嘎笑了一阵又说：“阿姨，我们和拉拉都是患难朋友，在共大时住一个屋子闹翻天！”小丽丽说：“拉拉，你不在这里还好，要在这里也受不了那些气。去年还贴我爸妈的大字报，硬说他们是叛徒特务，还说他们通敌。通什么敌呀？我爸是从老区当八路军出来的，我妈是个学生。他们造谣，我妈吓怕了，和我爸分居了，谁也不敢到谁房里去。只有我在中间给他们送吃喝的。我妈买块瓜也让我给爸送去。我爸买根油条又叫我给妈送去，老俩口真可怜！”三宝宝说：“我爸挨着打还让我学理论，学马列主义，可我学了几年觉得和我家的事对不上号，和咱五七干校的事也对不上号，越学越糊涂。现在我拿起书就打瞌睡。”四贝贝说：“拉拉，甭理他们，明天我出车，把你们姐妹俩拉上到峡江县城兜兜风，然后到新干县转一转。”几个姑娘叽叽喳喳笑一阵就坐不住了，扯上索拉去拉手风琴，又唱又跳。第二天我去猪圈路上碰见“合理大个儿”。他笑着说：“你的孩子手风琴拉得不错，不愧是你的孩子！”此人是我的专案人员，“合理”二字是口头禅，因此我叫他“合理大个儿”。去年他也来了这里，经常碰面但从来没打过

招呼。今天听小女儿说和那个大个子玩得很好。一切都变了，也许人们都在思考，都在变，先从群众中变。

两个女儿在这里住了几天，米拉急于动身回西安，希望能尽快找到工作。索拉不走说：“妈妈，我是来接你的。听林叔叔说，地质部已经通知五七干校，让你回北京治病。这里拖着不办，我就在这里等着。什么时候有了眉目，咱一块回北京。反正我已初中毕业，咱家这样，又没有上高中的资格。我就在这里等你吧。”为孩子升学和工作的事，我心里又是个疙瘩。我请假和索拉一同去送米拉上火车。米拉走后，我和索拉在樟树镇住了一夜。天没亮就起来了，搭船到新干县。我们头一回坐船游赣江，江面又宽又静。我们在江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旷神怡。回到五七干校，我和索拉两人住一个房，够宽敞的，但还是睡一张床，孩子要和我说话。母女分离这么些年，她有多少话要对我说啊！

孩子未来江西前，我早已向校部提出要回北京治病。校方答复说：我们看过你的病历，同意你回去，正在请示北京，等北京有了回信，你就可以走。孩子们说：“通知早已下来两个月了，他们就是不让你走。”有一天，风流打字员廖凤婷来我屋里说：“你有这么好的女儿呀真是福气。依我看呀，你也该走了。这么大岁数，眼又不好。你每次出去看电影都是陈立贞拉着你走。错走一步，你就可能滑到井里。前天还听人说，你到校部走了一趟，回来天黑了不见路，一会儿走上坡，一会又走下坡，就是走不上正道，是有人把你拉了回来。”我嘲弄地说：“你倒消息灵通，是什么人把我拉回来的？”四贝贝听见廖凤婷在屋里说话就在外边喊：“拉拉，狗拱了你家白薯锅，快出来撵狗！”索拉爱吃白薯，白薯收获后，我就买了50斤，天天用阿姨留下的破锅煮一锅。可今天我还没煮白薯，四贝贝是借题发挥轰廖凤婷。这招还真灵，四贝贝一喊，那女人站起就走了。四贝贝进门大声嚷嚷：“这廖凤婷不是个好东西！说我思想有问题，爱和拉拉玩，和你家划不清界限。她说，‘反党分子’家的孩子就那么香？整天混在一块儿又唱又闹的。廖凤婷是个特务，甭理她！”

国庆后组织去井冈山参观，我让索拉跟着去了。回来后，索拉给我担水，从后泉池担回小屋，摔了一跤。这下就病倒了，发烧尿血。我慌了手脚，带她到水边镇医院化验，诊断是急性肾炎。我只得催她快回北京。我到校部去催问：“我

能不能和小女儿一块走？”他们说：“上级还没来电报，你不能走。”我说：“那就让孩子先走吧，她已经病了。还得借些路费给她。”他们同意从我的“冻结工资”中借出200元给孩子上路用。索拉的离开给我的失落感比预料中的要强烈得多。

78、回到北京

据说4个月前中央就已同意我回北京了，可这里的军代表还是压着不让我走。校部的晁非说：“李建彤正闹翻案，让她走了影响不好。”军代表老张说：“李建彤的案子最大，是劳改对象。放她走了，这干校还办不办？都得闹着要走了！”原来他们是怕我走了稳不住军心，那我只得等着。不过，我还是常去催，到校部去问晁非。他说：“还是得等上边的通知。我们已经去了几封信，北京都没有回信。”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明知通知早就到了，可他们还在撒谎。这样就到了12月。

一天，有汽车到新干县，我搭车去买中药。结果在车库上车时不小心跌进了一米多深的洋灰池，摔伤了腰，不能动了，几个小伙子把我拖了上来。那个姓张的军代表正好碰见。他有点心慌，连忙说：“让李建彤坐前边，派个护士跟着去，一定要拍个片子。”护士陪我到了新干县医院，拍了片，买了药，然后回来。我从胸部痛到腰，疼得钻心。刚躺上床上，史涛就跑来说：“张代表让我通知你，明天回北京。”“什么时候通知的？”“你们去新干县的车刚开出去时。”“今天上午他还说上边没有通知，两个钟头后就接到了通知啦？”“你走后大家都在议论，幸亏你是摔了腰，如果是摔了脑袋，可要脑震荡了。那可是个大事故。那是个水泥井呀，你又是个半瞎子。”听她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后怕，我在这里几乎已死过三次了。吃午饭时，张代表又来了：“李建彤，你快准备，明天就回北京。”我“嗯”了一声，心想大概你害怕了。上边叫我走，你压了我半年，如今看见我摔成这样子，怕不好向上边交代，一个劲地催我走。史涛说：“既然叫你走，你就快走吧！明天有车去樟树，气象局有两个干部搭咱们的车，你和他们同行，他们还可以照顾你。至于东西就别管了，一切都由我收拾，你走后我替你托运。你快走吧！以免夜长梦多。”第二天，我只提了个装日用品的手提包，就离开了这块3年来流血流汗的土地。

回程还是从樟树上车，经杭州转上海，再回北京。这次是我一个人，可已成了残废，想看看旧人旧事已是力不从心。在上海换车只有两三个小时，我不打算住旅馆，叫了辆三轮车拉到老同学颜世庚家，我们是孩提之交。几十年不见，他与从前判若两人。生活的折磨使他老了，消沉了。他们父女俩都很热情，但没敢多说话，说曾在南京路上看过写我的大字报。看来他已知道了一切，什么也不用说了。我明白，他为了我的事也受了不少牵连，此时不好多说。他搀扶着我，默默地把我送上车厢。在车上，我不能自己去买饭，上厕所，只能忍着刺骨的疼痛，坐在硬梆梆的座椅上，多亏同车厢里那些陌生的年轻人帮助我。天黑下来，窗外一片漆黑，我只能趴在小桌上打瞌睡。哪能睡得着，心里总有许多事在沈思。

第二天晚上到了北京。车一停，年轻人把我架下车，阿姨和索拉就出现在面前。索拉说：“还有李宁阿姨也来了！”我的老友李宁是个作曲家。这年夏天，孩子初中毕业后不能升学，也不让工作。孩子5岁开始学钢琴，阿姨想让她继续学音乐，却求教无门，钢琴也被没收了。我写信教她们找到了李宁，在她家里练钢琴，还有李宁的辅导。李宁也常来看孩子。听说我要回来，她不避嫌就跑来接我。阿姨雇了辆出租汽车把我们送到真武庙，他们3个人把我架上四层楼。阿姨和索拉住的房间不到10平米。听说我要回来，地质部又给了一间15平米的房间，铺了张大床。这天晚上，我和李宁就在这里休息。我们在延安时就住过一孔窑洞，睡过一盘炕。事隔30多年，我们又可同床私语了。

李宁已45岁了，还是那么单纯，除了她的音符之外，很少看其它书。对许多事情都有疑问，但又找不到答案。这次和我住在一起问这问那的。我们关了灯悄悄说话。她贴近我的耳朵问：“你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呀？我的那一位（刘迅）也被抓进去了。”“他为什么被抓去的？”“因为和天津艺术界的关系，说他参加过什么黑会，还攻击过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真纳闷，他们究竟要搞什么名堂？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说：“借用无产阶级的名义去干坏事，是卑鄙无耻之徒。咱们不信那一套。”“我也这么想，就是不敢说。”我问李宁：“咱们的老朋友你都见过谁了？”“因为那个名演员瞎咬，很多朋友都被一个案子捆住，谁也说不清了。我也就看不到他们了。”“她咬些什么？”“也就是议论过那个人（指江青），说得多了，就说出祸来了。”“咱们那位老大哥（朱丹）爱交际，谁都

是他的朋友，难免鱼龙混杂。”“从前他把那位名演员当朋友，什么都聊。运动一来，她就乱咬，咬了一大堆，成了个反党集团，把天津的朋友也卷了进去。她没骨气，也很幼稚。”

79、小脚侦缉队

回家的第二天，阿姨就对我说：自从搬到这里之后，街道和派出所常来查户口。可能是往这里搬时，有人对这里交代过，说咱们家有问题，他们就把咱家当反革命家属对待。咱们对门儿住了一家工人，女的是家庭妇女，是‘红五类’积极分子。只要有人敲咱家的门，她就跑出来看。如果让我们碰上，她就说：“我听错了，以为敲我的门呢。二楼一位干部家属是街道干部。凡上楼来的人，她就派孩子跟着。看是否到咱们家，有多大年纪，穿的啥衣服，梳啥样头发，是男是女都要汇报。街道主任是个小脚老太婆，更是左得邪性，连我搬进来都要盘查。这里户主写的是孩子，街道硬要把我撵走。我说，我跟孩子到江西，又跟回来。从小把她带大的，我不能离开她。那老太婆说：当阿姨不是正当职业，应当解雇。孩子和她吵起来：我阿姨不是雇工，我没给她工钱，不知道什么叫解雇，你到地质部打听打听，看我有钱雇人吗？阿姨是我们自己家里人，她不能走！”真是难得的好阿姨。自从我们工资被冻结之后，再没给她发过工资，她坚持不走，要对孩子负责到底。生活费不够，她就拿出自己积蓄贴补。

阿姨接着说：“咱们家来的人都要报户口，马上就得报。”我临去江西前要求带户口走，专案组小老虎说：“别人都没带户口，你也不用带。”因此，我的户口还在北京，但阿姨说还可能有人来查户口。果然刚睡到半夜，有人把门敲得“通通”响，像土匪抢劫一样实在难听。阿姨赶快起来开门，横着进来3个大汉，板着脸问道：“你家来了什么人？我们要查户口！”阿姨拿出户口本，我从床上坐起来问：“你们要查我吗？我刚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名叫李建彤。你们看户口本吧！”他们翻了一阵说：“你是中央监察部的？”“对，我是监察人员，专门监察坏人坏事的。”他们楞了几分钟悄悄溜走了。我心里好笑：一个中央监察部就让他们吓跑了。这些人也真愚蠢，其实监察部早已撤销，只因当初派出所疏忽，没及时把我的工作单位改成中国地质科学院。从此以后，他们再没来查过户口。

索拉的一群小朋友，都是没有工作的“黑干子弟”，经常来找她玩。有4个女孩子是同龄人，都穿蓝布制服，留着长发，说说笑笑，引起积极分子们的担心。二楼的街道干部来找阿姨：“你们孩子的朋友为什么都穿蓝布制服，留长发？”阿姨知道蓝布制服都是赵小燕的妈妈留下的。小燕妈是13级干部，某机关党委书记，文革中被整死了。他爸也被管制，两个哥哥插队落户去了，只剩下小燕一个人。她便把妈妈的衣服拿出来给小朋友们分着穿。4个孩子中除索拉和小燕外，另外两个也是家中有问题的孩子，其中一个的爸爸还在坐牢，他们都不许上高中。这是最使阿姨伤心的，又不能说出口，只得对街道干部说：“现在不是讲艰苦朴素吗？孩子们穿的都是旧衣服，捡妈妈的破烂。那长头发是老师叫留的，他们都是学校宣传队演员。”三说两说就把街道干部给打发走了。

又有一个晚上，孩子睡熟后，阿姨把我叫到小房间，要和我谈心。出乎我意料之外，她谈的不是家庭琐事，而是国家大事，她怕我在江西什么都不知道。她说，北京人都在反对那个女人，骂得很难听，说事情都坏在她身上。有一次，索拉也跟着骂，我连忙捂住她的嘴：不许乱骂，你要惹祸的。”阿姨的担心是有道理，她怕孩子们惹祸。我知道孩子们的情绪，但无法向她们解释，只能禁止孩子们议论国家大事，不许随口乱说，真怕她们惹祸。

80、中央专案组找上门

中央专案组消息真灵通，我刚到北京没几天，他们就找上门来了。这次来的是两个军人，一个是早已熟悉的胶东大个子，几年前就打过交道；另一个中等个头的胖子，河北口音，自称姓王。这天来是审问马文瑞的情况，还想要从我口里套口供。过去几年我写的材料，他们都不满意，没有达到给马文瑞定罪的目的。显然他们虽把马文瑞定为“习、马、刘反党集团”成员，证据却不足。他们想利用我的小说做文章，但每次我都写上：“马文瑞说，写小说不能用高岗的材料”。这句话就打破了他们的企图，定不了为高岗翻案的罪名。

这次他们仍想靠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我，写出使他们满意的交代。我照旧写上：“马文瑞说，不能用高岗的材料。”他们冒火了：“不行，这句话不能写。”我放下笔，盯了他们片刻说：“这句话我写过无数次，你们拒绝过无数次。这哪里

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难道也是毛泽东思想？马文瑞确实是这样说的嘛！”胶东大汉开腔说：“审查了你几年，你就是不觉悟。按照马文瑞的思想，他决不会这样说。我们要的材料中不能有这句话。”我说：“我的觉悟再提高，也不能高到伪造的程度。话说到明处，将来出了问题，你俩要负责。”姓王的插话说：“中央要的不是这些，而是真正的东西。”“我写的就是真正的东西，如不是真东西，我不会每次都这样写。”胶东人说：“不行，我们就是不允许你写这种东西。”看来他们是要顽固到底了，也许是康生逼着他们来完成任务的。

我脑子一转，换了一张纸，我没写那句话，但在该写的地方用钢笔点了个蓝点。蓝点就是证据，是他们逼我删掉那句话，有朝一日，我会要求有关部门去寻找那个蓝点儿，证明中央专案组是有意陷害马文瑞。七年之后，我的小说得到平反。我向中央组织部控告这件事，他们果然查到那个蓝点儿，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郑平山撤职了，他当时是专案组长。那个姓王的军人在我的破书柜上找来找去，好像担心到我家抄了几十次，还没抄彻底。他从孩子们的书中抽出一本旧“新华字典”，封皮上写着“刘米拉”三个字。他问：“刘米拉是谁？是哪国人？”真让我又好气又好笑，搞了几年专案连我家的人名都未弄清。我冷讽热嘲地说：“刘米拉是我的大女儿，不是外国人，不要以为我里通外国。我从前是搞音乐的，所以我的孩子们都是用音符取名 36、11、56，大女儿米拉，儿子都都，小女儿索拉。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他们有点窘迫，赶快夹着皮包走了。

刚回来几天，就遇上这么些不愉快的事。看来他们决不会放过我。我想还是治病重要，准备应付持续的逆境。我到人民医院，内科、外科都检查了，最后确认是胸部和腰部肌肉撕裂。大夫开了很多药，连吃带敷。我卧床治疗，又有不速之客敲门，说是来看房子，要搬进来。阿姨把老林找来。他是地质部老人，是可信的。我请他说服管房子的人不要把陌生人搬进来。几年来，这是我和老林第一次见面。我向他打探景范的情况：“1968年 he 被捕，到底是骂了谁？造反派说，他骂了党中央，毛主席。我不相信。”老林说：“他骂的是康生。不过上边不让向外说。”我明白了，他们是撒谎。老林又说：“听专案人员说他在监狱里不老实，顽固抵抗。专案人员说他这是流氓行为。”我一听就生气，决不许如此诬蔑景范！

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世上最老实最坦率的人。我冷冷一笑：“哼，流氓！中国的流氓多得很，真正的政治流氓是谁，将来自有公论！”我的心难以平静，从这天起又彻底失眠了。

81、孩子们去探监

一天下午，新邻居搬进来了。一个 30 多岁的年轻妇女，挺秀气，一口东北话，突然到我屋里说道：“阿姨，我们搬来了！”我从床上坐起来问：“你们是谁家，几口人？”“我们姓于，我是儿媳妇，爸爸、妈妈和奶奶都来啦。我爸是 1930 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你们能谈得来。”“你们从哪里搬来？”“五七干校，我爸快 70 了，妈妈比他还大 4 岁，奶奶 95 五岁了。”“他们 3 个都下五七干校了？”“是呀，要我爸爸去，就得把我妈、奶奶都带去，用担架抬去的。90 多岁的人连自己都顾不住，还到干校受罪。”我心想，这不是造孽么？90 多岁的老奶奶还用担架抬上去五七干校。于家媳妇说：“我们也是全家都受害呀。我丈夫在总后被关在牢里，全身打得没一块好肉。我爸是从苏联回来的，在苏联挨整，回中国又挨整。”看来他家和我家是同病相怜。两家人不熟，心却已熟了。

听说从 1972 年起，很多家属都可以探监了。因为有人向毛泽东告了状，说监狱对犯人实行法西斯专政。我是被定为习、马、刘反党集团干将的，不许探监。习仲勋和马文瑞的夫人和孩子都已去探过监。从 1968 年 1 月 8 日我和景范被分别关押后，五年多了再未见过面，也不能通消息。1972 年后，孩子能探监了，我便写信给两个大孩子，说想见他们，想让他们去看爸爸。信寄出后，我就病倒了。这次患的是新病，诊断为植物神经紊乱，时常晕倒，不醒人事。不能抬头，也不能低头，还不能看书看报，就连洗头都得仰脸躺着让孩子给洗。睡觉只能仰脸向上，或向右侧转，如果向左侧一转就觉得天旋地转。但我并不糊涂。米拉和都都终于回来了。我顾不上问孩子在外的遭遇，只催他们赶快去探监。索拉把给周总理的信送到中南海西门，要求看爸爸。三天后，那个胶东人和姓王的军人来说：“你们要求看刘景范，可以准备好，后天到宽街交通部对面等，我们用车送你们去。”既然我回来了，就要给景范买足东西，向机关专案组又借了些冻结工资，给景范买了一套新棉衣，衬衣衬裤和袜子，还买了吃的点心、麦乳精和苹果，做了一罐陕北人吃的干揽肉馅拌饭吃。我想让他知道，我已回到北京，让他放心。

孩子们探监回来说：爸爸牙疼，满口牙都摇动了，咬不动东西，只能吃酱豆腐。他的毛巾全烂了，下次去要带两条毛巾、一双布鞋。1968年家里给他送的棉衣只穿了几个月就被没收了。后来向他们要，说是都交了公。干揽肉馅又带回来了。监狱有个女人专门检查食品，说这东西不能留。苹果也带回来了，爸爸的牙咬不动，监狱不准用刀子削。我没敢在孩子面前说什么，心想全部牙都摇动了，这明显是营养不良，但有什么办法呢？坐了几年牢，不知会把人整成什么样呢？两个大孩子陪我去看过病，三妹也费尽了心力，总不见好。在北京认识的中医又不好去找，怕给人家增加政治负担。我只得写信给南昌中医院的陈茂梧老中医，把病历寄给他，求他开个方子。他真好，给我寄来药方，我托人去配好，吃了几天，就逐渐见效。半年后就全好了，又能看书读报了，心情有点舒展。

到了1973年夏天，我开始焦急。这半年来景范杳无音信。有人说，他换了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托邻居老于打听。他也听说景范换过几个监狱，有人在秦城监狱见过他。又有人说，把他转到了政法干校。我和阿姨就到政法干校周围散步，边走边观察。走了几圈，只见大楼不见一个人。我心里不安，只好托地质部专案人员去送东西。他们虽然都提审过我，但也因此熟悉起来。我们买了衣物、毛巾、布鞋和水果罐头、麦乳精。阿姨去找专案组的憨厚老三，请他给景范送去。憨厚老三告诉阿姨：“夏布衣裤不能带，水果罐头更不能带。监狱里禁止有玻璃铁皮之类的东西进去，防止犯人自杀。”听阿姨回来一说，我就说：“能送进什么就算什么吧，请他拿个刘景范的收条回来。”憨厚老三果然送去了，也拿回了景范亲笔写的收条。我这才放了心：他还活着，仍在原地。他也会知道，我仍在北京。

刚把对景范的担心放下，又听到马明方的消息。知情人说：康生、江青把迫害干部的中央专案组分三个办公室：中央第一办公室专审党政干部，我这个案子就属于“一办”管。中央第二办公室专审军队干部。中央第三办公室专审叛徒、特务，明方属于“三办”管，这个办公室设在公安部。明方曾被关押在政法干校。虽说是学校却和监狱一样，只是因为监狱都满了。这个混乱时期到处关着人。北京城内有，东郊、西郊、南郊、北郊也都有监狱。此外，有些学校也改成了监狱。许多单位都有自己的小监狱。秦城监狱是从前关押高级战犯的地方，现在却变成

关押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地方。我和阿姨又一次去政法干校周围转悠，想碰运气看是否能得到马明方的消息。听人说，他有病，神经受了刺激，每天喊着：“我没问题，我不是叛徒！”这些消息对我来说都是钻心刺骨的。当年我采访过他，专案组也不止一次地提审过我。他是东北局第二书记。他的问题有一部分是受我牵连，有一部分是康生、毛远新等捏造说新疆狱中出来的都是叛徒，明方被诬蔑为叛徒首领。我的书株连的人实在太多，使我的心像被撕成了碎片。我在河边走来走去，却始终没见到他。后来又听说，明方进了医院，是保外就医，仍有人看管着。再过些时候，听说明方死了，他是含冤而去了。我的心碎了，又失眠了。明方的笑脸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和他见面虽不多，但他对我诚恳坦率，把我当成自己人。我永远记住马明方这位良师益友。

82、营救景范

1973年听到个好消息，说周恩来总理去了延安，在对延安的干部讲话中说：刘志丹同志是好的，是英雄人物。周总理说：1936年东征抗日时，我和刘志丹同路，一路走，群众都围着他。有从几十里以外跑来看他，瞎子也要摸摸他。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于是到处传抄那份讲话。周总理不但再次肯定了刘志丹，也提到1935年搞错误“肃反”事件的人和事，还点名批判那些杀人放火者。我又放下一个包袱。自从1962年我的小说被打成“反党小说”后，康生领导的专案委员会和后来的中央专案组就借机鞭尸，重新审查刘志丹本人。康生他们千方百计地否定刘志丹，在提审时表现得很露骨的。

听说在文革热潮中，西安有人按照康生的旨意，想要捣毁志丹陵，取消志丹县。那个支持造反派的省委书记找刘志丹的亲属谈话，要他们表示态度。还有人贴刘志丹的大字报，给刘志丹编造了十大罪状。周总理讲话后，贴大字报的人马上又跑到刘志丹夫人面前去报喜。有人问：“你不是给刘志丹贴了大字报吗？”他矢口否认，事后竟然还去哭陵，边哭边说：“你要不死多好呀，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真是两面派！那个编“刘志丹十大罪状”的人在干部会上被质问，要他拿出“十条罪状”来，他说是上边有人要，自己凑不起来。大批老干部痛哭流涕说：“老刘又一次翻了身。不然我们大家又都成了反革命。跟随他打了多少年仗，被内部的坏人一回又一回地打击。若不是总理说话，所有跟随老刘革命的

人都会含冤致死。”周总理讲话给了我精神支持。一本小说株连了几万人，可算是旷古奇闻，虽然我对此很痛心，但说明了很多问题。周总理讲话总算是严冬的一股暖流。人们脸上逐渐有了些血色。景范的继母由西安到了北京。我俩躺在一张床上拉家常，她很关心景范，我请她去看景范，透点家里的消息。继母答应去探监。我们又写信送去中南海西门。三天后，憨厚老三来说：“中央专案组要求调查继母和刘景范的关系。”查了半天才同意继母去探监。我对继母说：“探监的路很远，和他们坐在一辆车上可以问他们：刘景范犯了哪一条法？你们能给我说清楚吗？要是没犯法，就应当把他放出来。”继母不识字，只是答应着，她头脑是清楚的，能记住这些话。那天，索拉陪奶奶去探监，一手挽着奶奶，一手提着东西。回来时下了大雨，戴领章帽徽的军人硬是把老太太和孩子甩在路上，让一老一小在大雨泥泞中跋涉回家。我问继母：“景范怎么样？”“我摸摸他的脸、他的腿，都是肿的；揣揣肚子也是胀的，怕是生了什么病。”“你在车上对专案人员问了那些话没有？”“我问了，没用。那些人都像泥塑菩萨，砸不烂的石头疙瘩。”

听妈妈说景范有病，我的心又紧缩起来，盼有人能再去看景范一次。正坐卧不安，刘志丹夫人，景范的嫂子到北京来参加“人大”。她一到就来看我，我俩同床共枕说了一夜话。我请嫂子去探监，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索拉又照样写信，三天后照样来了两个军人，要孩子陪着大妈到交通部门口上车。土地革命时期，他们就把刘家的人都当成反革命家属。1935年，刘志丹和刘景范兄弟俩被左倾机会主义者逮捕后，嫂子就当过反革命家属。想不到40年后，她为了弟弟的冤狱，又当了第二次反革命家属。嫂子探监看得更仔细，回来对我说：“这人是病了，肚子都胀了起来，脚下像踩着棉花。再不赶快弄出来就要出事了。”嫂子说着就哭了起来。我说：“嫂子，用你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吧，要求把他放出来。”嫂子说：“给毛主席写信，顺便把江青也挂上一笔，要不她会给咱捣乱的。”我不愿提江青，嫂子说：“你不懂策略，挂上一笔，问候一句怕啥？咱们是为救咱的人嘛！”我照嫂子的意见写了：刘景范已坐了7年牢，现年老体弱、疾病缠身，要求把人放出来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他有错误，出狱后也可检讨改正。

信用挂号寄出后，嫂子怕不顶用，不放心，这几天在北京又去看了一些刚被解放的老同志，都支持她去找总理。嫂子去看邓颖超大姐，请求总理说话放出

刘景范。那时总理已病在医院，邓大姐接见嫂子，问了我们全家的情况。嫂子回来说：“邓大姐细心着哩，把你的每个孩子都问到了。大姐虽然也有难处，但还是答应请总理过问这件事。”嫂子悄悄对我说：“看样子，邓大姐好像也受着监视。她说话时总有几个人在跟前。”我感谢嫂子，感谢邓大姐和周总理。

果然，嫂子的信和周总理的过问起了作用。1974年12月27日晚上，专案组的李庚民和胶东人来把我们全家人召集起来，宣布毛泽东主席对刘景范案的批示：“宣布释放，免于追究”，把复印件拿给我们看了。我们全家都很激动，真诚地喊“毛主席万岁！感谢毛主席。”李庚民当场说：“自从接到毛主席批示，我们就到处为你们找房子。虽然还没找到合适的，明天就先把刘景范接回来，你们在家等着。明天上午九点来车接你们。”我问：“这次让我去吗？”他思索片刻说：“你也可以去。”我可以探监了，分别7年，我们没见过一面，没通过任何消息。当晚，我们谁也睡不着，话也说不完。我既喜且悲，心情很复杂。欢喜过后，我渐渐冷静下来想：“免于追究”是甚么意思？难道是说，问题还是有，只因为上级宽大为怀，不予追究罢了。让你感恩戴德，永生不忘。可这能算是清楚了吗？刘景范因为妻子写了一本小说坐了7年牢房，释放时总该说个明白吧？怎能只是以这“免于追究”四字了事？

83、刘景范出狱

1974年12月28日早上九点，李庚民他们按时来了。开车把我和嫂子、索拉拉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让我们先住下。那里已准备了两间房，有8个床位，孩子们回来也够住了。下午，胶东人和李庚民又来了。走在前面的胶东人见到我伸出手，准备和我握手，既然“免于追究”，大概就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握手了。我却不领情，把手缩回来放在背后，心想：我还没有把你看成朋友呢。后边跟着地质部专案人员憨厚老三。他过去比较讲理，还为我帮了不少忙。我和他紧紧握了手，表示谢意。李庚民说，这里的房子不合适，没有大房间。然后又把我们送到万寿路西街7号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在第二栋一层准备了一个大房间和两个小房间。大房间约有三四十平方米，客厅兼卧室，我和景范住；对面一个小间给嫂子住；楼上一个单间是给索拉和阿姨住的。房子安顿好了，才坐车去秦城监狱接景范。进了监狱大门后，拐来拐去走进一个小房间，像是个接待室。我们

进去不久，景范由人陪着出来了。我们彼此看了看，没有说话。李庚民再向景范宣读毛泽东的批示，还说：“审查干部是党的权利，事出有因，希望你们要正确对待。”我没说话，内心很反感。两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万寿路招待所。我们一住下，他们就走了。这里是中组部招待所，登记时必须说清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住多少天。我能说什么呢？只得对值班人员说：“从监狱里来，不知到哪里去，更不知要住多久。谁找的房子就由谁来付房费，我们都是刚放出来的犯人，无钱可出。”值班人听得直发楞。

自然，我要问景范在狱中的情况。他为什么从卫戍区到了监狱？他们用甚么借口竟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简要地叙述了经历。1968年1月8日下午被送进卫戍区后，又换过几个地方。中央和地质部的专案人员常去提审，还野蛮地拳打脚踢。把他打翻在地，泼上冷水，拉着双脚在地上转圈，直到满身是泥，把衬衣和身体都磨烂了才算罢休。还有一种刑法“坐飞机”，两个人架着膀子向上撅，有时还用两个大汉在前面踩着脊背，再用人拉起他的两条膀子用力掀，只掀得膀子几乎脱臼，疼得满身流汗，还不放手。还有人戴上铁手铐打他。用尽刑罚的目的，就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小说《刘志丹》的真正作者，是反革命。

他说：“书不是我写的，我不是反革命。”穿军衣的专案人员说：“康老说你是反革命，你还敢不承认？”景范一气便说：“康生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所有的专案人员都一齐叫起来：“你敢骂康老？他为啥是反革命？你说出理由？”景范说：“康生自从苏联回来就没干过一件好事。在延安搞抢救运动，诬陷了很多好人。在晋绥土改打死了许多人，还伤害了一些民主人士。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又到处点名，说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特务，伤害的都是好人。破坏了我们党的政策。康生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专案人员说：“你敢写出来！”“我当然敢！”他把自己说过的话写了出来。我不禁暗暗叫好：好一个陕北硬汉！他们收走景范写的东西后，第二天来提审时宣布：“刘景范是现行反革命，马上正式逮捕。”便戴上了手铐。关于景范的被捕，他们曾编了许多谎言，说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骂了毛主席。从此以后，景范换过很多监狱。每次换监狱都用黑布蒙上眼睛，装在吉普车里，让他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他戴黑眼罩也不是第一次了。1935年陕北“肃反”时，给被捕者戴上黑高帽，怕百姓认出是什么人。景范也戴过，现在

又用黑布蒙眼。

景范待过的有些地方，经常被狱卒打骂。最可恶的是，有时还派武装战士背着枪，每天 24 小时站在床前。有个战士患肺结核，不断地吐痰，把痰吐在他的床铺上，吐在开水桶里，使他不能喝水。还有个麻子脸狱卒打人很凶，像仇人一样对待犯人。他怀疑是敌人的后代当了狱卒。否则，谁都知道这些人都是受冤的老干部，怎么下得了手？他有十二指肠溃疡，吃了苞谷面就胃疼，硬是饿了 5 天没吃饭，居然胃不疼了。吃窝窝头，一个不够吃，他要求再给一个，狱卒就打他。这监狱和 1935 年景范在瓦窑堡坐的监狱差不多。

在监狱时间长了，他得了幻听幻觉病，每天看见墙上放电影，内容全是 he 熟悉的，有老家，有延安，还有老战友和亲人，特别是已经去世了，牺牲了的。他看见过自己的祖父，父亲，哥哥，看见过自己的老部下。他们都在和景范谈心，问他在干甚么？他就与他们对话，幻影说：“回咱老根据地吧！这里不行，人家占了咱们的家乡，还要杀咱们的人。没有好东西！自古如此，打江山的人活不过抢江山的。”他也答话：“不对，你们说得不对！现在是毛主席领导，不是执行王明路线的人领导。”有一次，要提审时，狱卒押着他往提审室走，耳边就有语音：“什么也不要说，这都是坏人。”无论是放风，还是独自坐在囚室里，他总是自言自语。有一次狱卒问他：“你说什么？”他说：“你看，墙上那个人在跟我说话。”狱卒说：“胡说！明明什么也没有，你偏说有人。”便把他打了一顿。

听他的叙述，我估计是他的神经受到了刺激，说话的嗓音也变了。原来 he 长期被单独囚禁，连放风时也是一个个放出来互相不见面。孤独寂寞之中，他每天看着窗格影子数时间；用剩饭渣喂蚂蚁，养蜘蛛，和这些沉默的伙伴一起消磨时光。后来允许 he 看报，他就大声读报。多少年没人和他说话了，再不读报会变成哑巴。开始狱卒以为 he 在和甚么人说话。打开门一看， he 在读报，还骂了一顿。我又问他：“有人说，你往门外递钱，挨了一顿打，还骂你是流氓行为，要收买狱卒。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我想家人，总觉得你们都和我关在一个监狱。听见隔壁有人哭，以为是你在那里；听见门外有人叫，觉得是米拉。有一天，她在门外喊，爸爸，我肚子好疼啊。我说，你赶快看病去！她说，我没有钱！我摸摸衣袋里，有你塞给我的那张 200 元存款单，就从门缝塞出去。狱卒把

门一开就骂起来：你为甚么往外塞钱？想收买我们吗？我说，听见我的孩子在外面叫，说肚子疼。狱卒骂道：谁是你的孩子？简直是流氓！把我们当成你的孩子！”这就是“流氓”二字的来源。

我听了几乎哭出来：“孩子根本没有进监狱。他们都在内蒙插队，68年9月就走了。小女儿去了江西，没有一个在北京了。只有你一个人在北京。你听到的全是幻听。”他还问我：“你是不是关在我隔壁？”我说：“我被锁在地质科学院地下室，曾想托专案组转东西给你。想让你知道我的下落，免得你有精神负担。他们不答应，害得你得了幻听幻觉症。”我又问：“后来，你为什么说书是你主持写的？你为什么瞎说？使他们不断审我，两边口供不一样，他们不放过我，总觉得我态度特别坏。”他说：“后来我仔细想，咱们有孩子，没有你，孩子咋办。我要求他们把你放了，所以说一切责任都是我的，与她无关，全揽在自己身上了。”我说：“我也估计你是这样想的，太离奇，被我顶了回去。关于书的事，你和仲勋、文瑞都说不清楚，你们基本上都没看过我的书稿。我究竟写了些什么，你们都蒙在鼓里。你们才真正是受冤枉呢！只有我能说清楚。当然，他们很主观，不愿听真话。”他还说：在监狱里听到过陆定一的说话声，也听到过利瓦伊汉的说话声。他熟悉他们的声音。还听到有女人哭，有人挨打，还有人逃跑，又被抓回来毒打。我问：“秦城的伙食怎么样？我打听过，各说不一。”他说：“有时好，有时坏，比如过年，菜里有黄花木耳，可是他们不给好好做，连洗也不洗，把柴草都煮了进去，弄得人吃不下，把公家的钱都浪费了。”

他说监狱里也有好人：“我满口牙都坏了，都摇动了。有个牙科大夫来检查，是个女大夫。她说，现在条件不好，拔牙的效果不会好，也不好镶，我教你做牙保健吧。她教我照着每天做，果然疼轻得多了。我见景范已变了形，脸胖得不正常。怀疑狱中给他吃了什么药，故意弄成那个样子。可是谁也无法调查清楚。监狱生活使景范变了样，变了声音，变了性格，庆幸的就是还没傻，还没有疯。

84、劫后遇故人

景范出狱的消息传出后，亲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家里的沙发上、地毯上到处睡满人。要招待这么多亲属吃喝、送礼、打发路费，怎么办？只有去借“冻结

工资”，因为我们的工资都还没有照发。在北京的熟人和老乡也络绎不绝地来看我们。最初几天感到的只是兴奋，劫后余生的兴奋。过了几天，景范就有些疲倦了，他身体不好。我们就回真武庙那个四层楼上去躲一天，休息一下，做点想吃的。谁知这里也躲不了，有些朋友追了来，真是无比热情，又是喜悦，又是激动，说个没完。我见人总要说几句抱歉话：“为我的书让你们受罪了！”大家都说：“这不能怨你，人家就是要借这件事打咱们嘛！”他们说的是真话。这么大声势，我没给任何人栽赃，没让康生的专案组捞到一点稻草。我是问心无愧，因此不但脸是笑的，心也是乐的。

有人告诉我们，毛泽东对景范的批示是 20 个字：“此案审查已久，不宜再拖。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而他们只传达了后面的 8 个字。为什么？显然那里批评了专案人员把案子拖得太久，整整拖了 12 年，最终还是一笔糊涂帐。看来如何传达毛泽东批示，恐怕是康生、曹轶欧和郑平年一伙商量过的，专案人员没这么大的胆。问题没算完，只是从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虽说我们可以参加各种会议了，但那紧箍仍在头上，他们随时可以念动紧箍咒，让我们翻不过身来。我有个二妹专从贵州来看我，在真武庙一进门就抱住我恸哭。不过，我没有哭，也不打算哭，只是在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盘算着将来如何讨回这笔帐。

在招待所，大家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开头几天，人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瞅我，然后是噼噼喳喳一阵议论，对我都很客气，熟人们更亲热。记得有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宁夏省委书记杨静仁、副书记马玉槐、陕西省委书记舒同、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福建省委书记叶飞、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文化部副部长冯乃超、甘肃省委书记汪锋、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他们有人是从外省来京治病的，有人是来申诉的，有人是待分配工作的，还有人则刚从监狱中放出来，还无家可归。他们中的每个人在这场动乱中都有一部血泪史。

在楼道遇见马玉槐，从他那里知道杨静仁也在这里，那是延安时的熟人，1947 年一起在陕北绥德县下过乡，多年再未见过面。经过这场灾难还是想见见这位熟人。我在食堂里到处找，终于找到他。我自我介绍说：“我是李建彤，你是杨静仁同志吧？”我伸手和他相握。他苦笑着说：“你还敢认我？”“怎不敢认呢？景范也在这里，你们见见面吧！”我拉他到我们吃饭的桌上，景范见了他很

热情。看来杨静仁遭的难也不小，显得很拘谨，沉默寡言，好像重压仍在身上。汪锋是在大动乱开始就被毛泽东点名的4个三反分子之一，到处拉着游斗。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曾被红25军当反革命，从陕南拉到陕北关押的。那次他是为营救张汉民，怕这位地下工作者被红25军杀掉，带着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去见25军领导人。但张汉民还是被杀害了，汪锋自己也被当成是他的反革命同伙拉到陕北。我们聚在一起叙叙旧。他说起甘肃就感叹不已：有的老干部经不起考验，成了软骨头，遇事就向坏头头汇报，弄得老战友之间也不敢来往了。这里的人都指指点点说蒋南翔是硬骨头。在批斗时，他说：“不让我办教育就不办。若让我办，还是坚持我的做法。你们愿斗就斗，愿关就关，我不在乎。”我和景范特地上楼去看他。屋里只有他一个人，孩子有时也回来看看。问起夫人，他们已经分道分道扬镳了。听说他们的思想不同，处境各异。这样的夫妻，离了也罢。

有一天下午，我和家人从街上散步回来。一进门，看见个高个子，穿一身浅灰衣服，在院子里散步。他看上去旁若无人，似乎不想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的侧影很像周扬，我没敢认。从1962年后再未见过他。在大动乱期间，批判周扬的文章多得数不清，还有人说他是叛徒。姚文元写《评周扬的两面派》中还点了我的名，说周扬接见过我这个“反党分子”，还看过我的小说。这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因此我特别关心他的下落，想见见他。在食堂里一直没见到周扬。有一次去打开水，在锅炉房碰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走近看，很清秀，像是周扬夫人。我冒昧地叫了一声苏灵扬同志。她仰脸望着我问：“你是谁？”我们在延安时见过面，进城后从未见过，一晃就是30年了。如今我被整得人老神衰，她当然认不得了。我答道：“我是李建彤呀！”“啊！你也变成这样子了！”我忙问：“周扬同志也在这里？”“在！在一号楼二层西头面北的最后一个房间。”

第二天下午，我便去敲门，出来的正是周扬。时隔14年，他已不大认得出我了，问：“你是谁？”我说：“我是李建彤，来看你。”进屋坐下后，我先问他身体怎样，然后说：“为我的事也把你害苦了。”他说：“身体还可以。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景范呢？”“他也在这里，我们是1月底来的，从监狱刚出来。”今天我还想说说1962年给他写那两封信的事。对那两封信，我从来没有检讨过，始终坚持自己是对的，闫红彦是错的。但事隔14年，周扬本人并不知道真相，

我不能不告诉他说：“1962年我写给你那两封信，批评阎红彦，我没有错，无论他们如何整我，我始终没有检讨过。如果说反党，是他反党，不是我反党。十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个态度。希望你也不要再惦记着这件事了。虽然案子还未全部澄清，但水决不会倒流，因为我是对的。”“啊！原来如此。”周扬很意外，他为此事不知做了多少次检讨。头一次也就说了这么多，我赶快告辞。周扬老师把我送到楼梯口，我回头对说：“如果你的身体能走动，到食堂吃饭吧，我们都在那里，可以吃热饭。”

从周扬那里出来，我就去看宋任穷，他住在后边小楼里。在这场大动乱中，他也受了我的牵连。沈阳大街上写着大标语：“打倒宋任穷！宋任穷支援李建彤为高岗翻案！”有些东北的小报上也编了不少慌言。宋任穷被整得驼了背，我问：“是否被人打坏了？”他开朗地笑着说：“没有打坏，你看，我的臂膀还很灵活。”他动了动臂膀。我向他诉说东北专案人员几次来京提审，逼着我揭发他的情况。我问他：“你是原28军政委，和26军毫无关系。怎么能扯上高岗呢？”他笑着说：“要扯么，用什么办法也可以扯上！”他的夫人钟岳玲大姐请我喝茶，吃水果，说笑了一阵。宋老说：“明天我去看景范。他比我吃的苦多。”

有次我正与原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说着话，远远走来宁夏自治区副书记杨一木，他是来看景范的。在文革中，他这是第二次来北京。第一次是康生命令他来的，要解决宁夏的“青铜峡事件”。所谓“青铜峡事件”是宁夏两派武斗。一派是康生支援的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双方打起来，康生命令兰州军区政委调驻守固原的一个团支援造反派。1967年8月28日，康生下令开枪开炮，打死保守派100多人，造成了血案。康生又嫁祸于杨一木。因为当时杨静仁和马玉槐都不知去向了，只剩下杨一木一个在硬着头皮维持生产。结果又被造反派拉到各县去游斗，最后又拉到北京。康生一见，原来是老对头了。1943年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有人向中央提意见。上边不得不下令甄别。老杨是西北局甄别委员会的委员，曾为了一个案子得罪了康生。这次，康生一定要老杨承认是“青铜峡事件”的指使者，在西苑饭店关了他28天，每天有人监视着，逼他写交代。到了第28天，老杨索性写道：“青铜峡事件，杨一木一字不知。”又把老杨弄到宁夏批斗，有人拿着赶大车的长鞭往他脸上抽：“打死这个杨静仁！”有人拦住说：“他

不是杨静仁。”造反派连人也没弄清就乱打。斗得老杨患了心脏病，万般无奈向人悄悄借了1000元钱，搭火车去上海治病，然后又转到北京，住在这个招待所里，还是治病。

招待所院子里又来了一群女将，其中有贾拓夫夫人白茜。贾拓夫被诬为“习、贾、刘”反党集团成员，迫害致死，留下孤儿寡母。白茜见景范身上穿着新棉袄便感慨地说：“到底还是有个家好啊，李井泉就没有这样的衣服穿了，他没有了老伴。”我看过大字报，李井泉的老伴被江青派人逼得自杀了。同白茜一块来的还有白烈菲，是烈士的后代，原农业部副部长朱敏的夫人。朱敏也刚从狱中放出来，双腿不能走路，烈菲在尽心照顾。两位白大姐还带了一位囚犯的妻子陶明霞。明霞是从南京来探监的，她丈夫是江苏省委书记陈光，被打成“五·一六”头子拉到北京关了起来。据说，江苏省打了40多万“五·一六”分子，陈光被押到北京，算是最重的。明霞说：她到监狱探了陈光，身体坏了，手颤抖得厉害。明霞也得了乳腺癌，刚刚动过手术。马明方夫人马淑良也带着小女儿搬来了，要给明方办后事。明方死得冤，可怜他的女儿小芳成了疯子。淑良说：“孩子神经本来就不太好，文革中斗争明方，孩子哭着喊：‘我爸爸不是叛徒，不要斗嘛。’造反派就打她，越打越疯了，现在20多岁了，怎么治也不行。”可怜的一对母女！这里还住了西北好几个省一级领导干部的寡妇。

我心里还惦念着许多受株连的朋友。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已经出狱。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还没消息。他受我的牵连最大，我内心深感歉意和不安。嫂子去看望他的亲属。住了几天，带回一封信，要给朱德同志送去，求他说说话。我和嫂子一起去送信。沿着万寿路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朱老总家。我的问题尚未解决，不愿给老人家添麻烦就对嫂子说：“我在门口等候，你一个人进去吧。”嫂子进去不久就出来说：“见了康大姐，也见了朱老总。他们答应帮助转信，找机会为仲勋说说话。”

85、患难与共的朋友

这场文化大革命闹得我脑子也坏了。刚被关押时，一天有多少拨来提审的，我都不在乎，可以对答如流。自从在江西害了几场病，回来后脑子就坏了。过去

的事情一点也记不起来，我真有点发怵。一个熟人把我带到一位叫张协和的老中医家治病。他对我很热情，诊了脉，让我每天吃一两个鸡蛋。我照着做，果然逐渐生效了。过几天，张大夫来看我，给我带来一枚图章，是老战友朱丹亲手在一块名贵的玉石上刻了“建彤”二字，侧面又刻上一行小字，“1975年国庆前夕为建彤治印，以作纪念，请予晒存，盖此名字深有纪念意义也”，署名“老丹时年六十。”这是友人的深情厚谊，因为我的问题尚未解决，仍是反党小说作者，也只有老朱这样不怕死的人才敢这样做。

张医生和老朱是老同学，我就约他一同去探望老朱。一路上换了几次汽车，走了两三个小时，才到广渠门文化部宿舍的老朱家。我们劫后相逢，说了些文革中的遭遇，也只是寥寥数语，无暇细说。老朱对人太诚、简直就是“老顽童”。只要给他三分友情，他就会对你无话不说，因此经常吃亏。他为我看过《刘志丹》小说的最初几稿，最后一次还在每页上都作了眉批，说是要像“脂砚斋评石头记”那样认真，永远留存。那本书稿送还后，我当然很珍惜。当我被抄家时，再也无法保存，又舍不得焚毁，只得托给老朋友刘迅说：“请你保存吧，或者交给老朱自己保存，千万不要毁掉，将来我还是要用的。”1972年我回到北京，向刘迅家人询问过老朱。老朱当时处境恶劣，被牵进了一个案子。他不敢保存自己的笔迹，只得亲眼看着刘迅将书稿焚毁。我告诉他：“1962年专案委员会提审时，没收了我的全部采访记录和笔记本，在笔记本上看见过你的名字。他们追问时，我只说，朱丹看过，但提不出意见，因为他不了解西北历史，只在文字上提些意见。”老朱笑着说：“为小说《刘志丹》，是斗过我几次，但他们没有一点材料，我就料到是你把了关。”临走时，我说：“就当我没有来过，什么话也没说”，大家心照不宣。

回到招待所又遇见难友钱凝来看我。她还是那样清瘦。我怕这客房里有窃听器，便约她到后院的苹果园散步，可以说知心话。钱凝这次是来告别的，她将要去美国探亲。她要求了好几年，都不让走，因为戴着右派帽子。这次弟弟来接她，弟弟是美中友协成员，才总算同意她们夫妇一同走。她问我：“你看我要不要带孩子？”“你的孩子太小，如果有人照管，当然可以不带。你自己的打算呢？”

“实话说，在地下室关押放出来后，我就随研究所到了陕西蓝田县，在那里更受

气。他们把我的孩子当狗对待，不让吃饭，逼着孩子吃屎，说是特务的孩子。”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又冒起火来，就说：“带走吧，让孩子逃个活命！既然在这里不当人看待，就全家都走吧！等时局好转了再回来。”她沉默着。钱凝又问我：“你的小说呢？我可以帮你的忙。只要我出去就可以帮你出版。”我说：“你就不要管我的事了。肉既然在锅里，就在一个锅里先炖着吧。我已经忍耐了十多年，还可以再忍耐下去。中国人的忍耐力最强，当然反抗力也最强。”我补充说：“还是我对你说过的那句话，出去后不要骂咱们的国家，也不要提你认识我。”

86、根据地乡亲遭难

1975年国庆节，景范出席了国宴，名字见了报，外地的熟人纷纷来看望他，人更多了，特别是陕北人的后代来诉苦喊冤的几乎天天都有。有一天，陕北来了个30多岁的青年，进门叫一声爷爷就哭了起来。景范忙问他的姓名和家乡。他说是保安人，要为陕北人告状。现在陕甘老区一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或“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反党集团”的黑爪牙。他们挨打，被关，被逼死的人也不少。群众思念刘志丹，但不敢公开哭老刘，因为只要沾上刘家的边就成了“黑爪牙”、“反革命”。中央派来的专案人员就是要找刘家的茬儿。在保安县金汤镇，刘志丹的表侄、王兆吉烈士的儿子王悦贤被逼死了。刘志丹的堂弟被打死了，堂妹被打得遍体鳞伤。就像1934年反动派到那里围剿一样，把姓刘的亲戚都整遍了。老根据地南梁地区的干部群众也都深受其害。陕甘边界的人民就象遇上了反动派的又一次围剿。

文革一开始，康生就宣布：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在陕西就是批判小说《刘志丹》，在西北五省清除“彭、高、习”的势力，肃清流毒。陕西到处是监狱，西安建国路监狱就是专门关押老干部的，特别是把那些在1935年陕北“肃反”中受迫害的老干部重新抓起来。他们说：1935年陕北“肃反”是对的，因为你们都是反革命。1942年西北高干会清理路线问题是错的，因为是右倾、右派。在陕西设立“习仲勋专案”，怕走漏风声，又转移到青海，由省委书记亲自管，整了几箱材料，放出许多暗探。北京西安饭庄王经理和湖南饭庄经理，都被说成是习仲勋的地下交通员，遭逮捕，被抄家。西北五省有几万人受《刘志丹》株连。有人说：“不知到底是李建彤利用小说反党，还是有人利用小说残害老区人民？”

即使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最坑人的是“学大寨”有被逼上吊的，有日夜干活累死的，有修水库砸死的。省委书记还到处邀功，张扬着开庆祝会，逼群众清扫街道，修整路边的庄稼蒙混人眼。他们哪管人民的死活。老百姓形容这些年的生活：从前的粮食是大囤大囤的。现在的粮食是小罐小罐的。从前外地穷人往陕北跑，因为那里有吃的。现在陕北人四处逃难。老百姓连讨饭自由也没有了，干部怕露馅，谁要求去讨饭，得先经过干部检查，摸摸你家粮罐，实在是一把粮食都没有，才批准去讨饭。自从推倒反动政权后，陕北人哪里有过这种苦日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时，就这么个小地区能养活十多万军队干部和学生。供应是丰富的，战士和学生最低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粮食、一斤青菜，每月一斤油、一斤盐、二斤肉。如今全国解放 25 年了，各省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油，还赶不上那个特殊的山区。陕北人民又掉进了苦难的深渊，怎能不使人痛心？群众形容那些文革上台的新干部：“牵上羊来扛着枪，看你活像个反动党。”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的事，而是文革新形势下的新生事物。

87、招待所里的怪事

在招待所里，虽然有这么多熟人，除了吃饭、散步能碰上互相打个招呼，真正来往的并不多。这里并不太平，大家的问题都还没有彻底解决，所以都有意回避。听服务员悄悄说：中央组织部常派人来了解情况。有些人还负有向他们汇报的任务。我这才明白这里也有特务。康生提拔郭玉峰当了组织部长，还有个副部长郑平年也是康生的亲信，郑还当过我们的专案组长。他们派人到处为康生搞情报。“批邓”运动开始了，郭玉峰派人通知宁夏把杨静仁接回去，说他是邓小平找来谈工作的，不能留在北京。来人还查了传达室的会客单存根，要杨静仁交代和这些客人谈了些什么？听说杨静仁回到宁夏后，“四人帮”的爪牙还在找麻烦，说他是“走资派还在走”。

我的小女儿索拉很有音乐天赋。因为家庭遭冤狱而无法深造，当了中学音乐老师。我回来后借钱给她买了架新钢琴，每天下班回来弹一阵琴。钢琴引来了许多孩子，都是住在这里的老干部子女。他们也都因家长遭迫害而失业或失学在家。他们经常在我们屋里听着索拉的琴声唱起歌来。突然门外有人骂街：“这还像个招待所吗？连他妈的钢琴也搬进来了。我们这里从来没人弹过这玩艺，谁要

想弹就他妈的出去，不能在这儿住！”我开门出去一看，是个40来岁的男人，一付凶相，还带有几分醉意，骂骂咧咧的就好像这招待所是他家开的大车店。我说：“我的孩子是音乐教员，工作需要弹钢琴，如果谁不让在这里住，去向中央组织部反映，我们可以另换地方。”女服务员小李忙把我拉了回来低声说：“您别理他，他原来是这里的一个勤杂工，没什么文化。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痞子当上了造反派小头头，变得又混账又专横，和他讲不清道理。”在大动乱中摔打出来的孩子们是什么也不在乎的。有个姓曾的女孩大声喊起来：“拉拉，弹！管他那一套，谁不愿听，让他把耳朵堵上！”这里的一群年轻人不怕造反派，不怕“四人帮”，一生气就骂人。

这几天，周扬夫妇已到食堂来吃饭，我们两家坐在一张桌上。一连几天，我们都在谈过去，回忆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的那段生活。我告诉周扬，文化大革命中又审查历史，查我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的情况，要我写出证明人。我写的主要证明人就是他，鲁艺的校长。周扬也在回忆过去，他很冷静，对过去那些事有了新看法和新认识。招待所的喇叭每天广播新闻。这几天广播里传达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才难得，要请他出来主持工作。大家高兴了没多久，又听传达说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反击邓小平。中央发下3个文件称做“三株大毒草”，都是邓小平主持写的，要求大家批判。中央组织部每星期派人来招待所主持学习会。凡在这里的干部都得表态。我的组织关系不在这里，每星期回原单位学习一次。那几天，我心烦意乱，就到周扬老师那里去和他们聊天。我说：“我学习不下去。发下个《论总纲》，前边先批了一大堆。一看前言批语就反胃。”周扬到底是老师说：“你再耐心看看，后边有原文，很尖锐。”我回到自己房间仔细读了《论总纲》原文，养心提神。邓小平批“上海帮”批得真尖锐，针锋相对，毫不留情。那是代表人民的声音，看了使人扬眉吐气。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民和他站在一起。被压抑的不满一触即发。

88、悼念周恩来总理

1976年1月8日那天，吃过早饭，我回到房里，突然广播里传来了哀乐，播音员沈痛地宣布：周恩来总理逝世了。阿姨哭着说：“天塌了，天塌了！”小女儿在房里开始大骂当局。阿姨赶紧捂上她的嘴：“这是啥地方？要惹祸的！”人们

的精神都很敏感，有个朋友来说：“你们房里换了电话？”“没有。只是有人进来修理了一下。”“不对，你还是查一查，看是否有人给你安了那个？”她指的是窃听器：“不然，外面为什么会传说你们换了电话呢？”她说完就走了。

没有人通知，没有人组织，一夜之间，全招待所的人都戴上了黑纱、白花。每一双眼都哭得有些红肿，闪烁着悲愤的光芒。前后院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往街上跑。他们到哪里？家长们不知道，索性也不管了。有人说：外面几乎所有建筑物门口都披上了黑纱。商店的黑纱、白头绳和做花圈的白纸都卖完了。男女老少都戴上了黑纱和白花。家家户户都设起了周总理的灵位。人心好齐啊！那是痛心，那是愤怒。上边有通知规定：不许戴黑纱，戴白花，不许挂黑幔。可是没有人听。客人们带来外地消息：各省群众都在集会悼念周总理，声讨阴谋家。到处是快要爆炸的地雷。开往北京的火车头上戴了黑纱，北京不许列车进站，可列车和旅客偏要进站，警察拦也拦不住。我走到街上看看，人山人海，到处是黑纱白花，也有一些穿蓝中山装的便衣在人群中鬼鬼祟祟地蹿来蹿去。他们是在监视群众。

在食堂吃饭时，苏灵扬轻声告诉我：“天安门的群众追悼会比官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的热闹得多。看来她已去过了。我和阿姨一商量，两个人悄悄出门，直往天安门去。那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我们随着人流进入天安门广场，一步一步走上人民英雄纪念碑。我站在那里虔诚地对周总理像鞠躬。周围愤怒的群众已经拔出了剑，直指“四人帮”。回到万寿路，索拉也刚回来，在天安门拍了许多照片，抄了许多诗词。她要将诗词谱成悼念周总理的挽歌，让朋友们传唱。广场上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我到人民大学去看一位老朋友，听说一个清华大学学生被叫去，要他化妆成工人到天安门广场。我心里一惊，马上回家告诉索拉：清华大学要派特务学生到天安门盯梢，你们去了要吃亏的。孩子把我的话传开去。

总理出殡那天，“四人帮”下令：各单位只准内部悼念，任何人不许出大门。万寿路7号二栋楼二层会议室里，中组部派人来召开纪念会。我们都要求，上街去为总理的灵车送行。主持会议的是位老太太，她动感情地说：“同志们，我和大家是一样的心情，谁不愿出去送送呢？但是上边有命令，我也不好办。”原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再也按捺不住，把脸猛然扭了过去，背对会议桌，差点就站起来。大家的心都在跳，此刻只要有一个人站起，大家就会一轰而散。我突然站起来走

了。只听见会议室里的凳子乒乓响，屋里的人都走光了。我出了大门，走到大街上一看，路两边站满了人。前排是军人，因为这一带军事机关多。军人都戴着黑纱，胸前挂着白花。后排是机关干部和群众。一望无际的长安街上挤满人。大家都向东望着，等待总理的灵车驶过。我个子矮，虽然挤不到前排，但心里却很宽慰：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正在觉醒。

等到 1976 年清明节，终于爆发了伟大的天安门“四五”运动。那一天，“四人帮”亲自在人民大会堂二楼指挥，北京市革委头头在广场下令打人捕人。公安机关的车在广场乱窜，许多人失踪了，天安门广场血迹斑斑。事后又展开大追查，万寿路 7 号也成了追查重点。他们盘问谁去了天安门广场，谁手里有现场照片，谁抄了天安门的“反动诗”？统统得坦白交代，否则查出来就要严办。我心里有点不踏实了。我们住的是招待所，锁不住门，不能藏东西。我把索拉拍的照片和诗歌都转移出去，将未冲洗的胶卷都曝光毁掉。真有点当年地下党的感觉。我们机关也在追查谁听到过谣言。有人问：“什么谣言？我们没听过，请组长讲讲。”组长当然不敢讲。还有人幽默地说：“我听到过很重要的谣言，说邓小平人才难得”。大家憋不住笑起来，那句话是毛主席讲的。在最紧张的那几天，住在招待所里的那些年轻人又忙起来。只要宋任穷的大儿子和媳妇往我家房门口一站，索拉就会跟着出去。我悄悄问女儿，她说在办一件大事，宋家儿子写了篇“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文章，要说明事件不像《人民日报》讲的那样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的。他们几个人都签了名。拿到学校印出来分给大院里的年轻人。大家再往外地寄，把真相告诉天下人。我知道后有点怕，孩子们在背着我们闹革命了。

89、四人帮倒台了

原青海省委副书记高峰也是 1962 年受株连，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干将，撤职后转到东北工作的。如今他患了癌症住在北京 301 医院。高峰夫人张耀生住在这个招待所里，平常从医院回来总是悲悲戚戚的，为丈夫担忧。这天午饭后，张耀生走进我屋里，含着笑容，神秘地说：“老李，我给你说个话。那 4 个人抓起来了。”消息来得太突然，一下子把我弄懵了：“哪 4 个人，怎么回事？”“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呀，都被抓起来了。我今天去医院看老高时大夫悄悄对我说的。医院里住的军队高级干部，凡是能走动的，昨天晚上都出

院了，说是去听传达报告。现在还保密，不让随便说。”其实，这样的消息如何能保密？我三步并做两步地跑回屋内，景范已躺下休息。我把他叫起来，兴奋地说：“好消息！好消息！那4个人被抓起来了。张耀生从医院带回的消息。”等景范弄明白怎么回事后也不睡了，坐起来和我聊天。他总怕不确实，我就把张耀生的话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他便兴冲冲地下床串门去了。

怕打扰大家的午休，我强忍着坐到2点钟就往前院跑，成了义务宣传员。到了周扬家，推门进去就说：“江青、张春桥他们被抓起来了！”他还不相信，觉得这变化太大太快了。我又转述了张耀生的原话。周扬隔壁是东北来的薛兰斌。我进门就伸出4个指头说都抓住了。薛兰斌脑子转得快，兴奋地说：“这么快？好了！好了！这就好了！”其实，院子里早传开了。半夜听到的，半夜就去敲朋友的门，我们的消息还晚了半天。几天后，机关才开始传达。全北京开庆祝会，组织到天安门游行。从五七干校回来的人几乎都去了。连上了年纪的朱效成、吴俊如、徐本光和陈立贞都在游行队伍里。我们从西城的百万庄出发，我随着队伍走，心情特别激动，有点像1949年进城时的心情。

不久中央派人来了解情况。中央组织部的领导人也换了，准备替这里住的干部安排工作。到了1977年，大部分人都陆续离开这里，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或者搬进新房安了家。我们在万寿路住了两年半也该再见了。政协干部问我们还不想回丰盛胡同2号住。我到丰盛胡同看了一次老家，孩子们在那里住了10年，留下了他们童年时代的回忆。但到那里一看却大失所望。我们家离开后，那里曾住过军代表和造反派头头，房子和院子都变了样。房子呈现出斑斑驳驳得败象，生气勃勃的院落也满目疮痍。我看得伤心说：“这房子我们不要了，就在那个‘复辟楼’里养老吧。”

90、冤案昭雪

我反复地想，我的案子只凭两年半前那几个字的批示并不算解决。我还是背着“反党小说”作者的包袱。我要平反，不仅是我个人问题，还牵连着几万人的命运。“四人帮”打倒后，中央组织部换了新部长，是胡耀邦。许多人的问题已经解决，我该怎么办？就去征求几位老同志的意见。先问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

能不能申诉。他说：“你的问题没人敢受理，因为是中央定的。”我又去问周扬老师：我要申诉行不行？他说：“中央定的案，主席说了话的，你只能藏书，不能出书了。”我去安慰习仲勋夫人：“你放心，我会申诉的，将来一平反，仲勋他们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谁知这句话反而把她吓坏了：“建彤，你可不要去申诉。我那老头子刚放出来，你一申诉，他又得坐牢了！”她真是被吓糊涂了。过几天，周扬夫人苏灵扬又打电话给我说：“周扬同志很关心你，叫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申诉。那是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主席说了话的。”我答道：“谢谢你和周扬同志。不过，我从不相信神仙和皇帝，只靠自己救自己。”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这些老同志党性实在太强，宁肯自己受委屈，也不敢申诉。可是别人还照样说他们反党，有野心。他们真是到了愚忠的程度。我只相信实事求是，相信真理。

1977年春节，中组部李步新副部长来看景范，顺便问我的处境好不好。我说：“我背着大冤案，怎么能好呢？”李部长说：“你有意见可以写申诉，我替你带上去。”我写了个便函给胡耀邦，要求重新审理我的案子。中组部果然受理了。可是在习仲勋那里发生了障碍。他从外地来北京开会，李步新和部长助理毛铎都去看过他，回来对我说：“仲勋同志不同意给你平反。他认为平反了，对毛主席不好。”我真为他惋惜！我表示：“不能听大干部的，要听我这个小人物的。只有我能说清楚情况。他虽然为此事挨过打，但他说不清。”过几天，习仲勋亲自到我家来说服我：“你还是不要提这个问题吧。这案子是中央定的。”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问题。如果只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背黑锅就背一辈子算了。这案子牵连了几万干部，几万个家庭在受迫害。为了那几万人，我必须申诉，再挨打也要申诉。我没有写高岗，那是他们的诬陷。”习仲勋这才明白过来说：“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到中央替你说说话吧！”“不用，你不要去替我说话，也不要阻拦。你到广东上任去吧。这事我自己会办。”

就在那几天，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贾素平打电话给我说：“耀邦同志本来今天来找你谈的。可他今天要开会，要先和你谈谈。”我去找贾素平，是位女干部，年龄不大，却很老练。我无所顾及地说，一个钟头就把全部案情谈完了。她说：“别的女干部来申诉都是哭着来的，你怎么没有哭呢？”我说：“哭什么，没必要！”她笑着说：“对，我赞成这样。整我时，我也没哭过。”此后，我就一个

问题一个问题地写给她。她看过材料心中有了数说：“只需要一本书了。”我说：“书，我还得找找。”她说：“陈野苹部长说，如果你找不到书，我们给你找一本。不是发过供批判用的书稿吗？”我说：“不用，所有传阅的书稿都不是最后稿，是康生印的废稿。说实话，我的最后稿在地下埋着呢。”她说：“地下埋着的也可以拿来！”文革初期，一开始抄家，我就把一部书稿托朋友埋了起来。贾素平很慎重，拿到书后提出请文化部的专家先提出意见。

书稿转给文化部党组后，拖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没结果。听说书稿给了文化艺术研究院苏一平副院长。苏一平很为难，因为他是受株连者之一，自己档案中还有我这个案子的纪录，他不能不避嫌。文化部又把书稿转给贺敬之和冯牧。他们组织政策研究室的人集体阅读后，写出意见认为政治上没有问题。文化部党组同意后转给中组部。当时，我想，这案子是中央定的，中央的人不说话，会给耀邦造成困难。我决定给邓小平写信告康生，又怕被人扣压。此时恰巧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大姐来我家。我给她看小报上康生对《刘志丹》小说案的讲话。她说：“这就是证据，先告他！”定国大姐又带我去找董必武夫人贺连芝大姐谈了这个问题。贺连芝非常热心说：“好妹妹，见了你就是见了亲人。董老常说，要不是陕北那块根据地，我们还不知往哪里走呢？陕北干部是我们的亲人。凡是陕北干部的事，一定要认真办。”我心里热呼呼的，30多年没听过这种话了，终于由贺莲芝大姐说了出来。我把事情原委和写的申诉材料念给她听，她提了点修改意见，我改好后交给了她。

三天后，中组部宣教局通知我：邓小平副主席的批示下来了。要我到宣教局谈话。原来中组部新成立了宣教局，我的案子就由干审局转到了宣教局。耀邦部长签发了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标题是《现代文字狱》，专讲《刘志丹》小说案。宣教局仔细研究了的书稿，写出正式平反报告。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又征求了1962年专案人员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应当平反，并说：“请转告李建彤同志，向她道歉！”有的说：“这本书本不应该打成反党小说。同意平反。”有的说：“为一本书，打倒那么多人，是不对的。”有的还补充材料说明原来立案就荒唐，还把康生、阎红彦的活动加进去。为征求意见，文件周转了几个月，到1979年8月才送中央批准，即中共中央1979年53号文件。

文件认为：《刘志丹》是一部很好的革命文化作品。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有意义的。《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写作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秘密反党集团”。在写作过程中所接触的人，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不是什么“反党”的关系。

文件认为：不存在“剽窃毛泽东思想”问题。康生强加给这部小说的罪名，制造了理论上的、思想上的混乱。

文件认为：康生曾布置，不仅清查小说《刘志丹》，而且要查西北地区的党校，革命博物馆的党史宣传。意即不准宣传陕甘地区的革命历史。“此风一起，给写革命斗争史的小说、回忆录，进行历史研究设下了禁区。”

文件还认为：小说中的罗炎并不是高岗。《刘志丹》是一部小说，不是党史，应该允许作者有运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自由，而不能用索隐式的方法硬把小说人物同真人等同起来。这种索隐式的批判方法，应当废除。”

文件认为，应当实事求是的按历史的本来面目评价一切人的功过是非。不能割断历史——因此，小说中即使采用了高岗在陕北时期的某些素材，也不应定为“高岗翻案！”小说《刘志丹》案件纯属康生制造的错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发展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应当彻底昭雪平反。

53号文件发下时的1979年8月，到案件发生的1962年9月，此案整整经历了17年之久。文件发到全国各地，传达到县团级，也在我所在机关的全体人员中宣读了。大家都说，把人平白无辜整了这么多年，把我们也骗了这么多年。”有人见了我就说：“想不到还能平反。”中央文件提出，要支持我把《刘志丹》写完。因此，平反后，我没接受任何工作，关系在原单位，1980年夏天重新开始写作。1983年写完第二、第三卷，修改了第一卷，共100多万字。我并不是想当作家，只是要完成我的历史使命，报答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吃的12年小米饭。

小说《刘志丹》3卷本正式出版后，又遭到当年那些机会主义者的围攻和诬告。他们仍身居高位，结成团伙，上下串通。中央的某些领导妥协了，又把我的小说压了下来。

1985年4月7日初草

1988年3月整理成稿